CAMBRIDGE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英]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Theft of History

在本书中古迪批判了西方历史著作中普遍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进而批判了西方在创造“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情”等的过程中对其他文化成就的“偷窃”。

书中详细讨论了很多理论家的观点，包括马克思、韦伯和诺伯特 · 埃利亚斯，并与斐迪南 · 布罗代尔、摩西 · 芬利和佩里 · 安德森等学术大家展开了学术交锋。古迪提倡一种新的比较的方法论，以进行跨文化分析。这种方法对评价不同的历史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据，取代了诸如“落后的东方”和“富有创造力的西方”那种简单的划分。这部著作将触发当今西方历史学家对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讨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都将在《偷窃历史》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

作者简介

杰克 · 古迪（Jack Goody），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荣誉教授，圣约翰学院成员，因其对人类学的贡献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1976 年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1980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成员，2004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杰克 · 古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交叉领域里执笔不辍，这也让他的著作成为当今最广为阅读、最具争议的学术专著。著有《野蛮心智的驯服》、《烹饪、菜肴与阶级——比较社会学研究》、《饮食与爱情——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史》、《西方中的东方》、《花之文化》等。

封面图片：《竹荫西狩图》 郎世宁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启眞館

ISBN 978-7-308-06518-4

9 787308 065184 >

定价：48.00元

CAMBRIDGE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英]杰克·古迪 著　张正萍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窃历史/(英)杰克·古迪著；张正萍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

ISBN 978-7-308-06518-4

Ⅰ.偷… Ⅱ.①杰…②张… Ⅲ.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

Ⅳ.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476 号

The Theft of History 1st edition (ISBN 978-0-521-87069-6) by Jack Good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9-12 号

偷窃历史

(英) 杰克·古迪 著；张正萍 译

策划编辑 景 雁
责任编辑 赵 琼
文字编辑 徐 婵 杨苏晓
装帧设计 高海云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数 294 千字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518-4
定 价 48.00 元

致　谢

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已经提交过本书一些章节的内容：例如，在美因茨提交了有关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论文，在蒙特利尔和柏林提交了关于布罗代尔（和韦伯）的论文，在亚历山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交了有关价值观的论文，关于世界史这个觉见性主题曾在伦敦的比较史研讨会上提出，此外，在卢萨·帕塞里尼组织的研讨会、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贝鲁特的美利坚大学、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伊斯坦布尔的比尔基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中则发表过论爱情的文章。

本书的确是温顺之辈所害怕探讨的，它是“野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驯服思想”的产物，它涉及我早年感兴趣的很多方面。在此，我要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朱丽叶·米契尔（不仅给我思想上的启发，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彼得·伯克、克里斯·汉、理查德·费什、乔·麦克德莫特、狄克·惠特科，还有很多其他人，包括我的儿子罗卡米特。同时，我还要向苏珊·曼斯菲尔德（组稿）、莫拉尼·哈勒（录入）、马克·奥弗德（录入和编辑）、曼努埃拉·韦奇伍德（编辑）和彼得·休顿（汇编）致以诚挚的谢意！

导　论

“偷窃历史”这个标题是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大陆一直认为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制度，诸如民主主义、重商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但这些制度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也都能找到。我觉得像某些情感诸如爱情（即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情感一直被认为只是从12世纪的欧洲才出现，而且还被视为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比如城市家庭）。

如果我们看看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Trevor-Roper）在《基督教欧洲的兴起》一书中的说法，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特雷弗-罗伯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虽然有些比较史学家将这一优势仅从19世纪算起）。并且，他认为这些成就由欧洲大陆单独取得。尽管这一优势可能只是暂时的，但他提出：

> 新的世界统治者——无论他们可能是谁，都将继承欧洲，而且仅仅是欧洲所创建的局面。正是欧洲的技术、欧洲的先例、欧洲的思想引导了非欧洲世界与其过去诀别——非洲摆脱了野蛮，亚洲也告别了更为古老、缓慢和更为庄严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部欧洲史。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为此辩护。①

① Trevor-Roper，1965：11.

特雷弗-罗伯还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检验它（他的哲学），历史学家必须涉猎海外，甚至是敌对的国家”。但我认为，特雷弗-罗伯并没有涉足欧洲以外的国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现实
1 中的。此外，当他相信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实际优势时，他采取了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欧洲的成就归功于一个事实：基督教世界“自身拥有一种全新的、旺盛的活力”。[①]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特雷弗-罗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我想指出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更极端的思想倾向，这些倾向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两大洲历史的理解，也妨碍了人们对整个世界史的理解。

在非洲“部落”和加纳这个简单王国里居住了数年之后，我开始质疑那些宣称欧洲人“创造”出了政府形式（民主制）、亲属关系（核心家庭）、交换方式（市场）和司法形式的观点，至少这些事物在其他地方从一开始就广泛存在。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的学科中，还是在普通大众谈论的话题中，这些观念都在历史中有所体现。诚然，欧洲在近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点是必须说明的，但是，这些成就很多也应归功于其他一些城市文化，比如中国。实际上，东西方之间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分歧只在近代才体现出来，而且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分歧。然而，在许多欧洲历史学家看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轨迹被视为一种不同的发展进程（一种极端的观点将其形容为“亚细亚专制”），这一进程与我对其他文化和早期考古学（文字出现前后）的理解背道而驰。而这本书的目的便是，
9 通过重新检视欧洲历史学家所理解的自公元前三千多年前青铜时代

① Trevor-Roper, 1965: 21.

就开始的基本的社会转型方式，来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抱着这种想法，我反复研读了一些我非常敬仰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布罗代尔、安德森、莱斯利特（Laslett）和芬利（Finley）。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我对包括马克思和韦伯在内的学者们理解世界历史的方式进行了批判。进而，我试图引入一种更广阔的、比较的视野，切入人类生活公共和个体特征的讨论，切入市场和非市场活动以及民主和专制的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西方学者用一个非常狭隘的框架来阐释文化史问题。当我们讨论古典时代和西方的早期发展时，忽略人类学家专门指出的早期（“小型”）社会问题是小，但对亚洲主要文明的忽略，换言之，对欧洲概念中“亚细亚国家”的忽略，将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反思亚洲，也要反思欧洲的历史。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2
赞同历史学家特雷弗-罗伯的观点，认为东方文明的建立比西方文明更为牢固。东方有着“稳定的文明，这一文明有着很深的根基，以致文明在改朝换代中仍能持续不断”。[①]但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几乎都不同意这个观点。

因而我的观点便是人类学家（或比较社会学家）对“现代”历史的回应。我读过戈登·希尔德（Gordon Childe）和其他一些史前史学者的著作，他们描述了青铜时代亚洲和欧洲文明大致平行发展的状况，那么，我所提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便是：为何许多欧洲学者设定从古代开始，两大洲的发展就大不相同，以致最终导致西方“创造”了“资本主义”呢？对早期分歧仅有的讨论限于东方部分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方面，但只是作为西方雨水浇灌体系的对比。[②]

① Trevor-Roper，1965：27.
② Wittfogel，1957.

而正是这一讨论忽视了东西方的很多相似点。这些方面起源于青铜时代，比如犁耕农业、畜力牵引、城市手工业和其他一些特殊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字的发展和因此带来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当然还包括我在《文字逻辑和社会组织》(1986) 中讨论的其他文化方面的很多作用。

我认为，只看到生产方式中相对有限的差异是错误的，因为东西方在经济、交往方式和包括像火药的最终使用这样的破坏形态上都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相似，包括家庭结构以及更普遍的广义文化，都在“东方的”的前提下被撂在了一边，而这种假设强调的正是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轨迹。

对比非洲时，欧亚在生产、交往方式和破坏形式上的诸多相似点变得越发明显，但当“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不加区分地随意使用时，这些相似之处又经常被忽略。特别是，有些学者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很大程度上非洲依赖锄耕农业文化而不是犁耕和复杂的灌溉体系，它从未经历过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但非洲也不是与世隔绝的。阿善提王国和西部苏丹盛产黄金，这些黄金和奴隶穿越撒哈拉沙漠，一起被运往地中海。这有助于安达卢西亚和意大利的城
3 市与东方进行货物贸易，因为欧洲急需贵金属。[①]反过来，意大利则给他们送去威尼斯的玻璃珠、丝绸和印度棉花。一个活跃的市场将锄耕经济和早期商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一边是南欧的雨水浇灌农业经济，另一边则是东方的灌溉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经济。

除了欧亚之间的联系以及欧亚模式与非洲模式之间的差别外，欧洲和亚洲大多数社会中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相似之处也使我大为惊

① Bovill, 1933.

讶。与非洲的“彩礼”（说得更明白一点叫“聘金”）相比——一般是新郎家给新娘家财物，或者为新娘家效劳，亚洲和欧洲的情况则是，无论是通过继承还是婚配嫁妆，父方的财产都要分配一部分给女儿。欧亚间的这种相似之处，是两者在风俗制度和态度观念上广泛的并行不悖的主要部分。两者的平行性也削弱了学院派一些学者在家庭史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努力——他们一直极力突显16世纪以来英国出现的“欧洲”式婚姻模式的特征，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将这种差异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种联系是值得怀疑的，而对西方与他者区别的过分强调则显得有些种族中心主义。[①]我觉得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想尽量避免种族中心论（就像规避目的论一样），但他们却几乎很少能做到，因为他们对其他地区（包括自己的早期阶段）的了解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也往往导致他们对西方独特性的主张难以立足，或隐或显。

随着对欧亚文化的其他方面了解得越透彻，以及对印度、中国和日本地区的体验越多，我就越发现，大国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或者说欧亚的各种文明需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理解。而那种方式恰好寓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亚细亚例外论、理性的不同形式、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等人们不可能去思考的概念，这些通过概念区别阻碍了对“理性”的追求和比较。欧洲有历史分期（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其他地区（其他任何地区）则没有。差异当然是有的，不过，我们所要做的是对东西方更细致的比较，而不是粗略的对比，因为粗略的对比最后总是后者沾光。[②]

我在本书开篇想要指出，几乎很少有人提出分析性观点。我认

① Goody，1976.
② Finley，1981.

为，人们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目前的不满。首先，假定以
4 体验者为中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共同体，围绕体验者组织材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这种倾向导致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希腊罗马的特征，也是其他共同体的特征。所有人类社会都表现出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这是社会成员对个人和社会认同的部分条件。种族中心主义并不单纯是欧洲人的毛病，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是它的两个变种。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人（The Navaho）自称为一个“民族”，这与种族中心主义没多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我欣赏种族中心主义在凝聚力方面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接受这些观点的原因。这些偏见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像伯纳尔（Bernal）[①]对待古希腊的态度那样；也可能根植于17、18世纪，像霍布森（Hobson）[②]对欧洲的态度那样，因为他们貌似为了简化历史而将一些特殊情况普遍化了。古希腊不是“亚细亚”的好情人，罗马人歧视犹太人，[③]理由不尽相同。犹太人将他们置身于宗教思想中，罗马人亲近资本和文明而走在了前列，当时的欧洲人以此为基础在19世纪获得了成功。所以，隐藏的种族中心主义危险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主义，这也是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屡屡掉入的陷阱。但如果欧洲并没有像我将要讨论的那样创造爱、民主、自由或者市场资本主义，那么，也可以说它没有创造种族中心主义。

不过，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却在一个既定事实下得到强化：在古希腊广泛运用的字母文字系统所源发的权威的强化作用下，欧洲古

① Bernal，1987.
② Hobson，2004.
③ Goodman，2004：27.

典时代某种特殊的世界观融入到欧洲历史编撰的论述中，表面上科学地遮掩了隐藏在普通现象的个别情况。本书的第一部分将集中分析与历史因果关系、历史编年相关的观点。

其次，弄清欧亚之间根本分歧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将非常重要（我将主要讨论古典时代）。[①]近代欧洲的大事件、欧洲在不同领域对世界的早期统治加剧了早期的欧洲中心主义。自16世纪以来，欧洲取得了世界支配地位，部分是通过文艺复兴，凭借坚船利炮[②]的 5
优势。这些使欧洲得以探索和开拓新的疆土，发展商业机构，恰如印刷术的运用为知识的推广做好准备一样。[③]直到18世纪末期，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取得了对全球经济的实际控制权。在这种控制的背景下，种族中心主义在任何地方都开始呈现出更具侵略性的一面。“他族”自动地成为“更少的民族”。在欧洲，一种非常世故的学问便是制造为何应该如此的种种理由（有时还可能是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者的语调，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从文化而不是生理上的优势来加以考虑）。有人认为，上帝，亦即基督教的上帝，或是新教使欧洲选择了这条道路。很多人都赞成这种看法。正如一些学者所坚持的，这种统治权需要解释，但长期以来对基本因素的解释——无论是种族的还是文化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分岔只是近代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警惕以一种目的论形式的历史解释，也就是说，从现在的立场出发解释过去，将目前的优势推到古代时期，而且，相比表面的辩解，这种解释更多是从“精神”层面上进行。

① 这一点与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关于东方主义的争论有关，参阅Gellner（1994）。

② Cipolla，1995.

③ 这一优势受到霍布森（2004）的质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的扩张不仅在美洲取得胜利，也在东方大胜。在东方，它超越了印度和中国的成就。同时参阅Eisenstein（1979）。

目的论模式简洁的线形观囊括了非欧洲地区的一切事情，却遗漏了古代，它使欧洲历史自身陷入一种不确定的进步变化的叙述中。这种线形发展观不得不被另一种历史编撰学所代替，这种历史编撰学对时代分期划分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认为欧洲在前现代时期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并将欧洲历史与青铜时代城市革命中的共享文化联系起来。我们不得不看到欧亚之间随之而来的历史乐章有着一系列的鲜活特征和持续的、多方面的、相互影响的联系，尤其是思想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动的联系。这样，我们可以将更广范围的社会发展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为相互影响的、逐步演化的进程，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纯粹的欧洲大事记。

最后，世界历史一直被那些始终将欧洲铭记在心的或专业或业余的历史学家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分类方式所主导。也就是说，一种“进步”的时段划分为了自身目的而突出欧洲特殊
6 轨迹的历史背景。[①]因此，封建主义本质上是欧洲的，说明这一点毫无困难。尽管连库尔本（Coulbourn）这样的学者也尝试过使用比较的方法，但依旧是从西欧开始，最后又回到西欧。这并不是比较法从社会学意义上如何研究的问题。如我要表明的，人们必须从单独的土地所有权等特征开始，建构多种类型的特征图式。

芬利研究奴隶制关系时采用的网状方法对考察历史形态的差异不无裨益。鉴于奴隶中间可能有很多等级，他采用了多种奴隶阶层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奴隶制，比如农奴、佃农和雇农，而不是简单的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②]讨论土地所有权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难

---

① 参阅Marx and Engels，1969：504.

② 参阅Bion（1970）一书的扉页和第3页。也可参阅Bion（1963），书中提到图式的概念已被用于解释心理学现象。

题，因为通常只是粗略地分为“个人所有”和“公共所有”。梅因（Maine）认为“权利阶层”也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分散在社会的不同阶层，这一概念使我们避免了那些错误的立场，也使我们以一种更复杂、更生动的方式去考察人类状况。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分析西欧和土耳其之间的相似与差异，而不用担心过早卷入像“欧洲有封建主义，土耳其没有”这样草率的误断中。蒙蒂（Mundy）等人认为，土耳其和欧洲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①]用这种网状图式，我们便可探询人们所预测的世界未来的发展结果是否存在很多差异，而不再需要应付以非比较、非社会学的方式所形成的单一概念。[②]

当我开始探讨这一主题时，全球史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很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布劳特（Blaut）[③]强调这些曲解是由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造成的。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Gunter Frank）[④]彻底改变了他对“发展”的看法，呼吁我们“重新面向东方”，重新估价东方。汉学家彭慕兰（Pomeranz）在他所说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⑤]中提出了一个学术总论，认为“大分流”仅仅是从19世 7
纪初才开始出现的，在此之前，世界主要地区都存在可比性。政治学家霍布森最近在《西方文明中的东方源流》一书中也作了全面论述，试图表明东方的主要贡献。[⑥]费南德兹-阿梅斯托（Fernandez-

① Mundy，2004.

② 虽然我提到的这种社会学比较法，但很少有社会学家能运用这种方法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制度。人类学家也没有做到，尽管我认为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一直在坚持这种方法。这两种学科总是质疑东西方的比较。或许，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年鉴》最可能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案。

③ Blaut，1993，2000.

④ Frank，1998.

⑤ Pomeranz，2000.

⑥ Hobson，2004.

Armesto）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讨论，认为欧亚主要国家之间两者平行发展了一千年。[①]另外，越来越多的文艺复兴研究者，像建筑史家德博拉·霍华德（Deborah Howard）、文学史家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他们都强调近东在促进欧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正像许多科技史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东方对西方后来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③]

我的目的是要展现为何欧洲不仅简单地忽视或削弱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结果也误解了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表明这种历史概念和历史分期如何妨碍我们对亚洲的理解，而这种方式对理解过去和未来都同等重要。当然，我并不打算重写欧亚大陆的历史，我的兴趣在于如何矫正我们从所谓的古典时代看待历史的发展方式，同时也是矫正欧亚和其他地区的关系。我试图表明，从总体上重新讨论世界史是富有成效的。我将这一讨论限制在旧大陆和非洲地区。以亚当斯[④]为代表的其他人，已经就城市化这样的问题比较了新旧大陆。这样的比较将会产生很多主题——“文明”发展中的贸易和交流，但它也会因为发展理论的重要结论而明确要求更多强调内部的社会演进，而不是商业或其他衍生问题。

我的总目标类似于彼得·伯克（Peter Burke）探讨文艺复兴时的目的，只是我从古典时代开始。伯克写道：“我试图重新考察西方文明兴起的宏大叙事。”他将这种“叙事”看作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描述”，文艺复兴是整个进程链条中的重要连接点，当然，这条链条还包括宗教改革、科学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
② Howard，2000；Brotton，2002.
③ 参阅Goody，2003.
④ Adams，1966.

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①]在伯克对文艺复兴的最新研究中，他试图将“西欧文化看成诸多文化的一种，与它的邻居——著名的拜占庭和伊斯兰共同存在并相互影响，两者也都有它们自己希腊罗 8
马古典时代的‘复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审视欧洲一种类似于阿拉伯圣训传述世系观念的有效性，这种社会—文化系谱学从古典时代、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一直贯穿始终，并将亚洲作为“例外”、“专制”或者倒退而搁置一边。第二部分考察三位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试图将欧洲与世界相比，但却仍然认为设定的这条独特发展线路是具有优势的。这三人分别是李约瑟，他展现了中国科技的杰出性；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他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中文明进程的根源；还有一位是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无疑，他们都流露出可怕的目的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当然，我这样做是为了指出即使如此盛名的历史学家也会掉入这样的陷阱。第三部分考察了包括学者和门外汉在内的许多欧洲人的观点，他们成为某些值得重视的制度机构的忠实捍卫者，例如城市、大学、民主本身这些特殊形式，以及各种价值观的维护者，诸如个人主义还有诸如爱情（即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之类的情感。

对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在欧洲中心论的言论中往往是刺耳的，时不时还会激起一些埋怨。我将努力避免这种论调，集中论述我在此前一些讨论中提出的事实性问题。只是，来自另一方的声音往往声势如此浩大，如此确信，以致我们的声音或许可能会因为要养家糊口而被谅解吧。 9

① Burke，1978：3.

Contents

目 录

❶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系谱学

第一章 谁偷了什么？时间与空间 /3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创造 /19
第三章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还是欧洲的瓦解与亚洲的主宰？ /72
第四章 亚细亚专制，土耳其或其他地区？ /110

❷ 第二部分 三种学术视野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科学与文明 /143
第六章 “文明”的盗窃：
埃利亚斯与绝对主义欧洲 /179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盗窃：
布罗代尔与全球比较 /214

❸ 第三部分 三种制度机构和价值观

第八章 机构的盗窃：城市和大学 /257
第九章 价值观的盗用：人文主义、
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 /291
第十章 偷来的爱情：欧洲的情感诉求 /323

结语 /348
参考文献 /373
索引 /399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系谱学

第一章

谁偷了什么？时间与空间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欧人便出现在世界各地，这是殖民征服与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此，世界历史的建构便由西欧所支配。然而，其他文明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部分），比如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明。事实上，大多数文化本身都不缺乏过去与其他地区相互联系的观念，只是比较简单而已，但很多研究者却更愿意将这些看法放在神话而不是历史的标题之下。所有形容欧洲成就的用语，与形容一些比较简单的社会成就一样，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历史强加给整个世界，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基于人类认知的自我中心主义冲动的扩张，而扩张所具备的能力要归因于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地区事实上的控制。我必须通过我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如导论中说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世界历史两种相反的观点产生于近代。[①]但在我看来，那场运动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探究，尤其是在考虑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方面。

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必然要面对在描述社会、过去或现在的尝试中所流露出的不可避免的种族中心论特征。这意味着，首先，要怀疑西方实际上是来自欧洲（或亚洲）的观点，这种观点声称创造了

① 进一步的讨论请参阅C. A. Bayly：《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行为活动和价值观。其次，这意味着要从源流而不是从结果（或者从现在）来检视历史。再次，它意味着要给予欧洲之外的历史以充分重视。最后，它还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
13 即使是历史编撰学的骨干、历史事件的时空定位也是可变的，它从属于社会构架，并随之不断变化。因而，它不是由社会上流传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构成的，而那些概念体现在西欧历史编撰学的意识之中。

现在的时空纬度都由西方制定。这是因为，全球扩张需要计时和地图，这两者提供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框架。当然，所有的社会都会有一些时空概念来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读写能力的产生，这些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或越来越精确），而读写能力为地图绘制者提供了时空纬度。与口头文化传统的非洲相比，正是早期的文字发明，才使得欧亚大多数社会在计量时间、绘制和改进地图方面占据了充分的优势，而不是在构建世界的时空方式等一些基本事实上占有优势。

时　间

口头文化中的时间是根据自然现象估算的，它根据太阳昼夜交替的变化，在天空中的位置，月亮的阴晴圆缺，季节更替等等来计量。口头文化所缺少的是对年代更替的数字计算，因为这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起点，而这一起点只在使用文字时才开始出现。

过去和现在的计时方式都被西方盗用了。历史学依赖的年代以基督出生前后来计算（公元前或公元后，或者从政治意义上更确切地说是公元纪年），其他对时间的认识，比如伊斯兰教纪元、希伯

来纪元与中国新年的纪元都被挤到历史知识和国际用法的边缘。在这些纪元中，对时间概念的盗窃自然是世纪和千年本身的概念，同时也是文字文化的概念。费南德兹-阿梅斯托在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充分论述了后者，[①]包括对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非洲和美洲的研究。阿梅斯托写了一本关于“我们的千年”的世界史，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西方支配下的“我们的历史”。和很多历史学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种支配根源于西方文化，而认为世界的领导权会再一次轻松地传到亚洲手中，就像先前它从亚洲传到西方一样。然而，这一讨论构架不可避免要牵涉基督纪元的时代、世纪和千年。在人们的头脑中，东方和现在的中心一样往往拥有另外一个千年。 14

对时间的独断不仅表现在以基督出生为标准的所有年代，还体现在计算年、月和周的每一天。在某种程度上，年代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划分。我们使用恒星的循环，其他人则采用月亮历的12个周期顺序，这多多少少是习俗的选择。在两种体系中，一年的开始即新年是主观的。实际上，欧洲人使用的恒星纪年并不比伊斯兰教或佛教国家的阴历纪年更具“逻辑性”。欧洲人对月份的划分也是主观的。其选择或是主观的年份，或是主观的月份。事实上，我们的月份跟月亮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伊斯兰的月亮历却明显更具“逻辑性”。但将恒星或周期纪年与阴历月份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历法体系都存在一些问题。在伊斯兰历法中，年份根据月份变化，而基督纪年则相反。口头文化中，季度和月份的计算都能单独使用，但是在文字文化中却要求两者的调和。

一周7天是所有历法中最主观的一个说法。人们发现，在非洲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

根据相应的集市，3天、4天、5天、6天都可以作为一周。在中国10天为一个周期。不同社会根据需要制定比月份小的阶段性周期，以适应频繁的周期性活动，比如地方集市，以区别于每年一度的大型展销。这些事件的周期完全根据传统习俗而定。白天和夜晚的概念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适应，但对小时和分钟的进一步划分只存在于我们的时钟和头脑中，它们同样也是主观的。[①]

文字社会中，不同方式的时间计算基本都有一个宗教框架，为先知、救世主或世界造物主的生活提供了参考依据。这些依据与基督教的形成有关，是征服、殖民和世界统治的结果，它们不仅属于西方，还属于整个世界；7天一周，礼拜天安息日，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复活节和万圣节现在都变成了国际性节日。即便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宗教节日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以及弗雷泽所说的对魔力的拒绝——这些正影响着世界各地。

日常生活中残留的宗教习俗通常会被奉行者和参与者所误解。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是世俗社会，他们的制度没有歧视这种
15 或那种信仰。学校允许穆斯林女子戴头巾，犹太人戴帽子（或者不戴），非宗派的礼拜仪式也可以成为一种制度，宗教研究尝试着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在科学中，我们将对世界及其全部内容的自由探索视为科学存在的条件。但同时，像一些宗教又常常因固守知识界限而受到指责，尽管它们也有理性主义的倾向。[②]即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也从经济和科学两方面打上了宗教福音主义的印记，并与宗教历法息息相关。

建构世界的宗教模式渗透到思想的方方面面。某种程度上，即

① Goody，1968.
② Makdisi，1982：2.

使它们被弃置不用，其痕迹也一直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观念。源于宗教叙述的时空范畴对世界相互影响的主导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普遍常见，以致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习俗性特征。然而，从社会层面上说，宗教矛盾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有关宗教的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即使在前文字社会也不断出现。[①]在文字社会中，这种态度无意中导致了人文思想的分期，比如扎法拉尼（Zafrani）所描述的12世纪黄金年代的希伯来—马格里布文化，以及其他人所描述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化的复兴（像彼特拉克所看到的，尽管基本是异教徒，却在很多方面都适应了基督教）。相关的古典和世俗的人文主义，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对既存教会权威的抛弃，当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它的位置，但两者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知识结构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广义的科学探索。而在同一时期，中国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那里没有一统的、主导性的宗教体制，因此，世俗知识的发展允许检验或重估既有的知识，而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受到阻碍。但宗教双重性、科学和超自然力量的共存，一直是同时期各个社会的特征，尽管这种混合状态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社会更多地被分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启蒙运动以来，“不信教者”享有越来越多制度意义上的地位，但是两者仍然被锁进特殊时代的宗教概念之中。西方的观念逐渐主宰了多文化、多信仰的世界。

16

回到时间计量上。显然，钟表是文字文化的独特贡献，是时间计量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们早已出现在古代社会，其形式有为日

① Goody，1998.

晷、滴漏和水钟。中世纪的僧侣用蜡烛来计算时间的流失，而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复杂的机械设置。但钟摆器械却是14世纪欧洲的一项发明，它发出“滴答”的声音，控制弹簧的松紧度。擒纵器和机械钟从公元725年起就出现在中国了，但擒纵器械没有像西方的钟表那样在后来得到改进。[①]对一些哲学家来说，钟表机械成为宇宙结构的模型，它最终改进成手表，使得个人“计时”更为方便。它也导致了对那些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和文化的轻视，例如那些遵守“非洲时间”的人们，因为他们不能适应工厂和任何大型机构所需要的定时工作的要求，他们还没有为“暴政”、朝九晚五的“工资奴隶制”做好准备。

费迪南德大帝派往土耳其苏丹的外交使臣吉斯林·德·布斯贝克(Ghiselin de Busbecq)，在1554年写的一封信件中描述了他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他谈到土耳其向导深更半夜把他叫醒的烦恼，因为他们“不知道时间”（他还说到他们不标距离，这一点也是错误的）。他们的确计时，但不过是由寺院塔尖上一天五次通报祷告时间的祈祷者来计时的。自然，这在夜间就不管用了。另外，日晷也有同样的问题，水钟虽然精确，却几乎不能携带。我们所看到的机械钟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发明，但也不完全是，它由耶稣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到中国——这个传播十分缓慢，而在近东也只是到了16世纪才开始流行。即使那时，它也没有在那里的公共场所出现，因为它的出现将会被视为对寺院祈祷人宗教计时的威胁。布斯贝克提到，缓慢的适应过程不是因为普遍不愿意接受革新。正如

① 李约瑟，2004：14。他认为，强调钟摆器械发明的独特性是欧洲在这一领域挽回面子的一个表现，是重新确定他们优势根源问题的表现，就像指南针和轴心舵的例子一样（p.73）。

一些人所说："没有一个民族不情愿使用别人有用的发明。譬如，他们或多或少使用了火药（事实上，这是中国的发现）和我们的许多发现。但他们从不让自己印刷书籍，不竖起公共的时钟。他们拿 17
着自己的手稿，那些非常稀缺的书籍，一旦被印刷出来就不再是手稿了。而且，他们认为，一旦竖起公共的时钟，寺院塔尖上祈祷人的权威和古代的仪式就会逐渐消失。"[①]这段话的第一句表明，这里远非很多欧洲人描绘的那种僵化的、不创新的东方文化。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四章进行更充分的论述。不过，从长远来看，对印刷术的拒绝充分证明了时间计量和文字文化的传播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在后来所谓的科技革命或"现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这两者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东对信息传递技术的选择性运用阻碍了此后一段时期的前进，但这与不能计测时间，或忽视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没有太大的关系。同样，也不能从这种不情愿中（不情愿本身是相对晚近的现象）认为欧洲计量时间的方式及其历史分期比其他人更"正确"、更好。

盗用时间观念还有另一种更普遍的看法，即认为西方观察时间的特点是线形的，而东方则是环形的。即使是孜孜不倦于重现中国科技的著名中国专家李约瑟，也赞同这方面的重要观点。[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过于泛化的特征，采取绝对的、概念化的，甚至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形式，错误地比较了文化及其潜在的能力。的确，在中国，除了长时期的年代计量，还有短时间的关于年岁周期的计量，以此，某年某年（比如猴年）便能规律循环。这一点与西历和占星术完全不同：西历中只有月份不断重复；占星术基于卡尔迪亚王国

① Lewis，2002：130–131.
② Needham，1965.

的黄道十二宫图，后者绘制了我们的天穹，但月份也需要相同特性的特征，就像中国的年份一样。不过，这也不得不成为既定事实：即使在时间计量确实非常简单纯粹的口头文化中，在其他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发现线形和环形的时间计量方式。线形计量是生活历史的内在部分，从生到死，循环不断。从“宇宙”的自然时间看，还有一个更大的循环趋势，即白天跟着黑夜、月亮追着太阳。那些认为只有线形模式而没有环形模式的单独计时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也反
18 映出我们对进步的、向前看的西方和静止的、向后看的东方的看法。

空 间

空间的概念同样也采用了欧洲的定义。与其说它们同样也受到文字运用的影响，不如说深受与文字一起发展的图形绘制的影响。当然，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些关于生活世界、周围世界以及头顶天空世界的空间知识，不过图形绘制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使得地图更加精确、更为客观和更具创造性，因而现在的人们才可以研究那些读者不知道的地方。

欧亚大陆本身几乎没有排外性的西方概念，正如它们作为独特的实体直观地展现自己以供分析——除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观区别以外。从地理上看，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一个整体——欧亚大陆，但希腊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的地中海海岸两边划出了界限。虽然希腊从古代就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殖民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亚洲的的确确是历史上的他者，是异教和异族的故乡。后来的“世界”宗教及其信徒，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一样贪婪，甚至试图用基督教的术语正式定义新欧洲，虽然欧洲的历史实际是与

这片陆地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信徒的出现连在一起的[①]——尽管有人强调，当时的欧洲（相比于其他地方来说）往往给人以世俗化的印象，这种看法在社会中一直都有。同时，年岁的时钟显然也随着基督教的节奏滴滴答答，如此，欧洲的现在与过去便面临着“基督教欧洲的兴起”。这里借用了特雷弗-罗伯的历史标题。

不过，空间概念并不像时间概念那样完全受宗教的影响。尽管如此，神圣之城如麦加、耶路撒冷的地位依旧不仅控制空间构成和朝圣方向，还控制了很多致力于往这些圣地朝圣的人们的生活。麦加作为伊斯兰教信仰者朝圣的角色——五根柱子之一，久负盛名并影响了许多地区。但自古代以来，基督徒同样也被驱使着到耶路撒冷朝圣或自由旅行去朝圣。耶路撒冷也有一根强大的柱子，从中世纪开始就吸引着犹太人不断返回，尤其是随着19世纪末犹太建国运动和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发展，返乡愈加剧烈。关于空间——将以色列作为故乡的观念最终引发了犹太人大规模地返回巴勒斯坦，并得 19
到西方政权的有力支持，它导致了紧张、冲突和战争，近年来一直在东部地中海持续发生。同时，西方武装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驻扎也被看作伊斯兰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兴起的一个原因。以此看来，世界为我们提供的宗教“地图”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只是这份地图的绘制需要这个过程中与身份相关的重要意义。内在的宗教动机会消失，但它所产生的内化的地理学却保留下来并被“自然化”了，作为事物重要秩序的一部分而强加于他人身上。时光流逝，迄今为止，这些恰恰都发生在欧洲历史的书写之中，即使现在整个空间的计量与时间相比受宗教的影响要少一些。

---

① Goody，2003b.

不过，西方殖民的影响十分明显。当英国成为全球统治者时，空间坐标变成了伦敦的格林尼治子午线。西印度群岛和大部分东印度群岛在欧洲的注视下，当然也是在欧洲的东方化进程、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中凸现出来。某种程度上，欧亚大陆的最西边和最东边都不是测量空间的最好地点。正如费南德兹-阿梅斯托指出的那样[①]，在这个千年（刚刚过去的上个千年——译者注）的前五百年，伊斯兰世界占据了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处于最好的方位，提供了一幅值得参考的世界地理图景，就像从阿尔伊斯塔科（Al-Tstakhi）的世界地图中所看到的10世纪中期的波斯位置一样。伊斯兰世界被置于世界的中心，既是为了扩张也是为了交流，它位于中国和基督教世界的中间。费南德兹-阿梅斯托还提到采用墨卡托设计的世界地图所产生的失真状态：南方国家如印度相比北方的瑞典显得非常小，而瑞典的尺寸则被大大夸大。

墨卡托（Mercator，1512—1594）是佛兰德斯的一个地图绘制者，他从一份流传到佛罗伦萨的托勒密《地理学》的希腊抄本中受到启发。这个抄本来自君士坦丁堡，但创作于2世纪的亚历山大。它被翻译成拉丁文并在维琴察（Vicenza）出版，为现代地理学提供了一个模板，因为它提出了空间坐标系的框架——这个坐标系以大量的经线、纬线延及整个地球，其中以赤道为纬线，以好望角为经线。这一成果恰到好处地出现在第一次全球环海航行和印刷出版——两者都是地图绘制的重要因素——传来之际。上述我提到
20 “空间失真”的产生是因为圆形在印刷纸张上被拉扁了，而地图设计尽量使球体和平面取得一致。[②]不过，“失真”呈现出特殊的欧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110.
② Crane，2003.

洲歪曲，这种歪曲一直支配着现代的世界地图绘制。

纬线根据赤道确定，但经线却引起了各种问题，因为没有固定的起点。要尽量估算航海的时间，就需要一个固定点。随着远距离航海的频繁进行，这种需求变得越来越急迫。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制造了一只即使在海上行使的船上也十分精确的钟表。这一工作促进了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研究，意味着1844年完全主观的格林尼治子午线最终被确定为全世界经线计算和时间计算（**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基点。

地图绘制和航海也涉及天空和地球空间的测量方式。同样，所有文化都有对天空的看法，但有读写能力的巴比伦人发展了宇宙的绘图，随后得到希腊罗马人的改进。这一知识在黑暗时代的欧洲消失了，但却由阿拉伯世界、波斯、印度和中国继续推进。特别是，阿拉伯世界运用复杂的算术和新的观察方式，创造出精确的星座图表和精良的天文观测仪，体现为穆哈默德·卡·本·哈桑（Muhammad Khan ben Hassan）的星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欧洲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欧洲仍然没有占据现有世界的中心位置，尽管随着古典时代的出现，它的确曾经一度位于中心。仅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早先是地中海其后是大西洋国家的商业活动，欧洲开始控制世界，首先是通过贸易扩张，继而便是征服和殖民活动。欧洲的扩张意味着在“大航海时代”和基督教背景下得以形成的空间概念强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本书要探讨的特殊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本书所探讨的是欧洲自古代以来单一的历史分期问题，这一分期排除亚洲及其革命性的青铜时代，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线形观，它经由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绝对主义，最后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历史分期

“历史的盗窃”不仅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还体现在历史分期的独断上。多数社会都会根据不同的、长时段的时间段来划分他们的历史，与其说与世界的诞生有关，不如说是与人文主义的产生有关。据说爱斯基摩人认为世界一直是它所呈现的样子，[①]但在大多数社会中，现今的人类并不被看作是地球上的原初居民。他们对地球的占领有一个起始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将其形容为“梦幻时代”；在加纳北部的洛达基（LoDagaa），最初的男男女女居住在“旧王国”中。随着“符号语言”和文字的产生，我们似乎得到一种更精细的历史分期，以为世界在更早的黄金时代或伊甸园时代是一个更舒适的居所，人类生活于斯但因为他们（罪恶）的行为而被放逐，这与进步观和现代化的观点相反。另外还需要提到一种历史分期，它基于人类使用的主要工具的材质变化，例如石器、铜器、青铜、铁器，这种按照人类各时代进程的分期在19世纪被欧洲的考古学家作为一种科学模式而加以接受。

欧洲在近代以一种更独断的方式划分了时段，并将之运用到世界各地。当然，如果要将世界历史整合在一起，它必须得有一个编年史的框架，但历史已经形成了以基督纪年为主的国际用法，主要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也由联合国这样的世界组织来庆贺；这同样渗透到第三世界的口头文化中，尽管第三世界没有承认主要宗教之一的计算法。这种独断在建构一门普通科学比如天文学是必要的。

---

① Boas，1904：2.

因为全球化需要一种普遍性标准。人们不可能用纯粹的地方概念来研究。尽管天文学研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根源，但信息社会，尤其是信息技术在书籍印刷（和造纸术一样来自亚洲）形态中的变化，意味着所谓的现代科学的构成结构仍然是西方的。在此意义上——其他也是一样，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化。普遍化在历史分期的语境中更多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无论学者们怎样为韦伯式的“客观性”而努力，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概念更贴近产生它们的社会。举个例子来说，“古典时代”和“封建主义”两词显然是根据单纯的欧 22
洲语境来定义的，反映了欧洲历史的独特发展。当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中，它们真正的现实局限呈现在人们面前时，问题就出现了。

这样看来，知识积累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使用的这些概念大部分都是欧洲的，许多概念最初是在希腊人恢复识字能力后的思想运动中确定的。正是从那时起，哲学领域、科学学科领域如动物学得以展现并为近代欧洲所接受。而与欧洲知识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史基本上是自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史。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渐对中国、印度或阿拉伯思想（即被记载下来的思想）[①]投以少许关注，但对无文字社会的关注几乎没有，即便我们已经在像加纳北部洛达基的巴格里传说[②]这样正式的口述史料中发现了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因此，从定义上来说哲学几乎就是一个欧洲命题。像神学和文学一样，比较神学和比较文学只是最近被塞到全球兴趣的一块面包而已。现实中，比较史依然还是一场梦。

① 例如E. Gilson的《中世纪哲学》（1997）一书有一小节论述阿拉伯和犹太哲学，因为它们直接冲击了欧洲（即安达卢西亚）。而世界其他地方要么没有哲学，要么没有中世纪。

② Goody，1972b；Goody and Gandah，1980，2003.

如我们所看到的，李约瑟提出了西方的线形时间观和东方的环形时间观。[①]这一评论就简单的前文字社会而言也只道出了有限的事实。前文字社会对于文化的“进步”所知甚少。在洛达基，新石器时代的斧子在铁锄普及之前偶尔也会用于田间，尤其是在暴雨之后。它们被当地人看作“上帝之斧”或是雨神送来的。并不是这里的人们没有文化变化的观念，他们也知道在这一地区雅尼人（Djanni）比他们先进，也能指明住所的废墟，但他们对社会从石器使用到铁器使用的长时段变化没什么观念。在巴格里文化[②]中，铁是和“第一批男人”一起出现的，他们的文化中有很多其他元素都是如此。生活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前进，尽管殖民主义和欧洲人的到来必然导致他们思考文化的变迁，而与教育相关的“进步”这一词汇也流行开来。旧的被新的狠狠地抛弃，文化运动的线形观占据了
23 主导地位。

这种线形观现今仍然流行。人类生活按照线形模式发展，尽管年月以循环的方式更替。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文字图示来计算时间的流逝。即使在西方，四季轮回的观念也依然根深蒂固。但文化变迁却以一种更显著的方式不断更迭：每一代汽车都会稍稍不同，也比前一代更加“优良”。在洛达基，锄头的手柄一直保持相同的形状而代代相传，不过变化仍然在发生，体现在那些往往被视为静止的、“传统的”思想领域中。

线形观是先进的“进步”观念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这一观念是西方特有的，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它要归功于文艺复兴以来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变化速度以及李约瑟等人所说的“现代科学”运

① Needham，1965.

② 参阅Goody，1972b；Goody and Gandah，1980，2003.

用。我认为，这一观念是所有文字文化及其固定历法的初步特征，是对直线发展的描述，但这绝不是单向的进步。很多成文的宗教文献都包含黄金时代、伊甸园或田园时光，而随后人类却不得不从那里退出的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出倒退的看法以及某些情形下对新的开端的期待。实际上，即便口头文化中也能找到对天堂的同样看法。[①]过去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只是在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占主导地位的世俗性的出现，我们才发现一个由进步观念支配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其说是通往特殊的目标，不如说是从世界的早期状态通往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梦想不到的目标，就像飞机这一科学尝试和人类智慧的结晶一样。

西方许多历史编撰学的基本设想之一是时光之箭覆盖了人类社会组织中价值与欲望同步增长的历程，即进步的历程。历史是不同进程的系列组合，每一进程从前一阶段中产生，又为后一阶段作铺垫，直到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最终达到共产主义。不过，它并没有由于历史导向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而呈现千禧年的乐观主义，因为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写作的那一刻最靠近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如果还没有达到的话。所以，就自己的文化而言，我们确定为进步的内容反映出特殊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是近代产生的。我们也会谈到科学、经济增长、文明和人权认知（例如民主）的先进性，然而，还有其他的标准来衡量变化。而且，某种程度上，即 24
使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话题。比如，假如我们采取环境指标，我们的社会就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如果我们谈精神进步（各个社会的主要进步多种多样，即使在我们看来仍值得

① Goody，1972.

怀疑），据说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个倒退的阶段。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价值观的进步，尽管相反的设想主导着西方。

这里，我要特别关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宏大历史观念、西方把自己的发展轨迹强加于世界各地的方式，以及已对此产生的误解。整个世界史已经被看作不同进程的系列组合，这些进程被想当然以仅仅发生在西欧的大事所设定。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诗人赫西俄德（Hesiod）是这样看待人类过去的时代的：历史开始于黄金时代，继之以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一直到英雄时代，最终导致当时的铁器时代。这一顺序与后来18世纪考古学家所发展的观念并没有太多不同，根据制造工具的不同材质，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①]但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更普遍地采取了另一种看法：世界史的变迁从古风社会开始，进入古典时代、封建主义，然后是资本主义，这一分期实际上被看作欧洲的独特特征。欧亚的其他地方（“亚洲”）则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它们的历史，以它们的专制政体形成了“亚细亚例外论”，或用当下的话说，他们没能成功实现现代化。正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对伊斯兰期望的那样，假定只有西方是对的，那么“什么错了呢”？但，这就是事实吗？这一事实又持续了多长呢？

进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区别对待欧亚洲之间共同的社会文化发展，并导致了“亚细亚例外论”、“亚细亚专制主义”、东西方文明不同路径的观点？后来，又是什么将古典时代从地中海东部的青铜文化中突显出来？世界历史又如何逐渐被单纯的西方历史事件确
25 定下来？

① Daniel，1943.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创造

古代，具体说是“古典时代”，象征着一个新世界（主要是欧洲）的开端。这一时期巧妙地嵌入到历史前进的链条之中。由此，首先，古典时代不得不与先前的青铜时代区别开来，因为青铜时代从根本上是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征。其次，希腊罗马被看作当代政治的奠基者，尤其是就民主而言。最后，古典时代的某些特征，尤其是贸易和市场这些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被低估了，它在引导各个阶段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鲜明的特征。本章我要声明三个问题：第一，我认为孤立地研究古代经济（或社会）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和政治组织的庞大网络的一部分；第二，它也不像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单一性和独特性，历史叙述不得不在各种目的论驱使的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下削足适履；第三，我将谈谈“尚古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他们往往从经济角度来讨论，并尝试指出两种观点的局限性。

有人认为古典时代标志着“城邦”、“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政治体制的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看，古典时代是独特的，它建立在奴隶制和再次分配而不是市场和贸易之上。从交流方式看，希腊语及印欧语系在字母文字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至今还在使用这种文字。艺术，包括建筑也是如此。最后我要讨论的是，古典时代

的欧洲中心与地中海东部包括它们周边的亚洲和非洲之间是否存在普遍的差异。

西欧对历史的盗窃发端于古风社会和古典时代这两个概念，从这里开始，其后多多少少按直线发展到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到资本主
26 义。这一开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近代欧洲来说，希腊罗马的经验由于字母文字的运用而成为真正“历史”黎明的象征（文字之前的所有一切都是史前的，属于考古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领域）。[①]当然，在古典时代之前，克里特岛上的米诺-迈锡尼文明和大陆文明中，欧洲也确实存在一些文字记载，但这些文字只是近六十年来才开始破译，而且这些记录大部分由行政明细单组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或文学。只有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采用并改进了腓尼基文字之后，欧洲才出现具有历史或文学特征的领域。腓尼基文字是其他许多字母文字的先祖，先前只有BCD（没有元音字母）。[②]希腊最初创作的主题之一是波斯战争，它导致了欧亚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从此对我们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对希腊人而言，波斯人是“蛮族”，特点是专制而非民主。当然，这纯粹是希波战争催生出来的种族中心论的观念。举个例子来说，薛西斯统治下（公元前485—前465）兴起的波斯帝国，其意料之中的衰落源于与希腊和雅典的霸权争夺，它并不像埃兰（E-lamite）文献说的那样诞生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而阿卡得（Akkadian）也不是阿拉姆（Aramaic）文献记载的那样诞生于埃及而是巴比伦，这些文献与考古发掘相差甚远。[④]事实上，波斯人和

① Goody and Watt, 1963; Finley, 1970: 6.
② 我采用了标准日期。一些学者将传播的时间提前得更早。
③ Said, 1995: 56–57.
④ Briant, 2005: 14.

希腊人一样“文明”，尤其是他们的上流阶层——那些来自古代近东社会的知识正是主要通过他们才辗转传播到希腊的。[①]

从语言上说，欧洲已经成为“雅利安人”和亚洲讲印欧语人种的故乡。同时，西亚是闪米特语的故乡。闪米特人是亚非部族的旁支，包括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哥普特人、柏柏尔人和许多北非人、亚非人。正是对雅利安人和其他人的区分——后来体现在纳粹的纲领中，才促使欧洲近代的民族史忽视了东方对文明发展的贡献。

虽然古典学者中间对古典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都知道古典时代在欧洲语境中意味着什么。[②]但是为什么这一概念没有运用到其他文明研究中呢，没有用到近东、印度和中国呢？这些对排除其他地区、对“欧洲例外论”开端的解释是否合理 27
呢？史前史学者一直强调欧洲和其他地区在早期社会进程中的相似性，虽然时间先后稍有差异，但基本上处于平行的阶段。这一进程在欧亚大陆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后来发生了分岔。希腊的古风社会基本上是青铜时代，虽然它们延伸到铁器时代，甚至进入了有史阶段。青铜时代后，欧洲经历了古典时代而亚洲没有。历史编撰学的主要问题是，虽然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包括吉本这样的著名学者都研究了古希腊罗马社会的衰亡和封建主义的产生，但如果人们深入思考的话，古典时代或古代社会的出现作为一个特别时期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是很少的。例如，人类为家索萨尔（Southall）这样写亚细亚模式，“第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是发展于地中海的古代生产方式，但它没有取代大多数亚洲和新世界中的亚细亚模式”。[③]但是为什么

① Villing, “Persia and Greece”, in Curtis and Tallis, 2005: 9.
② 近来对古代的结束时间有一种颇具价值的观点，参阅Fowden (2002)。
③ Southall, 1998: 17, 20.

没有取代？找不到理由，除非古代模式“在人权问题（但不是妇女权利）上是一个奇迹般的跨越”。这一转变发生于地中海东部，一定程度通过“社会性瓦解背景下的迁移活动”得以完成，而瓦解的情形肯定是既频繁又彻底的。

很多人认为欧洲的近代史产生于罗马和土著部落社会的混合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日耳曼社会的形成，但罗马专家和日耳曼专家对于罗马和部落社会各自的贡献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即使是在早期，古典时代也通常被认为是青铜时代各国和参与多利安入侵的“雅利安”血统各“部落”的融合，因而，它从社会制度、中央集权“文明的”城市文化和较为乡土的、游牧的“部落”两者之中受益匪浅。

从更普遍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立场出发来看，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晰。“部落”一词可能是描述某种社会组织特征尤其是流动性和缺乏官僚制政权的形式，与区别经济特征没多大关系。人们发现一些“部落”从事狩猎和采集，一些部落从事简单的锄耕农业，还有一些以畜牧为生。无论如何，应该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认为的古典
28 时代的古典文明的产生不是直接建立在这些形态中任何一种“部落”经济的基础上的，更不是建立在迈锡尼和伊特鲁里亚这样的社会之上。迈锡尼和伊特鲁亚人深受标志青铜时代产生的农业和先进城市生活的影响。青铜文化不是仅仅出现在欧洲，而主要是近东，即所谓的新月沃土，以及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在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欧亚大陆经历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新“文明”发展。在技术上，这一发展建立在以使用犁耕、车轮，偶尔还有灌溉农业的城市文化之上。他们发展了城市生活，以及包括书写形式在内的专门技艺，由此掀起了一场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这些

严重分化的社会产生了不同阶级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技艺，分布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北部印度的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后来近东新月沃土的其他地方和东欧地区。这一大片地区的发展是平行的，也有一些交流。事实上，城市革命不仅影响了那些主要文明的发展，也影响了那些生活在他们周边的“部落”[①]的发展，而这些却被吸纳并参与“创立”了希腊社会。

希尔德强调贸易在古典社会所起的作用。贸易的结果是文化、观念和人员等广泛的流动。当然，奴隶也处于买卖之中，他们不单是劳力，“还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科学家、工匠和妓女……在相互贸易和对东方其他文明以及南北部古老蛮族的外交联结作用下，东方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互相融合了”。[②]这种交流不仅发生在社会内部，也发生在各社会之间。

边缘“部落”，具体说是那些从技术意义上不属于主要文明的“蛮族”，[③]受到了城市社会重要发展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他们与城市交换产品，帮忙转运货物，并在转运中尽量为他们更好地流动 29
搜寻目标。对一些人来说，袭击城镇、掠夺他们的交通工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论述14世纪北非游牧的贝都因人和定居的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的相同状态）之间的冲突时，伊本·赫勒敦描述了上述

---

① 希尔德（1964：159）认为对帝国主义的抵制产生了一个至少是依赖武器贸易的“青铜时代的经济”。

② Childe，1964：248–250.

③ 与开化相比，蛮族的概念是古希腊人对部落民族的主要观点（其他人也一样），导致了希腊人对异族的贬低。但并不是所有的希腊学者将人类社会分成希腊人和野蛮人。有一些人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相同的，但“异族”在“波斯战争来临之际更多表现为一种消极的特点”（von Staden，1992：580）。同样，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责任要归于其他的古代文明，正如当时的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冯·施达登，1992年精辟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我在这里沿用冯·施达登冯·施达登的观点。

状况。相比技术上更先进的民族，部落更加“团结”，[①]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一书论“团结”的标题下采用了这一论证。[②]大多数重要的文明与周边的“部落”都有相似的关系，遭遇过类似的袭击。印度人遭到中亚帖木儿人的骚扰，近东受到周边沙漠民族、欧洲多利斯人的攻击。从这方面来说，日耳曼和异族对古典社会的入侵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除了他们造成罗马帝国的毁灭以及西欧辉煌成就的暂时衰落之外。然而，这些部落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掠夺者”。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其利益和团结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特征几乎完全和希腊联系在一起。

我们提到的古典时代显然在早期希腊和罗马社会中有自己的根基。这一论述受到众多古典史家的追捧。[③]他们一致认为古典时代建立在早期文明瓦解的基础之上。公元前1200年的“希腊看起来更像近东社会”。[④]就像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西欧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陨落一样，公元前1100年左右，希腊的米诺-迈锡尼文明也发生了类似的瓦解。或许这一瓦解要归因于外部入侵，但不管怎样它都导致了宫殿文化的消失。随后的希腊社会以“日益收缩的视野”为特征：没有宏大的建筑物，没有大量的雕刻，没有客观的交流，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也非常有限。[⑤]

虽然这一地区与早期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在语言上有着相似之处，但仍然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欧洲历史的本质所在，即究竟是什

① Ibn Khaldun，1967（1377）.
② Durkheim，1893.
③ Osborne，1996.
④ Osborne，1996：3.
⑤ Osborne，1996：32.

么将欧洲古代社会与青铜时代后的近东和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或更早社会区别开来的？我们看到，前者的确发生了变化。宫殿文化消失（在西方），铁器时代出现，使得金属在各地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但 30
问题不是缺少重要的时间转折点，而在于古风时期和希腊社会（即古典时代）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概念上的差异。从不太彻底的发展于进化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如果这些差异成为主要的地方特征，它们可能会被更充分地考虑进来。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一样，古风社会主要是青铜时代的社会，而希腊属于铁器时代。但这些阶段只在同一地域和同一商业领域内前后更替。例如，在克里特的诺索斯（Cnossos）发掘出宫殿的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Arthur Evans）认为，克里特文化是“自由和独立的”，是最早的欧洲文明。[①]换言之，是希腊的先驱。自由和独立是相对而言的，克里特人比伊文斯所认为的更依赖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与近东保持商业来往，正是从近东（包括从塞浦路斯）那里，他们才获得锡、铜（锡和铜被用来制造青铜）和其他日用品的供给。文化间的联系同样存在，有证据表明它们与埃及也有来往，例如，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帝王谷（the Valley of Kings）坟墓中的绘画，就描绘了它们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交往情景。

交流符号：字母文字

从雅利安部落入侵希腊这方面考虑的一个后果是，忽视闪米特人而过分强调希腊对那些毋庸置疑非常重要的发展进程的贡献。比

① Evans，1921—1935.

如在交流符号中，希腊人在闪族字母文字中增加了元音，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希腊人“创造”了字母文字。新字母文字成为交流和表达最重要的工具。但实际上大量的交流表达是由辅音字母来完成的，这充分体现在犹太人创造的成为犹太教基础的“旧约”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辅音文字已在历史、文学和宗教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阿拉伯和印度语的文学也是如此，由闪米特文字的亚拉姆语发展而来，同样没有元音。[①]但与希腊相比，这些成就一直以来都被低估了，而希腊的地位往往是从近代欧洲对世界支配地位的
31 立场上即从目的论的角度来估价的。这是希腊中心论的问题。[②]

既有元音又有辅音的字母文字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开始在亚洲使用，在那里，讲闪米特语的民族促进了文字的广泛发展，有腓尼基人、希伯来人、讲亚拉姆语的人，还有后来的阿拉伯人。事实上，使用这种文字的“旧约”以及后来“新约”的贡献常常被关注印欧语系的古典学者忽视了。[③]而且，和其他类型的文字一样，它们的使用为人类积累和传播知识也创造了奇迹，比如远东音标文字的使用。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运用相似的文字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但一定程度上由于语言的缘故，欧洲人将它们看作“东方的”而不是古典的。的确，字母文字文化很多想像的独特成就可能是与其他文字形式一起取得的。字母改进（如列宁所说）作为“东方革命”，是促进民族国家反对多民族国家的副产品，因为民族国家被看作为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这恰是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很明显，中国文字的交流超越了民族

① Goody，1987.
② 参阅冯·施达登（1992）对这一问题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③ Goody，1987：60ff.

语言的水平，它以各种语言来传授儒家思想，汉语具有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点。①

希腊从古风社会向古典时代过渡的一个特征是丧失了读写能力和B型线形文字。在青铜时代后期和铁器时代之间，希腊有一段不能读写的时期，伯纳尔力争这一观点。②他认为西闪米特的字母文字在公元前1400年就已在爱琴海传播，与B型线形文字共存。他还认为一定有些文献从那一时期幸存下来，但至今尚未发现；纸草文献在欧洲的气候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他意识到在公元前12—前8世纪之间，也即迈锡尼宫殿文化瓦解之后，有一次不可估量的文化倒退。

复兴逐渐发生。但在公元前9世纪文化复兴时，它并不是迈锡尼文字的恢复，而是从腓尼基人那里改进后的字母文化，它有助于文化的传播，而且在我看来，它还有助于荷马史诗的形成。在这段间歇的“文盲”时期，爱奥尼亚和腓尼基，特别是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仍然维持着，中途歇脚客栈的冶铁对于新的铁器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32
它目睹了希腊和腓尼基以及他们特有的字母文字在地中海的扩散。

交往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从（单纯的）口头到文字的转变，从单音节、多音节到字母文字的产生，从纸张、印刷到电子传媒的变迁。在这一模式中，新形式接替旧形式，但并不完全取代旧形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学者们强调史前或口头文化社会向文字社会或有史阶段社会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的确如此。一种交流方式建立在另一种之上，新的并没有完全抛弃旧的，而只是以不同方式

① Lenin，1962.
② Bernal，1991：4.

修正它。[①]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印刷的出现中，它被看作一场重要的“革命”。[②]印刷如此，书写也是如此。但演讲和书法对人类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精神”可能在变化，至少思想的技巧手段在不断变化，而且，在经济史和政治史中也存在很多连续性。

向古典时代过渡

让我们回到这个一般性问题上来。芬利这位研究希腊成就的重要人物提出了古典时代的产生。我们已经提到，芬利注意到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独特的事件：青铜时代（通常意义上）进入古风社会然后是古典希腊，于是产生了古希腊社会。古风社会摒弃了先前古代近东普遍的宫殿体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以雅典和斯巴达最为著名，他们在协商中引入民主，更多地强调个体的独特性。[③]那种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由高度集权的寺庙宫殿政权构成的观点现在被文字记载的证据否定了。[④]考古学家“可能高估了集权程度和政府权力”。[⑤]事实比这一模式所蕴涵的要更加复杂，国家中既有集权的趋势，也有分权的趋势，这些趋势表现为各种形式。比如，“在各城市之中，政府控制特权商品，但不会也不能够垄断像
33 陶器等日用品的专门制造业”。[⑥]

古风社会可以“自由地创造”。“由地方行政官、委员会，最

① Eisentein，1979.
② Finley，1970：140.
③ Finley，1970：140.
④ 近来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寺庙宫殿文明的思考，参阅Stein（1994：13）。
⑤ Stein，1994：13.
⑥ Stein，1994：15.

后是公民大会构成的政治结构是一项自由的创造。”[①]他们借鉴了近东的很多做法，但无论他们吸收什么，都迅速吸收并转化到本土……他们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但没有腓尼基的荷马。独立式雕像的观念可能是来自埃及……但是希腊人而不是埃及人继而发展了这一想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原始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艺术本身”……自立和自信允许并促进了人类思考政治、艺术和哲学等问题，并深深植根于这些奇迹之中。[②]同时他们在诗歌、社会和政治批评中创造了个人的原则，[③]产生了新的“个人主义”，目睹了“基本道德和政治概念的产生”。在爱奥尼亚，他们“指出问题并提出普遍的、理性的、‘客观的’答案”，抛弃了神话，代之于逻各斯或理性，[④]鼓励“理性的讨论”。[⑤]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主张，但并不普遍。不过，其中许多观点都需要论证。我们也能在别处找到政治“创造”。虽然腓尼基人没有荷马，但闪米特人确实也有他们的圣经。就“人类的自立和自信”而言，人们是如何开始做出一种比较性的评价的呢？

希腊人“创造艺术”的观点（即便“某种意义上”称得上“创造”）似乎是经济史家兰德斯（Landes）的专利。兰德斯写过一本现代欧洲人所谓的《创造的创造》一书。同样，这些观点将个人原则引入诗歌、社会批评、新的个人主义、道德和政治概念以及理性之中，并被大大高估，体现出欧洲传统优于所有其他的种族中心论观点。希腊雕塑可能应被视为一个例外，它的确使古代社会与众不

① Finley，1970：103–104.
② Finley，1970：145–146.
③ Finley，1970：138–139.
④ Finley，1970：141.
⑤ Finley，1970：142.

同，因为其他文化中确实没有相同之物。但是，其他传统也有他们自己的伟大成就，比如埃及金字塔中的绘画。金字塔中的神并没有像希腊一样被描绘成一种现实的人神同形，而是以一种变幻不定的“想像”的形式。另外，亚述雕塑中也有辉煌的作品。古希腊之前是西克拉底（Cycladic）、迈锡尼和阿契美尼德（Archaemenic）文化，更别提希泰（Hittite）和古代近东。显然，希腊从这些丰富的
34 艺术传统中吸取了养分。

就艺术而言，欧洲人从希腊那里继承的非凡成就也没按它指向的路径，整个艺术传统不仅被早期基督教彻底抛弃，而且直到晚近还被近东的三大主要宗教所抛弃。尽管布克哈特（Burkhardt）认为希腊和日耳曼精神的结合自古典时代起已经超过了一千年，但至少其艺术形式没有作为欧洲传统的成就在事实上被接纳。前进的趋势是毫无疑问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过去，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和直到19世纪的犹太教事实上没有偶像崇拜，这与早期的基督教和近代的新教一样。陈述历史就得重回历史，尤其是回到世俗领域中。

让我们尝试从更特殊的意义上来看待希腊贡献这一问题。与其他文明相比，无论从军事技术还是从交流方式上，以及从我们所谓的思想技巧即简化的字母文字的发展上，古典社会肯定有一些优势。我和瓦特（Watt）合写了一篇文章《文化的结果》[①]，文中认为，字母文字的发明开启了思想活动的新领域，而这些活动受到早期文字形式的阻碍（早期文字自然是青铜时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后来，我不断从各个角度来修改这一观点，但没有完全抛弃掉。希

① Goody and Watt, 1963.

腊对字母文字的吸收按年代顺序和文字的特殊革命连在一起。文字革命覆盖了各个不同的领域，描述了古典社会的特征，构成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基础。芬利对个人主义、新的诗歌风格、“理性的争论”、崇高的自我意识、神话批评等主张并没有什么根据，这些可能与强烈的自反性能更好地联系起来，而广义的文化都鼓励自反性。当人们的观点从纸上反馈回来时，思想得以深化，可能更具探索性，更具规范性。他人的思想在“符号语言”中呈现时也能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新的字母文字、书写引入文化的事实，正是这两者一起抛弃了文化，现在却又急于追赶文化。这一追赶不仅表现为接受新的字母文字，采用不同的物件（不再是陶制桌子），还表现为在艺术和思想领域扩展写作，使得读写的用途更加广泛。

古典时代的文明在一些特殊领域取得一些相对优势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建筑技术方面，那个时期创造的众多雕塑至今还 35
装点着欧洲和小亚细亚的风景。辉煌的城市建造起来，在希腊、广阔的欧洲、亚洲以及后来的罗马，这一进程甚至持续到古典时代之后。在希腊化国家中，“重要的希腊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使得希腊此后成为古代社会城市最密集的地区”[①]。“希腊城邦在东方的兴盛与跨界贸易和公共财富的急剧增加相伴相随。”

技术和城市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些领域追寻特殊的进步，而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很难做到。其他领域中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论证起来似乎要困难得多。[①]同样，从普遍意义上说，“其他文化”也是“文明化了的”。然而即便就技术来说，希腊人也不是唯一的城市建造者，即使那些残垣断壁带

① Anderson，1974a：47.

给希腊后来的定居者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从近东各地学会将廉价金属锻造成铁，促进了各方面的建设。公元前12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金属工具更加便宜，同时还导致了小生产者对城邦或“大家族”进口的依赖。铁矿几乎遍地可用，有利于民主的进程，但不仅仅是希腊的民主进程。

芬利认为，欧洲古典时代想像的独特性显然是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就像很多人对封建主义的看法一样。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后来欧洲的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对芬利来说，“自中世纪后期，欧洲在技术、经济和与之伴随的价值体系中的经验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一直到近代仍然不断输出”。[②]其他一些古典史家也持目的论的方法据此评判。例如，最近一位专家意识到目的论的一些问题，坦然道：

> 因为在欧洲思想中，古希腊和古罗马在过去总是享有独特的地位，所以欧洲人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雅典的民主实践那里。为了理解现在的形式而一次次追寻社会历史，我们发现自己追寻的却是古希腊神话，通过神话追寻古希腊历史。[③]

然而，他所提到的希腊在欧洲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既不能完全表明它的独特性，也不是最终的根源。它仅仅表明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
36 们思想中的神话因素。不过，这也不能阻止作者极力坚持古希腊的

① Elias，1994a.
② Finley，1973：147.
③ Osborne，1996：1–2.

贡献，以及西方对世界史，尤其是对艺术史的特别贡献：

> 我们在古希腊发现的不完全是欧洲的神话，还有对我们西方自己遗产十分重要的很多特征的根源。所有思想表达的方式都能在公元前500—前300年间的希腊找到它们的源头和根基：自觉抽象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学；修辞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还有悲剧、喜剧、滑稽戏和历史，西方的自然艺术和女性裸体雕塑；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民主制度。[①]

最后一句做了一个有力的声明，作者似乎是说，即使它仅限于西方，社会本身将这种思想方式归功于古希腊这一思想“源泉”。这种声明看似越有说服力，却越不能令人满意。

然而，在前古典时代的希腊已显雏形的很多特征，在其他社会中也能找到。比如说到希腊特殊的道德哲学，却忽略了像孟子这样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还忽视了像洛达基巴格里口述史料这样的口头文化中的道德和哲学雏形。[②]的确，修辞学作为一门学问就像历史研究一样可能是文字社会的特征，紧随文字的使用之后，正如作者所列出的“自觉抽象的政治思想”及其他思想一样，但认为正式演讲术的形成[③]和政治学[④]的理解能力需要希腊人的创造却是错误的。希腊人或许“更自觉地”探讨了这些特征，因为文化鼓励自反性，但不能说他们更早地填补了这些空白。

① Osborne，1996：2.
② Goody，1972b.
③ Bloch，1975.
④ Bayly，2004.

对古典史家奥斯本（Osborne）来说，由于坚持“目的论”的方式，他将古代社会看作“我们文明社会产生条件”[①]的论据，于是便出现了问题。事实上，他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古希腊的确创造了现代社会”。[②]人们也可能会说，现代社会“创造了希腊”。总之两者纠缠不清。欧洲文化中好的东西都能在希腊找到根儿，而它又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布克哈特实际上也写过一本关于希腊和他的祖国——德国的“神秘联姻”的著作，因而认为古代拥
37 有一切标志现代的好东西。如此主张肯定会招来批判性读者质疑的眼光。

经 济

很多古典时代的独特性都被置于单独的背景下，它们与先进的文化有关，这使得希腊人对他们的成就和目标非常清楚。希腊人在政治和艺术领域中获得了优势，不过，人们认为有一个领域希腊人并不完全领先，这一领域便是经济。

颇具影响的古典史家摩西·芬利坚信“古代经济”和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存在根本性差别。[③]他的观点大部分来源于卡尔·博兰尼（Karl Polyani）的著作，但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卡尔·毕歇尔（Karl Bücker）和爱德华·迈耶尔（Edward Meyer）[④]两位学者为主的那场争论，不过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却得到更充分的论述。毕歇尔认为欧洲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家庭生产经济，

① Osborne，1996：3.
② Osborne，1996：17.
③ Finley，1973.
④ Will，1954.

以专业分工和贸易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区域性或民族性经济，反过来与之相适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另一方面，迈耶尔特别强调古代经济中的商业活动，即它的某些“现代”方面。迈耶尔的路径与韦伯的早期看法（后来得到修正，变得更接近马克思）一致。韦伯早期认为罗马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至少是“政治资本主义”。[①]对有些学者来说，隐含在这一倾向背后的普遍问题是，套用伽兰（Garlan）的话说，由于坚持古典时代市场的存在，现代化理论“往往要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辩护”。[②]芬利本人坚决不考虑其与古代近东或资本主义的联系。

希腊人并没有“发明”经济制度，也没有如声称的那样发明民主制度和字母文字。芬利认为，希腊的确没有市场经济，但却发展了一种有别于青铜时代的经济形式，导致了近代欧洲的独特性。从这种观点来看，市场本身只是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起出现的。但芬利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又迫使他难以容忍资本主义特征渗入古代经济，这些特征迫使他不得不论述希腊与周边经济的区别，把它看作随后欧洲史的准备阶段。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角度看，芬利认为“欧洲文明拥有独特的历史，当作特例研究也是合乎情理的”。[③]这一图式中，“历史和前历 38
史都是研究特例”。这意味着要排除“古代近东重要的、开创性的文明”，即通常意义上史前文明的思想，而希腊却是历史性的，尽管无论从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上，做出这一区分几乎没什么有效性。古典社会中，文字（字母文字）越来越广泛地用于交流和表

① Love，1991：233.
② Cartledge，1983：5.
③ Finley，1973：27.

达，奴隶也可能广泛用于生产，但两者都不是古典社会的独特特征。在芬利看来，不需要囊括近东社会的网络以强调借鉴来的事物，以及希腊—罗马与近东社会的经济或文化联系。跳过这些文化不说，芬利认为，韦奇伍德青瓷的出现并不需要把中国也包括进来以完整分析工业革命。

但恰恰相反，强调这些联系几乎不会引起误解。我认为，代尔夫特和黑山国家烧瓷技术的竞争——就像印度棉花的例子一样，应该看作工业革命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恰是东方传来的生产流程构成了发生变革的基础。鉴于历史和前历史的区分，在思考过去论据特征的基础之上，我看不出将那段时期截然一分为二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如果它意味着忽视青铜时代文化过渡时期的重要问题时。不过芬利还是试图从更具体的背景突出古代经济，他写道：

> 大型官殿体系（或者还有寺庙体系）主宰着近东经济，他们拥有大部分耕地，在事实上垄断了所谓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不单是和国外的贸易，还包括城市之间的贸易）的一切事务，通过复杂的、地方行政的簿记制度，形成了社会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宗教生活。在这种簿记制度中，“分配”一词广泛使用，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一词描述。上述这些与希腊—罗马世界没什么联系，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和后来的罗马人吞并近东大部分疆域。

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不诉诸分散的地区，我便没有一个主题可以讨论”，芬利补充道。[①]因而，近东就被排除了。希腊—罗马社会

基本上是“私人所有制”，而如果我们“集中研究统治形式和行为方式的特征时”，近东大致与亚细亚专制类似。地中海地区的农业 39
是雨水灌溉［其他像曼（Mann）这样的欧洲中心论学者认为，这是欧洲的独特优势[②]］，特别适宜橄榄树种植；而埃及河谷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需要复杂的社会组织实施灌溉工程。但正如芬利所说，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公元前323年）以及后来的罗马人恰好控制了这些灌溉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发展了伟大的水利技术，尽管主要不是用于农业。无论如何，水利在这种二分法下是唯一因素。亚细亚专制主义和集体所有制的观念沿袭了19世纪对东方的观念，我将在第四章从政治层面上批判这一观念。统治和与水利相关的思想也是如此。的确，河流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许多雨水灌溉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橄榄生产之于北非如迦太基周边也特别重要。芬利说的寺庙体系在古代近东并不是随处可见，实际上这些寺庙也出现在古典社会。他自己也从详细的财政记载中留意到“提洛岛（Delos）的寺庙体系”。[③]这一地区的经济不是单一的形态，不同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些足以使希腊的独特性难以让人相信。

尽管如此，不过在芬利看来，当今许多人也采纳了他的研究结果，认为古典时代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只发生在希腊，别地儿没有。青铜时代文明的瓦解（这一现象并不独特）之后是荷马史诗的黑暗时代（一些人认为的迈锡尼文化），有着新政治制度的古风社会出现了，最后是古典社会的形成。

---

① Finley，1973：28.
② Mann，1986：185.
③ Finley，1973：186.

不过，经济性质以及这一制度是否存在都会遭到质疑。在最近非常热闹的讨论中，卡特利吉（Cartledge）沿用芬利［哈斯布约克（Hasbroek）也是］的观点，将城邦看作“历史特例”（什么不是特例呢?），认为“‘这种经济’不是事实上的，也没有将古风社会和古典希腊与众不同的、半自治的社会活动领域概念化”，“它属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阶段，分配和商品交易与近代社会流行的形
40 式很不相同，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相互联系、明码标价的市场体系，因而是前经济的”。[①]这种泛泛的、比较抽象的差异不能将古典时代从青铜时代的社会突显出来。还有一种启发来自卡尔·博兰尼。[②]他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一书中提出了三种普遍的整合模式，即贸易互惠、再次分配和市场交换。这三种模式多多少少与专门的制度框架有关。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早期的主导性观念认为古风社会的希腊经济由小农经济主导，[③]也有人认为市场贸易只是到后来才出现的。博兰尼权威观点的提出逐渐影响了古典社会（不包括近东）研究：经济转型被置于更普遍的理论框架中，早期社会打上互惠、再分配而不是贸易的特征。博兰尼确实承认某些混合状态，但他的观点主要倾向概念上不同的“经济”类型，是一种排他的模式。市场交换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除非人们从很狭隘的角度定义市场，不然，市场的存在肯定要广泛得多，即使在很多前青铜时代经济中都有。非洲各村庄间一直都有实际的市场，这些实际存在的周期性集市依照广义的市场原则运作，即博兰尼意指的市场含义。这不单是一个人的观点，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市

① Cartledge，1983：5–6.
② Polanyi，1957.
③ Will，1954.

场都持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这一讨论取决于实际市场（市场场所）和抽象的市场交换原则之间的区别。我个人以为不能将这两者分开讨论。博兰尼坚信他所说的都体现在希腊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经济之中，也就是说，和社会制度有关的经济并没有什么差别。但像许多评论家提到的，他这样做忽视了这些经济中的市场元素。奥本海默（Oppenheim）虽然对博兰尼的观点抱以同情，但还是批评了他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忽视。许多评论家对希腊持同样的批判，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如霍普金斯（Hopkins）意识到了缺陷，但还是捍卫绝对差异这种观点。格利德希尔（Gledhill）和拉森（Larsen）在研究了美索不达米亚、比较了它与中美洲之后认为，我们需要联系博兰尼和马克思的观点，采取一种更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态度来看待经济："在理论上，关注'封建化'插曲（所有古代帝国都曾经经 41
历）之后重新集中的轮回进程，比关注一些基本静态的问题收获会更多。这些静态问题只是和持续的更为政治化阶段之下的经济进程的制度化有关。从长远来看，古代帝国的发展轨迹显然比人们想像的更具活力、更复杂。"[①]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这样的早期城市社会中，商人之于政府和他们自身都非常重要。阿卡德（Akkadian）国王代表商人在海外投机，而阿芝特人（Aztecs）则以防止袭击为借口拒绝贸易。[②]

问题是这些经济概念往往在彼此相互联系时具有排他性。博兰尼认为以再次分配为主导的古代经济（从这种意义上说是非现代的）导致了一种重要倾向，即对一切类似市场因素的贬低。这种倾向也存在于芬利对古代经济的研究中。和博兰尼一样，芬利在这方

① Gledhill and Larsen，1982：214.
② Adams，1966：164.

面花费气力的动机是对市场的厌恶。这是他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博兰尼曾经一度摇摆不定的观点也不再令人相信。卡特利吉继承了博兰尼的观点，他意识到即使不在制陶业，那么至少在冶金业中（在青铜时代铁器不太普遍），贸易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主张我们需要看到哈斯布约克对进口利润和商业利润所做的区分。这些区分事实上是排他性的吗？就早期社会的普遍性而言，我们没什么证据，恰恰相反，新石器社会排斥市场贸易和商业。实际上在这种类型的当代社会中，不全是为“钱”的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有着重要的意义。[①]而实际的市场（市场场所）并不以同时代相同的方式进行交易也是可能的，撇开供求因素的压力，很难把这些看作完整的交易形式。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贝壳货币越来越难以获得时，我目睹了一次用贝壳货币进行的批发交易，当然供给和需求发挥了作用。尽管政府（加纳和上伏塔）试图替换他们的货币，但贝壳在边境贸易和一些宗教仪式活动中仍然非常重要。随着“现代”货币的价值逐渐上升，它们的价值越来越小。因而，我
42 认为，将市场场所和市场原则从其他交易模式（供给和需求）中完全分开注定是失败的。

早期经济的特点和商业的作用也影响了近来论古典时代贸易的一组重要论文，[②]反映在芬利编辑的著作中。在这组论文中，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指出了古风社会为了进口铁矿石和大理石对重物运输的运用[③]，但他采用了一种狭隘的定义，认为“贸易只是买卖和货物搬运，而不涉及知识或买卖者深层的身份意义”。[④]所以

① 参阅Coquery-Vidrovich（1978），《论非洲生产方式》。
② Garnsey，Hopkins and Whittaker，1983.
③ Snodgrass，1983：16ff.
④ Snodgrass，1983：26.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货物不能被看作商品买卖，因为人们知道最终的买主是谁。他认为，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腓尼基，即使腓尼基人以地中海大商人而闻名。[①]即便这是事实，他的定义也与贸易的常识概念相去甚远，似乎是受凸显希腊愿望的启发，但却以博兰尼式的方法使之更加“幼稚”。

其中有种设想并不认为这种商业性事务必须与现代社会一致，譬如霍普金斯，他追随斯诺德格拉斯，坚持货物能以不同的方式交换。[②]不过，贸易以正常的形态呈现，就像人们从希腊的贸易协定和商业意识中看到的。这种商业意识表现在古风时代制作雕塑的最后阶段中，“买主按劳动时间付给工匠及助手工钱”，还要承担大理石成本和运输费用。[③]报酬有不同的形式。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交易与现代贸易完全一致［虽然这种情况更接近文艺复兴时期卡若拉（Carara）采石场上米开朗基罗的工作］，但它们至少有可比性，应该属于相同的总体经济框架。尽管一些人认为希腊商业体现了进口利润和商业利润的根本区别，另一些人也可能认为这些概念并不排他。尽管霍普金斯认为，到目前为止，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是最有效的；但他在“适应经济适度增长和衰败”的七个构成因素中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这些观点看似从根本上修正了芬利所支持的博兰尼对古代经济的看法。虽然博兰尼宣称芬利的模式能“充分适应这一适度的活力”，[④]但在别人看来，承认这一点更多归因于这位“颇具魅力和影响力”学者的具体研究。事实上，霍普金斯明确 43
指出“尚古主义者”立场的问题，但他也没有采取“现代主义者”

① 他主张（但不太确定）他们能很轻易地转向农业。
② Hopkins，1983：x.
③ Snodgrass，1983：20.
④ Hopkins，1983：xxi.

的立场。

芬利的观点并没有被古典学者普遍接受。坦迪（Tandy）认为，公元前8世纪新的贸易活动和人口增长对希腊发展尤其是建立海外殖民地非常重要，商人成为最有钱的人。贸易反过来又促进了城邦的发展，导致“再分配结构的瓦解”，[①]以及坦迪所说的“有限市场体系”的发展。事实证明，“有限市场体系成为一台机器，产生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最终结果：私有财产出现、土地转让、债务和城邦”。[②]对坦迪而言，这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这一结论有力地把他推向“现代主义者”而非“尚古主义者”的阵营，坚定了后来他对商业经济的论述。不过，在这一论述中，坦迪只是将“尚古主义”的小农经济推到更早的前古风时期——那时有没有市场仍然是个问题，暗示着这种经济类型最终能够走向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保持优势。

尽管古史学者中间存在“现代主义者”和“尚古主义者”的争议，尽管博兰尼的贸易事务和实际交易的概念仍在使用，但他们关于“原始”经济（和一般意义的社会）的观点并未广为流传。这些观点既区分了古代经济和早期经济（如坦迪书中所述），也区分了古代社会和随后的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芬利的著作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早期各个社会之间是相互区别的，正如青铜时代的城市社群和桑族（K'ung）丛林人的狩猎采集社会相互区别一样。毫无差异地看待这些“原始”社会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坦迪却在同一标题下将所有的前文字文化放在一起，试图将这些“简单”社会和

① Tandy，1997：4.
② Tandy，1997：230.

黑暗时代的希腊作比较。他将“小型”和“前工业”这些词语看作“原始”的婉辞，避免颠覆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在古风时期的希腊和卡拉哈里（Kalahari）具有攻击性的桑族文化中找到了可比点。尽管说法不同，但事实是，坦迪在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和非西方的“原始”社会中找到了相似之处。在他看来，直到城邦形成，早期希腊从这个意义上一直是“原始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 44
“西方”。[①]这一比较还不算十分令人讨厌，因为有充分理由说明非西方社会可以和古风时期的希腊作比较，但后者肯定要比卡拉哈里的丛林人更接近“现代”社会。卡拉哈里的丛林人从未经历过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将丛林人、“原始人”和古风时期的希腊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混在一起，在思想上或许可以和芬利等辈的设想达成一致，但很少能获得以有效数据为主的人类学家的支持。

第二，虽然不同交易形式的侧重在特殊背景下有不同变化，但意识不到互惠（在当时的家族中间）和市场交易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例如，对非洲市场交易的研究[②]并未表明政治经济制度是19世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只能说明实际的市场对短途贸易和长途贸易都非常普遍。市场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充分发展，一直到工业资本主义产生。韦伯认为产业化庄园的发展生产出大量农产品，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③]这一点韦伯沿袭蒙森（Mommsen）的观点，但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马克思反对将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古代社会联系在一起[④]，他以“资本主义”特指一种生产方式，而工厂制度是这一概念的实质。显然，工厂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

① Tandy，1997：8.
② Bohannan and Dalton，1962.
③ Love，1991：18ff.
④ Marx，Capital，1976，vol. I，271.

征只能出现在近代，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产生要早得多。

需要补充的是，芬利（在一篇《论荷马时代的希腊婚姻》的拓疆之作中）和坦迪都充分运用了人类学的比较法，但如大家所见，两人尤其是坦迪往往以一种脱离历史、脱离社会学的方法，把古典时代看作一个没有差异的“原始”社会。这种方法引发了现代主义者-尚古主义者之争，并得到马克思、韦伯、博兰尼等人的支持。除了《形式》（1964，《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译者注）一书外，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形态关注甚少；韦伯认为传统社会是残留的社会，是更为复杂的制度分解下的残余物；博兰尼视其为市场社会的对立面。正如我们从博兰尼的文章《我们过时的市场精神》[①]中看到的，这些立场往往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对现代社会和市场活动的普遍性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但这些活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仅仅和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打算采取历史
45 学家“现代化”古典社会的立场。当代的西方经济必然不同于古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共同的因素，比如贸易和市场，尽管它们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意识不到古代社会的市场活动纯属自我蒙骗。[②]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源于对市场的意识形态，源于反对它们接管人类生活日益扩大的地域的立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他们的坚持也的确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过，将古典时代[③]或古代近东[④]描述成非市场的尝试却是乌托邦的，是不现实

① Polanyi，1947.

② 马克思主义的史前史专家戈登·希尔德一直强调这一点（1964：190，他认为“商人的国际化身份”是字母文字传播的主要原因）。

③ Finley，1973.

④ Polanyi，1957.

的，就像那些认为新石器时代或狩猎采集社会是“原始共产主义”、没有“私有财产”的人们一样。在某些方面，这些社会比后来的社会更集体化一些，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同样也更个人化。[①]

市场问题显然与商人地位和港口位置有关。许多学者已经充分讨论了这一点。例如，摩西（Mossé）总结道，商人是那些“中等家庭出身”、与城市生活联系很少的人。“贸易中心的位置”处于雅典城的边缘。“商业属于个人领域”。[②]但是，商人也要和社会其他人交流，比如他们要从其他公民那里借钱以从事商业活动，为此，海外借贷制度发挥了作用，“基本的机构”经由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一直到19世纪而幸存下来，[③]它见证贸易、交易行为和“港口”两千多年的延续。实际上，各种制度先前就已存在，其他文明也有更复杂的商业和城镇，这就使博兰尼、芬利等人的观点更加不可信。并不是说商业制度没有差别，而是说相似之处对于理解文化史也非常重要。所以，在格利德希尔和拉森看来，博兰尼主张“美索不达米亚从来没有商人”的观点经不起推敲。[④]同样，认为古希腊没有经济组织的观点[⑤]应该像对待坦迪著作中对早期希腊的市场力量[⑥]、米利特（Millett）对古代雅典借贷[⑦]、科恩（Cohen）对雅典银行业[⑧]的看法等的方式一样。

46

不过，博兰尼的确明确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所

① Goody，1996a.
② Mossé，1983：56.
③ Millett，1983：37.
④ Gledhill and Larsen，1952：203.
⑤ Finley，1973.
⑥ Tandy，1997.
⑦ Millett，1991.
⑧ E. E. Cohen，1992.

提到的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和青铜时代近东社会之间的差异问题。[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希腊不属于青铜时代而是铁器时代，因为希腊有着充足的廉价金属，制造的工具和武器被广泛使用。但博兰尼提到了一些交换类型，比如互惠等。尽管博兰尼注意到了他所说的早期社会广泛的分配基础，但他认为其他交换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商业活动出现了，但这些活动在美索不达米亚被解释为行政性商业，通过等价（固定价格）、专款和港口贸易来实现，但没有市场。芬利也持同样的看法，如上所述，他谈到了大型宫殿、寺庙体系下的垄断。格利德希尔和拉森——后者是一位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经济学专家——指出这一论述非常不充分，[②]即便没有交易场所，市场也是存在的。虽然博兰尼认为无法描述这一制度，但至少找到了三种论据。而且，交易不仅仅局限于“行政贸易”，商人往往按他们自身的利益行事，经营不错的还可以用他们的收入购买房屋。格利德希尔和拉森这两位学者整理出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卡尼什（Kanesh）的私人档案，这些档案被分成典据、票据和契约，由信件、契约条文、账目、装货清单、法律条文、裁定书等。这些资料提供了合伙契约书——既有家族内的也有非家族的合伙、贸易风险（契约往往流传开来）、盈利和亏损等证据。[③]以这种方式论证并不像他们所坚持的那样，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抹杀所有的历史差异，见证资产阶级在所有社会形态中的联系”，[④]而是认识其连续性和断裂性。

我认为，有种连续性一直存在于商业领域中，史前史专家戈

① Polanyi，1957：59.
② Gledhill and Larsen，1982：203.
③ Gledhill and Larsen，1982：209.
④ Marx，1973：105；Gledhill and Larsen，1982：24.

登·希尔德强调它在青铜时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多样性。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明得到发展，肥沃的冲积平原给农民带来丰盛的回报，却没有提供大量基本的原材料，包括木材、石料和金属。所有这些原材料不得不依赖进口，大部分沿着主要河流输入。交通方式发 47
生了革命性变化，“冶金、车运、驴驮、帆船为新经济提供了基础”。[①]贸易因而变得日益重要，并导致第二个千年里像卡尼什这样的商业殖民地的建立。“在文明的传播中，卡尼什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超过了它今天的地位。自由的技工跟随旅行队四处游走，为他们的技术寻找市场；而奴隶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这些人一起跟着沙漠旅行队或船队在本国的城市安身落脚。流落异邦的外国人也需要他们自己的宗教慰藉……一旦因此而传播了宗教（例如，印度的宗教仪式由阿卡德人举行），那么，实用艺术和手艺也会很快传播开来。贸易促使人类经验的共享。”[②]

博兰尼及其很多追随者的立场问题是，对经济活动采用一种概念化的、笼统的而不是历史的态度，要么看作再次分配，要么看作市场，而从实践上说这种截然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同一时期不同实践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例如互惠出现在家族内部，市场出现在家族外，再次分配则由国家进行。当然，交易模式的侧重点是不断变化的，主要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有关，至少从生产手段上，人们能够随时间流逝而辨认出基本的差别，比如锄耕和犁耕文明的不同。但这一变化既不能带来市场，也不能消除市场。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看待连续性和断裂性、“现代主义”和“尚古主义”。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贸易事务放在或明或暗的网状框架之中加以考

① Childe，1964：97.
② Childe，1964：105–106.

虑，以便我们能够估量特殊社会的各种可能性（横向）或生产方式的范围（纵向）。这一方法比对待概念的常见的历史方法——往往是排他性的——更加精细。用这种方法，我们也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检验希腊独特性的前提假设。

政 治

与解释经济同样狭隘的定义也经常用于政治，结果是某种普遍性特征完全挪给了古希腊。在此语境中，政治被看作“国家追求的策略或政策，而不是隐藏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的过程”。[①]这种看法是有局限的，它显然排除了非国家的社会群体和大量可以被看作
48 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原始民主”通常作为小型社会的特征而不加考虑。

这样做的结果是，这种政治研究产生了与上述经济研究相似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芬利否认马克思对古典时代进行阶级划分的可能性（因为古典时代没有市场），而认为阶级和市场仅仅产生于近代（和“资本主义”一起）。同时，他找到了韦伯式的“身份—团体”（以“生活方式”为特征，而不是马克思说的经济阶层）。但他没有完全坚持这一点，因为他发现，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出现了“相对富裕的中间阶层，但却是非贵族的农民，夹杂着商人、船主和技工”[②]，他们成为抒情诗的主题。这一群体构成了“整个希腊史的军事改革”，他们被组成重装备步兵方阵，自己提供武器和盔甲。“步兵方阵最早为较为殷实的社会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一项重

① Cartledge，1983：14.
② Finley，1970：101.

要的军事功能。”芬利还将其他一些现代政治生活的长期特征的起源归功于古希腊，特别是民主和自由。实际上一些学者也将政治本身归因于这一来源，近来一位古典学者为他的书大胆命名为《希腊的政治发明》[①]。齐泽克（Zizek）也在近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和其他人说的“名副其实的政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大量平民（那些在等级社会中被牢牢确定地位的人）作为他们自身的代表反映整个社会，体现了真正的普遍性”。[②]这里的政治似乎专指民主，但它也用来指政府活动，至少包括地方的权力运作（“地方政治”）以及那些没形成权威（没有首领）的制度的活动。

和其他领域一样，希腊在这一领域对于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对欧洲，进而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但是从普遍意义上说，把政治活动（或他们的发明）限定在希腊，或排除经济行为，意味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概念。限制政治领域可能会认为政治并不以这种方式存在——除非从制度上区分开，在社会中也没有体现，就像博兰尼对经济的看法一样。然而事实是，社会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复杂事物不断出现，导致一些活动部分脱离、部分体现在实际制度中，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政治、宗教或亲缘关系还没产生之前，人们不能充分使用这些术语。实际上，人类学家在现有基础上已经推进了一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其他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恰当的社会制度的概念。一些古史学家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在研究不同历史分期和社会类型的学者们中间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概念上的分歧。

49

① Meier，1990.
② Zizek，2001.

古典传统政治有三个方面被看作与其他同时期的社会的区别，并流传到西欧，这三个方面是民主、自由和法治。民主被假设为希腊的特征，与他们亚细亚邻邦的“专制主义”或“暴政”形成对比。当代政治家援引这一假设用以展现西方的优良传统，以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野蛮统治”。我将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的现代意义，这里我将集中论述古代社会。在芬利的民主讨论中，他意识到“民主之前还有一些先例，即所谓的部落民主，例如一些亚述专家（Assyriologists）认为可以追溯到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民主”。[①]但他认为，无论事实如何，它们对历史、近代社会的影响甚微。“从这个意义上，只有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恰恰是哥伦布而不是维京海盗发现了美洲。”“18、19世纪阅读的正是雅典经验激发而成的希腊著作……”这显然是事实，不过，它却体现了整个欧洲以及文字文化对历史、民主“发明”的窃取。以伊本·赫勒敦为例，假使我们设想，部落民主也存在于其他地方，即便他们没有为19世纪的欧洲人提供一个模式，那么也必然为别的民族提供了模式。当然，希腊人发明了“民主”一词，为了方便他人阅读可能最早给出了此词的书面形式，但他们并没有发明民主的实践。而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表述一直是一种政治特征，也是许多民族奋斗的结果。

我研究的一个“部落”民族，洛达基人形成了一个分散的、没有首领的群体，福特斯（Fortes）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社会。[②]他们很少有权力委托（或强行施加），没有领袖制度。他们的邻居，

① Finley, 1985: 14.

②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

加纳北部的冈加族（Gonja）也是如此。这些组织没有政治统治，他们的自由，即便他们自己都没有特殊的词语来描绘。他们也认为自己非常自由，就像罗宾汉及其随从一样。 50

这些政治制度成为非洲这些地区的专门特征，那里，他们以轮休耕种进行简单的锄耕农业。但这些“共和”组织即便在更复杂的农业体系（青铜时代）的历史中也存在，他们往往出现在中央政府不易控制到的山区，比如奥本海默对美索不达米亚[①]、哈帕（Thapar）对印度的记载[②]。中国也有类似的群体，发生在“水边”的故事（——译者注）与罗宾汉原始反叛或杀富济贫非常相似。[③]我曾提到的伟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中，北非的故事发生在沙漠部落中。我们在欧洲一些山区发明这样的群体是为了逃避国家的控制，像苏格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宗族部落。但即使处于边缘地带，海盗船队的组织通常也是基于“民主”原则，看似避开了国家的权威，这些群体选择了一种更具合作性的制度，相似的类型发生在北美的一些殖民地中。毋庸赘言，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希腊“发现了个人自由”或民主。而且，与古代近东的比较也有力回击了亚细亚或其他专制主义的争议性观点，而这些长期以来都用以描述欧洲对东方文化思想的特征。

---

① Oppenheim，1964.

② Thapar，1966.在最近的一本书（2000）中，哈帕（Thapar）提出一种早期印度的观点，简要论述了发展框架中的“部落”社会。先前她在一篇题为《从氏族到国家》的文章中已有论述。在此社会中，演进逐步发生。这是一个有效的框架，它排除了国家中的氏族和与国家同时存在的“部落”社会的问题，忽略了不同政治制度的“联系”状态，这种形式为定居者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就像加纳北部的情形一样）。我并不是说，人们能将“部落”社会的进程转化一种更复杂的制度，而是希望指出，这种选择是共存的，而且他们也激发了我所说的人类对表述的普遍欲望。

③ Hobsbawn，1959，1972.

再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不顾虑“人民”也不可能统治下去，有时还会导致暴力冲突。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抗议、抵制、“自由”运动独自兴起，而非在古希腊的激励之下。他们的动力或根源都不
51 在希腊或欧洲，即便他们的现代宣言偶尔来自西方。这些运动与集权制度的权力委托或强行施加这一长期性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也与通常形容的“权威的脆弱性”有关。

古代社会对近代欧洲或全球史的影响并不简单。西方视雅典民主为榜样，但民主制并不只是存在于希腊的唯一政体形式。“专制”同样存在。专制和民主都没有将它们的价值观像现在那样投射到自身。实际上，芬利往往将专制看作大众的需要，以打破贵族对民主个体的独断。“这一悖论在于，专制君主超越法律和制度（宪法），最终巩固了城市及其制度，将代表整个民族的平民这些民主个体提升到政治的自觉意识上，这在一些国家中就导致了平民治理的政府，也就是民主制。”[①]因而，专制为民主铺平了道路（很像奴隶为自由铺平道路的说法），当然这是一种乐观的世界观。无论怎样，两者之间都有些动荡，而不是直接的发展。在欧洲，直到19世纪，民主都没有确切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积极价值，[②]体现在集权政府的发展上是：急剧增长的文职官员和军队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政拨款，通过税收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即便在那时，一些政治思想家仍然鼓吹一套“有钱人”、“少数人”、“精英”的强硬统治。

希腊与它的邻邦在事实上究竟有什么差异呢？差异肯定是有的，问题是如何拿捏差异的分寸？很多古典史家一直强调希腊的独

① Finley，1970：107.
② Finley，1985：19.

特贡献。戴维斯（Davis）认为我们继承了民主制、“雅典革命”、“希腊人比他人更为文明”的思想。[①]但也不能轻视其他社会。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也认为希腊“创造了民主”。他甚至写道：“他者的兴趣始于希腊。这一兴趣只是对他们自身制度检讨和反省的另一面。”[②]不可否认，希腊的确对他们的制度作了很多思考，这是文字的广泛运用带来不断增长的自反性的一个方面。[③]认为这些启发了他者的兴趣，这种做法丧失了对人类社会自身特点的踪迹追寻。他者的兴趣一直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行为，尽管它会并且也的确 52
呈现出许多不同形式。把这一点看作雅典“现代性”的一方面，再次误解了人类社会的特征和现代的概念。

希腊发明民主制这一概念同样值得怀疑。许多更简单的社会已经显出民主特征，这种观点也常常体现在欧洲思想中。霍布斯的观点当然是如此，他认为早期社会处于人人反对人人的战争状态，只有让权威人物成为领袖才能约束这个社会，即早期的国家组织形式。不过还有一种哲学家的观点，比如哲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早期社会的特点是“互助”，是分散系统的机械组合。两人都影响了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剑桥三一学院的著名人物，以“无政府主义布朗”闻名）的思想。布朗提出了无政府时期氏族社会的拆分政治这一概念，影响了上述非洲政治制度的讨论。拆分系统混合了直接民主和代表制民主，以及和分配公正相关的积极互惠和消极互惠。[④]

雅典人做出选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选举方式（这里是指通过书

① Davis，1978：23，64.
② Castoriadis，1991：268.
③ Goody and Watt，1963.
④ 参阅伯纳德（2004）对简单社会的论述。

面投票)。不过，这一程序不只限于希腊。在戴维斯对民主起源的论述中，其调查报告提到的迦太基只与战争有关，从未提及迦太基的政治制度。腓尼基也只有粗略几笔。但腓尼基的殖民地迦太基每年都投票选出他们的行政官，即执政官，他们代表汉尼拔时代的最高权威。有人认为这一词语和最高军事指挥官**巴西琉斯（basileus）和雷克斯（rex）**是同义词，也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源于罗马，但闪米特专家提出，两名执政官与公元前5世纪提尔（Tyre）的行政权有关。[①]“有人设想，迦太基每年举行共同执政的行政官选举这一常规制度应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民主革命应该发生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的布匿城。”这一假设来自波里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5—前123）的启发。这位希腊历史学家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毁灭之时被罗马囚禁，和西庇阿（Scipio）关在一起。他写道：“在迦太基，人们的声音在商议中影响很大，而在罗马，元老院拥
53 有至上的权力。对迦太基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占上风；在罗马却是公民中的精英。”[②]换言之，不仅迦太基，还有亚洲，以及腓尼基人的提尔这座“母亲城”都时常实行代表性民主制。

事实上，将希腊和腓尼基的西闪米特人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是正确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地理环境。两者“在地理上都是分散的地域，都没有中央集权的轴心”。[③]在腓尼基，黎巴嫩的山脉和森林一直蔓延到大海，而希腊的海岸也是峡谷多山地区。两种情形下，居民期许的是大海而不是陆地。这些环境与“为数众多的……小城邦的自由社会”相互映衬，而城邦却通常与“埃及和

① Lancel，1997：118.

② Polybius，VI，51；Lancel，1997：118. 不幸的是，波里比乌斯的《历史》大部分都已散失。

③ Astour，1967：358.

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军事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进行比较。但如阿斯特（Astour）所说，比较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发迹于小城邦之间，“即使在真正专制的新亚述帝国的统治下，它也顽强地从众多地方自治的大城邦中幸存下来”。[①]有些情形中，地方行政官从富裕的居民中选出，委任一年。[②]希尔德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邦中存在着“原始民主”。比较的结果是，东方专制主义和城邦民主之间，无论是希腊还是腓尼基都没有显著的区别。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众多。亚当斯（Adams）写道：“四十年后，乌鲁克（Uruk）的王位继承者在和议会分享战争决策权时仍然受到约束。”[③]东西方存在亲缘关系：阿斯特认为在希腊中能找到早期闪米特殖民地的根源，而后来希腊又征服了腓尼基海岸。

我认为，为了使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听到，对代表制的渴望是人类的内在需求，尽管精英的权威声音往往反对这一行为，这些声音可能还会盛行很久。事实上芬利也认为[④]，即使在现代，许多民主代表制在政治职业化的结果下也变成了精英制度。迦太基模式的年度选举需要人们去争取，[⑤]也必将会产生更多的转变，更多的号召和更多的公民参与。

54

假设从希腊继承而来的政治三要素之二是“自由”，而这一特

① Astour, 1967: 358, n. i.
② Oppenheim, 1964.
③ Adams, 1966: 140.
④ Finley, 1970.
⑤ 迦太基不像那时代的欧洲古典社会。对迦太基的理解受到文献资料的限制。但这可能是图书馆毁灭的结果（Lancel, 1997: 358–359）。亚里士多德也赞扬“迦太基的民主原则”（Fantar, 1995: 52）。因为，选出来的元老院有很多义务，包括宣战；众议院为每年的事务选出地方行政官（sufes或shophat）。范塔认为迦太基由于共同执政，故而是一种“复杂的民主。”（p. 57）个人的权力遭到激烈反对，专政受到谴责。对法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得到充分认可，因为自由是一个滥用的词语。

征又和他们明确的自我完善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和罗马一样，希腊确实也广泛使用奴隶。这一劳力形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尽管多次宣称许诺要给予自由，但实际上在卡洛琳时期，奴隶是大陆出口的重要部分。事实上，不同形式的奴隶劳动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有人认为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工资奴隶，因为个人不能直接占有生产工具，因而只能被迫为雇主卖命。因此，自由比它想像的更为复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区别，被干涉和强迫的自由被看作积极自由，而自我实现的自由则容易落入替强迫他人辩护的陷阱中。①

尽管存在明显的退步，继承于希腊的自由概念作为欧洲的一个因素不断反刍。刘易斯在论述为什么近代穆斯林没能“现代化”时，从福音主义的出现和民主的缺失中搜寻“什么错了”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他完全赞同“缺乏自由”这一说法，因为“思想自由可以抵制禁锢和教化，人们有提问、探究和演讲的权利，经济自由可以防止腐败和普遍的决策失误，女人自由可以抵抗男人的压迫，公民自由可以防止专制暴政”。②尽管自由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特有的，但广泛用于这些语境中的自由却没多少意义。思想自由似乎暗示着世俗化，这的确是发展新方法、新知识的一个因素。如果你拒绝或承认宗教回答，你就不可避免要揭开其他因素。但对很多人来说，解决方案也有自己的问题，人们宁愿局限在宗教范围内而不采取彻底世俗的态度。但是，在思考刘易斯的问题时，近东落在了“知识革命”的后面。知识革命影响了精神发展，即刘易斯说的更具体的理性发展。我认为，近东的落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传播

① Berlin，1958；Finley，1985：6.
② Lewis，2002：177.

信息的印刷出版这一关键因素，工业革命和商业网络的扩张（大西 55
洋和太平洋）使得西方超越并接替近东。随着大西洋海岸大型港口的建立，西欧与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绕过近东。这些因素比刘易斯说的泛泛的自由要更具体，更特殊。

而且，自由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自由完全由或多或少有些主观的多数选民决定。任何形式上的“民主”都是大多数人的自由。选举程序在人们能投票决策的地方生效。而上文提到的群体在个性、种族或宗教上都比较原始，因而他们不能被称作代表制度。自由是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的服从。澳大利亚或美国的土著居民没有自由。他们的自由对由外来征服者构成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失败的，因为鼓吹者高调宣扬的普遍自由几乎都没被接受。

芬利坚持自由是奴隶制的对应面。他认为，奴隶制与自由紧密相连。显然，这是一种悖论。

> 众所周知，希腊人揭示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和实现自由的制度框架。从深远意义上说，前希腊世界，具体是指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我禁不住还要加上迈锡尼人的世界，都是没有自由的人。在此意义上，西方逐渐理解自由的概念……简言之，希腊史是自由和**奴隶制**的联手推进。①

一些历史学家也想把古典社会的成就特征和它对奴隶的使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奴隶生产方式连在一起。当然，完全控制劳动力对

① Finley，1960：164.

希腊社会特有的大型建筑修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他劳动组织形式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不管怎样，通常由军事征服促进的奴隶劳动的程度并不清楚。古典社会的很多活动都是其他劳动形式完成的，其中有些形成了奴隶劳动的特征，但与奴隶制本身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我们对青铜时代各种文明中奴隶劳动的使用比较并不清楚。时不时有些争议认为奴隶存在于所有文明中，但只在古典
56 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正如拉夫（Love）指出，主导性是个很难使用的概念。[①]的确，奴隶的广泛使用主要是侵略性的军事政策及其商业成功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其他形式的劳动同样重要，尤其在城市和手工业领域。亚当斯也论述了古代近东的奴隶制问题。[②]他就芬利的观点总结道：“从这一点来看，苏联经济史学家和西方专家的争议在于，前者将早期国家社会看作‘奴隶’社会，而后者坚持相对少量的奴隶在一些领域使用变成了专有名词而不是实际事实。”“奴隶社会”的特征取决于奴隶制在古典时代是“主导性”制度，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则处于边缘地位。[③]显然，奴隶制的范围十分重要，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并不独特，它的普及范围被夸大了，而“自由”的概念肯定不能取决于数量。

芬利认为奴隶在希腊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这是“希腊文明的基本要素”[④]），他还意识到劳动大军中其他广泛的劳动形式。在国家中，小生产者从事临时付费的工作，特别在收割季节；“自由工和奴隶同时存在”。[⑤]城镇中有更多闲散劳动力。不过，“希腊

① Love，1991.
② Adams，1966：103–104.
③ Adams，1966：96–97.
④ Finley，1960：69.
⑤ Finley，1960：155.

城邦越先进”，他们就不得不越像“真正的奴隶制”。即使奴隶对希腊非常重要，但无论在农业还是其他行业中，奴隶也肯定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劳力来源。[①]它既不能作为自由的尺度，也不是其他社会的标志。非奴隶劳动当然也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

不过，还有一种看法在芬利对古典时代的观点中也非常重要：他认为希腊与古代近东青铜时代主要社会的差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希腊没有灌溉农业，还因为他们“发现了个人自由”和实行奴隶制。希尔德也认为铁器时代的希腊哲学沉迷于个体和社会问题（印度哲学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随着铁器工具和铸币的出现，个人对个体的思索从对群体的彻底依赖中解放出来。[②]但他很谨慎地提出，这些关注即使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而，自由和个 57
体的概念并不是希腊特有的。这一点完全正确。

芬利非常“关注用以描述这些状态的语言”，正是在此语境下，他和另一些人（“那些非常著名的人物”）才能提出自由的“创造”。他认为不管近东还是远东（包括希伯来）都没有给出希腊语和拉丁语“自由”一词的翻译，以此证明这一点是合理的。既然一种类似奴隶制的制度在其他社会中也存在，他认为，无论这种制度是否被看作“主要的”还是“主导的”，意识不到有没有奴隶制的差异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奴隶制也出现在我所研究的加纳北部的群体中，他们也没有专有名词来描述“自由”，但不管怎样，人们区别“奴隶”（或“卖身之人”）和其他人是没有困难的。实际上，如果你不是奴隶，假设你是自由的，也就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标记了。

---

① 伯纳尔认为北欧海盗民族入侵黎凡特（Levantine）海岸之时“奴隶社会”被引入，这一入侵取代了青铜时代的君主的但却是商业的社会，代之以寺庙主导的社会。

② Childe，1964：224.

古典时代假设的对政治的第三项贡献是提出了法治，这一特征与罗马传统密切相关。罗马的确提出了一套完备的成文法典，其他文明社会同样如此。但认为口头文化没受到广义上的法治，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正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①]和很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更最重要的可能是格鲁克曼（Gluckman）[②]，他对赞比亚（Zambia）的巴罗策人（Barotse，Lozi）法律进行了详细研究。实际上，“法治”概念被文字文化的人们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加以解释。法律条文写进“努尔法”（Nuer Law）、“茨瓦纳法”（Tswana Law）和其他法典体系中。口头法律与新型国家的成文法典是一致的，这些国家也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确，近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事件或许给人们一种印象：那里缺乏法律保护措施。但伊拉克、巴尔干、东方，偶尔还有西欧的当代事件也同样如此。一旦出事便动用武力是与法治相反的做法，即便法治可能是大动干戈的结果之一。

我们再谈一个更特殊的例子。私人财产权是罗马法或者西方的一项发明，这一普遍观点完全忽视了人类学家对口头文化中法律秩序的精辟分析。农业社会要是禁止（不必要禁止，也没那么重要）
58 小块土地耕种权，它会怎样运转呢？加纳北部洛达基的口头文化显示，那里农田并不缺乏，农田边界以石头标识清楚，这些石头上画有黑色十字架（非常神秘），以警告侵占土地的纠纷。和所有周边社会一样，边界纠纷虽然不经常发生但肯定有。这些纠纷通常由公认的法律程序来解决，通过先例、调停或暴力威胁。更复杂的文字文化自然也有他们的方式，包括登记在册和契约形式，这些在后青

① Malinowski，1947.
② Gluckman，1955，1965.

铜时代的社会中都能够找到。成文的“契约”在中国是“公告文件”，包括土地转让。唐代就已有这些了。19世纪的中国台湾有这样一个例子：“契约生效，旱田买卖不可取消……”[①]卖主继续写道，他已征询亲戚的意见，根据他们是否想买而定，但亲戚不买，又“因为母亲急需钱”，所以才出卖土地。“因为担心口头协议不可信赖”，所以立此字据。由此可见，原则上，如果不立字据，口头的土地转让也是可行的，但并不可信。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直到欧洲罗马法出现才有了这些权利。例如，韦伯遵循其师蒙森第一个提出假设，认为人类的原始天性“本质上是群居的”。[②]马克思也这样认为。这是19世纪历史学家做出的假设，20世纪的历史学家还提出同样的假设就要另当别论了。早期学者由于文献资料不足，对过去有些幻想的成分；但现代学者能接触到大量近来社会的研究资料，其基本情形相似的政治经济说明了梅因土地权利阶层观点的有效性，有些土地属于个人，有些则属于特殊群体。梅因的网状框架分为个人和团体，这一分类并不能充分描述过去和现在社会的土地制度。前文字社会也有不同的权利阶层，也可以粗略分为所谓的个体和集体。[③]的确，将古典时代的法律程序和靠近当代的前文字社会法律体系的复杂研究作比较会导致方法论上的明显的危险，就像格鲁克曼所进行的赞比亚研究，那里的证据很有说服力。这种法律程序显然更容易普遍化对群居阶段的设想，它更 59
适合神话王国而不是历史领域。某种程度上，对另一类“资料”的忽略是一种否定，是对独立学科的疏离，它导致一种残缺的历史。

① Cohen，2004：41.

② Love，1991：15.

③ 对于个人和集体划分及方法这一问题的论述，这一粗略的两分法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参见Goody（1996a：17）。

宗教与“黑色雅典娜”

学者们对希腊文化的一般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他们不是从古典社会的独特性出发，而是试图在爱琴海和中东，特别是埃及，伯纳尔研究的黎凡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其他人研究的黎凡特北部等之间建立联系和连续性。抬高希腊的地位，贬低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市场经济，意味着否定希腊的辉煌成就，否定他们与腓尼基和埃及的联系，否定他们作为商人在周边海峡、东部地中海和黑海的重要性。伯纳尔在《黑色雅典娜》一书中对这些主要内容进行了批判。

对古希腊文化史的接受性阐释被伯纳尔看作雅利安模式。[①]这种模式取决于对印欧语系者（或包含更广的印欧—赫梯人）入侵的看法，并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此，欧洲历史与它周边的历史发生分岔，否定了地中海东部海岸闪米特人的影响（和亚非闪米特人的影响，他们是闪米特语系家族中较大的一支）。这一模式导致人们容易低估希腊与腓尼基和埃及的联系，但伯纳尔认为这些对希腊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这部著作的标题所示。[②]在伯纳尔看来，雅利安模式使得“希腊历史及其与埃及、黎凡特的联系和19世纪的世界观取得一致，尤其是与之相应的人种种族主义”。[③]他抛弃了这种看法，选择了他所谓的“修正的古代模式”，承认埃及的古代历史和腓尼基殖民化的希腊，换句话说，承认与地中海东部的来往影

① Bernal，1987：1991.
② Bernal，1987：72.
③ Bernal，1987：442.

响了希腊及其语言、文字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就像希罗多德的《历史》最初所展现的那样（因而成为“古代模式”）。

伯纳尔论述的一个问题是，从古代到雅利安模式侧重转换的观点只是随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发展产生于19世纪。的确，工业 60
革命之后，随着欧洲对世界的统治，这些情绪在当时越来越强烈。不过伯纳尔将这些情绪的出现看作与19世纪40年代印欧语言学产生相关的新发展，它导致人们“很不情愿”看到希腊和非印欧语系的任何联系。

但在我看来，否认东部联系的倾向要追溯到它的“根源”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更一般性问题，伊斯兰世界自公元7世纪的扩张[①]、十字军东征和基督教在拜占庭的一系列失败恶化了这些问题。那时，欧亚之间的对立表现为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亚洲的对立，他们各自延续了早期“民主”和“专制”的传统。从更广义的层面上讲，种族中心主义将我们与他者区分开来，以便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非常差劲的历史导向，对世界历史尤是。

我认为伯纳尔后期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发展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伯纳尔承认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源泉”是“古典文学”。那时，希腊罗马思想比其他思想更有优势，为人文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方法”。一方面，有可能建立与近东、闪米特和亚非文化包括迦太基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已经遍及欧洲，并持续了数个世纪。相比中世纪的基督教，古典时代是一缕清新的空气，古代就是希腊罗马，人们可以阅读他们的著作。

① Goody，2003b.

另外，伯纳尔认为宗教和哲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希腊宗教主要是埃及人的，是殖民的结果。有些论据出自语言比较，但据我对非洲语言有限的经验表明，这些比较通常太过细碎，有些投机性，因而不能形成对复杂文化的基本结论。尽管如此，宗教经历了漫长的开创和衰落、荒废和建构，这使得它更加不能从其他仪式，如伯
61 纳尔所强调的祭牛仪式中寻求借鉴。养牛为生的群体往往有这种仪式，而且，所有的仪式都不能代代相传，也可能被另一种仪式取代，因此，我更愿意强调人类学家所说的宗教领域是独立创造的，而不是伯纳尔的假设所展现的那样。这种现象并不是随处发生，我们在总体上承认埃及象形文字对米诺文字的影响，承认埃及柱廊对希腊建筑的影响，但宗教仪式的开创往往是不受影响的。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与黎凡特的长期来往，从黎凡特征募新兵和水手，这些都影响了埃及。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Hyksos，公元前18—前16世纪，又称“牧人王朝”——译者注），统治者是外族人，他们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利斯（Avaris，Tell el-Dab'a）建都，与亚洲进行频繁的贸易，充分挖掘西拉比卡迪（Serabit el-Khadim）的绿松石矿场，依靠沙漠驴队进行贸易。那时，埃及缺乏适宜远航的船队，也乐意接受米诺人的保护。[①]埃及进口了大量陶器。在阿瓦利斯发现了大量米诺的壁画残片，显示出埃及与阿卡拉提尼（Akrotini）的锡拉岛（Thera）壁画有很大联系。[②]那时，“克诺索斯和三角洲之间的来往……比先前更加紧密”。[③]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摩西与一神论》（1939）中沿袭埃及有功

① Bietak，2000：40.

② Davies and Schofied，1995；Sherratt，2000.

③ P. 瓦伦，《米诺时期的克里特和法老时代的埃及》。Davies and Schofied，1995：8.

于欧亚宗教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他宣称摩西是埃及人，在埃赫那吞（Akenaton）法老时期的“异教”中找到了一神论的来源，反过来，一些新教徒认为基督教义中发生的事情作为创世神话的结果在很多人类社会中可能曾经存在，而创世神话强调了这一过程的独特性，理由是创世（往往是创世主）是一种独特行为，越来越少的神性往往扩散为尘世之物。

弗洛伊德主张“法老帝国的统治是一神论思想产生的外因”。[①]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导致了宗教上的集中。但很多传教士和人类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一神论，简单文化中至少有神灵存在，那种作为创世主的神和创造了神性较少的人的神。在非洲，他成为一位退隐的上 63
帝，很少受到人们的崇拜，但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事实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他可以返回到一种积极生活的环境中去。在此语境中，一神论的出现并不难理解。

尽管有所保留，但我还是不能完全赞同伯纳尔的主要观点，因为：

（1）对“种族”因素的忽视占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些因素作为根源比伯纳尔认为的要持久得多，它是一种与文化优越和种族优越性相关的观念。

（2）同时，古希腊和近东的联系被大大忽视，腓尼基和迦太基的边缘化是这一进程中的明显例子。迦太基的宗教受到希腊和埃及两者的影响。

伯纳尔并非唯一试图在地中海社会构建一个比通常认为的更高程度共同体的学者。相信希腊人和亚细亚海岸讲闪米特语的民族之

① Frued，1964（1939）：108.

间存在联系，这已经成为很多犹太学者如著名的希乌斯·高登（Cyrus Gordon）的论述重点。[①]高登开创了乌加里特语言研究，他从叙利亚北部城镇发掘的泥板碑文研究这一新发现的闪米特语言，此发现为最早的字母文字提供了证据。高登试图将乌加里特在腓尼基的据点和克里特联系起来。1955年，他出版了《荷马与圣经》一书，认为“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在东方地中海的相同起点上平行发展”。[②]这一主张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无疑异端。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前否定腓尼基人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观点得到修正。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腓尼基人不仅居住在沙漠中，也在大陆的底比斯定居。[③]由此，现在人们认为，腓尼基对铁器时代希腊的影响可能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开始了。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穿梭航行。他们是一群在海外寻找商业机遇，特别是金属的海边群体。他们改进了字母文字，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记载交易。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腓尼基人是如何成为木材商和金属商的。黎巴嫩的群山从西顿北边绵延至海，甚至连提尔人都有一些海边习俗。黎巴嫩雪松被卖给埃及人建造船只（埃及没有木材），卖给以色列修建庙宇，反过来，他们则卖给黎巴嫩谷物和粮食。腓尼基人的足迹为寻找金属遍及地中海，到迦太基、加迪斯，甚至到了康沃尔，特别是在后面两座城市寻找锡用来锻造青铜。他们穿行的结果正好是对迦太基的殖民，建立了今天的突尼斯。据说，他们甚至还引导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埃及环航非洲的远征。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伟大的海上旅行者、富有的商人，不仅是爱琴海

① 同时参阅高登的同事阿斯特（1967）、沃德（1971）的著作。
② Bernal，1987：416.
③ Bernal，1991：6.

地区的，还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一些19世纪的学者如贝洛赫（Beloch）极力否认腓尼基人在公元前8世纪前的存在。考古学家的发掘表明，“在第二个千年”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爱琴海世界和地中海东部海岸的商业来往极其繁华”。[①]实际上，基迪亚（Jidejian）认为，卡德莫斯（Cadmus）的故事“反映了早期西闪米特人对大陆希腊的渗透”。[②]据《历史》记载，卡德莫斯是提尔国王的儿子，被派出去寻找他的妹妹欧若帕（Europa），结果建立了希腊城市底比斯。正是腓尼基人卡德莫斯给希腊的波奥提亚（Boetia）带去了字母文字。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腓尼基人在罗德岛（Rhodes）和其他地方的活动。卡德莫斯建立了俄狄浦斯王朝的传说在古代社会一直流传着。当然，他们不仅与古代近东，也和我们所说的古典社会有很多联系和影响，他们是古典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古典学者的著作中，对希腊罗马的强调不仅低估了腓尼基人对字母文字产生的贡献（在辅音字母上要比希腊早750年），以及闪米特语的文学成就，还把迦太基贬到历史的边沿。迦太基最初只是腓尼基人的贸易区，后来才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强大帝国，但它不仅被降到历史边沿，甚至贬到“野蛮人”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相信罗马人用小孩做祭品。这一点尚待考证。不管怎样，为什么“旧约”中有些更野蛮的事件，比如以撒的祭献，或者罗马对私生子的揭发，又或者斯巴达的训练又被解释为纪律严明，这些并不清楚。我们清楚的是，一个高度完善的文明，作为罗马的敌人也是

① Jidejian，1996：66.

② 有一种保守的评价认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埃及和爱琴海之间存在联系。参阅Ward（1971），特别是其中第119页。

64 它的祖先，却以对待近东社会同样的方式被排除在古典时代的范畴之外，尽管从公元前5世纪起，当分散的商业中心连成一片时，腓尼基人便成为先是希腊后为罗马的同时代人和竞争对手。

我们获悉迦太基、腓尼基人对地中海文化贡献的一个难题是对他们的书面记载所知甚少。自从腓尼基人有了字母文字，他们显然保存了各种记载。而且，约瑟夫（Josephus）后来写道："在这些与希腊联系的国家中，恰是腓尼基人对文字的使用最为广泛，他们用文字记载生活琐事和公共事务的庆典。"他还提到，"过去很多年来，提尔人一直记载他们自己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与外族交往的公共事件，并由国家汇编和保存"。[①]这些文献都没能幸存下来，但它们可能被记在从埃及进口的稀少的纸莎草纸上，而不是更为持久的泥板碑文上。腓尼基人的碑铭大多很短，一般发现于沿海城市，其他地方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除非我们将视线延伸到犹太教。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腓尼基人是古代社会的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没有文学或艺术的遗产留给希腊罗马的原因。就文学遗产来说，迦太基的图书馆由于公元前146年罗马对城镇的毁灭而遭到破坏或消失。但有据可证，他们的农业知识不仅推进了他们从事的农业，还被翻译成拉丁文记载在农业课本中。

由此，闪米特人的角色在地中海东部的消失也与腓尼基在这一地区远航的大量证据相矛盾。腓尼基人居住在很多著名的"城邦"之中（如他们所形容的），这些城邦沿着主要位于今天黎凡特海岸，延伸到阿克里，一直到乌加里特。

---

① Bernal，1991：6.

结语：古典时代与欧亚二元对立

希腊人的与众不同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近代欧洲人确认的。哪些内容被芬利这样的古典学者视为潜藏在希腊与近东其他地区假想的差异背后的驱动因素呢？实际上，希腊与近东的货物交换与思想交流非常活跃。想像中的政治差异几乎没有充分体现在希腊本身上。无论古典时代社会的特殊性是什么，学者们的论述所欠缺的是，欧洲和地中海为什么，又怎样以一种不同（可能是进步）的社 65
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与后青铜时代社会的普遍特性发生了分岔。他们在知识体系、雕塑、戏剧、诗歌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就特殊社会形态而言，我们持怀疑态度。许多批评家认为奴隶制的支配地位是古典社会的主要特征。我已表明：就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来说，奴隶制的盛行既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不管怎样，奴隶制或许不能构成古典和所谓的亚细亚生活方式之间巨大的差异，正如古代和亚细亚模式的二元对立所表明的那样。奴隶劳动力的使用非常广泛，他们在生产技术手段上没有多少差别。在古典时代，铁比铜、锡便宜，又非常实用，它的广泛使用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但此结果是这一地区所有社会都有的。[①]其他方面的发展无论发生了什么——以水利工程和农作物生产最为明显，这些发展与先于他们的技术保持着持续的一致。从这些层面来说，两者的比较比很多古典史家说的更没多少意义。

描述发生在东方事件的概念表现为“东方例外论”，描述西方

① Childe（1964），第9章。

系列事件的概念表现为“常态”，这是种无凭无据的欧洲设想，这一设想在19世纪占据了有利位置，并声称它指明了通往“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这种观点产生于混合的资本主义概念中，广义上说，是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经常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意指工业生产发展这一非常特殊的经济行为，通常包括“生产性投资”（虽然这是农业社会的一个普通因素）。当西欧本身成为19世纪的“例外”时，先前区别于其他主要文明的独特之处此时并不明显，除了“大航行时代”的优势以外。而“大航行”可能与“枪炮和帆船”的技术发展以及其后西欧对中国古老的活字印刷技术的吸收有关。这一发展鼓励了信息传递（和积累）更加迅速，但这是中国和阿拉伯文明很早以来一直享有的优势，因为他们使用纸张，并最早用于印刷。

区别古代与后青铜时代文明亚细亚生产发展模式，结果产生了与假设的分岔有关的解释性问题。同时，它也把资本主义起
66 源这一问题推到想像的欧洲文化根基。因为在很多古典作家看来，早在古典时代，欧洲就已沿着这一方向探索出正确的道路，而亚洲却走错了路。直到最近，“人文主义”的主要观点仍然认为欧洲文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萌发于希腊罗马的成就之中。有时，这些成就归功于“希腊的天才”，就像布克哈特所采取的方法一样，这种方法很难从单一的历史学或社会学观点来讨论。有时，它们又被看作与字母文字的创造有关，这种方式忽视了亚细亚（闪米特）音标文字的起源和其他文字形式的大量成就。[①]有时，希腊科学（或逻辑）又因为近代的发展被赋予独特的地位，这种观点

① Goody，1997.

似乎被李约瑟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①]否定了。[②]每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要诉诸交流沟通，都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做出了贡献，但就东西方、欧洲和亚洲的成就而言，两者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概念性区别难以接受。实际上，直到现在，多数人都承认文化和经济成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重商主义、城市文化和读写活动在其他地方也都存在，至少处于相同的水平。 67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但这并不是李约瑟的全部观点，他倾向于认为，“近代科学”仅仅出现在西方，因为这些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我在后文将会讨论这一观点。

② G. E. R. Lloyd（1979）以不太相同的观点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

第三章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还是欧洲的瓦解与亚洲的主宰？

“封建主义”一词有很多种用法。一般情况下，它是指不经选举、不劳而获的阶层，比如最初的贵族院。在更学术性的说法中，我们可以采取斯特劳约（Strayer）的区别：“一类学者用这一词语描述一种学术思想：封侯依赖地主和土地财产（及其附属的经济利益），占有封地采邑的组织形式。另一类学者把封建主义看作一个概括性的词语，总结了中世纪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①]波斯坦（Postan）在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的导言中也区分了两派学者，一派是讲英语的学者，他们坚持军事采邑的观点；一派是苏联学者，他们论述了阶级统治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波斯坦和布洛赫一样提到了苏联学者的研究方法。[②]这里，我们用“封建主义”特指欧洲古典时代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

古典时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

西方人通常把封建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西方发展进程

① Strayer，1956：15.

② M. Postan，Bloch（1961），导言。

中的“进步”阶段，而其他社会这一阶段却没有以同样方式的进行。和缺乏古典时代一样，封建主义的缺失将他者排除在现代性道路之外。不过，这一阶段很少显出后来商业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确切的内在本质，除了偶尔一些比较有力的改革活动以外，这是一段倒退的时期，被视为希腊的黑暗时代——优势的倒退。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与东方联系取得的，而不是纯粹的内部发展。不是墨洛温和卡洛琳王朝，而是君士坦丁堡继承了罗马帝国。“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西方退缩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现在的中心是地中 68
海东部盆地，也就是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国家。”[①]实际上这个中心甚至可能还要延伸到更远的东方。

尽管封建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观点，但某种大土地所有制（也附着各种义务）在后青铜时代几乎随处可见。而且，东方的城市文化一直持续发展，虽有暂时的衰落，却不像西方那样，在此方面可以打上“东方例外论”的特征。西方的瓦解并没有波及到地中海东部，这里城镇和城市文化，譬如君士坦丁堡或亚历山大，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早期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因为这些城市一直是手工艺中心、教育建制的发源地和贸易转运站——尤其是和东方的贸易。

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延续

古典时代向封建主义过渡的时间仍有待商榷，但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的的确确地发生了。至少，西方发生了显著的瓦解。因而，西方的重要特征不是罗马时期文化的进步发展——像很多人假设的那

① Slicher van Bath，1963：31.

样，而是帝国瓦解所带来的城市文化的灾难性衰败。西欧政治经济体要比东方更加脆弱，也没有充分以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为基础。其结果便是，当帝国岌岌可危时，西欧的瓦解比东方要容易得多。显然，先是瓦解，随后才是复兴，这一点对欧洲的封建主义非常重要。索萨尔将这一点看作所有封建主义的关键，接着，他认为封建主义是普遍存在的。①

某种程度上，西欧的瓦解是蛮族入侵和基督教及其势力兴起的外部结果，但很多学者也将瓦解归于内部因素，比如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弊端（矛盾），也可能归因于自公元前200年左右经济长期衰落所导致的人口减少。生产进程也被看作大地产（庄园）的迅速扩张，它们逐渐能够自给自足，这一发展便是我们口中常说的早期封建化进程。有人认为封建化进程是外销产业而非产品本身的问题，②结果是失去了扩张，罗马经济因输出金银以换取货物而逐渐崩溃。

很多著作记载了罗马帝国终结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衰退。③北方的遭遇更加凄惨，尤其是不列颠，“和基督教一起兴起的城市几乎彻底消失了”。④巴尔干也同样如此，尽管其他地区稍微好点，特别是西班牙南部。即便在意大利北部，也有四分之三的自治市幸存到公元1000年。虽然如此，但西方的陨落仍然被看作世界史的范例，古典时代及其城市中心的衰落导致了封建主义的盛行，后一阶段又目睹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对东西方和地中海南部不同历史的认

① Southall，1998.

② Childe，1964：283.

③“衰退”概念用来指一种特殊的批评（例如识字率），先前（第一章）我们在讨论“前进”有别于“进步”时曾用到这一概念。“进步”包含对所有领域的优势模糊的判断。“前进”的概念用于解释所有领域的全面地相关性，涉及多个领域同时发生的运动，比如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

④ 蒂利翁（Tillion）于2004年3月在艾克斯的演讲中首次提到这些内容。

识将各重大事件的共同历程分散到完全不同的视野之中。 69

弄清楚罗马瓦解对东西方帝国的影响有多深远非常重要。欧洲历史学家从西欧的立场出发，非常看重这些重大事件，他们排除了东欧和更普遍的东方。但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罗马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别。东罗马与亚洲贸易来往更为密切，罗马的大城市比如帕米拉（Palmyra）和阿帕美（Apamea）在黎凡特和西亚都普遍建立起联系。安德森的《从古典时代过渡》一书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差异。西罗马的人口不太复杂，城市化程度不高，其政治经济本身也不是以近东的复杂文明为基础的，但这些基础存在于埃及和黎凡特。西罗马的特点是雨水灌溉而不是灌溉农业，城市很少，商业也不发达。西方正在逐步衰落：乡村覆盖城市，而城市活动迅速消失。[①]富庶的庄园在扩大，把农民和工匠都揽进这个封闭的经济体。因为引入了更复杂的农业，罗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通常以一幢大庄园为核心组织起来，周围散落一些小庄园。这些庄园非常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力。由此，西方才经营起农业来，并出现了较高的机械化程度，水车在古典时代末期普及开来。[②]但东方较少受到蛮族的侵略，城市生活 70
比较活跃，农民抵制大庄园所规定的居住制度。在一些城市，比如迦太基、雅典、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高等教育继续发展。

在希尔德看来，地中海东部的城市生活及其所有配套体系一如从前：

> 很多匠人仍然发挥着古典和希腊化时代所有的技术性技艺和才能。农产品依旧有效地为市场生产。物物交换并

① Petit，1997：336.
② McCormick，2001：10.

> 没有完全取代货币经济，自给自足也没有完全使商业失去活力。文字并没有被遗忘。实际上，亚历山大和拜占庭的科学和文学文本被认真抄写、慎重保存。希腊医学和教堂祈祷一起在公共医院实施。①

西方状况凄惨，好在教堂城市兴起了，旅行继续着，玻璃制造业也发展着，水车的使用范围扩大了。

有种观点认为，罗马的繁荣取决于地区间彼此的相互依赖。沃德-伯金斯（Ward-Perkins）否定了芬利对地方经济的强调，但他意识到帝国全部地区的联系并不很紧密。罗马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瓦解之后，依附其上的整个经济也崩溃了。尤其是，“5世纪是东方持续繁荣的时期，而西方却是显著的经济衰落”。②7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前罗马帝国极其相似：东方发达的经济延伸到迦太基、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这些西方“蛮族地区”。这一差异部分是因为东方，某种程度上还有南方更紧密地融入到亚洲的贸易经济中。直到7世纪，意大利甚至拜占庭“都和当时的近东（那时是阿拉伯世界）非常不同，近东经济明显存在多样化，并持续繁荣着”。③

东方的城市和市场有何不同？有人认为，伊斯兰的城市和市场落入与西方甚至更远的东方不同的范畴之列。④的确，有些一般特征能够将它们区分开，但这些差异又无法应对相似的问题、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群体组织。外行们总是倾向于夸大这些差异（通常是

① Childe，1964：290.
② Ward-Perkins，2000：382.
③ Ward-Perkins，2000：360.
④ Goitein，1999.

表面上的“文化”差异），而忽视这些相似性（通常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以城市为例：远东城市被形容为小商小贩经济[①]，近东的城市则是杂货铺经济，它们总在西方经济的对立面。[②]实际 71
上，货郎带着小商品这样低级的销售方式在集市和商店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与西方的行商是相同的。不管怎样，他们只是这些不同社会整个经济的一个方面，而这些社会的商业、银行和投资的形式都与西方类似。城市也是如此。无论城市有没有城墙，无论它们的街道是否由单一一类工匠占据，无论穷人和有钱人是否比邻而居，这些都很重要，但并不能决定经济发展的特征，在各种环境中城镇都要履行自己的一套职责。

但西方与这些发展失去了联系。从公元4世纪起，希腊知识的逐步消失切断了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一直到文艺复兴。罗马帝国的瓦解与基督教的发展同步发生，后者对艺术和思想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一神论宗教中，教会最初是反对大多数艺术的，尤其是戏剧、雕塑和风俗画。教义信仰的有力统治意味着禁止思想领域的探索。众所周知，在西方，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不提倡教授易于攻击基督教的哲学，因为哲学总是喜欢问：世界是被创造的，还是没被创造；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但问题是，宗教已经宣布了它的绝对权威。很多情况下，知识甚至在缩减。这点在知识领域中没有比医学更明显的了，因为对人类身体（“以上帝的形象”）的解剖当时是被禁止的。

在基督教时代的前几百年，知识渊博的医生来到罗马，包括盖伦（Galen）——他继承了亚历山大的希腊医学学派，赫罗菲卢斯

① van Leur，1955.
② Geertz，1979；Weiss and Westerman，1998.

(Herophilus) 则在这里进行动物解剖。直到那时，解剖人体都是非法的，盖伦不得不依靠动物实验。罗马衰亡后，医学再也没有受到如此尊重，实验不敢做，创意成为危险技能。科学史家查尔斯·辛格 (Charles Singer) 写道，基督教在医学上是反科学的，因而医学经历了一段“逐渐衰落”的阶段。[①]“中世纪早期，医学经由基督教会和阿拉伯学者之手广为流传……疾病被看作是对罪恶的惩罚，这种惩戒只有通过祷告和忏悔才能消除。”[②]一方面，辛格认为，基督教可能对医疗有益：修女细心仁爱的护理改善对病人非常有用。
72 但另一方面，医学的确不是基督教的发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大医院都有护理工作。西方对医学知识的维持——如果没有增进的话，其唯一的真正贡献是将希腊医学文献翻译成拉丁文，并由修道院保留下来。[③]基督教世界的东部展现了一幅非常生气勃勃的景象。聂斯托利教派的波斯基督教徒一直致力于将古典医学知识翻译成阿拉伯文。波斯诞生了著名医生拉兹 (Rhazis, al-Razi, 9世纪后半期) 和阿维森纳 (Avicenna, 980—1037)，其主要著作《医典》作为蒙彼利埃 (Montpelier) 医学院的课本一直用到1650年。不过，阿拉伯人在他们自己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增补不多，他们和基督徒一样禁止解剖人的身体。只是在12世纪，随着医学院的建立，西方解剖才再次兴起。那时，文艺复兴及其知识的实际扩展目睹重要的解剖场所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建立，比如米兰、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达·芬奇在前两个城市做了近30年的研究。可以说，实验医学的历史见证了中世纪西方很多学问湮没陨落的历程。

---

① Singer, 1950: 215.
② Guthrie and Hartley, 1977: 890.
③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122ff.

但东方和南方的情形并不相同，至少医学是如此。地中海东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与罗马周边的北部和西部繁荣的贸易依赖较少。公元1世纪，叙利亚的沙漠商贸中心帕米拉从远东、中国和印度进口大量的货物，并被记载于公元187年一份著名的关税表。这份关税表对大量的贸易项目进行细分，包括奴隶、紫色染料、香油、橄榄油、腌制品、家畜，还有妓女。叙利亚人由此也被称为古典时代的二道贩子。他们的支脉向各地延伸，所有市场都有叙利亚-腓尼基银行家的身影。帕米拉的商业区荟集在东方幼发拉底河的杜拉-欧洛波斯，西边则是罗马。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的丝绸和玉石，还有穆斯林的香料、檀木、没药、象牙、珍珠和各种珍稀的玉石。玻璃来自叙利亚、绿色精致陶器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还有经过安提阿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器，以及其他很多奢侈品。①

在北非的迦太基和马格里布，汪达尔的统治并不是经济衰败的原因，因为海外贸易一如既往，在随后拜占庭的征服之下仍然繁荣，直到阿拉伯人入侵。举个例子，非洲红色条纹陶器的出口一直持续到7世纪。公元533年拜占庭入侵，情形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似乎 73
还有更多投资注入迦太基这样的城市。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侵入此地时，商业从欧洲转到君士坦丁堡和东方。但这一地区仍然有着丰富的油和小麦，值钱的商品源源不断从东方进口，尽管后来衰落了。②

北方基督教世界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商业活动，与伊斯兰世界南部相比更是每况愈下。在我提到的东方，商业中心与长途贸易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西方，长途贸易和罗马一起迅速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教会城市”的产生以及教会因素主导的城镇的出现，这一

① Browning，1979：16-18.
② Cameron，2000.

现象部分是因为曾盛行罗马社会的繁荣商业的崩溃，部分是因为教会的兴起。教会兴起意味着长期债券由自治城市流向教会城市。有人认为，“正是这一时代特征，过去以公共浴室和剧院为标志的土木工程大幅度地转向宗教建筑”。[①]伊斯兰世界同样也出现了向宗教建筑的转变，不过这种需求并不太多。那里产生了辉煌的清真寺以及后来的马德拉斯，这些通常由依附于它们的市场供给，但伊斯兰教对经济没有太高的要求。

戈伊泰因（Goitein）一生致力于研究19世纪晚期在开罗墓地发掘的中世纪犹太人手稿。我们从他的著作以及其他资源获悉，开罗依旧像在罗马帝国时期一样，仍然是与远东贸易的中心。[②]犹太人和伊斯兰商人的足迹一直不间断于西印度半岛的马拉巴尔海峡，而东印度人也曾远行至埃及。[③]君士坦丁堡的商路也畅通发达。李约瑟曾提到一位到过巴格达的中国学者，欧洲人也一直零零散散地从陆路旅行到中国。虽然这也不能表明和西方的贸易就衰落了，但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近东不可避免受到欧洲低迷时期的影响，贸易的主要对象转移到别处。西欧落在了最后。如果西欧对东方奢侈品、香料、丝织品、香精、陶器的需求降低了，那么东方还有另外的市场需求。他们继续与北非贸易，正如我们从印度和突尼斯的商贸情
74 形中看到的，这些把历史学家戈伊泰因最早的注意力吸引到商业上来。近东有它自己活跃的市场，这些市场需要商品供应。所以，即使西边商路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东边的商路仍然维系着。印度一直是近东的贸易对象，它和犹太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马拉巴尔海

① McCormick，2001.同时参阅Speiser（1985）
② Miller，1969.
③ Ghosh，1992.

岸的定居一起作为完整的历史在创世记的文献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西南印度的胡椒贸易在著名的旅行指南《红海航行志》（又译作《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有很多记载，此书由一位希腊领航员创作于公元50年左右。同时，胡椒贸易在其他一些有关罗马的资料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与印度的贸易自罗马时代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莫泽里斯（Muziris）的商贸中心位于今天的科因（Cohin）附近，此地被假设成圣·托马斯传教士和叙利亚基督教徒（聂斯脱利派）登陆的地方[①]，是亚历山大装货的重要中心。正如我们从纸草记载中所看到的，一份公元150年前后的书面契约记述了货物从红海运到亚历山大海关保税仓库的过程。有人推断公元2—4世纪之间这一贸易衰落了，这显然不是全部事实。公元6世纪，印度的商船仍继续将胡椒运到埃及，送到罗马的市场上。实际上，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教徒而言，从创世纪时代一直到后来，西印度一直是重要的贸易中心。

与此同时，土耳其和叙利亚为中国、伊朗和高加索地区的货物提供了另一个市场。他们的交易对象主要是非欧洲地区。东方贸易进入威尼斯，继而是意大利西部、帕尔马、热那亚（Genoa）和阿马尔菲（Amalfi），并建立根据地继续从事贸易。随着十字军东征，欧洲经济在新千年里积聚力量，西欧开始进入地中海。

威尼斯不是重新打开欧亚非三洲贸易唯一的地中海力量。在地中海东部贸易复兴基础上建立的意大利城镇不是威尼斯或塔斯各尼这些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普拉托（达蒂尼家族）商业家族的故乡，而是卡帕尼亚，尤其是亚马非（和拉维罗），南边靠近萨勒诺，东边抵达那不勒斯，处于安茹王朝的统治之下。从这一时期初

① Gurukkal and Whittaker, 2001.

期开始，城市商业活动变得非常活跃。公元836年，伦巴第的国君允许阿马尔菲人有“旅行的特殊自由权”。[①]很快，阿马尔菲人用这一特权以谷物、油和木材与拜占庭、叙利亚和埃及交换丝绸和香
75 料，他们把其中一些卖给北非的阿格拉比和西西里，以换取金子这种当时西方非常稀有的商品。早在10世纪，阿马尔菲商人还和君士坦丁堡、开罗、安提阿，甚至科尔多瓦进行贸易，到11世纪在耶路撒冷的人数已经相当多。的确，这一时期拜占庭和法蒂玛（Fatimid）的通货广泛用于地方贸易之中，对这一地区的长途贸易产生了一些影响。在伦巴第统治的鼓励下，意大利城镇恢复了与拜占庭和东边的一部分贸易网络。这一复兴与古典时代或封建主义没多少关系，却体现了对商业文化的普遍认可。

阿马尔菲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繁荣。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基督教或西方的成就，随着南部人口包括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散居，所有地区都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这一事实也反映在艺术上。阿马尔菲周围的商业活动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譬如公元1061年左右，君士坦丁堡制造了教堂的青铜大门。这一活动被卡斯基（Caskey）形容为“新生的资本主义”[②]，但实际上它不仅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冲突，也与亚伯拉罕宗教宣扬的价值观矛盾，后者与放高利贷有关。商业活动与宗教的竞争处处可见，不过显然商业赢得最终胜利，商人对这些社会制度的贡献是进程的一部分。

阿马尔菲的艺术很多都是商人委托创造的，特别拉维罗鲁菲洛的建筑，薄伽丘在早期的《十日谈》中颂扬了鲁菲洛的商业活动。不过，这个故事还描述了商人的冒险生活及其成就。因为，这个家

① Caskey，2004：9.
② Caskey，2004：8.

族腐败盛行，父亲于1823年被安茹王朝处死。当时的安茹国王是萨勒诺的查尔斯，也是后来西西里的查尔斯二世，他们遵奉教皇的命令，从公元1265年起一直统治这里。①

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一样，西班牙南部维持的完整的地中海贸易网络要归功于它与伊斯兰世界的来往。显然，穆斯林对地中海欧洲商业瓦解之时给予了很大援助②，在公元711年征服西班牙之后，他们一直和西班牙保持联系。安达卢西亚和非洲大陆的交通一直维系并不断改善，③西西里和伊夫奎亚（Ifriqua，突尼斯）也一样。从当时西欧的有利位置看，就文化和历史来说，地中海是一幅严重扭曲的画面。我们需要像弗兰克说的那样重新面对东方④，因为东 76
方并没有遭遇西方同样程度的瓦解。在后罗马时代，东部和南部在经济、科学和城市文化上的延续非常重要，尤其是后来，使得西欧能够在罗马瓦解和“封建主义”早期之后迎头赶上，而这段历史与贸易和城市生活的毁灭以及随后侧重于农业和乡村有关。

东方和西方军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对于维护法律、维持社会内部秩序、抵御外部入侵、海外征服、为货物（如细陶器）寻找市场提供服务来说，军队是一种重要的机构。相比西方，“东方成功地使他们的军事机构近乎完整地幸存下来”。⑤军队“一直是国家授权的机构，但不是独立的力量，按名义上的主人指令行事”。⑥同时，西方既有军事统治，也有一些部落联盟统治。地方诸侯根据他

① Hodges and Whitehouse，1983.

② Belgian Henri Pirenne（1939），Hodges and Whitehouse（1983），讨论了这一问题。

③ 参见：Constable，1994.

④ Frank，1998.

⑤ Whitby，2000：300.

⑥ Whitby，2000：305.

们的领土和居住民规定军队义务，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好为封建分权和军队义务提供了基本条件。这种社会组织的重新出现是西方之于衰败的一种回应，而不是文明进程中的进步阶段。

譬如，维克曼（Wickham）对古代社会向封建主义过渡的讨论就没有提到民主，这与一般观点正好相反。古代的特征是，强大的罗马中央政府，其庞大的军队由不断增长的重税来维持，这大大超过了人们上缴的租税。抵抗赋税促使农民藏身于地主庇护之下，地主有义务拿出一部分租子缴税。由于税收的原因，地主们也打算改变对日耳曼政权的效忠，军队从地方上组织起来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所以，万恶的税收逐渐消失，而租金和地方劳役开始盛行，不过并没有那么迅速，地主们直到公元568年前后才开始有此动作。[①]

转向封建主义

只有在西方，以及西方的一些学者会认为，古典时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是普遍的。但不管怎样，西方的封建主义在古典时代衰落后并没有立即出现。安德森认为，古典时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是
77 古代社会末期的“灾难”，而非“渐进的”重大事件。但是欧洲的倒退被看作“为接下来诞生于古代废墟之上的新的生产方式”扫清了道路。[②]这一新的方式是“接续古典时代，起于封建时代”。安德森提出，欧洲以外与封建主义近乎相同的日本，虽然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其所缺的正是古典时代的元素。[③]同时他否定了

① Wickham，1984：20.
② Anderson，1974b：418.
③ Anderson，1974b：420.

罗马农业，并将他的评论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系，认为希腊罗马世界的思想和政治成就和“与其狭隘局限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①]实际上，希腊罗马的“上层建筑”以妥协的形式幸存下来，教会在破坏政体时起了很大作用。“古典时代的上层建筑文明要比封建主义优越一千年——从古代直接过渡到自认为自觉的文艺复兴时代，中间有一段倒退。”[②]安德森认为教会的长期存在横跨了这一时段，因为教会成为文字文化的保护人，不过，这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文字文化，是一种将很多古代知识谨慎排除出去的文化。

所以对安德森来说，不是“上层建筑”，而是“下层基础”，也就是说经济，被看作中世纪的进步。他提到古代社会的静态经济（与封建社会的动态基础相比）和“文化与上层建筑的活力”之间的对比。希尔德偶尔也喜欢贬低罗马的贡献，认为它没有“解放新的生产力”。[③]他宣称，奴隶在罗马农业的广泛使用禁锢了技术的发展，因为人力比机械便宜。在希尔德看来，奴隶制“阻碍了工业的扩张”。[④]尽管“封建主义”产生于西欧的瓦解，但它仍然是进步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极力陈述这样一种观点，即“奴隶生产方式导致技术停滞，在奴隶制内部，奴隶劳动没有改进的动机”。[⑤]但这些学者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那一时期也有很多“改进”，因而，关于奴隶社会的有些观点需要修正。[⑥]

---

① Anderson, 1974b: 136.
② Anderson, 1974b: 137.
③ Childe, 1964: 280.
④ Childe, 1964: 209, 280.
⑤ Anderson, 1974a: 132–133.
⑥ White, 1970.

同时，奴隶生产方式也没有自动导致经济停滞，或许正是由于奴隶
78 的使用，罗马的庄园农业才出产丰盛，不仅为上流阶级提供了高层次的奢侈生活，还为他们提供了丰裕的美酒，以及陶器、织物和家具——这些还出口到其他国家。

改进不一定非得“节省劳力”，因为，就像波塞鲁普（Boserup）说的[①]，技术进步也可以包括一个劳力做更多的工作。如果改进意味着一个奴隶而不是两个奴隶能生产同样多的东西，那么使用奴隶劳动必有其动机。在西西里和迦太基王国，奴隶或奴仆从事的大型庄园以一种“科学的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着。[②]实际上，罗马人在整个欧洲都建立了“资本主义模式”。[③]这种观点并不矛盾。明茨（Mintz）和沃尔夫（Wolf）在研究加勒比地区糖业的奴隶生产方式时，将“机械的创新性使用”看作“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④]西方认为摆脱奴隶生产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积极后果，虽然奴隶制肯定不会完全消失。“古典时代的概念仅适用于希腊罗马，正如它与‘奴隶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一样。”[⑤]不过在欧洲，有些学者认为“奴隶制”至少持续了更长时间，直到“封建主义”完全建立。[⑥]即便到后来，欧洲仍然热衷于掠捕贩卖奴隶，奴隶贸易成为欧洲一项主要出口。[⑦]但在很多学者看来，奴隶生产方式和古典时代一起消失了，从这一角度看，封建主义和此前的古典时代一样被看作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进步阶段。但是，这不是对中世纪经济的唯一

① Boserup, 1970.
② Childe, 1964: 244.
③ Childe, 1964: 276.
④ Mintz and Wolf, 1950.
⑤ Anderson, 1974a: 47.
⑥ Bonnassie, 1991.
⑦ McCormick, 2001.

看法。欧洲农业史专家斯里彻·冯·巴斯（Slicher van Bath）写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庄园体制不能完全自给。人们生产的物品比他们的消费稍多一些，没有资本积累，也几乎没有劳动分工。”[①]至少在初期，生产是衰败的，就像普通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和知识毋庸置疑也都衰落了一样，而恢复却是缓慢的。

至于罗马农业，还有一些比安德森更客观的说法，这些看法认为向封建主义进步转变的观点必须修正。霍普金斯（Hopkins）[②]曾对芬利的古代经济观提出有力支持，但他也认为，整个农业生产因为更多可耕地而得到发展。北方肥沃的土地使用重型犁，这种犁装有铁制模板和犁刀，由好几头牛牵引对土地进行翻耕，它不像地中海 79
犁那样只能刮到地表。人口增加了，出现大量的城镇居民，其中很多是工匠和小商贩。人口增长带来食物需求的增长，还带来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单位生产力的提高。后者大多在公元1世纪就已完成，因为生产力水平先前已经普及到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地区。这一提高是由于“铁器工具的广泛运动，农用工具的改进（例如螺旋压榨机），还出现了农书这一试图合理使用劳动尤其是奴隶劳动的征兆”。[③]

在农业之外，生产力也有所提高，因为那时人力得到了“杠杆、滑轮和定轮、火力、水力（古典时代后期的碾磨以及淘矿）、风力（对帆船有用，磨坊用不着）和技术能力”的补充。建筑（例如使用混凝土）、旋转碾磨、在铸铁中改进空气流通方式，交通以及大型制造业如建造更大型的船只等等都出现了“技术进步”。所有这些活动中，铁在机械形式的改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铁只是

① Slicher van Bath，1963：37.
② Hopkins，1983：70–71.
③ Hopkins，1983：xvi.

一种廉价金属，铁矿到处可见。

罗马所体现的不是“成熟文明”和“上层建筑”这一狭隘意义上的简单的“文化优越性”，因为他们以城市建筑、栈道、火炕供暖、剧院和公共浴室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他们还创造了法典、文学作品，建立了教育机构，创立了各种类型的戏剧表演形式。没有发达的经济这些都将不可能出现。正是罗马，才在农村领域和建筑这些大型城市集中地广泛使用奴隶——不仅在罗马本地，还有不列颠的小型城市中心，以及叙利亚的帕米拉和阿帕美这些大城镇。所有这些比空谈静态的基层结构要有意义得多，而且它的确使这段封建时期看起来不太活跃（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太重要，处于边缘位置。

但是，中世纪早期的确体现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犁的使用导致了种种变化，[①]不过这些主要是早先实践的发展。另外，还有大量的发明，这些是“罗马时期的巨大进步。其中一些是从其他地区传过来的，但被打上技术标志，成了后来西欧的文明特征”。[②]没
80 人怀疑欧洲后来的技术成就，但是，很难说清楚那些从海外借鉴来的发明如何成了西欧的技术标志。上述观点体现了技术领域中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后来有它，所以我们以前也有它。”这个“它”是假设的技术“层面”，是我们继承的精神内容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些引进的先进技术确实是别人的发明，尤其是中国的发明。[③]根据林恩·怀特（Lynn White，1972）的说法，那时引进的主要发明是马刺、马蹄铁和水磨。马刺主要用于军事，经阿拉

① Slicher van Bath，1963：69.
② Slicher van Bath，1963：70.
③ Hobson，2004：50.

伯传到欧洲，这和牵引的其他改进及其管理一样。与此同时，马蹄铁也在9世纪作为新的马具（嚼子）可能从拜占庭帝国传到欧洲，它提高了马的牵引力，就像马刺促进了奔跑一样。水磨，早在公元31年中国就运用于风箱，出现在欧洲已是罗马后期，它从水槽引水以便碾磨，其传播非常缓慢，4世纪时才传到阿拉伯然后进入西欧，抵达不列颠时已是8世纪了。欧洲最初将这些机器用于碾玉米，后来用以榨油，制革厂剥皮、轧金属、锯木头、粉碎染料，直到13世纪才用于造纸。在英国，“磨坊”一词指一般意义上的机械工厂，就像布莱克（Black）的著名诗句“黑暗的撒旦磨坊”。此句中，磨坊成为工业革命的画像。

尽管有这些成就，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处于陨落之中，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公共剧院和公共浴室重新出现在西欧用了多少时间？教育机构重新赶上以前又用了多少时间？能够再烧制一道精美的菜肴又用了多少时间？当所有这些最终出现，才是我们所提到的文艺复兴、古典文化的重生。只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中间还伴有断断续续的恢复，譬如所谓的卡洛琳时期的“文艺复兴”以及12世纪的复兴。

卡洛琳王朝的复兴和封建主义的产生

罗马帝国的瓦解并没有自动产生“封建主义”，尽管有人认为罗马后期自我封闭的庄园经济预示了封建主义的产生。[①]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特征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独特，此前是黑暗时代，所以

① Coulbourn，1956；Goody，1971.

有人认为封建主义仅从公元8—9世纪的卡洛琳王朝开始，安德森对此形容为西欧普遍的“行政和文化的真正复兴”。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表现为“帝国管理机构统治下逐渐产生的封建主义基本制度”。①

有人认为，卡洛琳的封建农村经济即大庄园经济是独特现象，“表现并迫切需要经济的推动力”。②“欧洲经济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大庄园。③有些庄园非常大，但极少是完全自我封闭的。因而，
81 公元8—9世纪，“农村作坊铸造货币”④并参与市场流通是非常普遍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庄园在水力磨坊上倾资颇多，尽管它在古典时代末期比想像的更为广泛。⑤大量考古发掘表明，庄园内也有各种城市手工业，其中一些有自己的依附性商人，其结果是商业缓慢扩展，特别是在北部，因而人口也开始逐渐发展。

不仅封建主义产生的“原因”，甚至连封建主义的时间和划分都引起了争议，这与卡洛琳王朝有关。显然，前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取决于“后者是否是纯粹的欧洲现象以及它出现（或消失）的时间”。这是《剑桥古代史》最后一卷（第14卷）的重要观点。福登（Fowden）在书中提出了分期的合理性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古典时代”结束于公元600年，或者以310年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作为一个更早的说法。⑥后一种划分忽视了这一事实：东罗马“既有皇帝又有主教，并以一种妥协的状态延续了850年之久”。⑦实际

① Anderson，1974a：139.
② McCormick，2001：7.
③ McCormick，2001.
④ McCormick，2001：9.
⑤ McCormick，2001：10.
⑥ Fowden，2002.
⑦ Fowden，2002：684.

上，查士丁尼皇帝（482—565）“真正重组了罗马帝国”。所以，他的继承者转向了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人进入后，它与西方的联系便被切断了。福登强调阿拉伯世界的扩张应该放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背景中考察，基督教是“全新的、更通俗易懂的教义”，而且使得阿富汗到摩洛哥，地中海南部、东部和西部等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采用公元600年这一时间没有考虑阿拉伯世界，因为阿拉伯世 82
界被看作属于完全不同的亚细亚社会。这就完全忽视了连续性，所以，福登总结道，变化的更好标志是公元1000年。

法国的学术传统采用了相似的观点，集中论述较近的政治变化，这些变化要么被看作激进（即革命性的），要么被看作渐进（渐变）。这一传统将“封建主义”推到甚至比卡洛琳时期还要后，大约到公元1000年。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形容为“残酷的断裂”、“社会骚乱”。[①]但另一派学者批评了激变的整个观点，代之以一种更温和的、渐进的模式。他们否认11世纪之前和13世纪之后相对稳定的统治中间有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特别是导致经济急剧变化这一事实，并认为诸侯的残暴作为一种手段以建立新的奴隶制这一假设毫无根据。[②]但对两派而言，封建主义仍然是欧洲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序幕：“11世纪的封建主义是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前提。”[③]

封建主义是现代性的征兆，因为现代性不能看作早期阶段的特征。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中，“劳动力和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生产方式由土地状况和自然经济决定。[④]另一位学者写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

① Barthelemy，1996：197.
② White，1996：218.
③ Barthelemy，1996：196.
④ Anderson，1974a：147；Slicher van Bath，1963：70.

的过渡可以看作从货币经济向自然经济的退化。”[①]但他指出，“自然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城市经济。

构成“自然经济”的因素并不清楚，不过，这一论述单指西欧，以城市瓦解和恢复为基础（如我们所看到，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延续），这是非常清楚的。以此看来，东方历史的确与众不同，他们没有中世纪（中间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呢），没有“封建主义”，因为城市一直繁荣，制造业和工业也很发达，即使与西方相比侧重有所不同。地中海东部也是如此，例如叙利亚，城市甚至城邦历经十字军东征也一直存在。[②]即使在意大利，古典时代社会末期的城市
83 文明也从未完全销声匿迹，教会势力[③]和市政组织混合在一起……从10世纪起一直兴盛。

从广义的生产方式确定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问题是，生产方式不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定义，还容易以一种狭隘的方式加以解释，这种方式建立在“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区别之上。但“下层基础”深受“上层建筑”的影响，知识体系的发展往往对经济十分重要。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体系在下层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甚至连农业生产都不仅要依赖狭义的技术，同时还要依赖交通（例如罗马道路的修建），依靠作物种植和播种技术，以及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

尽管以上论述为封建社会发展特征的种种质疑开释，但人类的宽广历史仍然被西方学者追溯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古典时代和封建社会是通往西方资本主义的因果链独特的一环。其他一切，用马

① Slicher van Bath，1963：70.
② Maalouf，1984.
③ Anderson，1974a：155.

克思的话说，都是“亚细亚例外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情形的确只发生在西方，并成为这一时期的“特例”。西方经历了公认的“灾难性瓦解”，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学者如林恩·怀特一样，历史学家安德森强调中世纪取得的技术进步，并且以此和亚洲和罗马时期的“静态”经济作比较（这一点值得怀疑）。例如他提到这一事实：虽然罗马人从巴勒斯坦，后来又从亚洲那里接受了水磨，却并没有充分利用它（虽然也有新的证据表明使用广泛）。水力是东西方长期以来唯一被逐渐利用的自然力。罗马在此方面的确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比如水渠修建、火炕供暖、复杂的供水系统等，就像叙利亚的阿帕美或普罗旺斯的加尔桥。只关注狭义的农业技术似乎是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眼光，无论如何，如果人们想一想罗马对农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水磨的运用以及生产制度的全面成就，罗马就绝非静态的经济。

就封建时期欧洲社会的进步特征而言，毫无疑问，西欧农业的生产力随着时间得到提高，不过是从一个低水平的起点开始的。但 84
是，它并不像近东的灌溉农业那样多产，也不像北非、西班牙南部，更比不上远东。[①]“直到13世纪，中国的农业可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农业，而印度则是中国唯一的有力对手。”[②]有人提到6世纪中国的“绿色革命”，以及后来其他一些事情。[③]欧洲农业水平在公元8—12世纪的确提高了，但提高了多少呢？安德森和希尔顿这样的学者视其为非常“进步的”发展，另一些人则对它的成就印象不深，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

① 伊斯兰世界对农业的贡献，参阅Watson（1983）和Glick（1996）。
② Elvin，1973：129.
③ Hobson，2004：56.

骑兵战

就破坏形式而非生产和交流方式而言，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还与骑兵战的出现有关。[①]骑兵战的出现要比很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封建时间早得多，因为他们与不同体系的政治经济变迁关系更紧密。这种战争形式及其相关的骑士是国际至大事件的结果。公元前370—公元1000年间，欧洲遭遇了自东部草原边疆的无数次挑衅，经历了连续不断的亚洲迁移高峰，这些迁移是为了躲避遥远中国的骚扰。[②]阿瓦尔人在欧洲大陆的渗透意味着大量的日耳曼民族迁移到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英格兰，而斯拉夫人则占据了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对这些统治者的回应之一便是战争，轻骑兵的出现充分利用了东方的马镫，它能让骑马者在马鞍上用矛或剑战斗。西方历史学家往往认为骑士制度是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于公元733年在普瓦泰战役中的发明。史诗和传说中流传的这场胜利把欧洲从穆斯林中拯救出来。但实际上，这场远征只是一场小小的袭击而已。[③]穆斯林当时更关心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无论如何，想像中的重要的新军事技术将欧洲从东方中拯救了出来。

当然，中国在第3个世纪就已使用马镫，它用青铜和铁屑铸造。
85 翻山越岭的轻骑兵在波斯、拜占庭和伊斯兰的军队中都有。早在几百年前，“射箭骑兵”就已出现在近东。各种专门化的骑兵战都需要大量的装备费用。[④]轻骑兵所需要的昂贵费用依赖于封建经济基

① White，1962；Goody，1971.
② Hobson，2004：105.
③ Goody，2003b：23-24.
④ Goody，1971：47.

础。骑兵需要从战利品和他们声称保卫的农民那里获得补偿。这一期望同样也存在于西非冈加族管理庄园的骑师中，不过他们的优势是有限的，因为酬劳主要来自战利品而不是农民的税费。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主义”，因为他们用手持锄头生产，这与牛马牵引的犁不同，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统治者，他们生产的产品都很少，几乎没有“剩余”。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对他们的技术、供给以及态度观念作一番比较。

总之，我们在评价社会发展时并不一定要将欧洲中世纪看作一个“进步的”阶段，尽管很多欧洲思想总是希望我们这样做。[①]这些观点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群居的”或“部落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②]，每一阶段必然导致下一阶段。“古代阶段”是“建立在……农业之上的城邦历史”，奴隶经济占主导地位，尽管它也有少量的商人。封建主义随后征服了这种形态，虽然它几乎不能代表欧洲对亚洲的优越性。

中世纪的生活质量的确有些改善，但如果将封建主义看作进步的话，与灌溉农业生产相比，近东和远东城市的延续和农业发展似乎更有代表性。西方的优势并不能真正代表它自己，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建立在意大利城镇的制造业和商业成就——主要是纺织业成就的基础之上，因为正是这些把欧洲引向了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出了追求知识和艺术进步的信号。这一进步不仅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还有交流方式的变化，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姗姗来迟——两者终于从中国传来，只是现在才用于字母文字中。　86

① 在此语境中，我用“进步的”一词主要指技术上的进步，如上文我所提到的一些措施的改进。

② Hobsbawm，1964：38.

贸易的繁荣和制造业的兴盛

医学史专家的研究揭示了欧洲卡洛琳王朝的医生借鉴阿拉伯科学的重要意义，这一认识反映出地中海长途贸易的重新确立，它不仅影响了经济，还有更多方面。这只是所谓的卡洛琳王朝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而卡洛琳文艺复兴不仅包括知识的增长、学校的建造，还包括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丝绸进口偶尔供应，而且有一定限制”。[①]随着与黎凡特的相互来往，欧洲商业才真正开始好转。和黎凡特的贸易开始于8世纪末，但直到10世纪和11世纪才达到一个重要的层面，“一方面鼓舞了威尼斯和意大利南部的来往，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威尼斯与近东国家的贸易”。[②]地中海和西方的贸易由此开启（东方和北非港口之间的贸易一直延续下来），有人将这一恢复看作资本主义的“起源”。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是——对于中世纪的西方来说。贸易扩张意味着和地中海东部商贸中心，和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很多小的贸易中心重新建立联系，这些贸易中心没有遭遇西方城镇类似的瓦解，它们确立了持久的商业经济。贸易联系为欧洲的缓慢恢复铺平了道路，带来了大量奢侈品和更多的日常用品，更有利于技术的提高，还能受到古典知识、文学和学术的熏陶。

卡洛琳时期依附性的商人为大型宗教机构和大庄园服务，而独立的商人则为城市经济效劳。因而，商业使得很多意大利城镇得以恢复，并为卡洛琳时代欧洲所谓“自然经济”的中心提供了不同的聚集地，据说在这些地方封建主义得以发展。城市的显著瓦解发生

① McCormick，2001：23.
② Slicher van Bath，1963：34.

在西欧，而不是东方，现在又在东方贸易的刺激下复苏了。欧洲贸易在8世纪末开始好转，沿着波罗的海北部路线，经俄罗斯到伊朗，甚至到了地中海，香料（药品）、香薰和丝绸开始用来交换羊毛、皮毛、锡、法兰克剑，特别是奴隶。奴隶成为欧洲一项重要的出口，一直持续到土耳其时期。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小世界开始和穆斯林经济的大世界联系在一起”。[①] “伊斯兰的兴起和经济的巩 87
固改变了正在兴起的欧洲经济特征。”[②]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海外贸易主要仰赖羊毛和布匹生产以及对欧陆的出口，其巨额利润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与制造业相关的活动，即长途贸易和高利贷。纺织业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重镇，也是文艺复兴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的成功带来了文化活动的复兴和扩张。最初形成的是地方的羊毛产业，其后是丝绸业。开始时丝绸依靠进口，后来由地方制造。最后是棉花，同样先是进口，后来由欧洲自己纺织。它们正好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在工业化生产之前，丝绸从中国传到伊斯兰世界，在土耳其的布尔萨纺织。同样，西方大力提倡印度的棉布生产。欧洲对棉布的大宗进口招来了怨愤，就像反对丝绸进口一样。大量的金银为此流向海外。[③]东方贸易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只是“小商小贩”[④]，也有大宗的进口和出口这样重要的商业贸易。大宗进口最终使得布尔萨和阿勒坡本地开始生产棉布，并仿效印度的花纹设计，就像土耳其著名的伊兹尼克瓷砖模仿中国一样。[⑤]

---

① McCormick，2001：797.
② McCormick，2001：718.
③ Inalcik，1994：354–355.
④ Steensgaard，1973.
⑤ Inalcik，1994：354–355.

羊毛出口开始是未经加工的，后来才制成布料出口，最终在与近东的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羊毛纺织是西方制造业的主要生产部门，生产率“可能是……横向踏板织布机的三倍”。[①]新的织布机大大提高了布匹生产效率，最早出现在欧洲的时间是10世纪。而这种织布机很早就为东方所知，中国的商代就已出现，同样复杂的纺线卷轴装置为后来卢卡和博洛尼亚的水力纺纱机提供了基础。[②]

丝绸生产在中国得到巨大的改进，它比意大利机械流程的充分发展以及后来英国其他纺织品的发展都要早得多。埃尔文（Elvin）描述了一种大型的水力大麻纺纱机，它的雏形是中国北宋的缫丝装置。此装置把丝绕在踏板上，将蚕茧浸入装有沸水的盆中，然后从
88 中抽出大量细丝。[③]13世纪这种机器用于麻线纺织，由畜力或水力带动。埃尔文将它和17世纪末18世纪初狄德罗《百科全书》中描述的麻丝纺纱机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以致“几乎不能不怀疑其最终源于中国，可能是通过意大利纺丝的制丝设备传到欧洲的”。[④]换句话说，丝绸生产及其机械化都开始于中国，为欧洲的纺织品制造业提供了基础，这一过程被形容为丝绸和棉布的“进口替代”。

纺织业的发展对欧洲出口羊毛布料进口丝绸的贸易恢复十分重要，因为纺织品通常要和近东交换。布匹生产得益于机械化乃至工业革命。欧洲纺织业中的水力机械最初出现于10世纪意大利的羊毛产区阿布鲁齐。在阿布鲁齐，水力用来操作大型木槌敲打羊毛皮[⑤]，这种加工过程可能也从中国传来。[⑥]普拉托，这座与佛罗伦萨（其产品

① Anderson，1974a：191.
② Elvin，1973：196；Poni，2001a and b.
③ Elvin，1973：195.
④ Elvin，1973：198.
⑤ See Duhamel de Monceau，*Il Lanaioli*，1976.
⑥ Needham（2004：223），他提到水力棒槌。

在国外通常没有名气）毗邻的城市依赖罗马水渠和水库的改善来清洗和加工羊毛，同时也用以水力驱动机械。

普拉托的纺织业产生于12世纪，依托皮参泽奥（Bisenzio）河流的充足水源。由于能有效洗掉黏土，因而这里是精加工羊毛的天然位置。我们发现了12世纪初在城墙周围沟渠边有铺晾羊毛布的痕迹。12世纪制造业的发展已经遍及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并导致家庭生产转向所说的工业生产。活跃的布匹贸易意味着城市中出现了很多货币兑换活动，尽管完全意义上的银行直到12世纪末才出现。1248年，羊毛商们组织了自己的公司，包括来自卢卡和羊毛产区伦巴第的移民。[①]1281年，一个普拉托商人在佩拉（Pera）进行丝绸和貂皮交易，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地区由热那亚人组织起来，因为羊毛和丝绸贸易是欧洲和近东贸易的重点所在。直到12世纪末，商人们开始准备参加香槟展，13世纪参加了阿维农的教皇宫廷展销 89
会。13世纪末，另一个普拉托商人成为法国国王的收税员，这就启发了薄伽丘《十日谈》开头的故事。[②]银行业和纺织业往往密切关系，处处可见，比如印度。

13世纪末，普拉托有67个厂房加工谷物和织物。羊毛制造业在这座城市的迅速扩张要归功于弗朗西斯科·迪马可·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1335—1410）。他的雕像就立在大会堂前面的中心广场上。达蒂尼留下了大量的信件和书籍，这些资料是从砌在他房子的墙壁中发现的，为商业文化提供了一份索引。达蒂尼没有子女，他把自己的财产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帮助穷人。他

① Cardini，2000：38.

② 参阅 I. Origo（1984/1957），《普拉托的商人：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日常生活》，Harmondsworth：Penguin。

曾在旅行中去过阿维农，当时教皇的宫廷展销会（纺织品的大市场）就建在那儿。回来后他便建了一座厂房，有各个生产流程包括印染。纺织业以及相关的商业发展了，与此同时，意大利的会计业也发展了——前者需要后者。所以，普拉托到处是会计、律师、商人和像达蒂尼一样成功的大商人。

羊毛商不仅制造织物，还印染和加工羊毛，羊毛布从其他地方运来，如伦巴第和英格兰。上等的羊毛产于英格兰，羊毛贸易中商人和银行家的活动体现在伦敦城市中心的“伦巴第街”这一名称上。这些人是伦敦最早的跨国银行家。英国羊毛填充了大陆贸易，导致了东安格利亚的巨大成功，产生了大量“羊毛教会”，财政部长的席位也成为这里的传统。羊毛出口到法兰德斯，主要到布鲁日，后者主要使用法兰德斯的织工，他们使这个城市的建筑和艺术活动兴盛繁荣，并导致14世纪佛兰德斯文艺复兴的兴起。在塔斯各尼，正是纺织品贸易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成功的基础。这些活动始于12世纪末和13世纪的画家。13世纪正是普拉托羊毛贸易兴盛之时，此时，欧洲的会计业也得到发展。美第奇家族本身就是纺织大商和银行家，他们以靠近阿奎拉的阿布鲁齐羊毛区为据点，与普拉
90 托关系密切，并在普拉托紧挨城堡的位置修建了圣玛丽亚大教堂。

中世纪的经济恢复最重要的是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特别是地中海的长途贸易，它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海上交通和贸易密不可分。”[①]阿拉伯人在他们早期的扩张中控制了内陆海，不过这条路线一定程度上是由11世纪伊斯兰舰队清扫出来的，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时，而意大利舰队开启了从地中海

① Slicher van Bath，1963：193.

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路线。土耳其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形，他们的海军是一个重要原因，至少要到他们在勒潘多战役（1571年）中的失败为止。但贸易延续下来，不仅对经济复兴，而且对知识和思想的复兴也非常重要。

其他封建主义

一些欧洲学者因全神贯注于“封建主义”的概念，由此才研究封建主义的出现，或者说，事实上是研究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缺失。库尔本在亚洲特别是在日本找寻封建主义的踪迹[①]，另外一些则在非洲的中心地带发现了封建主义[②]。对这些学者来说，任何社会制度稍有地方分权的迹象都可以用来支持这一想法（很多政权在中央和地方自治之间都有一定张力）。更具体地说，他们寻找的是依附土地所有权的军事义务。同样，要找到这些并不困难。由此，在某些情况下，封建主义的概念被强加于非欧洲地区如非洲的社会制度之上。[③]但是，研究普遍的封建主义是错误的，因为通常所认为的封建政治条件非常广泛，欧洲和亚洲社会都建立在犁耕农业之上，产生了与非洲大不相同的土地所有制度。

广义而不太严格地看待封建主义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欧洲剧场的显著的独特活力。“历史学家都认为，欧洲及其美洲殖民地之外其他地方没有同时产生工业资本主义。”[④]这种观点主张，正因为早期的封建社会形态，欧洲才获得了“经济优势”，导致了独特的

① Coulbourn，1956.
② Rattray，1923.
③ Goody，1971.
④ Aderson，1974a：402.

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各地区的社会转型。强调“西方例外论”、强调古典时代经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条直线前进的独特意义，就将历史拐到了一个特殊方向。我们需要认识到，19世纪（或更早）
91 的优势并不一定要按因果关系追溯到中世纪，追溯到独特的封建主义。的确，在埃尔文所谓的庄园体系（和李约瑟的“官僚制封建主义”），或尼赫鲁等人关于印度资本主义的路径受到殖民征服的阻碍等观点的影响之下，早期独特性的命题如何与中国学者“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取得一致呢？它又是如何与彭慕兰和布雷（Bray）这样的学者达成一致，而这两位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某些地区和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并驾齐驱的。

虽然我们可以因为生产体系的巨大差异忽视非洲的封建主义，但亚洲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社会有着各种复杂的生产形态。一些人提出“亚洲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遭到很多正统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强烈反对。马克思的通信者，一位年轻的俄国历史学家，卡瓦列夫斯基（Kovalevsky）认为印度也产生了封建主义，这一假设遭到马克思和安德森两人的反对，因为它忽视了印度与欧洲不同的政治法律情形。对此观点有两方面需要说明：欧洲的封建主义的确是独特的，这和所有社会形态一样；尽管如此，但这些不同社会的所有制关系的确有相同之处。这种情况在社会网状结构中是有用的，它试图表明“封建主义”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存在或缺失。关键问题是欧洲的独特性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假设存在于很多支持“西方例外论”的“进化论”观点中，但这些观点是不是建立在所有的而不是暂时领先的基础之上？

很多学者都认为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一个阶段，因而只限于欧洲。比如，安德森认为欧洲以外不存在（可能日本例

外）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封建阶段。而欧洲的封建主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正像我们在讨论古典时代时看到的，欧洲被看作是一定程度上以“日耳曼体系”为基础，而“日耳曼体系”的特征是把分散的自耕地聚集起来，因而比“古代制度”包含更多“个体化”的潜力，在古代，个人只是共同体比如团体的代表。这一情形与密集型农业社会极为相似，人们生活在固定的住所里，参加集体劳动。很多有思想深度的学者都将这种模糊的因素即个人主义看作企业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为早期“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看作导致欧 92
洲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稍后我们会讨论这种观点。在安德森看来，封建生产模式产生于早期奴隶生产和部落生产遗留下来的混和形式，是“剥削阶级掌控的大土地所有权和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小型生产这两者的结合”。[①]前者被认为在独立的教会和庄园体系的夹缝中促进了自治城镇的发展，[②]并导致“主权分割”。

封建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欧。不单非洲和亚洲，就连东欧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种情形在拜占庭帝国不太明显，这是通过比较罗马帝国东西两半而得出的。安德森用这样的语句描述随后的发展情况：“拜占庭末期的封建形式是统一帝国政体世俗解体之最终结果。”而“西方的封建主义是古代两种不同生产方式（部落形式和奴隶制）的有机重组，新的组合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解放了生产力”。[③]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拜占庭的这一进程“释放了某种思想活力”，但资本的商业却被意大利商人而不是当地人所“控制”。然而，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国

① Anderson，1974b：408.
② Anderson，1974b：410.
③ Anderson，1974a：282-283.

人（就像威尼斯和伦敦），在布尔萨和其他近东城市更是如此。

拜占庭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被看作是僵滞的（除了引进新的农作物和水力磨坊的广泛使用以外）。但是，君士坦丁堡有一项惊人的突破，那里“国家工厂……享有对欧洲市场出口的垄断权，一直到意大利商业城镇后来居上”[①]，并在后来分担了这一地区的很多生产。即便土耳其加工丝绸的技术据说也是“从东方偷来的，而不是本地的发明”。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本地”发明呢？很多被认为对西方兴起非常关键的基本发明都来自东方。同样，所谓的欧洲丝绸生产这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经济因素也是如此。据说，蚕种是藏在聂斯脱利派僧人的空心手杖中从东方偷运到拜占庭的。接着，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又于1147年从拜占庭的底比斯和克林斯劫持
93 了丝绸织工。丝绸生产从那里传到意大利北部的卢卡。卢卡试图再度维持技术的垄断权，但是，从博洛尼亚迁移过来的工人也从事丝绸生产。在博洛尼亚，更为复杂的机械化缫丝技术在还没传到更远的北方以前就已得到发展。从那里，机械化进程的关键部分被英国丝绸商人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剽窃走了。当我们谈到土耳其落后的亚细亚生产力特征时，我们不得不回忆一下土地所有制度的相似之处——无论它是否是封建的，以及土耳其城市中活跃的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特别是它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商业活动。

有种“偏袒的例外论”似乎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即认为封建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唯独日本是个例外，即便多数欧洲历史学家也都认为如此。[②]有人怀疑，从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成就

---

① Anderson，1974a：275.

② 对封建主义的论述参阅布洛赫（1961：446）。对布洛赫来说，封建主义并不是局限于欧洲的社会形态——日本也经历了这一阶段。

看，这种特殊模式的看法是一种事后假设（通常与中国的经历对比，这种论断被证明非常幼稚）。安德森认为日本发展了与欧洲14—15世纪相似的制度，尽管它的庄园从来都不是大庄园也不是自耕地。但安德森认为日本自身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从欧洲借鉴来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而且，日本的“封建主义”没有出现“欧洲封建生产模式的经济活力，这种活力解放了欧陆资本原始积累的各个要素”，[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和布罗代尔一样，安德森认为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模式只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才启动的，而工业革命则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地主所有制”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日本可能有封建主义，但从未有过绝对主义。在原始积累因素的讨论中，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兆。接下来，安德森批判了一些学者，他们依循一些学者的思想倾向，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阶段是普遍的，所以封建主义也是世界普遍的现象。[②]他将这一观点理解成对欧洲优越性假设的回应，尽管如此，他依然强调将封建生产方式狭隘地定义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司法和法治制度这些……外部体系”的联合，与“主权分割、诸侯等 94
级和封地制度无关”。

假设的日本早期的独特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和西欧一样，有人主张封建农业形成了“惊人的生产力水平”。[③]然而，农业生产力当然超不过季风性亚洲的其他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中国南方或印度南部。这些社会制度也是高度城市化的，体现了“以市场为普遍导向的地主所有制”。他们和西方的贸易非常兴盛，尤其是香

① Anderson，1974b：414–415.
② Anderson，1974b：401.
③ Anderson，1974b：418.

料方面；而且，他们一直处于复杂贸易体系的中心，包括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同时还有大量“文化”输入：梵语、佛教、印度教，寺庙和各种具有世俗意义的事项。尽管生产力水平对日本有（独特的）贡献，但据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自外部”，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亚洲到处都是本土发展，至少在重商主义上是这样。

安德森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例外。在此意义上，日本轻易地“接受”了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十足的欧洲中心论，因为它不承认东方即便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除非借鉴西方。安德森的一个理由是日本不能依靠自己发展，因为它没有古典时代。安德森在原始因素的论述中提出，日本的封建主义是“中国化的帝国体系”缓慢瓦解的结果。[①]欧洲的独特不仅是罗马帝国的瓦解，还有“古典时代的永久性遗产”，[②]即“古典时代和封建主义的延续”。欧洲保留了早期模式的残余，古典的前奏为其铺石填路。古典时代的重生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这一“欧洲历史的关键时期”；而日本“与文艺复兴遥不可及，几乎没触到文艺复兴的边儿”。[③]显然，如果没有死亡（或衰落）就不需要重生。既然，无论“封建主义”还是“古典时代”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找到，因而，它们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以外有联系（在延续性上）。

这种观点败在一个明显的问题上：历史学家极力创造“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但对确定其特征并不满意。“古典时代”主要是希腊罗马统治的历史时期，很大程度上没有从经济上限定，只在地理上非常特殊，以致它甚至排除了主要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① Anderson, 1974b: 417.
② Anderson, 1974b: 420.
③ Anderson, 1974b: 416.

迦太基、印度和中亚。　95

尽管如此，日本依旧往往被认为与欧洲平行，这种观点不仅基于两者形式上的相似，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结果的相似。“在20世纪后半叶的今天，日本是欧洲以外，或者说欧洲海外据点的唯一重要地区，唯一完成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地区。像很多历史研究所极力展现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封建主义，这一点就连马克思和19世纪后期的欧洲人都感到极为惊讶。”[①]这又是一种颇具目的论的观点。这一观点或许可以维持到1974年，但很快它就不再适用，因为“现代历史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缺。随着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崛起，人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亚洲从前存在的封建主义区分开来（除非人们采取另外一种，甚至可能并不令人满意的附注，即封建主义普遍化）。从经济上说，日本不再具有独特性。和布罗代尔一样，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就像我们应该分清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两者的关系一样，因为工业化显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特征，两者存在于比通常想像还要广泛的社会之中，而且一直都是如此。

欧洲从封建主义通往资本主义的进程始于那些被看作城市的不同演化之中，这种演化是在安德森所谓“分散化”（看似“无关”）影响下进行的。这些城市拥有“地方市政的传统”，农村有罗马的遗风，据说这些使有条件的私人财产权转为绝对的私人财产权这一决定性进步得以可能。[②]资本主义的出现依靠“成文民法”与这种“法律秩序”联系起来。罗马法在博洛尼亚的恢复“伴随着古典社

① Anderson，1974b：415.
② Anderson，1974b：424.

会整个文化遗产真正的再次重组”。[①]这些发展包括对外贸易的制度化（涉及中国和穆斯林世界时，这种说法看起来更是一种十足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国家形式的产生即绝对主义，它扫除了封建主义的分权化，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绝对主义产生的同时，商品生产和贸易交换得到发展，在“农村中消除了基本的封建关系”。[②]但随
96 着欧洲的集权化——这种形式被假设缺席于世界其他地区，人们还发现绝对的私人财产权得到巩固，这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必要特征。

这一论述有好几个问题。首先，正是法律阐释将法律特点局限在成文法之内。显然，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广义上的“法律”，包括习惯“法”，所以，人人都要和他们的邻居卷进各种“外交”关系，享有某种形式的“私人财产权”。其次，日耳曼部落比罗马公民更像一个共同的组织，虽然这种身份与假设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力”的本质似是而非。再次，很多欧洲学者探寻的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个人主义”。很多“部落”民族都强调他们的存在是个体化的，例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对苏丹努尔人的古典研究中就有所体现。不管怎样，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如工厂劳动，比任何狩猎或耕种都需要压制个人主义倾向。[③]鲁滨逊·克鲁索孤独的个人生活，或者住在蛮荒僻壤的人的生活都不是主要民族的正常经历，而与后来的社会形态相比，早期狩猎和采集社会的生活有更多相似之处。最后，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贡献的观点似乎忽略了城市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城市是近代发展的核细胞）。封

① Anderson，1974b：426.
② Anderson，1974b：429.
③ Goody，1996a.

建制度下发展的城市，支配了以乡村为基础的各种关系，不过，城市的历史却要追踪到青铜时代，它们几乎在后青铜时代西欧以外的各个地区繁荣起来。马克思的确思考了从罗马或拜占庭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商业和高利贷的财富并不能当作“资本”。实际上，投资发生在贸易和制造业中，也在丝织业、造纸业以及农业生产中。商业和高利贷当然也是近代发展的重要部分，“自由”农民和城市手工业劳动者也是，并且正是后面两者，发展成工业化的劳动力。

封建主义因此被看作主权分割，它在“夹缝中”得到发展，提倡一点儿自由，东方从近东开始，以灌溉农业和专制主义为特征。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专制”制度被认为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而绝对主义显然可以）。但是，它们显然非常适合城市和大 97
型制造业（例如土耳其的丝织业或印度的棉织业），甚至适应一定程度的机械化生产。它们引导着欧亚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贸易。如果其他社会拥有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那么，他们如何参与到这项重要的货物和技术交易中呢？资本主义因素的分布是不是要比学者们想像的广泛得多，就像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布罗代尔的著 98
作一样？

第四章

亚细亚专制，土耳其或其他地区？

中世纪后期，土耳其是最靠近欧洲的非欧洲的亚细亚政权。自14世纪起，土耳其的军队就不断骚扰现在欧洲和基督教的地盘，包括拜占庭和巴尔干地区。早些时候，北非的“摩尔人”也一直袭击欧洲的很多地方，他们从西班牙推进到西西里，一直到地中海的普遍地区。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是抵抗欧陆的主要非欧洲力量，他们从特征上被看作典型的专制制度，缺乏基督教的价值观，以残忍和野蛮闻名。

在欧洲人看来，即便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土耳其是专制主义，尤其在17世纪之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这样描述奥斯曼帝国：有一位君主统治，由君主的奴隶和奴仆构成。数年后，法国学者布丹[①]比较了欧洲君主制以及在亚洲领域内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这种情况是欧洲无法容忍的。[②]还有一些人认为东西方的根本差异要归于土耳其没有贵族继承制[③]，或者说是缺乏私有财产权[④]，这两者被视为保护个人及其世俗财产的手段。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认为，在东方制度中财产往往容易被没收[⑤]，没有安全感是东方专制

① Bodin，1576.
② Anderson，1974b：398.
③ Becon，1632.
④ Bernier，1658.
⑤ Montesquieu，1748.

主义的主要特征，原则上与欧洲封建主义是相反的：欧洲人的财产是安全的。

当然，土耳其“专制主义”的概念随时间而变化。16世纪早期，威尼斯的外交使节还称赞奥斯曼制度比西方先进。1575年之后，这种关系就反过来了。[①]“如果奥斯曼帝国基于的组织原则不同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原则，那么，帝国也不过在建构庄严之美这种令人羡慕的秩序。”[②]是什么颠倒了这种情形？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 99
些变化，那里更加“残暴”。大西洋帝国运来了大量的美洲金银，影响了经济发展。勒潘多战役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失败。但在瓦伦西（Valensi）看来，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专制概念的发明，“亚洲（或东方）与欧洲的分离塑造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③]完美政权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

因而，土耳其成了近代早期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就像先前古典时代的波斯是希腊时代专制主义的代表一样。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已经融入到西方学术的历史编撰和文化分析之中。他们在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所谓的专制波斯这一“他者”之间建立了二元论，近代欧洲对土耳其所形成的观点也融入欧洲的思想之中，这一范式被马克思指定为“亚细亚例外论”的特征。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青铜时代文明的继承者，从近东的新月沃土到亚洲的中国，它们都是肇始于古典时代欧洲发展的根基。所以，就早期历史而言，欧洲和亚洲社会的模糊对立没有多少分析价值。例如，在那个时代的初期，欧亚有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

① Valensi，1993：71.
② Valensi，1993：98.
③ Valensi，1993：98.

罗马和东方的中国。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两者几乎是不能分开的，都建立在青铜时代的经济之上，使用文字知识体系和文字交流方式建构自身，罗马使用腓尼基字母文字，中国使用复杂的“字符”音标文字。从知识体系来说，两者也有很多可比之处，就像李约瑟在植物学中所展现的那样。[①]就罗马和中国而言，两国的经济文化成就都建立在青铜时代开创的相似发展之上。虽然两者都从事犁耕农业——这一实践在产生于青铜时代的城市文化中非常普遍，并扩展到欧亚大陆，但中国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江河流域的大型灌溉，这就产生了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概念，因为中央控制被视为组织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这些发展包括很多技术活动，例如城市建造、制造业和贸易，还包括写作活动。

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产生了非常清晰的经济分层。在牲畜牵引
100 的帮助下——这也是变化的根本原因，人们能耕种的土地比依靠锄头要多得多。这就产生了有重大意义的所有权差别，因为，一个拥有较多土地的人，可以雇佣他人和使用牲畜，为城镇市场生产大量产品，服务于非农业人口。土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比在锄耕农业下变得更有价值。整个欧亚大陆，主要社会的经济不仅以相似的生产技术为基础，也以大致相同的劳动生产形式为基础，西方可能奴隶生产多一些，东方稍微少些。后来，青铜熔入铁，一种更“普及”的金属被用作和平时期的犁和战争时期的武器。农业活动造成的社会变化包括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交换，长途的奢侈品贸易和短途的生活用品贸易，陆地轮车和水上交通更加便利。写作是“城市革命”下发展的一项专业技能，它带来了多数人所理解的“文明”，

① Needham，2004.

与早期的文明理解相比更加凝练。这种情形导致了整个欧亚大陆“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分化。每个社会都出现了社会分工，这种特殊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我的目的不是消除不同文化间管理和组织的差别。但是，这种变迁发生在宽泛的社会结构中，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描述为“藩属国”，这种结构在东方更为集中，在西方则不太集中[①]，但没有极端的二元对立这种假设的亚细亚专制的典型概念。

费南德兹—阿梅斯托最近写的千年世界史试图调整欧洲的早期论述的平衡性。书中，“西方的优势”是“未完成的，不稳定的，短暂的”。领导权从大西洋传到太平洋，而在千年的开始太平洋享有领导权，维持的时间比欧洲人想像的还要长久得多：

> 在18世纪，尽管一些欧洲帝国延伸范围甚广，但中国的范围几乎同样广阔，而且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帝国。中国似乎更像是“近代”社会的故乡……是一个有着良好教育的社会，有着超过一百万的学士；一个更具有实业精神的社会，有着大型商务、庞大的商业和产业资金，这些都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一个更产业化的社会，有着机械化和专业化更为集中的较高的生产水平；一个更城市化的社会，绝大多数地区人口稠密；对成年人来说甚至是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世袭的乡绅和他们西方的同伴分享相似的特权，只是不得不依循从每个社会阶层中选拔士大夫制度。[②]

101

① Wolf，1982.

② Fernandez-Armesto，1995：245.

公正地看待所选择的这些特征，不仅要重新评估中国直到18世纪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而且确实抛弃了僵化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

的确，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整个理念总体上都是不适当的。孔子的《大学》非常有趣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至少是理想中的特征。孔子的观点与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典型方式相距甚远，他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①]人民的支持直接来自统治者的德行。需要赢得人民支持，意味着要有商议过程，这肯定就不是独裁统治。统治者必须帮助他的子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也就是天堂里的生活。

显然，欧洲和专制亚洲的二元对立非常草率，它建立在忽视和偏见之上。本章下面的内容，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它们区分了非常态的专制东方与健康的、民主的、发展的西方，通过进一步分析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近代例子——土耳其来辨析这一偏见的有效性。

我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奥斯曼社会，以便质疑那些对奥斯曼采取欧洲中心主义的某些解释，质疑那些反映欧洲更一般性的历史分期概念和历史编撰学。这些方面是，作为一个范例研究，火器的使用允许我们质疑“伊斯兰守旧”的观念，农业组织（“农民作为奴隶”的观念）以及商业水平，后者往往被看作由国家管理（我认为，土耳其展现了某种重商主义）。

这一讨论将允许我们做出以下结论：在统治形式上，土耳其与欧洲政体非常相似；在经济和“文化”上，土耳其也比通常想像的

① Confucius，1996：46.

更接近欧洲。军队迅速装备了枪炮和火炮，其速度一如他们很快在地中海建立了一支海军。农民的地位和其他地区一样，并不都是帝国的奴隶。最重要的是，所谓的专制统治的的确确鼓励贸易，包括个人的进取精神，并提倡发展商业经济，尤其是丝绸、纸张（及其 102
制造业）和香料贸易。所有这些领域都得到迅速发展，最终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内部阻碍，而是遭到纺织工业向欧洲转变的打击，这一转变是因为大西洋国家开启了通往东方（香料和丝绸）以及通往美洲金银、农业产品的商业线路，由此边缘化了近东的早期成就。本章主要致力于将土耳其作为欧洲价值体系中传统意义上极其反面的例子来分析。在本章的结语部分，我们将把眼光投向远东——它已铸就成活跃的民主西方的“反义词”。这里，我们将按照上述概要深入研究欧亚大陆对立双方的相似之处。

苏丹的军事

视土耳其为专制主义的看法和“伊斯兰保守主义”的观念一起代代相传，比如那些假设的奥斯曼技术落后的看法，[①]持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论的学者有K. M. 瑟顿（K. M. Setton）[②]、E. J. 琼斯（E. L. Jones）[③]、P. 肯尼迪（P. Kennedy）[④]，他们拒绝承认别人创造的技术革新，往往从世俗或宗教权威出发，在专制统治的导向下把知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进步都交由意识形态决定而不是从实践考虑，最终没有为个人的进取精神或“自由意志”留下一点空

① Agoston，2005：6.
② Setton，1991.
③ Jones，1987.
④ Kennedy，1989.

间，而这些都被假设用来描述不同的欧洲情形。

欧洲可能最先使用并改进了枪炮，面对使用这种武器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也很快跟上。他们行动非常迅速，既实用又有效。土耳其人收集枪支和火药的原材料，制造自己的武器，组织大量的生产劳力和相关技术，甚至改变军队结构。

“火药的‘发现’和火器的出现，尤其是它们在战争中的运用”[①]是中世纪晚期的特征。火药由中国在7—8世纪左右发明，据李约瑟说，“真正”的火枪、手持火枪或大炮……大约出现于1280年。[②]数十年间，这些武器很快传到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火药和火器传到
103 土耳其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据说火药装置在13世纪30年代由蒙古人传过来[③]，13世纪中叶，它们作为器械被引入到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一些独特的火器也在14世纪末期被引进。欧洲很快意识到新式武器的价值，把它们改进成加农炮形式（据李约瑟说，中国在13世纪就运用了初级的加农炮[④]）。14世纪20年代火炮被用于围攻，30年代装在船上使用。14世纪中叶，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开始使用，直到14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才知道这些武器。15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时使用了火炮。15世纪初期，地中海的欧洲舰船装上火炮，使得他们能够征服海洋。

火炮制造是项复杂的工程。奥斯曼帝国使用青铜，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黄铜供应。欧洲人主要用铁，铁不太昂贵，同时也比较重，攻击力更强。青铜和铁都需要具备复杂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的铸造厂。这在整个地中海的确是事实。赞（Zan）写道，对威尼斯的大

① Agoston，2005：1.
② Needham，1986b：10.
③ Agoston，2005：15.
④ Needham，1986b：4.

型兵工厂而言，工厂雇佣了大量劳动力，扰乱了行业制度。奥斯曼帝国在其领域内建立了很多兵工厂，在阿维隆亚（Avlongya）、埃迪尔（Edirne）和其他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军工厂。和西欧一样，装备火炮的舰船也在伊斯坦布尔的军工厂里建造。

“15世纪末到16世纪，帝国火炮厂、兵工厂、火药厂和海军军械厂，使得伊斯坦布尔可能成为欧洲近代早期最大最庞杂的军事工业基地，仅有威尼斯兵工厂可与之媲美。”[①]伊斯坦布尔的铸造厂每年可生产1000支火枪，工人数量不断变化，1695—1696年有62个火炮铸工和大量的技术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在40—200人之间。[②]奥斯曼帝国还铸造了一些大型火炮用于围攻，同时生产其他武器。正如阿格斯通（Agoston）指出的，欧洲认为土耳其人不能依靠批量生产技术生产小型武器的常见观点是错误的。批量生产在土耳其可能是一项新技术，但它在西方同样也是新技术，虽然西方有些领先者；批量生产成为所有制造船只和火枪的新型兵工厂和铸造厂的特征，土耳其吸收技术和劳动形式并不慢，而这已经被定义为“资本主义”。 104

所以，不存在伊斯兰技术守旧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技术接受能力与普遍的批量生产能力和较好的帝国储备军结合在一起，苏丹军队在15世纪中叶明显比同时期的欧洲对手更具备火力优势。”[③]直到17世纪末，他们一直保持火力和储备军的优势，以抵抗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人。

伊斯兰也不能被指责为“组织保守”。奥斯曼帝国早在欧洲军事建立之前就拥有一支禁卫军形式的常备军。穆罕默德一世（Murad I，

① Agoston，2005：178.
② Agoston，2005：181.
③ Agoston，2005：9.

1362—1389）已经意识到需要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是“一种超越各种宗教、文化和异族团体的军事力量”。[①]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以集体形式招募新军，和基督教世界15—20岁的男丁要分期服兵役一样，他们已经被奥斯曼化了。接受训练之后他们直接服从苏丹的命令，薪酬是金银财宝。而奥斯曼帝国的邻邦，第一支常备军似乎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队，他们只是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才拥有一支长期军队，也就是说已经比土耳其晚了250年。

这一发展和他们生产的大型火炮一起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方面创新的特征。土耳其人轻松地适应了技术和组织上的军事需要，展现了土耳其社会的不同活力，与通常西方学者提出的亚细亚例外论和欧洲独特性相比，土耳其至少在保守和技术低劣性这些被认为阻碍了变化的方面要更有生机。有些历史学家也意识到土耳其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但往往坚持技术是借鉴而来的，是外国工人带过来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军工厂以及军队偶尔也雇佣的外国工人的数量。在欧洲人看来，奥斯曼帝国的成就偶尔会从“依附性理论”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批量生产的产业，只是“三级生产者”。但这不能成为土耳其固执守旧或没有能力的证据，因为从海外招募其他劳动力也是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的铸造工人。至于说到军队中的外国人，那么，请想一想指挥塞浦路斯军队的奥赛罗（Othello）这位威尼斯的摩尔人，或者指挥土耳其海军的英国史雷德（Admiral Slade）海军上将。[②]因
105 而，“借鉴”并不是土耳其的专利，欧洲人也是劳动力的“出借者”。使用国外劳动力不能被看作守旧或低级。认识到一种新的工

① Agoston，2005：22.
② Yalman，2001：271.

具或方式，具体说是劳动力，并采纳之，体现与欧洲的僵滞亚洲观念完全相反的灵活性。他们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接受者（谁不是呢），也是“欧亚战场上活跃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径的重要参与者”。[①]

正确的做法是，从相互影响的角度去看待技术交换和发展，而不是说谁最先发明了一项创新，比如工业流程。因而，高级或低级的问题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考察。

农民和奴隶一样？

欧洲有种看法，认为土耳其的劳动形式与西方的完全不同，西方的奴隶发展成封建的隶农，因为自耕农一直维持着更受奴役的状态。但这就是事实吗？他们能像奴隶一样被买卖吗？他们没有任何亲缘连带权利吗？奥斯曼帝国的确有一段强硬的集权统治时期，但认为土耳其的农民是苏丹的“奴隶”只是对事实的一种矫饰。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农业在著名的租佃制度下以租借土地耕种为基础。土耳其历史学家伊纳科里克（Inalcik）对此恰亚诺夫（Chayanov）对俄国的研究，分析了农户耕种的制度。[②]他认为土耳其和欧洲的框架大致是相同的。这种家庭租佃就像行会之于土耳其城市一样十分重要。[③]国家官僚体制通过有组织的调查有效地维持这二者。换句话说，从经济和社会意义的角度出发，这些制度在人口统计上都是不错的。家庭农业单位由一对夫妇、一块土地（5—15公顷）和两头牛构成。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土地国有制主要通过一种机构维持

① Agoston，2005：12.
② Chayanov，1966.
③ Inalcik，1994：143.

此制度、保护农民免遭土地分割、侵犯或过度剥削。国家保护很重要，因为这种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基本的税收单位。

国家只是从国库考虑才保护农民和牧民，这种保护包括维持生活的一般权利。农民和牧民被安置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既然国家本身不能使用所有的“封建”劳力，它就把这
106 些劳力变成现金。税收以农户为单位（“法律上的自治单位”）[①]，这是罗马晚期的特征，并一直持续到帝国瓦解之后。国家的职能实际上与被授予欧洲各国统治者的国家征用权没有太大差别，这一职能使得它可以抽税、征兵、审判臣民。农民既是“依附性的，又是自由的”，和各地的多数佃农一样，中央政府保护他们不受地主或税官的侵扰。[②]

因而，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所有形式比那些把土耳其当作专制国家放在亚细亚模子当中的人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亚细亚模式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界定的，体现了欧洲对东方“他者”更为普遍的看法。因为土耳其基本上是征服国家，正是征服这一事实在国家的土地上建立了普遍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否授予乌玛（社会共同体）这个忠诚的社会共同体，或者它的代表苏丹，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的确，正如我们看到的，征服者把本地农民留在原地，只是当作“缴租”的对象。[③]国家接管了“国家征用权”，因为继续征服的计划需要一支军队，所以土耳其需要土地税收来维持。

正如一句波斯谚语所说，“土地和农民都属于苏丹”。“属于”这个词语隐含的权利观念需要非常谨慎地理解。实际上，土耳其的

① Inalcik，1994：174.
② Inalcik，1994：145.
③ Inalcik，1994：104.

民法典和罗马—拜占庭的实践密切相关。[①]罗马法中，土地权利由“国家征用权”（“所有权”）、占用权和使用权组成，后两者以各种形式委托给农民。虽然这不是一场轻松的交易，但在某种情况下，国家的土地可以被农民卖掉；在这种情形中，统治者需要在伊斯兰法律下建立“绝对所有权”。[②]在欧洲，国家征用权不仅意味着法律控制下的根本权利，还意味着臣民也被授予“完全所有权”，农民有可能把土地转让给宗教机构。伊纳科里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使用了“全权所有”一词，虽然这种“全权”在任何地方都隶属于更广的统治之下。

农民也可以为了商业目的使用他的权利。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瓦克夫制度中（即赋予的、全权所有的土地制度）。“农民收集了大量小麦，出售到遥远的帝国中心城市的市场，甚至出口到欧洲。”[③]换句话说，他们与市场、换钱的农作物比如棉花、芝麻、亚麻和稻谷的生产密切相关。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允许这种私有权，而 107
伊斯兰国家也从未忽视这一事实。“法治”包括财产权利和其他方面。世俗和宗教权威的冲突意味着农民和工匠必须互相捍卫彼此的权利。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都有国家和教会的冲突，苏丹和回教教主的权力冲突形成了“主权分割”，而这一点被看作欧洲封建主义的独特特征，我们在前一章已讨论过。[④]国家和教会的利益绝不总是一致的，理论上，城市和国家之间允许有一个类似调度的空间，就像人们对欧洲的宣称的那样。

尽管很多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用了唯物主义的方

① Inalcik，1994：105.
② Inalcik，1994：117.
③ Inalcik，1994：126.
④ Inalcik，1994：128.

法，但他们仍然非常关注高度抽象的权利概念（而不是实际行为），使用泛泛的排他性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用权的概念。但正如亨利·梅因所强调的，我们在所有社会都能找到土地上的“身份”阶层，有些权利属于个体耕种者（或他的家庭），有些属于邻里或家族等较大的组织，有些属于当地的地主，有些则属于更广的政治集团。不同阶层的所属权利也有很多变化，把所有可能的权利形式仅仅定位到一种特殊社会的一个阶层是错误的。在农业领域，大多数个体都能养活自己，但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权利，这与生产工具和耕种方式有关，主要根据是旱田还是水田（需要灌溉），是犁耕还是锄耕，是轮休耕种还是一直耕种。还有其他一些隐性的差别。就土地所有权来说也有很多差别。近来，对马穆鲁克到奥斯曼时期埃及伊斯兰（哈里发）法律中的土地所有制（军事“采邑”）的研究很好地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土地所有权的复杂性，也证明了先前欧洲观点的肤浅。[①]“权利阶层”的分布与欧洲完全不同，至少与欧洲一样复杂，体现在实践以及由律师们引起的变化不定的理论争辩两个方面，尽管这些问题在政治意识形态或对其起源谜团的研究方面都还没有形成理论。[②]这些争论围绕权利的性质展开，体现了一种高度成熟的法律操守。律师们的不同结论当然影响了公共事务，尤其是对簿公堂时；但有些讨论试图在描述既有的复杂的社会生活时联系财
108 产权进行解释。还应该加上一点，伊斯兰教的出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欧洲不同，它并没有为现有的权利扫清铺石板，尽管它的确进行了重新组织。毫无疑问，这些也发生在很多其他“征服”国家中。

除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外，军队和行政官也会因特殊贡献而被

① Mundy，2004.
② Mundy，2004：143.

授予土地。有种观点颇有说服力：既然这种授权是可以撤销的，那么阿拉伯的“克塔”（iqta）一词应该被译为“行政封地”而不是“采邑”。[①]不过很明显，这一概念非常接近中国的封地制度[②]（李约瑟所认为的“官僚制封建主义”），它需要再次放到社会学的“网状框架”中研究，而不是从单纯的欧洲经验出发在“有或是没有”的基础上研究。即便从概念上来说，这种情形也能被看作比很多理论设想的更接近欧洲。实际上，土耳其领先时代近东伊斯兰的既有状况近来常被拿来与欧洲早期作比。1193年撒拉丁去世时，政权类似于“由领主和委托关系维系的君主制，仰赖于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效忠行为，而一旦臣属领主的宗主权虚弱无力，君主制也会受到威胁”。[③]

农业从来就不处于一种单纯的维持生计的水平——它得生产出大量产品。伊斯坦布尔是个庞大的城市，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的城市都要大。它的供给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最关心的事情，正如它曾经也是基督教和罗马先祖最关心的事情一样。大量的粮食来自克里米亚北部地区。克里米亚的商业性农场发展规模巨大，甚至还能为威尼斯提供玉米。部分地区也为城市生产谷物，首府自身的周边地区则致力于牲畜饲养、种植水果和蔬菜。农民从来就不只生产维持生计的产品，贸易总和市场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地位类似于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北部的许多滨海城市，著名的“阿农那”制度（一种分配形式）供应这座城市。这些城市在很多方面都与东西方的城市相似。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供应问题，而这些供应往往来自农民。

---

① C. Cahen，1992；Mundy，2004：147.
② Elvin，1973：235.
③ Fernandez-Armesto，1995：90.

商 业

如果农业和欧洲其他地区基本相似，那么，城市和商业的情形
109 也是相似的。商业既有公共贸易，也有私人交易，它需要一个并不完全受“专制”控制的资产阶级，这确实是对“专制主义”概念的质疑。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将大部分商业、商品流通和销售都置于国家控制之下，[①]奥斯曼帝国也沿袭了这种形式。但是，商业也包括不受控制的商人和资产阶级，还有国家公差。门德斯机构，由被基督教西班牙驱赶出境的摩洛哥犹太人掌控，他们拥有欧洲主要城市的代理商网络，“控制了大部分国际性商业”。[②]“每个欧洲国家都热衷于商业扩张，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需要从苏丹寻求经济特权”，也就是说，继威尼斯之后，意大利各城市都较早地享有了贸易特权。[③]“西方至少在开始依赖来自或经过奥斯曼帝国的供应，如新兴的丝织和棉花制品。”[④]1571年的勒潘多战役和1580—1590年间大西洋远航努力——英国和荷兰在地中海的到来，用枪炮划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地区向这些国家新型的黎凡特公司敞开了大门。因而，西方第一批成功的特许公司是黎凡特的公司，它们和近东而不是印度或更远地区进行贸易，而且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就已非常完善。

---

① Inalcik，1994：198.

② Inalcik，1994：213.

③ 在欧洲常常有一种明显的片面观点看待土耳其历史。不过，布罗代尔论述菲利普二世的著作把伊斯兰帝国看成地中海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布罗代尔，1949）

④ Inalcik，1994：3.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①]伊斯坦布尔是黑海和多瑙河南北线路的交叉点，也是印度和东方东西线路的交汇点。它不仅连接着威尼斯和热那亚，从15世纪起还连接着经由大马士革—布尔萨—阿克曼（Akkerman）—利沃夫（Lwow）的南北商路，通过这条商路，东方货物抵达波兰、莫斯科维（Moscovy）和波罗的海国家，依循早期从波罗的海到近东的路线，这条线路开启了卡洛琳时代的欧洲贸易。[②]西方主要出口羊毛布（同时还有金银），以交换“东方货物”，包括土特产、丝绸和毛毯，主要是奢侈品，但也不全都是。一些罗马道德家十分关注因交换到而使这些物品金银流向东方这一状况。他们把东方看作奢侈品而不是专制主义的发源地，这一嗜好大大影响了罗马的军事德行，但商业仍然非常重要。 110

商业活动覆盖了欧亚。拜占庭对黑海的政治经济统治于1204年瓦解，此时，威尼斯成为爱琴海西部和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热那亚征服了爱琴海东部，并围绕内海建立了殖民地。随后，土耳其摧毁了这一地区的拉丁殖民地，恢复了拜占庭帝国的古老传统，控制了供给来源。征服者穆罕穆德受到振兴东罗马帝国思想的鼓舞。为了给伊斯坦布尔提供小麦、肉和盐，奥斯曼帝国需要重新控制黑海。土耳其北部的丝绸、棉花和大麻与黑海北部农业产品的交易，意味着小亚细亚在这些方面的“产业化”甚至要早于西方，俄国的制造业有机会参与18世纪晚期的竞争。[③]土耳其和埃及（至少名义上长期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在印度洋的贸易也非常活跃。在贸易

① Inalcik，1994：4.
② McCormich，2001.
③ Inalcik，1994：275.

上，土耳其极力支持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穆斯林王国，把它当作贸易伙伴，为其提供人力和武器，以便抵抗欧洲海军其后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尽管土耳其发端于一个陆地政权，但抵达地中海后，它展现了创建海军的巨大能力，以此长期控制海上霸权。后来，美洲大陆的发现带来了廉价的银、棉花和糖（先前只有通过和伊斯兰国家的贸易才获得糖），改变了整个机遇的平衡局面。

丝织业

贸易促进了一个专门的制造业——实际是工业，在这一领域，土耳其成为第一提琴手，并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兴起，意大利便是第一个兴起的地区。这一领域便是丝织业。

最初，生丝经波斯商人从中国或经陆路或由印度洋运到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试图打破波斯人的垄断，尤其是蒙古人挡住最便捷的路线之后，他试图寻找另一条路线——南边经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商人，北边经克里米亚和拉齐卡的高加索王国，以及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丝绸成为“利润丰厚的重要商品”。公元561年前的某个时候，查士丁尼的商人间谍将蚕种偷运到君士坦丁堡，建立了
111 一个完整的丝绸业，意欲摆脱本国对东方的依赖，并在事实上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活动”。

丝绸早在6世纪就从中国传到了欧洲。随着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的开拓，大量丝绸运到欧洲。公元114年后，“每年都有一打儿商队驮着丝绸从中国穿越亚洲中部的沙漠”。[①]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

① Childe，1964：249.

及进口生丝和丝织物，最终，丝织业开始繁荣起来。直到4世纪，制丝业传到波斯，然后传到拜占庭，这一产业由土耳其人继承并加以改进。科尔多瓦的阿卜杜-拉赫曼二世（755—788）统治时期，丝被引进西班牙的伊斯兰地区，彼时，阿卜杜-拉赫曼二世采用了乌玛亚王朝的哈里发称号。他垄断了钱币铸造，仿效阿巴斯帝国（黑衣大食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组织奢侈织物的皇家制造业，引进桑树、蚕种和叙利亚织工，在科尔多瓦城堡附近和塞尔维亚、阿梅利亚（Almeria）建造缫丝厂。很多花纹和技术一样也来自近东，有些来自波斯（萨珊波斯王朝）。[①]

的确，丝“构成了土耳其和伊朗经济结构的发展基础”。[②]此进程中，布尔萨在14世纪成为“世界市场”，很多西方商人停靠在艾菲索斯（Ephesus）和安塔利亚（Antalya）港口。不过，佩拉—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直接与布尔萨进行贸易，虽然它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热那亚商人甚至走到内陆，直接从塔伯利兹（Tabriz）和亚速海（Azov）的城市买进货物。丝绸贸易反映出欧洲商人和近东特别是土耳其制造商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初，丝绸作为奢侈品从东方运来，后来，欧洲进口生丝纺成丝绸，最后，欧洲接管了整个生产流程，包括蚕的养殖和桑树种植。这一进程展现了这些地区的相互联系，而各地区的思想和技术也互相传播开来。我们并不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欧亚大陆以及亚洲和欧洲体制间的界线——无论是政治上（专制）还是其他方面的，而应看到欧亚大陆货物和信息的逐渐流通。早期机械化的发起、大型生产和开始于东方包括土耳其的丝织品市场，欧洲离这些尚有很大距离，只是到后来才发展了丝业。

① Reynal，1995.
② Inalcik，1994：219.

不管怎样，欧洲的生产替代了进口。“随着本土羊毛业的快速发
112 展，丝也成为西方国家13—18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要原料和财富。”[①]有人说[②]，时尚是推动经济扩张的动力，上流阶层对丝绸的使用，接着是十字军需求的剧增，产生了一个日益繁荣的奢侈品行业。

除了西班牙，欧洲也开始生产丝。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在9世纪就开始使用生丝，到10世纪波河流域也开始这一生产，他们吸取了希腊和近东的技术，正好在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从希腊带回丝绸织工之前。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因为蒙古人的入侵和其他一些骚扰，近东的丝绸供应出现了困难，这些可能促使意大利扩大丝业。卢卡这座城市早在13世纪就开始纺织丝绸。1266年被法兰西征服后，很多织工从西西里逃了出来。[③]他们开始使用从里海地区、波斯、叙利亚和“罗马尼亚”途经热那亚进口来的生丝，这一贸易的确受到东方迅猛发展的商业的刺激。[④]丝绸瞄准的肯定是奢侈品市场、君王的宫廷、富有的修道院、大教堂，最后是那些成功的大商人。宫廷和一些上流阶层试图通过奢侈品立法限制丝绸的消费，但最终这些限制都失效了。商业必然会扩张。商人在香槟展上销售他们的丝绸，自12世纪末就在巴黎、布鲁日和伦敦开始了。[⑤]供给和需求都在增长。博洛尼亚和威尼斯也获得了制丝业的成功，尽管佛罗伦萨的专长仍然主要是羊毛布，尤其是用英国羊毛织成布，它可能是欧洲14世纪最重要的工业城市。[⑥]

---

① Inalcik，1994：218.

②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反思了这一论题。

③ 有些资料表明早在11世纪卢卡就能进行丝绸纺织。

④ Arizzoli-Clémental，1996.

⑤ E.德·洛芙对此做过一些研究，参阅：E. de Roover，*La S·· ucchesi* (1993) in St. Paul's Cathedral，London.

⑥ Tognetti，2002：12.

因此，东西方都在制丝业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机械化最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织机的效率逐渐提高了，这并没有立即在各地发生，往往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因为其他地方的变化促进了效率的提高。由于中国使用水力驱动机器纺线，这一过程进一步得到发展，后来欧洲也跟上了步伐。生丝生产本身也获得发展。直到这 113
时，土耳其这位以前制丝业和丝绸贸易的主要提琴手，才给了欧洲——就商业机构中的组织来说，欧洲与土耳其非常相似，而两者的鲜明对照使得他们发生了错位。

香料贸易

不仅在丝绸制造业，还有丝绸交易（主要是交换金银）方面，土耳其和地中海周边的其他伊斯兰国家开展了积极的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与重商主义有关，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人进取精神和开创精神——二者是市场需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结合了制造业和商业。除了丝绸，商业还受到香料贸易中其他变化的影响。香料贸易刺激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活动。初期的土耳其更像一般意义上的近东，它再次成为重要的提琴手。凯伦本茨（Kellenbenz）提到土耳其时说："资本主义精神在胡椒调料贸易这一最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中找到了。"[①]胡椒贸易主要由个体商人经手，他们经常光顾散落在这一地区的大旅店和商队旅馆，也正是这种贸易体现了与欧洲商人一样的资本主义精神。

香料在古典时期就从东方传到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近东、印

① 凯伦本茨，《富格家族的胡椒生意与国际胡椒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XI（I），1956：27，转引自Ialcik（1994：344）。

度和中国十分重要的一项贸易。当地胡椒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佐料，但地中海地区只能从东方进口，当地商人很早就投身于这项生意之中。和丝绸贸易一样，土耳其在打败君士坦丁堡之后继承了拜占庭完善的商业传统。早先，伊斯兰教传到东南亚，传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因而，伊斯兰商人非常活跃，即使葡萄牙打开了西欧海路，于1501年将他们的第一船香料运到里斯本之后也仍然如此。来自苏门达纳的印度和亚齐船只——他们大多信奉伊斯兰教，继续供应红海地区，尽管遭到葡萄牙的抵制。后来，穆斯林的船只载着货物经过波斯湾，在那里，奥斯曼帝国于1546年建立了巴士拉基地。所有的香料贸易从来都没有一条完整的运输路线。奥斯曼帝国继续和亚齐的伊斯兰王国直接联系，并试图在政治和军事上
114 支持他们。威尼斯则继续充当东方香料的接受者。

随着英国和荷兰在印度洋的出现以及葡萄牙1622年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海湾控制权的丧失，大西洋帝国的贸易扩张迅速拉开。此外，随着美洲贸易的发展，殖民地生产的替代品——糖、烟草、咖啡和棉花，所有这些都从美洲运来，其结果便是地缘政治向大西洋的根本性转移。[①]大西洋经济的起飞之时，正是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遭遇地中海东部商路的转向之时。

糖是生产和贸易转向的关键，它是最重要的一种“香料”，其产品从南亚运到波斯，再经过阿拉伯人运到地中海的东部海岸。土耳其人也投身其中，十字军领导下的基督教王国也参与进来。生产组织在方方面面都很有意义。“甘蔗种植庄园产生于12—13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十字军王国，它与后来的美洲种植园有着惊人的相

① Inalcik，1994：353.

似。到14世纪，塞浦路斯成为重要的生产者。”[①]这些庄园由宗教慈善机构、加泰隆尼亚人（Catalan）和威尼斯家族掌管，他们雇佣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奴隶以及当地的农民，因此劳动力是混合型的。糖向西传到克里特、北非和西西里。在西西里，即便12世纪诺曼人入侵之后，糖业也依旧很兴盛。摩尔人征服了很多国家，因而早期农作物也在伊比利亚半岛耕种，建立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奴隶的劳动基础之上。整个欧洲都有糖类市场，通常是意大利（热那亚）商人从事糖类交易。15世纪奴隶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而葡萄牙也在此时积极探险。糖类生产及其相关机构从阿尔加夫（Algarve）传到马德拉（Madeira）和其他大西洋岛屿，后来传到了美洲殖民地。

由于使用磨石刮削甘蔗，地中海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一产业逐渐机械化。地中海或大西洋岛屿上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装置，它由两个啮合在一起的滚筒组成，这样不用砍断甘蔗就可以提取更多的甘蔗汁儿。加那利（Canary）群岛发展了一种复杂的糖类产业，被形容为“资本主义”（依然在热那亚的管理之下）[②]。当然，糖厂需要基本的资金和用于刮甘蔗的器械。商人变成生产 115
者，投入资金并购买器械，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整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市场化的。西非圣多美岛（Sao Tome）上的条件更有利于获得大量非洲奴隶，由此，这种机构的发展最终形成巴西的产业模式。后者最早开始于1516年，甚至比1533年巴西有组织的管理形式的建立还早，比卡普拉（Cabral）发现这片辽阔土地早三分之一个世纪。在南美，这些机构雇佣大量来自欧洲和印度的工匠，后来才是黑奴。其结果是，以商业化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结

① Schwartz，1985：3.
② Schwartz，1985.

构在种族和职业两方面都发生了混合，并为其他地区机械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模式。

这段时期，在廉价商品如棉花、羊毛、钢铁、矿业等领域内，土耳其渐渐失去了与西方竞争的能力。而早期对糖类生产的主动权也被迁移到加那利和巴西的蔗糖业打破了，以致塞浦路斯和埃及的加工厂被迫关门，技术现在被大西洋掌握，生产过程变成了明茨和伍尔夫所谓的“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

僵滞的社会？

制造业和商业活动表明，土耳其难以被看成专制政府特有的“僵滞经济”。同样也不能把这个社会看成死板一块。所谓的自反性不仅要归因于假设的专制特征，也要归因于其他因素，一个反复引用的例子是拒绝承认中国已经使用了数个世纪的印刷术。相反，我认为，社会产生了大量影响和变化。限制印刷术（可能还有其他创新，比如钟表）与不愿改变没有多少关系。而且，主要还是宗教信仰问题，这一点非常特殊。由于错误的泛化——它以特殊方法解决特殊问题为基础，于是，问题常常是，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比基督教或犹太教愿意坚守信条的时间要长，这似乎是事实。独立世俗政权的建立非常缓慢。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允许世俗主义的发展。
116 伯纳德·刘易斯强调这种观点，他说：“世俗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是这样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教会和国家截然分开，它们是可以或应该分开的，从更深层意义上讲，这种思想是基督教思想。”[①]我认为这一评价不能成立。确实，基督教告诫它的信徒“在

① Lewis，2002：107.

凯撒的统治下接受”工作，强调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但后来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建立，统治者都声称要忠于保护者，这一分离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宗教主宰了中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出现了反潮流的怀疑主义，甚至不可知论。但通常的世俗主义思想产生于在后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后启蒙时代，此时它才获得更为持久的地位，形成了重要发展。甚至到后来，有些老传统在某些方面也一直维持着，像美洲南部的某些地区，尽管这些地区有着现代化的经济，另外就更别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正统犹太教团体了。而且，当世俗知识兴盛时，宗教也经历了人文主义时期，不过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宗教看起来都没有多少差异。

对土耳其情况的简单考察集中于政府、农民、贸易方面，所强调的是，仅仅集中于分析社会制度的特殊方面，尤其是当这一论点取决于寻求差异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虽然试图阐释“现代化”时研究差异确实很重要。印刷术出现之后，欧洲的确发展了一套先进的知识体系，工业革命后也出现了强盛的经济，此前也已在枪炮和舰船上取得了一些优势（虽然这些优势某种程度上受到质疑）。[①]但把这种成就和政治制度（欧洲的民主制度与“亚细亚的专制主义”相对），与土地所有制的区别（“缺乏封建主义”），或者与法律体系（假设土耳其没有罗马法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企图以一种难以成立的方式把当下推到过去，这是一种前后倒置的历史解读方式。

不管怎样，就知识生产而言，直到印刷术出现之前，伊斯兰世界一直具有明显的优势。制造业和贸易经济平行发展，而近东也成为丝织品和其他奢侈品的中心。这些进步并没有因为假设的“专

① Hobson，2004：189.

117 制”制度或特征如缺乏所谓的法律、独立城镇或自由而受到阻碍！城镇从古代社会延续下来，并发展出行会、市场和慈善机构（瓦克夫），这和西方一样。伊斯兰法律以罗马法和近东的后犹太法典为基础。法律商议过程和欧洲一样非常复杂。[①]农民和商人的活动都能得到法庭的法律保护，女人可以作为原告出现在法庭上。欧洲用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概念以否定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其源头是古希腊，随后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学术领域。我们要抛弃的正是这一概念。

建立在这些发展中心之上的奥斯曼帝国，从经济角度看并不是僵滞的东方专制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一直到17世纪仍然保持着充沛的活力。”[②]费南德兹-阿梅斯托还提到，“15—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适应速度和匹配方面一直都要超过西方对手，它也共享了很多西方传统。”[③]这些共享的传统非常重要，土耳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单单是东方的他者。“16世纪土耳其的政治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保持着一致步伐。艾布乌斯-萨德（Ebu us-Sud）大帝创造了一种绝对主义法学，完整展现了罗马法的律令。”[④]土耳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只有“事后诸葛”式的历史学家才会“预示它早期的衰败”。适应性对前期发展同等重要。最初依赖马队的土耳其人后来成为抵达地中海的重要海上力量。他们的技师开发了“一种迅速快捷的射击术”。阿梅斯托还称赞“伊斯坦布尔在地图改进方面的远见卓识”，它对哥伦布和其他人的地理大发现都非常有用，并最终彻底影响了他们的地位。[⑤]

---

① Mundy，2004.
② Fernandez-Armesto，1995：220.
③ Fernandez-Armesto，1995：222.
④ Fernandez-Armesto，1995：223.
⑤ Fernandez-Armesto，1995：219.

东西方文化的相似性

土耳其是最近的非欧洲（亚细亚）国家，而后启蒙时代主要的批判靶子是中国。很多欧洲人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是“传统的”、“僵滞的”、“专制的”，甚至落后的。我在早期著作中试图表明：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与欧洲大致是并驾齐驱的。[①]从家庭和婚姻的角度，我认为，首先，就家庭人口平均数（MHS）而言，
118
人口统计数字不能说明非欧洲模式，因为家庭大小和夫妇“单子化”程度有关。[②]这发生在嫁妆制度中：父亲的财产在女儿结婚或者后来儿子继承时都要分给他们，产生了“妇女财产情结”的复杂特征（族内通婚、配婚和世袭婚姻的特殊策略，如过继以及以女人为主的联姻等）。这种制度似乎是欧亚大陆后青铜时代所有主要社会的特征。中国先进的农业使得经济分化（阶级）十分严重，在此情形中，财产转移不断变化，父方试图通过婚姻来维持或提高女儿和儿子们的地位。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能得到父亲的财产，尽管并不均等。为了说明欧洲和亚洲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比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盛行的锄耕农业的情况，那里，经济和社会差别很小，并不影响人们娶的是谁（或者嫁妆的多少），商人的婚姻可能是个例外。[③]

其他“文化”形态中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表现出趋同而不是分歧。东西方的相似表明，历史学家对古典时代以及其后圣训传述式的世系或系谱学一直到西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概念分歧，把“专制

① Goody, 1982, 1983, 1996a.
② Goody, 1976.
③ Goody and Tambiah, 1973.

的”、甚至落后的亚洲推到了边缘，这一做法难以解释各种复杂层面。我认为，欧洲复杂的烹饪活动——最著名的是“高级厨艺”，从那些比较明显的阶级化的烹饪形式中凸现出来，而那些大体上没有差别的烹饪术即便在政治上已经阶级化了的非洲社会也能找到，农业经济在其他方面没能保持这种区别。[①]简单阶级化的烹饪一直共存于欧亚大陆后青铜时代的所有主要社会，但在有些社会中，我们发现高级厨艺有进一步发展，在宫廷和有钱人群体包括商人和大资产阶级中间，鉴赏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级厨艺在中国[②]、印度和近东[③]、古代和近代欧洲[④]也能找到。虽然这看起来只是表层的东西，但烹饪问题的确关系到社会分化（阶级）和我们人口的食物。

鲜花文化同样如此。不同社会培植鲜花的方式不同，它们用以
119 审美、仪式和相关目的——比如送礼、拜神等。[⑤]这些看起来处于边缘，却再次成为文化的核心，不仅是礼物仪式，而且还是农业和阶级分化的重要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前殖民地区不仅不培植家养的鲜花，而且在仪式和其他社会环境中也不用野生的鲜花。这与中国、印度、欧洲和近东很不相同。在非洲经济制度中，他们用的更多是水果而不是鲜花，用来食用而不是装饰。宫廷和一些有钱人的花园中开发了花的品种，同时也为集市培植，市场上出售的鲜花品种多样，功能各异，用于拜神（但近东没有）、人际交往（礼物、赠送）以及装饰。中国有些地区在新年时会把开花的果树砍掉，插在花瓶中，摆在商人的屋中，作为供品以炫耀“富裕阔绰”，人们

① Goody，1982.
② Chang，1977.
③ Rodinson，1949.
④ Goody，1982.
⑤ Goody，1993.

并不在乎水果。和美食一样，中国发展了一种以“审美”为目的的鲜花文化，这种文化也体现在后青铜时代的所有主要社会中。而且，政治和商业的上流阶层一起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所以，它们和商业甚至工业发展有关联并不奇怪。事实上，与很多欧洲人的观点相反，对美食和花艺的热衷在东方要比西方更为发达。

文化的相似性延伸到其他艺术活动的整个范围。大约同一时期(17世纪早期)，日本出现了歌伎馆，而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了世俗戏剧艺术，适应了商人和资产阶级等观众的需求。中国在16世纪时开始出现小说，甚至比18世纪的欧洲还要早，更早的还有日本，如果我们算上《源氏物语》（11世纪）的话。这些方面的平行发展要归因于世界范围内各商业团体之间的贸易体系。这些团体依靠商品交易维持生活，而这些交易必然涉及思想、技术知识的交流和各种商品的交换。这就是为什么纸张和丝绸制造在数百年之间从东方传到西方。其他如玻璃制造[①]的技术和绘画透视法的运用以相反的方向从西方传到东方。一些绘图花纹如叶子形状和莲花装饰从西方传到东方，而龙的图形则从东方传到西方。[②]思想的交流也是这种方式。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即内部的深化（社会演进）。从 120
青铜时代开始，城市社会产生了日益复杂的技艺和思想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互为发展基础，就像很多技术中的变化一样。[③]因而，这些社会的内部活力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市场”的刺激。“市场”导致世界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平行发展。如果我们对现代社会采取“人类考古学”方法的话，青铜时代出现完全不同的模式

① MacFarlane and Martin，2002.
② Rawson，1984.
③ Singer，1979—1984.

的看法似乎就很有问题。

这里我所表明的是另一种关于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说法。前一种说法往往是静态的，把人类群体放在一个近乎生物学的框架中，虽然也涉及文化组织而不是自然组织。后一种说法不得不更动态一些，它考虑到信息的外部交流和内部发展，以及长时期内更复杂的行为方式的交流。文化或社会的发展与生物进化过程非常不同，虽然有些情形下它沿着“自然选择”的模式进行。但是，在“深层结构”方面的文化分析、追溯不同组织的同质性（相似的结构方块）方面，可能但并非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是基因组织，它产生了思维内置结构研究中的“认知人类学”分支。毫无疑问，这些结构仅仅出现在更动态的“社会演进”进程中，即“外部”交流和“内部”发展。这些在考虑欧亚社会的长期发展时非常重要，也有助于理解框架内、某种程度上是交互影响的那些文化，它排除了一些主要社会如“专制”社会的根本性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所获得的任何比较性的优势严格说来都是暂时的。

更生动的一种文化史观念在共同基础而不是“专制”或“民主”政权范畴的区别上探寻趋同和分歧。埃里克·沃尔夫对东西方国家“藩属国”的划分体现了这一点，东方有时比西方更“集中”一些，但两者属于共同的范畴之内。我是这样理解“藩属国”的：它需要得到居民的钱财支持，因此为“人民统治”打开了道路，因为人民提供资金。可能李约瑟在描述西方“军事封建主义”和东方
121 “官僚制封建主义”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两位学者都避开了“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概念。[①]

① Wolf, 1982; Needham, 2004.

在我看来，沃尔夫的概念解决了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等人关于“亚细亚例外论”和“东方主义”的很多论述中所发现的问题，换言之，是从青铜时代的平行发展到假设的古典时代及其后的分歧问题。但它需要概念的根本性转变，需要抛弃欧洲生产模式、交往模式和破坏模式的特殊概念。相反，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欧亚大陆“藩属国”的发展，这一发展和城市革命并立而行，货物交换和思想交流随时间不断增长，产生了欧洲大陆的重商主义、市场、金融活动和制造业，而没有亚细亚专制、亚细亚例外论或完全不同的亚细亚模式。 122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第二部分

三种学术视野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科学与文明

下面三章我将讨论三位重要学者的历史观。他们不一定离我们最近，尽管李约瑟的结论到2004年才出现，但是，他们却是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对世界史在当代的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第一位便是李约瑟，他早年是一位涉猎广泛的生物学家，后半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史，并编写了一套权威的系列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他在书中表明，直到16世纪，中国的科学如果不是领先于西方，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李约瑟试图解释为什么16世纪之后西方接管了这一优势，即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第六章我将讨论德国历史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颇具影响的著作，他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认为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的成就达到了巅峰。第三位，我将探讨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迪南·布罗代尔的著作，他在《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讨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资本主义形式，但总结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只是单纯的欧洲发展。

这些学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陈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之后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后欧洲获得了相对优势。这一优势不得不解释一下，但我认为他们的解释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要么将这一优势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要么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方式将优越性归到近代欧洲，进而扭曲而不是阐明了世

界史。[①] 很多当代学者也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好，对欧洲的独特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文明得出了相似的推论。在某些情况下，
125 他们的方法似乎通过对世界史的不同理解，甚至通过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对主义得到修正，但实际上，他们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都体现出相同的欧洲中心论。

在这三章中，我将审视那些引起历史学家兴趣的一般特征。首先，欧洲被认为创造了某些特殊制度，它们昭示着资本主义：12世纪的大学和商业城市两者都被看作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类似机构。进而，有观点认为，就欧洲历史而言，欧洲宣称拥有独特的德行和实践，比如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家庭模式等，而这些无论如何都要追溯到古典时代。我将在第十章讨论很多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欧洲在爱情这种情感方面（或至少是罗曼蒂克的爱情）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观点同样是十足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目的论，它们源于那些以完全不能成立的方式把优势推到过去来解释近代世界支配地位的企图。

封建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被视为西方独有，对西方的现代化也非常重要，这便是“文艺复兴”。欧洲学者往往认为文艺复兴在人性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艺术上，不过，艺术与政治经济联系紧密。最近一位评论家提及这种状况时写道：

> 15世纪早期产生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它是占优势地位的城市和商业上层势力不断提升的结果。这些人渴望通过奢华的艺术品来展示他们的财富，渴望教会为虔敬的信徒

① 当然，仅仅以某种方式。我完全认同他们的大多数著作。

> 创造、分配一个相应的神学地位……（艺术作品）追溯到古典时代而不是圣经的先例，以思想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①]

当然，在这些艺术分支中有一次大的恢复，特别是戏剧和雕塑（没有提到世俗绘画和音乐）最开始都受到教会的压制或掌控。

晚些时候，一次小复兴（或早期的文艺复兴）波及到佛兰德斯。杨·凡·艾克（Jan Van Eyck，1395—1441）为勃艮第公爵腓力大帝（1419—1467）画画，据说他改进了（如果不是他发明的话）油画，并在根特创造了《羔羊的崇拜》（1432）。图尔奈（Tournai）的罗吉尔·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00—1464）继承他的画风并造访了罗马。维登在罗马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欢迎，他在那里教画，成为美第奇家族和国王的画师。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1430/1435—1494）成为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画派 126
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吕贝克的新汉萨同盟画画。[②]那时布鲁日是欧洲最大的商业城市，[③]以商业活动而闻名，东方运来的香料和其他货物，特别是英国的羊毛，奠定了其经济基础，为著名的佛兰德斯织工提供了原材料。这一活动使得他们与波罗的海的吕贝克联系紧密，成为范围颇广的同盟首领，它也是香槟展销会、佛罗伦萨、西班牙和南部一些地区的领头羊。繁荣的经济和萌动的复兴相互促进，因为，正是富商及其扶持的僧侣和政府支撑着点缀城市的装饰和艺术工作所需要的财力。

---

① Brotton，2002：138-139.

② 凡·艾克的早期作品（15世纪早期）受到勃艮第透视绘画的影响。

③ Letts，1926：23. 在14世纪，可能有4万到5万居民，但在编年史家眼中只有1万到1.5万人。

布罗顿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提出疑问，“文艺复兴”这个词在事实上是不是“被发明出来建构一个关于欧洲文化优越性的令人心悦诚服的神话”。[①] 当然，这是看待文艺复兴的常见方式。历史学家米什莱在《法国史》（1855）的最后一卷中写道，文艺复兴意味着“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人重新发现了自我”，在他看来，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法国的。瑞士的布克哈特和牛津的佩特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几乎是民族主义的文艺复兴“精神”概念，他们称赞“有限民主制、对教会的怀疑主义、艺术和文学的力量以及欧洲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的征服”。[②] 换言之，文艺复兴是人类的“人文主义”，就像自我的复兴或重生，它被西方盗用，“强化了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用来证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统治的合理性。

东方却没被看作也能有这样的活动。不过西方对中国优势地位的认识有一个转变。此前有过一些批评性言论（例如维柯、休谟、卢梭和约翰逊博士），但到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赞许地介绍了中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观念想法。这一积极因素在工业革命之后很快消失，此时对中国更普遍的看法是落后、专制和僵化。18世纪的欧洲深受中国艺术和装饰的影响，但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只有希腊艺术传统才体现出真正的“美的理念”，中国艺术是低劣的、
127 僵化的。语言学家洪堡认为汉语低劣，诗人雪莱认为中国的制度“一团死水，不值一提”，赫尔德讽刺中国的民族性，德昆西认为它们陈腐，黑格尔认为中国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低水平（对黑格尔来说，中国是“神权专制主义”）。孔德、托克维尔和米勒都认为

① Brotton，2002：20.
② Brotton，2002：25.

中国是低劣的、野蛮的或停滞的。[①] 蔑华的言论甚至出现在戈宾诺（Gobineau）和其他欧洲人的著作中，而哲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也认为“中国精神”麻木呆滞。[②]

围绕文艺复兴的怀疑论，这三章将探讨学者们是如何采取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去看待欧洲独特性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这种方式为后来的欧洲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换言之是为现代性提供了经济、社会和认识论的基础。汉语中没有和“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相同的词语，即使在英语中这些词也是19世纪的发明。但是，对中国人而言，它们的欠缺被认为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预示着中国在近几个世纪不能取得欧洲那样的成就。

对多数欧洲学者来说，没有文艺复兴就不可能迈向近代社会——因此，近代社会只是单纯的欧洲现象，正如衍生于文艺复兴的所有一切也都是欧洲现象：资本主义、世俗主义、活跃的艺术体系以及现代科学，我们看到，这种观点的极端便是将欧洲的优势至少推至封建社会，甚或推到古典时代和基督教出现之前，但即使在最谨慎的表述中，仍然保留着一个事实：离我们最近的文艺复兴发起变革以来，欧洲就被看作凌驾于潜在的竞争对手之上。在此语境下，“现代性”被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分离。我将从我的立场出发分析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的权威性著作中的那些观点的准确性。李约瑟在重组世界历史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当他讨论近几个世纪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时，他仍然倒退到接受下面这些概念：文艺复兴的独特性、资产阶级、现代性、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兴起。

然而，所有的复兴都是独特的，所有的文字社会某种程度上都

① Brook and Blue，1999：91-92.
② Brook and Blue，1999：82.

有复兴。追溯城市革命到“现代性”这条普通线索意味着有这个传统的所有社会都有资产阶级，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至少都有重商主
128 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西方的确按时间顺序走向现代性和“现代科学”，不过欧洲语境中这些共同特征所归结的独特性仍然是个问题。“现代性”被视为一个独特的西方用语；但是，即便只是从概念术语上来描述它的形成，其种种标准也难以说清。

“现代”这一西方概念的用法被布鲁克（Brook）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加以分析，对比中国学者对此概念的运用，他的说法和“现代科学”问题有很大关系：

> 既然与过去决裂是在杂乱无章的事件中弄清现代历史的关键，那么，前现代历史不得不被看作与现代社会本质不同，与现代不可调和，但仍为现代能够超越前现代提供了基础。随着现代与前现代的分离，现代史败坏了作为当代价值或意义来源的前现代名声。①

李约瑟提到的文艺复兴成就，当然不仅限于艺术。那时，随着商业和行政活动的需要，教育也发生了变化——教育体制的内容和范围大为扩展，因为教育与世俗活动关系密切。早期的大学得到发展，并继承了古代高等教育机构诸如马德拉萨及其课程；尽管宗教在这些课程中占支配地位，但也包含其他课程。从15世纪起，不列颠语法中学和类似学校在城市中扩展开来（教会学校要早得多，10世纪就已重新出现了），其他地方同样也获得了发展。后来，在15世纪

① Brook and Blue, 1999: 115.

中期，欧洲发展了印刷、书写的机械化和产业化，而这些早在公元868年就已出现在远东[①]，但现在却用于有限的字母文字而不是其他各种文字之中。这一进程使得大量作品迅速准确地生产得以可能，对学校和大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信息以另一种方式发展和传播也非常重要。[②]

布罗顿的著作强调了东方（主要是土耳其）在商业和知识方面对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贡献。[③] 如果我们还记得文艺复兴不单纯是 129
由内部决定的话，突出欧洲就显得有些奇怪了。不过，我们也还需要考虑欧洲其他时期发生的“小复兴”，还有其他文化中的“复兴”。在复兴中，重生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先前已在人文主义的背景中提到。实际上，任何文字文化中都可能追溯历史的早期阶段及其复兴（古典时代），书面文字使我们准确做到这一点。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沉迷于西欧文化，读的是欧洲人文历史学家的著作，这必然会让我们认为自身传统非常优秀。尽管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起源于文化，但欧洲文艺复兴并非想像的那样独特。平行也仍然存在。所有承袭城市革命文化的社会中，随着其他商人和资产阶级团体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艺术和“文化”形式也不断发展，它们植根于这些社会。文艺复兴式的进步在不同时期都

---

① Bloom，2001：36.

② 欧洲人常常指责中国人没有字母文字。字母文字对自然科学产生影响的差异还不清楚。

③ 我发现有个问题和布罗顿的论断有关：“15世纪东西方没有明显的地理或政治界限。”布罗顿认为，只是在19世纪，我们才发现“伊斯兰东方与基督教西方文化、政治绝对分离的观点，掩盖了东西方畅通的贸易交往以及两种文化间的艺术和思想交流这些状况”。这一时间似乎太晚，在伯纳尔看来，分离和帝国主义相联。交往要早得多，但同样也有黑暗的一面，它也遭遇了宗教阵营的反对，就像我们从摩尔人的驱逐、对犹太人的屠杀和对基督教团体的攻击中看到的一样。

有发展，但一般情况下城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被很多历史学家看作现代早期，这是一种期待诞生而不是死亡或重生的模式。欧洲在这一进程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某种程度上知识和艺术（实际上还要加上家庭生活本身）受到信奉一种特殊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的限制。宗教改革再次回到古代的文字信条中，体现出对某些完善信仰的背弃，并开启了世俗知识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它引向一个更加受限的宗教领域，家庭生活不再以天主教会的原则为主导。

李约瑟对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发展两者的观点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他还追随了韦伯，这位新教徒将重要的“进步”归功于宗教领域的经济伦理。“宗教改革的成功包括传统的重要突破，欧洲人得出这一结论并不迟：实际上历史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上帝（Lord）将使所有一切焕然一新。直接通往上帝的新教意味着一批真正有文
130 化的劳动力”[①]的首次文化生产，并扫除了阶级障碍；文艺复兴之后，“一场‘工业革命’即将发生”，正如“现代科学”也即将发生一样。实际上，新教国家的确经历了识字率的提高，不过这一增长幅度很小，很快就被天主教地区赶上。不管怎样，正是在天主教地区，特别是在意大利，欧洲的商业革命、丝绸和造纸机械化生产的早期发展、银行业、赊贷业和会计业，所有这些要素都产生了。它们中的大多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东方进口贸易的影响。李约瑟再次从后来的发展，也可能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以目的论的方式把这些要素重复了一遍。而且，早期将西方科学传到中国的欧洲人不是新教徒，事实上是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传教士。

对西方比较特殊的是，数百年来，交流和知识体系都受到限

① Needham，2004：63.

制，不仅受命于教会（很多宗教都有人文主义时期），还因为纸张的缺乏（纸张对伊斯兰世界非常重要，它起源于中国）。西方向东方敞开大门，它便发生了文艺复兴，某种原因是由于西方早期的瓦解产生了一个如此黑暗的局面，直接导致初期“黑暗时代”的出现。为了打破这些限制，文艺复兴的确非常必要。当文艺复兴来临时，西方经历了一场知识和艺术活动的大迸发，某些世俗活动受到与黎凡特不断增长的贸易所带来财富的刺激。文艺复兴的这一方面对西方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东方从未经历如此大范围的瓦解。这一瓦解还伴随着基督教形成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

尽管如此，东方和西方一样也的确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或多或少经历了活跃时期，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和商业水平有关。扎法拉尼提到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传统中的“人文主义”时期，那时，世俗知识而不是宗教知识非常兴盛。伊斯兰教在希腊知识（“古代科学”）和宗教信条之间常有冲突，后者被正统派看作所有知识的源泉。因而，一些统治者和富商在图书馆尽其所能收集这些知识，另一些人则收藏神学方面的文集。欧洲这一运动的发展比较连贯，伊斯兰教中则更加变化不定：世俗知识——特别是源于希腊的世俗知识的抛弃和恢复，随着时间地点而不断变化。我们发现在象征性艺术的用法上伊斯兰教也是摇摆不定的，尽管有宗教禁令，这些艺术仍然在波斯、埃及、印度和莫卧儿王朝中兴盛繁荣。朝廷往往避开和宗教 131
信仰相关的限制。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导致整个欧亚大陆的纵向变化。到处都是资产阶级，他们是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物，加强了社会参与，也巩固了他们在知识、教育和艺术中的贡献。

如前一章中提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发现高级烹饪术的发展和鲜花文化发生在欧亚社会的主要城市背景中。在16世纪，我们也发现了和西方类似的戏剧艺术，以及稍晚一些的日本戏剧，还有绘画，中国和西方还都产生了现实主义小说。近代学者如伯克和布罗顿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论述表明近东文化在这一发展中的重要性，只是他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我们需要考察所有主要“文明”中的文化发展的复兴。但这一进程主要是西欧的特征，因为罗马瓦解和基督教产生之间有一段过渡，还因为印刷术和纸张用以字母文字所导致的交流方式剧变的影响。当然，中国在印刷术和造纸方面有长期的竞争优势，但现在欧洲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欧洲在向现代化的跨越中后居上了。

在欧洲，这些发展导致各种活动的迸发，包括“现代科学”的发展。一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艺术发展密切相关，虽然这些不是那时唯一重要的成就。所谓的“科技革命”或“现代科学”的诞生是另外一回事。它构成了一部伟大思想史著作的背景，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完全可以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媲美。埃尔文在“最后”一卷（第12卷第2章）的导言中评论道，“人们的世界观被改变了”[①]；“直到17世纪左右，中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往往比西欧要优越，只有很少领域落后于西欧。对中国文化领域的这一揭示”改变了世界的观念。但是，尽管中国的贡献往往对西方和东方都很重要，却只是以有限的方式被吸收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的血液之中”。

李约瑟耗费50年时间以规模浩瀚的研究证明中国科学的发展。

① Needham，2004：xxiv.

但我希望评论的不是他对中国科学的研究工作，而是他解释原因的 132
企图，尽管东方很早就领先，但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取得了他所认为的“现代科学”的突破呢？这一悖论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采纳了西方很多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其解释断定科学发展与资产阶级兴起，也即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在这一宏伟构想之初，李约瑟写道：“我们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文艺复兴之后就立即在西欧发生？”[①] 不过他补充道：“一列火车会遮住另一列火车。我们马上会意识到背后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在先前的1400年中比欧洲更为成功？”关于第一个问题，李约瑟回到他的“最终”评论中，几十年这些文章流传甚广，它们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欧洲在17世纪后跨越到“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这一科学结合了实验方法和数学。他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在科学和经济上两方面都取得了早期优势，恰是更落后的欧洲成功地跳跃到“现代科学”，而且还跨到了资本主义，这种情形是如何形成的？为了给出一个答案，李约瑟集中研究了政治、经济领域和知识体系的内部特征。

对李约瑟来说，中国科学一直到文艺复兴都领先于西方。最生动的表现是他在植物学卷中绘制的图表，这一图表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所处的时代，欧洲和中国对植物物种的认知是相同的。但此后欧洲的知识落后了，而中国却稳步前进，一直到16世纪，此时，欧洲才突然爆发并超过中国。[②] 李约瑟认为这要归功于“现代科学”的诞生，其定义是“对自然假设的数学处理，它需要长期实验的反复检验”。[①] 希腊很

① Needham，2004：68.
② Needham，1954：xxx.

少做实验，中国也主要是出于实践而不是理论目的。一般认为，“现代科学”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秤砣并重”。②

不过，李约瑟认为有利于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方优势的一些基本
133 因素早已存在，甚至早于文艺复兴。因为西方受益于欧几里得，而东方没有发展出“几何原理”③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三角学）。他认为这些因素起源于“希腊城市生活的公共性”，并与此有关，因为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需要更多清楚和详细的判断（同时缺乏巴比伦人将圆分成360度的划分）。李约瑟和韦伯等人均认为欧洲城市是独特的，借助资产阶级地位及其价值观念的提升，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且，东方没有从希腊城邦的传统中获益；“文艺复兴到来时，雅典文化引导着威尼斯、热亚那、比萨和佛罗伦萨兴起，这些反过来又带动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最后是伦敦的兴起……在这些城市中，商人受封建贵族干预的庇护……直到他们最终诞生的那一天……”④所以，李约瑟在这里也认为城市生活及其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对西方来说是独特的，与古典时代一脉相承。他还考察了西方“军事封建主义”和东方“官僚制封建主义”的差异，认为官僚制封建主义影响了东方的进程，限制了东方的发展。⑤从这个方面来说，李约瑟把欧洲史解释为某种长期持久的优势的企图与他对中国科学成就的强调互相矛盾。

显然，欧洲在所有领域，具体地说是经济、阶级制度和“自然

---

① Needham，2004：211.
② Needham，2004：210.
③ Needham，2004：210.
④ Needham，2004：211.
⑤ 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森谷胜见（Moritani Katsumi）使用了“官僚制封建主义”一词。（Brook and Blue，1999：138）

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发展。但李约瑟认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没有发生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间，印度、南亚、中国都没有”。在西方，军事—贵族封建主义（与中国的“官僚制封建主义”不同）被资产阶级所“代替”，资产阶级更愿意尝试，因为“精确的知识意味着更多的利润”。通过比较两种封建结构，李约瑟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但正如欧洲一部分贵族也投身于商业和金融事务一样，中国的政府官员在他们“退休”甚至“为官”期间也能并往往会参与商业。因而，他们头戴两顶帽子，既是政府官员/地方显贵、地主乡绅，也是官方士绅和商业投资者。他们运用政府的资历和人际关系，为其提供法典中不便的机构上的支持。① 134

但是，还有其他资产阶级和早期资产阶级，其他商人和制造商对利润和“精确知识”也很感兴趣，即便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不总成功。而且欧洲贵族被资产阶级真正代替的观点也不完全确切。后者逐渐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影响，不过，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在旅行到坎特伯雷的乔叟商队中，在卢卡、威尼斯、帕勒诺，同时也在近东的城市诸如伊斯坦布尔、开罗和阿勒坡以及更远的东方，他们就产生了。实际上自从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就已经存在了，随着交换经济的增长，他们变得日益重要。交换经济不可能仅仅存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而是整个欧亚大陆。独特性的观念很多情形中取决于形容资本主义和科学时对“现代”的定义。下面论政治和经济的几个小节中，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一些因素，也就是李约瑟试图解释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成就在近代（当代?）失衡时他所认为的导致中国和西方差别的那些原因。

---

① 为这些评论我要感谢麦克德莫特博士（Dr. J. McDermott）。

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

李约瑟非常欣赏中国政府的官僚体制，因为它很早就采用以“成绩”为标准的行政体系（考试制度从公元2世纪开始算起），而不是其他类型“封建主义”所实行的招募制度。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政府和官僚体制虽然基本上是“不干涉主义”，并的确对推动古代科学贡献颇多，在星象观测家的诠释中维持了几千年的记载，形成了各种百科全书和科学探索。

相对来说，西方科学大体都是“个人钻研”，因而停滞不前。的确，用李约瑟的话来说，“中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要比欧洲要理性得多”[①]。在他看来，中国古代鼓励科学但后来又像一道刹车，而资产阶级的个人钻研为进步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当时机到来时，中国的国家科学和医学仍然没能形成‘质的飞跃’”，而这一飞跃产生了西方的现代科学。[②] 他认为这一失败部分要归
135 咎于官僚体制不提倡竞争的特征。但古代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必然也能促进近代的科学发展，除非这种可能性被人们所描述的从“古代”到“现代”的“质的飞跃”主动剔除，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唯名论问题。隐藏在李约瑟分析背后的假设有力地暗示着，他否定中国古代有资产阶级，认为这一点和行会一样都是政府官员禁止的。缺乏资产阶级（和货币体系）被用来解释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事实上是任何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失败的原因。

---

① Needham，2004：9.
② Needham，2004：18.

因而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过去不具现代意义，因为它没有资产阶级而只有政府官员，因此也就没有资本主义。虽然中国可能认为资本主义纯粹是西方的进口，但它更理性地认为西方进程和东方的领先是一致的。的确，这一选择总体来说体现出一种粗放的分析，它忽视了整个东方历史。欧洲科学“质的飞跃”这一概念给中国以一种方式迅速赶上西方留出了可能性，但这种方式对非洲来说比较困难。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它更接近欧洲的社会经济，超过了马克思、韦伯，甚至李约瑟等人的认识。[①] 中国能够取得的成就可能更像这些学者所说的要从目前的优势回溯到过去来加以解释。

当然，任何时候欧亚大陆的主要文化在知识成就方面都是有区别的，但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交换地区体系中的一部分，在长时期内，较“落后的”地区大体上能够赶上较“先进的”地区。李约瑟的理解并不完全错误，不过是以一种模糊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的方式来表达的。他承认其早期观点受魏特夫（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影响更深。但是这种理论试图将经济（灌溉体系）和政治（专制主义）以非常紧密的方式连在一起；水利控制在需求和组织上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官僚”控制被认为是一个比“专制”更好的描述。这的确是个进步。宣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自欧洲马克思主义，它以19世纪的姿态将资本主义看作欧洲的特殊现象。李约瑟用这一概念引起人们对希腊传统独特性和对中世纪 136
共同体一般评价的注意。

① 中国在1500—1950年的宗族在欧洲没有对等之物，但福莱（Faure，1989）的著作表明，中国并不禁止韦伯所说的那种商业的发展，在中国海外也的确如此。

据说，作为中国特征的“官僚制统治”想保持的是社会稳定而不是更多的经济收入，正是这一优势“维持了基本的土地社会结构而不是致力于，或者准许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工业的发展”。[①] 这一表述采用概念化的发展模式，设想农业社会之后便是商业社会。但这种模式过于简单。即便新石期时代出于某些目的也要依赖商业和贸易，正如我们谈到市场时所提出的那样。所有社会都有一些技术因素，包括货物交换和服务设施。社会的构成元素在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中急剧增长，影响了中国等伟大的文明。当然，这些国家的农业活动对人口数量非常重要，不过创新领域在那些通常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中也能找到。这些国家由农业和城市部门组成，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复杂。

以农业为基础的主导部门，“以农为本”的思想可能会看不起商业，但资产阶级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直到后来，这些并没有“支配”整个社会，不过长期以来它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兴趣点，推动了文化发展和朝廷外的人文活动，具体说是提高了僧侣的人文活动和行政程序的效率。第三等级是存在的，即便不能正式出现于政府中。李约瑟本人也注意到，在中国，除了在城市生活中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发挥重要作用以外，富商在朝廷中也可能担任一个角色。[②] 而且，在优于欧洲的商业和工业条件的发展下生产大量产品，一部分用以出口，一部分销往国内的巨大市场，我们很难说这个国家抛弃了商业，即使这个社会的某些因素和商业互相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提出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理由。[③] 正

① Needham，2004：61.
② Needham，2004：50.
③ Needham，2004：8，n. 22.

如布罗代尔提到城市时所说的，“城市永远都是城市”。因而，城市居民永远包括早期的资产阶级。官方可能会禁止资产阶级和行会的发展（其他文明中也发生过），但它不能也没有完全压制他们。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李约瑟没有充分考虑到商业和农业的混合，由于不断的发展，前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要普遍一 137
些。否认这种类型产业的存在似乎是旧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货币体系），那么，这种缺失便被用来解释为何中国没能成功发展出现代（实际上是任何）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

关于近代中国限制发展资本主义的论点与韦伯“官僚主义”的看法有些细微差别，具体说来，官僚体制中的学者型官员是最大的阻碍。李约瑟认为官僚体制最初为生产提供了动力，而韦伯则认为它一直都是有害的。韦伯认为，从宋代以来商人一直遭到压制。韦伯的观点得到法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埃提恩那·巴拉兹（Etienne Balazs）的赞同。巴拉兹提到“士大夫的专制权力”（但研究表明他们是通过考试全国遴选的），他们的存在限制了资产阶级的兴起，由此形成了中国城市的特征。[①]

巴拉兹的思想轨迹非常有趣，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研究结果的一个范例。他曾和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一起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工作，明显受到布罗代尔中国观的影响，我们将会在第七章中看到。一位评论家近来提出，巴拉兹受到他个人经历和所遭遇的政治变迁的影响。[②]起先他对中国没能在宋代经济成就上奠定基础持一种矛盾的立场。宋汉理（Zurndorfer）提到他通过对“无穷的数据、

① Zurndorfer，2004：195.
② Zurndorfer，2004：193.

数不清的个人记录收藏和大量政府报告的研究，希望发现一些证据以支持他的观点，即商人一直遭到官僚主义的迫害，农民总是专横残暴的国家的受害者”。[①] 由于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文集》的出版，巴拉兹从“那些陈旧老套的帝国主义的中国论述”转向探究“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他对明清时期的矿业发展特别感兴趣，因为那段时期国家与私人实业之间产生了竞争关系。巴拉兹在调查生产组织、劳动冲突以及铁、银、铜矿的利
138 润等因素之后得出结论：当国家对实业不感兴趣时，它就不能妨碍个人实业。与他早期的“文学”研究不同——这一研究必然倾向于关注文人和官僚，这时巴拉兹使用了工人和当地商人的相关资料。[②] 因而，他逐渐意识到在国家官僚之外还有“一类资产阶级”，中国的确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不过他对此观点作了限定，认为商人要获得法律地位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行贿，而且他们从未获得“自治”意识。[③] 相反，他们鼓励儿子成为官员，投资土地来获利。巴拉兹受到“资本主义萌芽”争论的影响，这一争论引导他去研究这些材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主义概念施加到中国漫长历史的因素，但巴拉兹抛弃了这一观点（这种方式与埃尔文反对李约瑟如出一辙），同时，通过集中论述商人的法律地位，他试图以目的论方式解释中国近代为什么没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然而，商人的法律地位看起来和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不同，在这些领域中，商

① 这个个性化的词语不应该照字面意思理解。就像麦克德莫特给我指出的一样，我们有的是一些商人行会的手册、账簿，而不是其他真正的个人的记录。他还表明把中国的商人看作一个“商人”阶层是错误的，因为文人也参与其中。（宋汉理，2004：234–5）

② Zurndorfer，2004：214.

③ 麦克德莫特博士指出，商人可能不欢迎这种自治，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破产。

人从商的威望比置地要少，这种地位在任何地方都随着时间得到矫正。[①] 李约瑟同样重复了过去的抱怨，认为“商人和他们的职业不是中国最推崇的传统的生活方式”，[②] 因而，商人以他们的财富让自己变成“有教养的绅士”。欧洲的商人也是一样。

不仅李约瑟、韦伯和巴拉兹接受了中国科学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正反并存的观点，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认识都存在分歧。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中国和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被排除在古代、封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人类社会的主要进程之外。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其不成熟的文明正在腐烂”。[③] 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十月革命之后，一些人更关心中国发扬反帝国主义的精神和农民斗争，特别是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希望中国永远被排除在现代化发展之外。[④] 对他们来说，需要一种更有活力的历史。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这就为中国依照马克思主义五阶 139
段论的进步运动留出了空间，因此中国不能被排除在通史之外。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由商业资本支配。另一些人相信它仍然是各种亚细亚模式中的一种，就像魏特夫说的那样。[⑤] 最后在1931年，苏联领导人决定反对亚细亚的僵化概念，这一概念由欧洲历史编撰学提出，并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⑥]

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社会的商业发展看作东西方

---

① 斯密斯（1991：9）提出国家在宋代前期发挥的作用包含“资本主义”的因子。

② Needham，2004：59.

③ Blue，1999：94.

④ Brook，1999：130ff.

⑤ Wittfogel，1931：57.

⑥ Godelier，2004；Hobsbawm，1968.

都曾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①] 这种反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似乎非常合理。它意味着抛弃亚细亚模式，接受普遍的“封建主义”，一旦这一概念意指任何高度分化的农业社会，其意义就淡而无味了。而这种普遍类型的概念往往产生于在青铜时代和引入牲畜牵引犁耕之后农业生产的分化。和西方一样，中国以“贡赋模式”经历了盖茨（Gates，1989）所说的“小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产生，尽管政府试图抵制“贡赋模式”的侵蚀。但是，国家借此获得钱财，例如1581年“一条鞭法”税收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可以用钱而不是实物缴税。

这种状况如何影响思想史，尤其是科学史？回想一下，西方“跨越”这一概念不仅和“现代科学的突起”有关，还和“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产生有关。但是，这一“跨越”不完全局限于西方。在中国，李约瑟提到了17世纪中期东西方天文学的“交叉”。[②] 实际上，他在《店员和工匠》[③] 一卷中的图表体现了西方赶上东方科学成就的时间（“横坐标的时间点”）和交叉的时间点。

就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来说，西方在17世纪后来居上，随后30年东西方交汇在一起。这表明人们几乎不需要探寻未能发展现代科学的深层次因果关系，只是一些比较偶然的因素。我也顺带提一下所谓的科学“内在”模式的特征，但不一定只限于这些发展。在“内化的”和“社会的”解释之间没有完全的对立。[④]

---

① Brook and Blue，1999：153.
② Needham，2004：28.
③ Needham，1970.
④ Needham，200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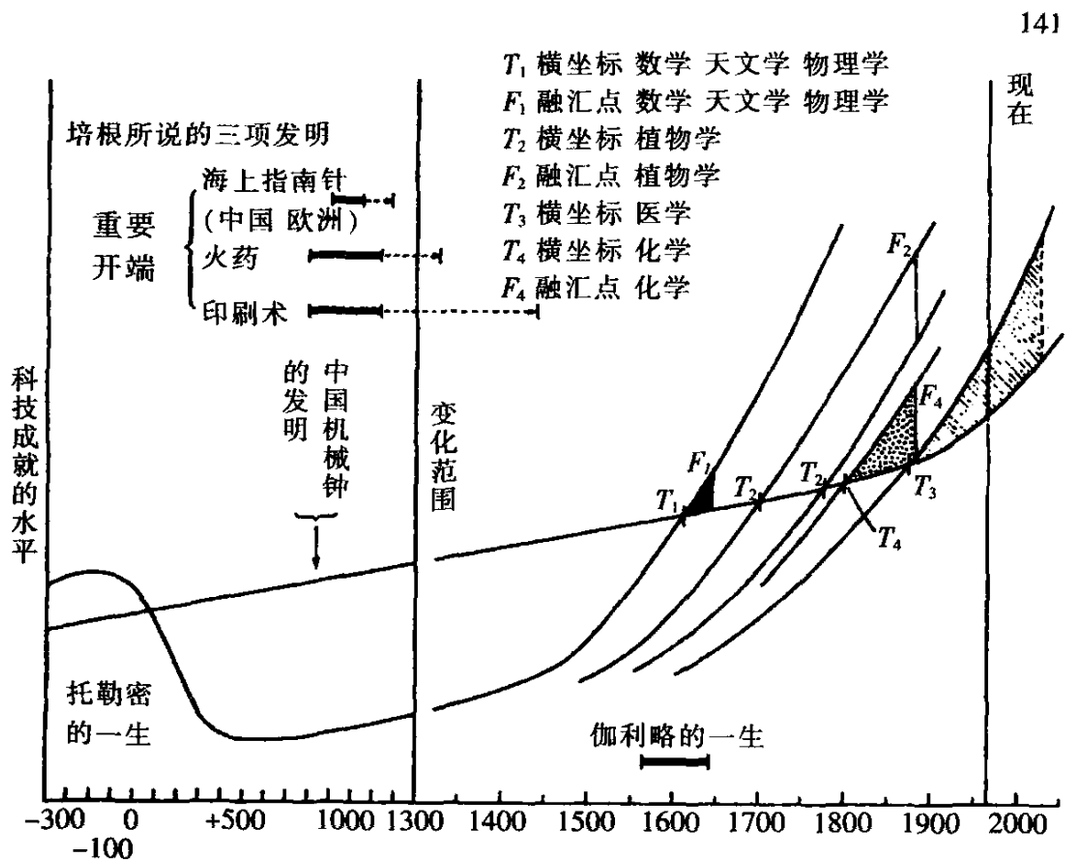


图5.1　此图表明中国和西方科学的横向时间和交汇时段
资料来源：摘自李约瑟（1970），《店员和工匠》，图99

经济和法律

李约瑟认为抑制内部商业的一个政治因素是缺乏“法律和秩序”。他提出，道路上盘踞着强盗，城市中有很多半雇佣状态的游民，治安的力量非常薄弱。但这种情形和18世纪英国的路匪、城市贫民、当地治安人员和“高地部落”的械斗有什么不同呢？但是，英国成功管理着国内贸易，发展工厂制度。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法律和秩序”并不是一些分析所假设的西方特权。所有社会都会制裁暴力，都能管理商业，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李约瑟还提到中国的商业承诺受到伦理准则的称赞，“而不

141 是靠法律强制实施”。[①] 但裁定双方的“君子协定”在商业圈中仍很普遍，显然，李约瑟所指的诉诸法律厅堂，不是管理商业事务的唯一手段，尤其对于不同司法权限之间的长途贸易。但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当资本主义完全获胜时，诉诸法律也的确是事实。在一些领域中，人们也能发现“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商业主义”，因而，它的缺乏几乎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起飞”而中国没有的原因。李约瑟再次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思考，探求长期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差异，总体上这些差异似乎没什么关联。

李约瑟认为中国商业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没能发展出一套信用体制，[②] 这意味着商业不能扩张，商人、资本主义，还有“现代”科学都难以发展。他提到，与“现代货币体系”相比，“中国货币经济欠发达”。[③] 所以，个人不能“超越他的范围扩大商业运作”。[④] 这一看法完全不属实。即使在单纯的口头文化中，人们也能找到信用的标准。[⑤] 而在文字文化中，比如在中国，这一进程延伸颇广，实际上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其他地方，信用的扩展是读写的早期用途。李约瑟的命题遭到以埃尔文为代表更普遍的经济史家的否定，确实和欧美金银的巨额流出不符。他提到，现在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史家愿意看到宋代已有“广泛铸币”的现象。李约瑟确实承认在后来出现了货币和信用改革，但它没有通过任何机构变迁延续下来。他还提到有账房先生做助手的商人，这体现了行会和商业活

① Needham，2004：60.
② Needham，2004：55.
③ Needham，2004：55.
④ Needham，2004：58.
⑤ Goody，1986：82ff.

动的可观水平，但对于一些学者，主要是中国学者，把“汉代实业家”看作“中国欠缺的资本主义企业主”，[①] 主张在明代“资本主义处于萌芽”之中，宋代经历了一场“复兴”和“商业革命”，他对此持批判态度。所有这些都“夭折”了，因为“农业社会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制度上的矛盾”。[②] 但它们的夭折只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的，这是旧马克思（尽管是基督教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思想认为中国缺乏资产阶级，因而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③]

在人们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前，中国经济不能在独立商业活动中获得发展这种认识是很奇怪。埃尔文在导言评论中毫不客 142
气地批评了这一点，他写道，“把一个声名赫赫的阶级国家的命题撇在一边，这个国家在第一个千年一直走在前列，后来却鲜有成就”，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很多变化。他批判李约瑟“官僚制封建主义”的概念[④]，因为两千多年的变化太长，不允许人们贴上任何一个单一的标签从而与“所有阶段相匹配”。[⑤] 这一用法是李约瑟强调“连续性”、“整体论”这些几乎是“中国精神”的内在（他用的词是“本质”）特征，而“生物化”中国历史的某些倾向。李约瑟往往赞许地把中国精神看成“宗教融合”的产物，因为中国不是由单一的宗教形态支配的。“从宋到清，中国有大量的私人采矿。在宋代，个人的信用方式和清代一样广泛，宋代也经历了像‘钱

① Needham，2004：57.
② Needham，2004：57–58.
③ Needham，2004：52.
④ 最早将“官僚制封建主义”运用到中国语境下的文章，参阅Brook and Blue（1999：138）。社会史争论（1928—1937）的普遍结果是中国的帝国政权是“封建”性质，虽然有些人更愿意用“专制”一词。
⑤ Needham，2004：xxx.

庄’一样的私人金融机构的兴起。在清代，长途资金周转最先由山西票号运作起来，这些票号虽然要依仗官府，但运作上都是个人的。”[①] 埃尔文的论述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信用和商业运作的图景，而不是像李约瑟解释的那样，这种景象在东亚其他地区更有秩序[②]，更接近欧洲，并再次斩断了欧洲早期优势设想的根源。李约瑟不得不谈到的中国古代科学和他对经济的看法，两者之间明显矛盾的要害也被埃尔文的评论击中：似乎李约瑟个人并不满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构想，这一构想也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牢固的、欧洲中心论的程式，由此得出结论是欧洲资本主义之前没有资产阶级。

“这些发展限于欧洲”这一观念得到李约瑟的坚定拥护。[③] 他沿袭了沃勒斯坦的思想[④]，当然还有马克思和其他一些19世纪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欧洲独有的，产生于欧洲社会（封建诸侯、教会等）早期瓦解时期的资产阶级也是独特的。“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也带上了现代科学的手套。”不过所有这些问题诸如城市住户和资产阶级之间假定的界限等等都涉及唯名论
143 问题。

沃勒斯坦认为这些“结构”是“资本主义/现代”历史体系、私有财产权、商品化和“现代”君主国家的特征。所有权绝不是现代西方世界独有的。自我们有文字起，我们就有土地买卖的契约，尽管这些契约都隶属沃勒斯坦所意识到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征用权”。在古代社会中的确存在大量财产权，并由亲戚，偶尔还有邻

① Needham，2004：xxix.
② Goody，1996a：82ff.
③ Needham，2004：209.
④ Wallerstein，1992.

里分享，但是个人的财产权也会受到极力保护，甚至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中也有商品化现象，虽然土地在通常情况下不是流通物。[①] 这些社会中，土地的商品化非常少见，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制度上，“现代”西方远不是独特的，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在最近的时期内取得了如此独特的“资本主义”成就。

沃勒斯坦放弃了从文明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的起因（与“推测的”解释不同）——它们和马克思、韦伯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出人意料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利润的不懈追求”，这仅仅发生在西欧，在16世纪非常显著。但很难衡量什么才是对利润的不懈追求。的确，利润是早期商业活动的特征。沃勒斯坦所说的无止尽的追逐似乎和技术发明有关，尤其和工业化、机械化进程有关。的确，这个节奏不断加快，但资产阶级一直致力于追求利润，这似乎是他们的本质，并逐渐接管了整个经济，这些沃勒斯坦在对地主角色的变化讨论中可能一笔带过了，他透彻分析了发生于西欧随后是其他地方的变化。但历史不需要以这种概念化术语来书写。

在我自己的用法中，资产阶级是国际化的。当然，他们在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有权力。但是，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和金融手段，沿着丝绸之路、海岸和陆地的广泛的货物交换和思想交流是不可能发生的，律师、银行家、会计也不会出现，更别提学校和医院了。正是沿着这些商路，各种宗教——它们通过组织事务和朝圣也在经济中占一席之地——传到了东方，主要不是通过贵族、征服 144

① Goody，1962：335.

者，也不是通过官僚，而是通过商人，他们见证了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西海岸和中国的登陆。这些人也参与通常是双方互惠的商业活动，并导致印度商业团体的创建，还有中国的商队。这些商团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他们促进了文学形式如现实主义小说的成长，刺激了表演艺术如戏剧以及风俗画和雕塑的发展，还打破了单一的宗教界限，培养了美食和鲜花文化，就像和其他艺术一样，他们逐渐从贵族手中接管过来。在贸易和其他活动中，商人是东西方知识传播的重要人物。

就农业经济而言，李约瑟认为中国技术太成功了，以致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因为它导致了大量劳动力的增长，这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机械化的动机，如果缺少劳力，机械化则可能会发生。这一论点和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种描述奴隶劳动的观点相似，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把中国农业领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技术进步，而若没有现代科学的出现，技术进步是不可想像的。[①] 在农业和城市中没有资本主义，现代科学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绕了一个大圈。但是，中国农业不仅一直成功地养活了大量人口，而且它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南方的水稻种植需要完全不同的密集型技术，而不是欧洲北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那么，除了新的种植方式——它延续了旧方式之外，是不是真正需要“技术”的改进呢？由于很少使用非人力的动力，中国农业可能被看作生态型农业而领先于欧洲广泛的混合生产模式。

13—14世纪，水力不仅用于农业，还广泛用于丝织业，“与18

① Needham，2004：62.

世纪欧洲发生的事情相比仍然构成一种挑战”。[①]“正是那些同样的纺纱捻线机促进了后来意大利丝织业”。为什么工厂生产“没有迅速跟上”？李约瑟问道。他把这一“失败”归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我们说的“货币经济的限制”和官僚制国家。这些几乎都不是 145
充分的解释；前者看似不那么“落后”，后者此前也提倡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需要详细分析李约瑟“现代科学”的概念，因为它才是这些矛盾的关键所在。

“现代科学”和知识体系的内在特征

选择西方作为“现代科学”发源地时，李约瑟导向了一种模糊的欧洲中心论立场。西方“自发地”发展了现代科学，而中国只能通过效仿才能想像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先考察一下李约瑟挑出的体现“现代科学”主要特征的两块奠基石：数学和试验。只是，当“现代科学”的大量计算原理来自亚洲的空间体系，“试验”的理念可能更适合已有的技术成就，所谓的“现代科学”能否被认为完全是西方的发展呢？

除了经济和政治环境，李约瑟还提到知识体系内部的影响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一个领域的渐变会导致不同思想领域产生有利条件，以彻底检验当前的实践和模式。李约瑟讨论了基督教——据说，它所提倡的自然态度和其他宗教完全不同；讨论了教育——它得到迅速发展，有利于知识的广泛传播；讨论了印刷术和入门手册的产生，这些使得信息和思想更加广泛实用。

---

① Needham，2004：60.

宗教是因素之一，被李约瑟用来解释比较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时他所认为的“质的飞跃”的明显矛盾。李约瑟追随罗斯扎克(Roszak)等学者，认为西方能够采取“科学”的立场，这与希伯来一神论“激进的偏执”有关，还与它的分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关，两者有利于“祛除隐念在混乱的思想形态中自然的神圣化形象”。在李约瑟看来，被有些人看作基督教和“异教”[①]斗争的结果，并得到希腊早期原子论修补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据
146 称，自然的具体化激发了“现代科学”以客观为基础的方法论特征，而不是非欧洲文化中笼统的、日常经验的结合。但同样不是西方独有的。印度不仅“提出了原子猜想”，还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传统。[②]孔子对超自然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怀疑论精神。

所有成文的宗教最初都要面对相同的问题，抵抗基督教所对抗的异教的当地“万物有灵论”，如基督教抵制异教，但这种对抗从来都不是完全彻底的抵制。这一论点比较含糊，但这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反对偶像崇拜解释为自然事件（照理应净化了思想环境），此态度仅限于近东的各种信仰；它也是早期佛教的特征，实际上也是柏拉图主义和其他思想体系的特征。的确，我认为这是人类的普遍倾向。[③]为了解释“现代科学”，李约瑟再次关注西方。只是，其他的可能性也需要探究。

在埃尔文的引言中，“现代科学”和早期科学概念二元区分的整个方式都出现了问题。他写道：“大约17世纪，中国拥有所有的思想类型，其程度不同，（科学史家）克罗姆比（Crombie）认定

① Needham，2004：93. 引自帕里斯（Pallis）和林恩·怀特。
② Goody，1998：211.
③ Goody，1997.

这些最终是主要的科学元素……具有或然性的明显例外特征，但这些在当时的欧洲几乎还不存在。”[①] “17世纪后的欧洲革命——**假设有一场革命**（我做了特别标示），随着这些思想类型的发展和相互联结大大**加速**，而不是根本性的质的改革——可能性被排除了。”这与李约瑟的立场完全不同，明显扫除了西方“质的飞跃”观点（至少有科学思想层面上的）的疑问，还有关于资产阶级、宗教、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方面的解释疑问。近来很多学者也质疑现代科学或技术的独特性。[②] 有人指出，此前欧洲在这一领域是落后的，如此一来，重要的变化就不能用以解释西欧与科学知识传统的亲缘关系。当然，种族主义者或文化解释是必须抛弃的。

埃尔文一方面试图为科学和技术差别定性，另一方面也想定性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的差异，以便修正很多科学史家所用的术语。他批评那些有“些许婆罗门高傲姿态”的学者，这些人认为高级科 147
学的努力方向是使司空见惯但却复杂的现象比如运动的水赋予意义。埃尔文也怀疑很多科学史家区分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这一区分是李约瑟“现代科学”概念的内在本质，很多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论点便取决于此。

“李约瑟难题”

尽管如此，李约瑟仍然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知识的星火在欧洲点燃。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有人提出，随着伊斯兰世界的实践，在欧洲像罗吉尔·培根（Roger Ba-

① Needham，2004：xxviii.
② Wallerstein，1999：20.

con）这样的导师开始系统地探索自然世界的性质（和我们在前一小节提到的背景相反），尽管埃尔文指出，中国的炼金术士中间也找得到类似的思想运动。一如我们所见，还有人认为，随着印刷术的产生，入门手册的印刷又促进了这些研究，不过印刷术早就在中国出现了。

我们从欧洲的情形中能看到怎样的差别呢？随着知识的积累，欧洲已经远远落后，就像我们在李约瑟《中国科技文明史》[①]最后归纳的著名的摘要性图表中所看到的那样（见表5.1）。

当欧洲在中世纪前期和它的东方邻居断绝了大部分联系时，它只好枕在自身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上昏睡。随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和伊斯兰欧洲、伊斯兰近东的商业联系扩大之后，欧洲深刻意识到自己在商业、知识和发明方面的落后。商业重新拾起，知识从国外流入，东方包括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信息和发明也涌了进来，依旧是通过商人的来往，从延伸到亚洲的穆斯林社会的大商队那里传来。知识的恢复速度惊人，并仰赖商业这个特殊领域。这一速度的确有助于“后来者居上”。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与东方的差距便被越过。

另一些因素也被认为是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知识迅速恢复的原因，即大学和中学教育的扩大。印刷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
148 育，使得欧洲具备了迅速而广泛散播文本和图表的能力。[②]但我们在第八章将会看到这一特点并非欧洲独有。埃尔文提到一些历史学家将12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生看作有关“现代科学”起源这一不可思议的变化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发现“中国也有类似于大学的

① Ong，1974.

② Needham，（2004：xx）见图2。

表5.1　中国机械和其他技术向西方的传播

	西方滞后于中国的大致时间（世纪）
1. 用木榫连接的木制水车，浮筒轮	15
2. 轮碾机	13
使用水力的轮碾机	9
3. 冶金鼓风机，水力	11
4. 旋转吹风和去壳机	14
5. 活塞风箱	c.14
6. 纺纱机	4
7. 抽丝机械（飞鸟形式，把线平均地绕在轮轴上，大约出现在11世纪；水力用于纺纱机，大约在14世纪）	3–13
8. 独轮手推车	9–10
9. 帆船	11
10. 龙舟	12
11. 提高食草动物的挽具：胸带（位置）挽具	8
颈圈挽具	6
12. 弩（作为个人武器）	13
13. 风筝	c.12
14. 飞行陀螺（由线纺成）	14
圆筒机（借助上升的热空气流起作用）	c.12
15. 深度钻井	11
16. 铸铁	10–12
17. “带轴的”悬摆	8–9
18. 辅助性拱桥	7
19. 铁链悬索桥	10–13
20. 水道闸门	7–17
21. 船舶建造原理	>10
22. 船尾方向舵	c.4
23. 火药	5–6
火药作为战争技术使用	4
24. 磁铁罗盘（司南）	11
指南针	4
指南针用于航海	2
25. 纸	10
印刷术（印版）	6
印刷术（活字模型）	4
印刷术（金属活字模型）	1
26. 烧瓷	11–13

资料来源：Needham（2004：214）

机构”[①]，最为著名的要数宋代官方管理的“大学”。学校开设数学、医学，设置各种考试。另外，更为广泛的“学术机构”也提供指导、讨论和训练。

埃尔文还考察了可能包含的两种因素：首先是自然，它是人类解读奥秘的知识库，这种观念可能源自于我们看到的一项伊斯兰传统，而以13世纪罗吉尔·培根的名言最为有名；其次，知识通俗化所带来的“大量入门手册”，这显然和印刷术的出现有关。尽管如此，埃尔文仍然抛弃了这一看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炼金术大体上类似于第一类（研究传统），与第二类（通俗化）部分类似的是中国在农业和技工入门手册的长期传统（虽然对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来说不太实用）。比如，忽必烈（Kabla Khan）下令编撰《农业和养蚕的基本原理》，1315年的版本就印刷了一万册。[②] 所以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一背景。

这种情况强调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没有理论上设想的那么复杂。看起来似乎是这样，欧洲仅仅需要一个火花点燃思想活动的导火线，这个火花可能由伽利略点燃（埃尔文如此暗示）。这一巨大的进步或许是沉睡者醒来的部分结果；西方科学的落后——它允许发展的自由——在我看来主要受到基督教会及其世界观的制约，通过文艺复兴的逆流、希腊罗马模式的回返得到解放，至少是部分解放了，希腊罗马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被世界宗教所主宰。主要知识领域的世俗化，得益于欧洲印刷术的出现、宗教改革的怀疑精神、中学、大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它还有助于商业发展和海外冒险这些变化，以及提倡研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

---

① Elvin，2004：xxvii.

② Needham，2004：50.

但是，即便这些事件促成了欧洲思想领域的根本变化，这也只能看作是欧洲的觉醒，只是超过远东同伴的暂时领先。当然，科学 150
并不是到文艺复兴的欧洲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在其他地方早已存在。李约瑟在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科学和技术之间划出的区分（我们已提到，这在埃尔文和其他人中间引起争议），产生了一种惯性，认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发展是成就的巅峰，并探寻这种优势的合理性，要不然这种优势就可能被视为主观独断。如此出现的李约瑟难题并不存在。问题应该是这样，就现代科学而言，欧洲的领先地位是否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李约瑟告诉我们，欧洲科学没有出现在科学沙漠中，而据他的估计，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完整的知识体系都被欧洲赶上——尽管只是在漫长的消极状态之后。可欧洲的领先地位是否牢不可破仍然是个问题。

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的确充分运用了科学，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需要一种不那么概念化的解释，而不是我们本章评论的这种方式。在埃尔文看来，“李约瑟难题”甚至到现代都还没有解决。他在总结论述时提出，我们可以研究比李约瑟挑选的更特殊的变量。埃尔文坚持，变量以一种不同于李约瑟对社会因素分析的方式“消解”了。比如就大学而言，埃尔文提出，维持欧洲优势这一论点所需要的是对这些机构更特殊的分析。导致科学迅速发展的哪些欧洲机构才是特殊的呢？埃尔文问道。他主张需要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一些被看作科学理念的可能性概念，而这些理念中国直到17世纪都没有正式发展出来。尽管如此，虽然没有确定这种命题的一般性原则，但关于可能性非常重要、非常实际的一门学问却体现在大众游戏的运用中，一些来自西方比如国际象棋，另一些来自东方比如多米诺骨牌。这种具体学问可能很难形成一种普遍的理论，因为它是

赌徒的职业秘诀。没人会泄露自己赖于生存的秘诀。但赌徒也有一些原理，可能会产生“可能性的基础微积分学”。因为这些图形从未公开发表，“所以，通常和公共实用性相联的法典文字化、普遍化和进步从未发生”。[①] 这种情形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样本：似乎文
151 字表述应该非常清楚，因而，科学原理更加“理论化”，其发展主要取决于交流方式的进展。

这一网状框架的观念似乎比概念化区分更为合理；概念化区分往往以一点来确认每种传统。我们进而找到的是一个时段、一种传统、各种特征的集合，随着年代的变化，更多和“科学”“无关的”活动对“技术”更直接实用，但在总体上它们彼此是互无区分的，也不是单一地与这个大陆而不与那个大陆有关联。

不承认多元性和矛盾性的双元概念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一段推测性话语中，李约瑟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现代科学”提出的伦理困境，因为两千年来，中国有“一种强大的伦理体系，它从不由超自然统治支撑”。[②] 这里他提到儒家思想。但中国的信仰体系也包含佛教思想、祖先崇拜和地方神灵。[③] 中国所缺乏的（如我们所见，这对知识非常重要）是凌驾其上的单一的宗教意识形态，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多元性的确打开了广泛探索“自然”的通道。但事实上有大量“超自然力量”和“超自然统治”。李约瑟强调儒家思想，不过这种做法往往强调完整社会信仰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并将其与人们试图解释的其他方面的文化联系起来，就像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方式的做法一样。忽视任

① Elvin，2004：xxxiv.
② Needham，2004：84.
③ 李约瑟曾认为道教是中国科学史的主角，但这种观点现在不再流行。

何时期信仰体系中的多样性和矛盾性都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所产生的是一部不能令人满意的历史。

此前我提到的概念特征用法的相关问题是将这种特征看作更持久而不是更合理的倾向（仅仅是一种倾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李约瑟避免诉诸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种族主义”倾向；但他的历史观往往受到文化趋势遗传倾向的影响。因而，他提到犹太人“很多高贵的种族**特质**”。[①] 另外他还提到中国人的“禀赋”。[②] 这些用法可能很形象，但它们几乎都体现出文化连续性的生物观，这种观念需要谨慎对待，需要更多修正。这里我的评价和埃尔文的观点一 152
致，李约瑟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随着时间一成不变，这完全是反历史的观点；他对空间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他总是倾向连续性。网状框架又成为发生于历史进程的动荡不定、变动不居、古代模式回光返照等更好的向导。[③]

在对中国未来的预言中，李约瑟的社会史问题体现得非常清楚。中国没有复制西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适合中国历史”。[④] 我们并不清楚他如何解释中国现在的调整，但很多人已不再认为这些调整是“社会主义”。[⑤] 无论如何，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例子似乎不能见证李约瑟提到的那种不适合。而李约瑟的范畴对现在和过去来说都过于宽泛。

除了对文化或历史连续性的强调之外，李约瑟试图解释他所认

---

① Needham，2004：85，我已特别标示。

② Needham，2004：69.

③ 参阅李约瑟对“重现”的否定。Needham，2004：51.

④ Needham，2004：65.

⑤ Brook and Blue（1999：155ff），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

为的西方现代科学的“独特”发展，还有其他问题，而这些和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一脉相承。我坚信，这些都不会贬低李约瑟理解中国成就时体现的巨大进步。不过，在此我们需要指出，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论述，韦伯对中世纪城镇特征的讨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更别说韦伯对审美意义上的新教伦理特性的看法了。所有的解释都会面临对文艺复兴后欧洲不合理的强调，虽然欧洲经历了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领域惊人的发展，只是，当与其他形态相比，这些被看作“现代”而不被考察时，“李约瑟难题”便以一种概念化、本质主义的方式而无法解释东方后来的经济、政治和科技成就的进步。这些进步需要以不同形式、历史—文化的长远视角解释。如果将当代欧洲或欧洲科学作为出发点或参照点，那么，任何其他事情都可能偏离常态，像缺少什么似的。这是当代欧洲历史学家回顾历史或审视其他地区时的一个普遍问题。差异表现出某种消极的评价，因为近代欧洲科学成为标准，其他事物被认为都有
153 欠缺，这种就失败需要给予解释。

第六章

“文明”的盗窃：埃利亚斯与绝对主义欧洲

大部分世界历史都是按照个别或多种文明以及后青铜时代较大的社会单位来写的，往往在整体上被理解为塞缪尔·亨廷顿所讨论的文化冲突。[①] 从种族中心论的立场来看，这一斗争总是西方胜出。一些有预见性的学者确实意识到，如果这个世界应该看作相互影响的世界，那么，这种胜利可能就是暂时的，有些学者甚至可能认为此前几个世纪的各自成就比往常设想的不相上下。比较夸张的种族中心论观点不仅将当代或近代的优势视为事实上一贯的优势，而且，只是根据欧洲社会的演进过程来解释至少从16世纪起以及更早时候的优势。这种方法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例子便是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研究。[②] 书中，作者解释这一进程的意图显然受到他对人类文化研究方式局限的限制。

“文明”一词的用法很多，与“野蛮”形成对比是其最广泛的用法，这两个概念在希腊世界有专门的形态，是希腊对其南北方以及东方邻居的看法。“野蛮”一词来源于一种鄙视他者、完全种族中心论的概念，但它同时也有比较固定的理论，因为城市公民用

① Huntington，1996.
② Alias，1994.

“野蛮”来描述城墙外那些比较粗野的行为。最终这对词语被西方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采用，但不涉及任何道德评价的因素，文明指涉“城市文化”、文明，以犁耕农业、手工生产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以及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文字的使用等[①]；而“野蛮”指那些从事锄耕农业活动的比较简单的社会。

但在平常的言语中，种族中心主义的、带有评价色彩的用法仍继续存在。在殖民时期，人们不断从欧洲人嘴巴中听到“野蛮人”
154 一词，以指那些和他们产生联系的其他文化的人们和“风俗”。今天，人们听到这个词以同样频率、一贯贬损的语调特指那些其他地方来的移民，或是那些不依从常规原则的活跃的抵制者。而与之对等的、“文明化了”的人物，在埃利亚斯备受赞誉的著作中基本出现在欧洲语境下。

在本章我的目的是，首先用平安时期的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文化的相关可用材料来质疑埃利亚斯将文明局限在单纯欧洲背景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欧洲对“文明的盗窃”。其次，我想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②]中的构想与他在加纳的经历进行比较——埃利亚斯在那里任教到终老，并阐释了他对人类学家提到的“其他文化”(尤其是那些“未开化”民族和“野蛮人”)比较普遍的态度，表现出这种研究方式孤芳自赏的特点。[③]再次，一些方法论思考似乎适于说明埃利亚斯使用的数据和他的解释性结论之间的差距。有人认

① Childe，1942.

② Alias，1994a/1939.

③ 本章最初以民族志学的评论写成，论述我与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加纳的会见，以回应他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加纳的访谈录。我不得不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扩展这一问题，这一方法是他在加纳逗留期间提出的，并从他对“文明进程”的宽泛主题来思考这一经历。对比埃利亚斯和20世纪其他主要社会理论家的理论立场，我不得不扩展成后面这些评论。

为埃利亚斯的观点过时了，不过在法国仍有重要的追随者，如著名历史学家罗吉尔·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著作那样，还有荷兰、德国以及英国的一些社会学家。这些有趣的追随团体在英国出版了一本杂志——《构型》。埃利亚斯的著作不断再版，尖锐地提出了比较文明研究的问题。

埃利亚斯的事业以康德的宣言为出发点。康德说：“我们是文明的国度，在这里，我们负载着过多的社会礼节与优雅风尚。”[①] 这里的“我们”指欧洲。埃利亚斯的真正研究肇始于对“‘文明’和‘文化’概念‘社会生成’”的讨论，具体说是德国广大民众“文明”的观念如何发展成准分析性的术语。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是开化的，而他人则是野蛮人，或异教徒（乡野村夫），或者是我们中间流离的下层阶级。他认为“文明”（在一般功能和普遍性质上）表达了“西方的自我意识”，概括了西方自认为优于其他社会的所有一切，体现了与现代化有关的特殊特征。（“现代化”是我 155
的用语，埃利亚斯指的是“西方的进程”[②]）埃利亚斯以“进程”概念批判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③]，但在这里，他认为自己的用法是合适的，因为人们都用这个词语。埃利亚斯的术语使用显然要归因于他著作中的欧洲中心论，毕竟讲话者都是欧洲人。因此，这一使用逐渐合理化，这就像谈及文艺复兴时期或此前我们自身的特殊成就时，人文主义在一些领域的合理化方式一样。

埃利亚斯“历史化”文明和文化的尝试很有意思，因为，相对科学概念来说，他对这些词语使用的理解往往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纠

① Kant，1784；Elias，1994a/1939：7.
② Elias，1994a/1939：4.
③ Elias，1994a/1939：193.

缠在一起。这些考虑大大复杂化了这些词语的分析性用法，进而导致他采取的立场单纯以西方社会历史背景为基础。文明是西方认为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与此相关的各种观念。然而，其他复杂社会对于与他们有关的成就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此而言，埃利亚斯的用法与历史学家对古代社会采取的用法完全不同。古代社会中，文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公民”一词相联（而不是和“教养”），指的是城市文化这一青铜时代城市革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完全不同的、带评估色彩的参考框架来理解埃利亚斯的意图。

埃利亚斯的观点提到行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模式的产生。第一种情形下，他提到“社会生成”，第二种则提到“心理生成”。他认为，中世纪以后，行为日益从社会角度加以批判，导致了羞耻和荣耀情感的社会生成，更普遍地说，是文明行为的社会生成。这一行为及时地内化，文明的机制从外部的威压转化为内在的批判，羞耻变为“罪恶”（这种观点和弗洛伊德有关）。从“自然民族”到文明的整个进程只有一次在历史上完成了，这就是现代欧洲。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些进步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向绝对主义国家的转变。社会组织更加阶级化和复杂，更加约束人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又及时地内化了。

在进一步分析他的观点之前，埃利亚斯试图展现他的理论和方法论兴趣。他非常关注其同时代的社会学趋势的主要形式——埃利亚斯主要提到帕森斯——已经流为“国家”社会学（静态的），而不考虑长期的社会变化问题，和“各种社会构型发展的社会生成”
156 问题。[①] 埃利亚斯的重要成就是保持了历史社会学的鲜活传统。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等辈都抛弃了这一传统，但马克思的著作，以

① Elias，1994a/1939：190.

及最重要的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都有这一传统的典范。①

我不认为比较法是历史学、人类学或社会科学可采取的唯一策略。显然，对那些想研究努尔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宽泛框架，或中世纪的波斯尼亚（Bosnia），甚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行为模式的人来说还有空间；对于既不透彻研究也不系统比较但涉及人类故事的一般思考的研究模式来说，也还有空间。我本人更愿意在一个独立的名称下看待上述方法，比如哈贝马斯运用的“哲学人类学”在这里就是一种可能。但如果人们想对确定的社会形态（已定义了的）之间的差异说点什么，或者甚至暗示这一普遍差异的存在，那的确没有比系统比较更好的选择了。彭慕兰近期在一本书中承认，很多经典的社会理论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不过他指出：

> 这一选择得到当前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支持，他们摒弃了整体的跨文化比较，几乎排外地只关注偶然性研究，特别是历史时间的未知性方面——这就有可能研究很多历史（和当代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种做法把比较的双方看作对立双方，而不是把其中一方看作标准，取代了对峙的、带有偏见的比较，并试图得出一个更好的结论，看起来这种方法很可取。②

---

① 埃利亚斯和韦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一起工作，并加入海德堡玛丽安·韦伯的圈子，成为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助手，后来他们又在伦敦重逢。埃利亚斯用这一方法研究“礼仪”这一令人着迷的主题。我们看到，随着时间过去，他也完全沉迷于这一发展的研究。这是事实，但帕森斯看到社会行为的共时分析的优势。实际上，孔德、斯宾塞、马克思和霍布豪斯的著作中的历时分析，也被埃利亚斯自己打发走了，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有一些论证基础，部分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他设想发展总是朝着更好方向、进步方向运动。

② Pomeranz，2000：8.

这应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重要目标，也是促使我们研究韦伯和埃利亚斯著作的目的。

尽管埃利亚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影响了社会分析的发展，不过一直是在欧洲语境中。举个例子，孟奈尔（Mennell）对法国和英国食物发展的有趣研究，其内容是历史的，但却从社会
157 学框架加以研究。框架研究的一个方面便是诺伯特·埃利亚斯“构型社会学”，这是他方法论的本质，但实际上非常含糊。

> “构型”一词用以表示人们被维系在一起的团体、国家和社会的模式——这些模式互相依赖，包括各种合作和冲突模式，它们几乎不是静止的或一成不变的。在发展的社会构型中，个人行为、文化趣味、思想观念、社会分层、政治权利和经济组织的模式以复杂的方式统统纠缠在一起，它们自身也随时间以各种需要研究的方式不断变化。研究的目的是提出构型如何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变化的“社会生成”解释……①

和孟奈尔一样，埃利亚斯也提出了一种关于欧洲的有趣的历史社会学。这必然包括要随时间变化而分析事件，而且变化和连续性也是埃利亚斯在介绍“构型”概念时试图加以论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或人类学概念虽然还未完全做到，但“构型”一词事实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少。而且，埃利亚斯的著作一直都有个问题：构型和文明一样几乎没有比较的基础。孟奈尔提到埃利亚斯的观

① Mennell，1985：15–16.

点时说[①]：“文化和行为对照的缩影和相互混合的特点搅和在一起，成为西方社会的众多特性之一，而这些特征最初却是来自各不同的社会阶层。”[②]我非常怀疑这一特征是否只有西方才有，不过确实也提不出什么证据。[③]我们所提出的任何理解，或者埃利亚斯的早期著作，又或是他在人类社会范畴内论述加纳时将行为或构型看成整体，这些都没有证据。人们没有这种理解也的确能做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但却严重限制了对“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普遍特征的分析。

客观地讲，埃利亚斯觉得我们应该抛弃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尽量善用事实性根据。但他研究的问题使事实性的根据受到限制——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进程”在何种程度上是文明、中央集 158
权和礼仪发展中的内在化约束等概念的本质并不清楚。埃利亚斯“进程”和“过程”的概念特征，以及和这两个词语相关的“演变”和“发展”的概念特征，都是值得讨论的。在埃利亚斯的大作中，他的确也讨论了随时间发生的社会和人格两者的纵向变化。

除了“当今一些较发达的社会”之外，埃利亚斯还抽出少量笔墨关注了“人类情感的结构和控制”。他赞同需要借鉴其他社会的

---

① Elias，1994a/1939：ii，252–6.

② Mennell，1985：331.

③ 对埃利亚斯更深刻的批评来自汉斯–彼得·丢勒（Hans-Peter Duerr），也是对孟奈尔和古德斯布洛姆（Goudsblom，1977）的精辟回答。我试图从思想和经验上表现埃利亚斯对东方和他者的关注基本上是失败的。正如我试图指出的那样，埃利亚斯书中的开放性评论和他的非洲经历，都是从韦伯的观点出发的。他从未成功超越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孟奈尔和古德斯布洛姆后来的评论都修正了埃利亚斯的观点：孟奈尔强调去文明的辅助性进程；古德斯布洛姆收回了“文明”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是16世纪和“国家形成”，甚至是青铜时代和它的城邦，还有人类对火的发明——有人认为这是文化本身的开始。第一种修正注意到纳粹经历，第二种注意到对加纳和“自然民族”的排斥。这两种修正正好契合了我的批评和论述，我相信，它与埃利亚斯观点的主要方向不同。

经验，不过，他认为自己在处理社会政治层面（“国家控制”）的区分和情感控制的长期变化关系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者体现“羞耻和革命开始时前进形态中”的经验。“前进”的概念非常关键。尽管埃利亚斯希望以更具经验色彩的基本模式形象地取代了主导性的社会学发展理论，但他没用“19世纪意义上”的“演进”概念或20世纪不确定的“社会变化”概念。[①] 他还探讨了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即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形式的发展，它伴随着先进文明的辅助性发展；任何其他事情都是**自然民族**的产物。他宣称自己是建立在“普通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非教条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之上”。[②] 人们或许期望一个一般化的**自然民族**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例特例。但是，埃利亚斯接着说，随着代际更替，社会变化（“结构的”变化）应被看作朝着“多多少少复杂些的”运动方向。[③] 由于这一理论的泛化特征，因而，讨论它对其他语境的适应性并不容易。同时，埃利亚斯将国家形态和文明限于欧洲的近代时期，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单纯只关注欧洲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其他德国学者［比如人类学家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在广泛的语境中探讨了国家形成。

文明的进程

埃利亚斯在他的大作中以这句话开始序论：“这一研究的核心
159 问题是那些被当作西方文明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他的命题是：

① Elias，1994a/1939：184.
② Elias，1994a/1939：184.
③ Elias，1994a/1939：184.

“中世纪封建”时期，欧洲是未开化的。西方的“文明化”是后来逐渐完成的。中世纪之后行为和“情感生活”如何变化？我们如何理解“文明化的具体过程”？埃利亚斯表明，在“羞耻和荣耀情感”上有一个转变，社会要求和法律禁止的准则也发生了变化。渗透在社会中的不满意的门槛渐渐移动，所以，出现了“社会生成的”恐慌问题，这是文明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社会规训的内化是其标志。埃利亚斯认为，有些民族与我们相比显得更幼稚，更不成熟，他们没有达到文明进程的相同阶段。但埃利亚斯并不主张“我们行为的文明模式是人类所有可能的行为模式中最先进的一种”——尽管“文明”的概念“体现了西方的自我意识”。[①] 他说，西方社会借助这个词尝试着形容自身的优越性。

埃利亚斯关注“这一概念：人们应该试着与其一致，体现对彼此的关心，因为个人不能总是只顾自己的情感”；这一概念产生于法国——尤其是宫廷文学中，也出现于英国。[②] 封建社会没有这些观念，中世纪之后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的宫廷生活产生了这些观点；它们“与社会地位有关，上流社会的生活引领欧洲各地相关的行为准则和模式。”换言之，文明的进程与欧洲的“现代化”有关。

从文艺复兴到当代，随着国家的兴起，身体的作用在言语和行为中越发隐蔽，刀叉等介质逐渐用于食物和嘴巴之间，行为、姿态和手势越发刻意的正式，文明进程的一部分是礼仪的发展。这一迹象来自行为手册（埃利亚斯认为应该比我们现在说的“礼仪手册”更为严肃），或来自法国的“处世之道手册”，还有其他文字或图片

① Elias，1994a/1939：3.
② Elias，1994a/1939：27.

的来源。但这些指导和行为都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以上流社会的原则为目标，甚至以教中间阶层上层社会应该做什么为目标。这些手册和很多讲烹饪和阶层行为方式的其他书籍一样，指导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自身，指导那些想成为某些人的人们，而不是已经是某些人的人们。同时，它们还将“下层”和一般意义上的“上层”区别开来，尤其是当这些群体或群体的成员正处于改变他们社会地
160 位的过程中时。

埃利亚斯解释中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行为的某些因素，比如餐叉的使用对欧洲来说显然是全新的，这些行为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对先前古典模式的重现。显然，这些模式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各种方式获得重生而不是新生（社会生成学）。[①]社会和各种欧洲文化一起经历再度开化的过程，不仅重新创造而且重新找到了罗马帝国瓦解之后那些再三被遗落的东西。“高低贵贱”之别当然不会在中世纪甚至此前消失，因为此前那段时期也经历了“宫廷礼仪”和骑士风范的发展。尽管如此，在中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很少强调古代社会就已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城市文化（“文明”），甚至贵族中间，一些优雅的礼仪也消失了。

埃利亚斯试图论述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生活。虽然他关注封建主义之后的社会政治变化，但他不像马克思和韦伯那样在其研究重心中突出“资本主义”或工业化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埃利亚斯否定马克思的著作是因为马克思和产业工人阶级站在一条线上及其对人类进步的信念；而韦伯的历史方法在建立理想模式时与埃利亚

① 埃利亚斯提到文明、制度（绝对主义），甚至社会生成法律的社会生成。他指的似乎是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源。

斯对进程而不是抽象概念、特征区别和独立组织的关注发生冲突。为了对比后来的“文明”，埃利亚斯的兴趣促使他回到中世纪欧洲，而对此前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则不太关心。他没有论及古代社会或东方的文明。

这一论题作为单向发展的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就已经出现。忽视古代和其他文化文明进程的一个结果，是它逐渐被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作为综合进程的一个部分，包括标志着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用韦伯或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说）以及知识体系的发展；埃利亚斯很少关注这些。他的论述还有另一个问题：埃利亚斯研究的手册所体现的约束和礼节，是所有主要阶级制度的特征。我的意思是，从主要制度来看，这些都和后青铜时代的文明有关，它们从东亚一直延伸到西欧。实际上，在这些地区之外还有非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地区。中国也是一样，其教育机构在那片广袤的 161
国土上传播着儒家礼节、仪式和思想。或许在这一范围之外也还有，因为在非洲“同等文化层次”但也阶层化了的国家中，这种特殊行为和团体（“阶级”）的联系不太多，而和个人的职位比如酋长有较大关系，它是埃利亚斯观察到的另一类约束的例子，和欧亚大陆阶级化社会的阶级定义没有关系。这一看法指出了埃利亚斯特殊发展观的弱点，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发展观，而是欧洲认为非洲模式发展过程相对较短的那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阶级分化的产生（尤其是文化地位）是一个特殊事件而不是循环的过程。

对欧洲的关注和对抽象概念的厌恶也将埃利亚斯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区别开来。[①] 马克思和韦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的确结合了

① Elias，1994a/1939：3.

亚洲史料，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是解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材料。他们以非常普通的方式了解到很少一点“其他（比较简单的）文化”。不过涂尔干做到了，他在考虑人类发展时进行了广泛彻底的研究。虽然埃利亚里斯经常讨论劳动分工，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位颇具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家主要的比较性著作，而只是从一个较为狭隘的视野研究近代早期的事件。考虑到他浓厚的心理学兴趣，埃利亚斯更应该这么做，他可能更应该关注劳动分工的内化问题，而涂尔干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题目下论述了这一问题。“有机团结”是指简单的、没有差异的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特征，而机械团结是复杂社会中群体和个人的结合方式。他在“道德密度”的标题下讨论了劳动分工，“道德密度”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这样的人类学家所用的概念。就埃利亚斯而言，对社会根源的浓厚兴趣一直和心理生成学[①]的兴趣是并列的，因为他断定内部和外部、社会和个体只是硬币的两面而已。

尽管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看，埃利亚斯缺乏长远的历史深度，但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他对社会生成的一贯强调，他的兴趣在于各种制度的生成过程，但20世纪人类学家的前文字文化研究表明，社会
162 生成的价值基本没有或者很小。对埃利亚斯来说，历史研究揭示的正是这个问题。心理生成由于论据的特征对研究来说必然更实际些，但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历史性的、比较的甚至理论性的基础，并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领域。

这也为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例子，即埃利亚斯接着考察的绝对主义[②]的社会生成，就像安德森在其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

① 例如本书第26页提到的。（为原书页数，见本书边码）
② Elias，1994a/1939：269.

提到的那样[①]，它占据了“整个文明进程的核心位置”，和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专制主义”概念的地位极为相似。绝对主义的形成过程和“日益增长的约束和依赖”的方式有关，是指康德对“负载着”“社会礼节”的文明人的论述，我们看到，“社会礼节”是康德整个事业的核心。社会生成、社会发展一直伴随着内化的“心理生成”这种超我控制的绝对主义的社会约束。埃利亚斯诉诸弗洛伊德的概念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其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采取了社会进程的类似观点。[②]

埃利亚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源泉来自弗洛伊德《幻想的未来》[③]一文。该书的英语译者，也是其编辑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认为，它最终成为“本能需求和文明约束之间无可避免的对抗”。[④]“文明就是少数人强加于抵抗的大多数，少数人知道如何拥有权力和财富的手段”[⑤]，也就是说，譬如绝对主义的环境中，并没有通过近代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民主制度的途径。在弗洛伊德看来，“群众是懒惰的，愚蠢的”[⑥]，不得不高压控制，至少要教育到使他们内化这些控制之后，那时，他们将不再痛恨文明并意识到它的好处，包括本能的牺牲。

文明的概念和埃利亚斯使用的概念非常相似，它的优点包括对美的认知、洁净和秩序；在文明进程中，洗浴非常重要，香皂的使

① Anderson，1974b.

② Elias，1994/1939：249. 尽管在最初的版本中没有提到弗洛伊德，但这种缺失在其后的脚注中得到矫正，这一引用完全得到承认。

③ Freud，1961/1927.

④ Strachey，1961：60.

⑤ Strachey，1961：6.

⑥ Freud，1961/[1927：7.

用成为“文明的准绳”。[①] 实际上，本段文章提出了埃利亚斯对欧洲文明发展复杂观点的确切方案，而且重点从物质转向精神。据弗
163 洛伊德认为，罪恶感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我们为文明前进所付出的代价是在增强罪恶感的过程中丧失了快乐”。[②] 在弗洛伊德写给爱因斯坦的著名信件《为什么要打仗》[③] 中，他说：

> **心理**的调整伴随着文明的进程（“一种有机的进程”）……在于进步地取代本能的目的和对本能冲动的压抑之中。[④]

文明进程中论述的一般脉络、文明观、约束和压抑的观念，本能性（动物性的）的控制，权威的角色（绝对主义在父亲角色的形成中），所有这些命题在埃利亚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中都非常相似，也有助于解释埃利亚斯对所谓的自然民族的态度，**自然民族**是指他访问加纳时所见到的土著居民。国家的兴起直接与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有关。在思考这一命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观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那种认为国家统治和公民的内在行为相联的观点在其他地方也有相似之说，比如日本，实际上人们怀疑这种观点是对国家产生事后诸葛的说法。批评家巴赞（Bazan）在评论日本11世纪的伟大小说《源氏物语》时写道：“情感的自我表达是人们的天性，能在传统的仪式和正义之中栖息是先王们仁慈的庇护。”[⑤] 换句话说，

① Elias，1974 /1939：93.
② Freud，1927：134.
③ Freud，1964 /1933.
④ Freud，1964：214.
⑤ McMullen，1999.

在绝对主义时期，促成文明产生的种种条件和那些形容所谓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情况并无二致。所以，欧洲对国家角色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管怎样，把国家规范视为控制行为、制定“法律”的唯一方式明显是个理论错误，除非单纯从学术术语的角度看。在较简单的社会中，互惠作为所谓的社会规范广泛存在，但对国家行为来说没有任何必要性。

国家行为被看作有影响力的礼仪，正如礼仪和内在变化相联一样。埃利亚斯关注日常行为方面，如餐具（尤其是餐叉）、手帕之类越来越多的使用。不断增长的消费随着时间变化与商业扩张连在一起，确实在西方文化中经历了一系列根本变化，包括衣着和就餐礼仪方面的优雅行为。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仅仅选择一系列特殊 164
的文化因素，进而鄙视看似与之相反的其他文化能否令人满意？在考虑个人行为方式变化的同时，人们还需要考虑战争和暴力，包括导致埃利亚斯从他的祖国德国逃离的那些原因，还有在性行为方面越来越少的约束、财产权的侵犯，以及我们当下生活经历的其他形式的犯罪行为。

谈到暴力，埃利亚斯认为“我们清楚地看到直接起因于武器威胁和武装暴力的压迫是如何逐渐消失的，塑成自我控制方面的情感规范这些依附性的形式是如何增长的”。[①] 这种论述很成问题，至少从社会层面上要解释一下20世纪武器的用途和威胁。我们每天都能在电视上、大街上见到这些。但埃利亚斯仍然认为这些事实符合日益增长的自我控制的一般概念。如我们所见，这一命题建立在比较“**自然民族**”和假设的更自由的情感的模糊基础之上，建立在

① Elias，1974 /1939：153.

（外在的）羞耻到（内在的）罪恶转变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弗洛伊德学说以及本能和冲动逐渐被社会控制的相似观点之上。对埃利亚斯来说，社会生成（如绝对主义）似乎和羞耻相关，心理生成（如超我）和罪恶有关。

埃利亚斯的命题还有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各地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要考虑到其他个体，考虑情感和行为约束的尺度，即便出于互惠的目的。埃利亚斯对欧洲就餐礼仪历史发展的论述可能是对的，但这和他预设的他者思想发展的整体概念没多大关系。[①] 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找到了这种看法。实际上，上述我们已经看到，在某些方面，其他领域缺乏这种思想和就餐礼仪的发展似乎秤砣并重；今天的家庭暴力和大街上的暴力事件并不是幻象，它很难和埃利亚斯的辉格党式的实证研究方式（虽然他声明已经抛弃了这一观点）取得一致，那时，他正在写有关谋杀全欧洲犹太人的纳粹党的文章，他们用塞在口袋中的手绢擦着脚后跟，优雅地擤着他们的鼻子。一本
165 论述文明行为的著作需要充分考虑这些矛盾。

其次，埃利亚斯文明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他完全采取了欧洲中心论的立场，甚至没有考虑到发生在其他文化领域的相似进程。青铜时代的早期社会暂且不论——因为“文明”一词往往用以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先想一想东方的近代文化。比较历史学专家费南德兹-阿梅斯托提到紫氏部（Murasaki）的《源氏物语》中表现了日本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微妙，此前我已提过这本书。他说：“同一时期的基督教世界，贵族谋杀受教会的限制，至少被教会引导。贵族

① 对埃利亚斯基本观点的评论，参阅：勒·华·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费加罗日报》，1997年1月20日；《圣西门》（巴黎，1997）；戈登（1994）；夏蒂埃（2003）。

中的小混混在漫长的岁月通过骑士礼仪缓慢地、断断续续地开化，这一礼仪作为文雅价值观的教育和武装训练一起保留下来。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另外一种社会文化，其细腻的情感和平和的艺术受到世俗精英发自内心的称赞，这一点令人惊讶。”[①] 阿梅斯托用了一种类似于埃利亚斯的概念，认为日本体现出“自我约束的共同观念”，这被看作关键术语。[②] 这一相似性并不是唯一的。因为阿梅斯托补充道，根据11世纪其他一些宫廷文化判断，平安时期的价值观看起来并不比基督教世界的标准奇怪。例如，塞尔维亚的统治者穆尔台米德（al-Mu’tamid）也有“日本的双性恋倾向，热爱园艺，富于诗歌才华，还有同性恋嗜好”。这些差异比欧洲通常设想的要少。

当然，埃利亚斯承认文明进程在中国也有发生（尽管在他论述文明的大作仅有四次提到中国，其中包括最后注释的两次），但是他的问题和解释模式几乎没有给其他“文明”内容留下任何余地，更别说“其他文化”了，因为他的认识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情形产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对习俗行为的“一般规律”的态度，这一规律由系统比较研究所揭示，因为他认为这些规律的价值“在解释历史变化时**单独地**存在于它们的作用中”。[③] 不过，结构和变化都是社会研究的主要方面。人们能够理解埃利亚斯为什么如此反对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及其提出的高度概括的比较传统，这一传统突出强调“共时”分析。但埃利亚斯本人也没有和其他社会进行广泛比较，除了和一种标准化的**自然民族**比较以外。

---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20.
② Fernandez-Armesto，1995：22.
③ Elias，1939：534. 我做了特别标示。

我对当代社会的研究表明，通常认为的礼仪和优雅举止方面的
166 文明进程并不是一直朝好的方向发展，而是不确定得多。我们为自己在对待儿童 [一如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著作中那样]、动物、女人和战争囚犯等的态度变化而骄傲。这些观点有一些基础，但这些态度是以埃利亚斯所表明的那种方式，以弗洛伊德学说的泛化形式，被真正内化了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还处于虐待的危险之中，这些虐待大部分来自家庭，还有一部分是家庭外的恋童癖。为什么我们有如此众多的“离异家庭”？为什么会有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阿布格莱布（Abu-Ghraib）和对日内瓦协议的背弃？

从技术层面上说，毫无疑问，文明在以城市为基础的文化意义上得到了发展，它们变得更加复杂。同时还有从奢侈文化到大众消费的平行性转变，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是上流社会的礼仪普及大众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上层的礼节比下层社会更受约束。但这种约束不一定体现在外在行为早期形式的内化之中。虽然在西方，民众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社会理论都普遍持这种观点，但很少有迹象表明我们的行为在内化上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约束。所有社会的行为都受内外的规范。相应的一种观念认为，一些文化是内在规范的罪感文化（我们），而其他文化是外在规范的耻感文化（他者），这是十足的自我中心主义，难以立足。如此看待他者的欧洲中心论认为他者比我们受到的约束要少，并普遍存在，正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粗野的卡利班的例子一样。这种观点很少停留在只与名称相符的论据上，接下来它便整合成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相关的各种理论前提，这种做法在埃利亚斯之前早就有了。例如，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史专家R.马尔萨斯提到19世纪这个转折点

时认为，“欧洲婚姻模式”的晚婚形式是自我约束的证据，能够控制人口。这种限制人口的观点在中国遭到李中清和王丰的坚决反对。①

埃利亚斯写道：“赋予西方文明进程特殊和独特特性的原因是西方的职能分工达到了一定水平，各种力量得到控制，税收财政良好稳定，在实际空间和人口数量方面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由此，世界历史失衡。”② 这真的是所说的16世纪吗？不管怎样，埃利亚斯都没有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如果他这样做了——考虑到最初对文艺复兴礼仪的问题，他或许仍然会像韦伯那样认 167
为欧洲“独一无二”而告终。当然，极大可能会是这样。它暗示欧洲在走向文明进程（或者资本主义）的成因方面是独特的。彭慕兰在最近的著作中以一种看起来非常恰当的方式有力地质疑了这些设想③。④

埃利亚斯声称西方社会发展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不仅包括海洋，还包括陆地的可耕地区（在欧洲的扩张过程中），为“人类行为在辽阔土地上的协调一致”创造了必要条件。“与此相适的是自控的力度、克制的持久性、嗜好的节制和本能的控制，这些是网络中心的生活所施予的。”⑤ 埃利亚斯阐释了全球扩张（欧洲殖民主义）和心理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导致长期的自控（更复杂的超我），接着他认为这与准时性有关，和精密计时技术的发展有关，和时间意识还有金钱的发展、“社会构成的其他器械工具”有

① Lee and Wang, 1999.
② Elias, 1994a/1939: 457.
③ Pomeranz, 2000.
④ Goody, 1996, 2004.
⑤ Elias, 1994a/1939: 457.

关。这些发展包括“那些属于比较长远目标的瞬息万变的必要情感”[①]，它发端于上流社会和中间阶层。所有这些都关系到与“高度劳动分工”相关的“西方发展”和“西方社会”。[②]注意，是“高度的”而不是“更复杂的”。当然，这些社会还有更多计划，进而延缓了回馈的时间，这与计时有关。通常还包括外部控制，它和内部控制一样，甚至还要超过——埃利亚斯认为内部控制在这类社会中占优势。但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这一事实，除了这种“协调一致”以外，国家的形成还导致了边境内外的冲突、殖民主义、压迫，以及“不列颠式的世界和平”。

埃利亚斯在1968年增补版的导论试图展现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兴趣。[③]我们需要在社会理论的广阔语境中考察埃利亚斯的著作，分析他与马克斯·韦伯在哪些地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韦伯对促进社会学比较方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的讨论有时也只有有限的价值，正如传统权威这一特殊概念有很大的局限，和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的并不一致。对韦伯来说，传统仅是一种乡村类型，因而对埃利亚斯也是如此。其次，虽然韦伯对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极为了解，但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实际上一点儿都不了解非识
168 字社会，对“农业”社会的了解也很不充分。如此广泛的兴趣却受限于德国的社会学传统，埃利亚斯受到的正是此种传统的熏陶。更多的激励因素要算韦伯重要的问题意识，及其从跨文化角度尽其所能回答问题的方式。虽然韦伯评价了欧亚大陆主要社会的情况，但他从19世纪欧洲的立场出发没有给予其他成就以充分的重视，也没

① Elias，1994a/1939：438.
② Elias，1994a/1939：459.
③ Elias，1994a/1939：190.

有考虑他们的观念看法。埃利亚斯也没有提出如此广泛的评论。他从欧洲开始，又从欧洲结束。换句话说，他的论文最初采取的方式和布劳特在《八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①]中讨论的那些人非常相似。埃利亚斯将会是第九位（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候选人），因为他没考虑任何非欧洲史料的评论而断言文明进程中的欧洲优势。[②]

此前我已说过，埃利亚斯的巨著完全只关注文艺复兴之后那段时期的欧洲及文明进程的发展。他认为这一进程表现为日益增长的自我约束，表现在情感控制的内化中，他将这些明确与中世纪发生的事情（如毫无节制的饮酒），以及一直发生在**自然民族**如加纳比较简单社会中的事情进行对比，比较它们的祭祀、仪式、缺衣少穿但更加率真。因为韦伯和埃利亚斯，这一关注点坚定地回到历史比较上，尽管也会提到**自然民族**和对传统社会某种理想类型的设想，这些使人们危险地接近19世纪人类学家的广泛思考，而反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静态”观察方式进行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所力争并也得出的研究程式和结果。

埃利亚斯认为并不是每一步进展都是沿直线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道德上的松弛”[③]，不过这“正好是一段短暂的萧条”，埃利亚斯认为这并不影响总趋势。他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对所有类型的行为来说都一样”。[④]本能被缓慢地、逐步地压抑住。虽然这一观点在西方司空见惯，但要找到经验支持也不那么容易。比如，很多非常暴露的服装（和女式泳装）就预设了

① Blaut，2000.
② 和很多学者一样，这也是随时间变化的。我指的是最开始的著作。
③ Elias，1994a/1939：153.
④ Elias，1994a/1939：154.

“一种非常高层次的本能控制”。为什么这些研究适用于我们而不适
169 用于简单社会的缺衣少穿呢？实际上，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日益增长的约束问题时，总体进步的观念消失了，尽管随着时间，可能有很多变化朝着更严厉或更松弛的控制。

在埃利亚斯的最后生命中，他转而思考了当代很多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即纳粹的兴起（或更宽泛地说是法西斯主义）。有人认为无论如何纳粹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变化中都应有一席之地。埃利亚斯现在认为纳粹时期体现了“去文明化”的过程，“倒退”的过程，不过这似乎应该避开主要问题。和世界大战一样，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德国、意大利的行径，的确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部分，它造成了我们目前的情形，而不是某种“倒退”，是弗洛伊德心理发展理论体现在社会方面的对应表现。

“倒退”的观念似乎与种族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的问题有关。有一点几乎是确定的：在很多语境中，埃利亚斯将种族的童年等同于人类的童年，种族的生成等同于个人的生成（尽管儿童没有经历文明进程的所有阶段）；**自然民族**或原始民族需要控制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就像儿童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规范一样（恐惧在两种情形中都发挥了作用）。这种观念现在一般被看作误解。像通常指出的那样，**自然民族**本身也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化、去自然化的过程，因而，认为他们缺乏自控难以成立。在没有首领的社会中，不存在确切的权威制度，但也可能有更“内化”的约束，当然是相互约束——这种相互关系在复仇或械斗的暴力中也可能呈现“消极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如果埃利亚斯从福特斯的加纳研究中有所收获，他可能就会明白这一点。福特斯是以心理学但真正说来是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的，但埃利亚斯却忽视了。

在埃利亚斯看来，情感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化有关，特别是封建社会的“自由竞争”向绝对主义君主制权力垄断的转变，它创造了一个宫廷社会。不同文化中，不断形成的集权控制为其社会成员提供越来越多的“自由”，使得外部约束转为内在约束，虽然这一转变的逻辑基础仍然是个问题。而“自由”转变的基础在这些疑问上又添一层。

但是，埃利亚斯所说的国家形式的进程，即国家的社会生成，是从一种排外的西欧立场来分析的，当然，他认为这里产生了文明 170
的进程，又认为根本没有一个本土的非洲社会形成了国家，尽管他生活在阿善提王国的庇护之下。他的方法与韦伯形成了对照，韦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成（和内化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新教约束），深入探讨为什么亚洲社会没有也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然而，问题总是相互关联的。

不考虑文明进程中的**自然民族**也就罢了，但不提其他城市社会就令人无法接受了，尤其是这些可能会引导埃利亚斯去质疑西方独特的“社会人格结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长期变迁“朝着较高水平的社会分化和整合”[①]是否伴随着人格结构的平行变化。人们情感和控制结构的长期变化构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论述——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比较角度——当然是就情感与情绪方面。但人们对社会控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包括内化的规范、羞耻和罪恶的问题，分权的（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与道德和司法一致的联系，这一问题由涂尔干提出（不久，关注国家这一势不可挡的德国传统也提出了）。“情感”的

① Elias，1994a/1939：182.

比较及“情感”的历史提出论据和文献的更大问题，至少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是这样；的确，这种情形使人们对只研究“精神状况”文本的依赖性产生怀疑，很多人类学家都对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原始精神”不满意，他们往往认同G. E. R. 劳埃德（G. E. R. Lloyd）对这一研究方式的广泛批评。这并不是从情感层面上否定长期变化的可能性，可能是直接的变化，即便有些人类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经常采取相对论，偶尔还有普遍论（“人类的普遍性”），对诸如20世纪法国或18世纪英国“爱情的发明”这类问题需要有怀疑精神，尽管其依据完全依赖文字记载。

我们已经看到，埃利亚斯没认真研究其他文化，这使他陷入各种问题之中。首先，是对西欧优势以及西欧从封建社会到宫廷社会（十六七世纪）再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顺序问题。其次，他的观点完全低估了较简单社会的社会约束力，这些社会当然也有关于
171 性、暴力和其他人与人之间行为方式的约束。“原始人”或许缺衣少穿，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强烈的、内在的羞耻和难为情的情感。再次，另一种假设也不太合理，我认为他的做法时常如此，物质文化是精神形态的风标，物质文化包括发展和“进步”，但这对精神形态来说很有问题。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构型），埃利亚斯的分析留下的问题，不是人类的相互关系，也不是个体和**社会的**（不同于“社会”，是“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涂尔干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了，后来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①]中又有进一步分析，而这项研究是埃利亚斯所没有充分考虑的。这一最令人忧心的问题是

① Parsons，1937.

社会结构和人格结构关系的特征。精神发展的阶段如何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是埃利亚斯问题的关键。没人否定这些联系，不过解释这些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埃利亚斯断定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阶段。他认为产生了一种关系概念，这种关系存在于什么是“内部的人”和什么是“外部社会”之间。“外部社会”在所有群体的著述中都有记载，这些群体的“反思能力和自我意识已经达到一定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不仅能够思考而且意识到自身，像思考生命一样反思自身”。[①] 但以这种模糊方式呈现的阶段是怎样的呢？假设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精神存在，它排除了自我意识的可能，找不到通往设定突破口的特殊社会因素，诸如提高这种反思能力的书面文字（以及个人、社会团体和产生这种方式的机构的作用，包括“哲学家”、知识分子和学校）。我们谈“人们形成的构型发展以及正在形成的构型”合不合适？[②] 这又将问题推到一个泛泛的、非社会学也非历史学的层面。当埃利亚斯看到“人们思想中日益增长的自我疏离感”导致世界地心观的转变时，他也采取了这一做法，[③] 文明进程中的特殊发展导致了“人类更强的自控”。很多科学史家以另一种方式散播了这种联系，他们提供的解释认为不需要“自发的文明进程”这种观念，这一进程带来的是更强的“情感控制”和自我疏离感。的确，如果 172
追溯埃利亚斯假设的根源，我们很难接受这种抽象的、变动不定的建构，它不是单纯的描述，而是一种结果：“文明发生了转向……正在人类自身中发生”，[④] 这是对我们“自我”的吹捧。

① Elias，1994a/1939：207.
② Elias，1994a/1939：20.
③ Elias，1994a/1939：208.
④ Elias，1994a/1939：209.

即便认为和欧洲中央集权相关的行为是直线发展的，那么，当人们论及“文明”时——比如我们看到的埃利亚斯的做法，为什么要鄙视其他社会比如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呢？中国也有礼仪的发展，有食物和嘴巴之间介质（筷子）的用法，复杂的问候礼和身体洁净的礼仪，与乡野率直相对的庙堂的种种约束，诸如喝茶的方式——所有这些在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都是平行发展的，应该能吸引埃利亚斯的注意力，将他引向地理分析（跨文化），而不是局限于欧洲，特别是在考虑他一直努力证实的更为普遍的心理学主题时。如果你愿意就请黏在欧洲吧，但如果你想得出一些更普遍的论断，那么还是不要这样做。但这却正是埃利亚斯的做法，以韦伯式的方式认为欧洲这里所发生的是通往现代性的唯一道路。

我想确定的是，首先西欧不是第一个发明文明礼仪的，无论是不是简化的礼仪。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就餐礼节，吃饭的仪式化形式。每个社会都希望身体礼仪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保持一定距离。同样，大多数阶级化的社会中，上层社会的行为要比下层更仪式化一些。我说的是“大多数”，因为在非洲，甚至在国家的各项制度中，这些行为的差别相对较小，部分是因为经济的特点，部分是因为相关的婚姻和高官接替制度。我们提到的“原始国家”，在礼仪以及更普遍的文化上，行为的阶层分化很少，但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文化上都阶层化了，这些国家经历了城市革命及其伴随的事件。

然而讨论礼仪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从沐浴和洁净身体方面来说，西方在15—17世纪遭遇了一次“显著的倒退”[①]。沐浴

① Braudel，1981：329.

这一“罗马的发明”（此说法可疑），在整个中世纪都能找到，既有私人的也有公共的浴室，还有男女共浴。沐浴甚至要服从君主的 173
命令。[①] 但在16世纪后——埃利亚斯认为文明进程由此开始，这些变得越发少见，部分是出于对疾病的恐惧，部分是天主教和加尔文教牧师的影响，他们斥之为道德败坏和“沐浴羞耻”。[②] 19世纪伦敦没有一个浴室设施。而东方发达的政府事务体现在波斯城伊斯法罕（Isfahan），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1588—1629）的统治之下，这座城市当时有273个澡堂，这在西方的确罕见。肥皂生产成本很低，尽管在中国更低。中国虽没有受益于衬衣衬裤（布罗代尔认为衬衣衬裤在18世纪后半期就出现了），但不管怎样，中国使用手纸比欧洲要早一千年，这个事实他没提到。造纸只在和印刷术、钞票联系时才讨论到，其出现据说挽救了中国的“落后”，这都是和那些“处于早期发展”的原始国家毗邻的结果。[③] 当澡堂最终重新引入欧洲时，它们才以“中国式澡堂”[④] 和“土耳其式澡堂”而闻名。当然，欧洲早期的基督教徒也经常破坏罗马的澡堂，其理由和布罗代尔归纳的16世纪的原因相似：澡堂怂恿道德败坏，和异教礼仪有关。

不但洗浴，还有更一般意义的清洁都是问题。在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卡冈都亚被父亲留下，其父问道，离家的时候是否是清洁之身。是的，儿子答道，但没用清洗的东西，因为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擦屁股方式。[⑤] 他用各种不同的布擦屁股，包括他母亲的手

① Cabanes，1954.
② Braudel，1981：330.
③ Braudel，1981：452.
④ Braudel，1981：330.
⑤ Braudel，1981，第13章。

套，它们“散发着好闻的女人芳香”。

然后，我用圣人的方法擦屁股，用茴香、莳萝、茴芹，用香甜的薄荷、玫瑰、南瓜，用南瓜叶子、卷心菜和甜菜，用葡萄叶子、锦葵和毛蕊花（是种毛蕊花属的植物，它和我的屁眼儿一样红），用生菜和菠菜的叶子——好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擦屁股啊！——还有山靛野草、马齿苋和荨麻叶子、飞燕草和含羞草。但后来我得了伦巴第的痢疾，我用遮羞布擦屁股治好了病。

后来，我用床单擦屁股，用毛毯、床帘、用垫子，桌布（后来是另一块绿色的）、抹布、尿布、手帕，用衣服的袍子。我享受着这种感受，就像你梳刷生疥癣的脏狗时它们的感受一样。

“自然，不过你认为哪种擦屁股的方法最好呢？”卡冈
174 都亚的父亲说。

“我这就要说了，”卡冈都亚说，“马上你就会听到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我用干草擦屁股，用稻草，用各种绒毛样的绳头，用羊毛头，用真正的羊毛，用纸。但是——

请用纸擦你的脏屁股

你需要用一个能擦干净的东西来弄干净你的屁股。”

直到拉伯雷写作的16世纪，纸一直从阿拉伯世界输入欧洲，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在交流方面。14世纪早期兰格伦（Longland，1332—1400）在《农夫皮尔斯》中描写了人们是如何用叶子来擦屁股的：

他们饮酒唱歌直至夕阳西斜，
饕餮足灌下一加仑多的黄汤，
肚子里像有两只母猪在闹腾。
未等祈祷，就已憋出几夸脱尿，
同时从肛门里发出一声巨响，
使听见这轰鸣的人都捂紧鼻子。
恨不得用一把荆豆叶子堵住那屁眼。[①]

加纳的经验

埃利亚斯对其他文化问题的看法可以从他《生命的反思》中对自己在加纳经历的评价看出一些。为了回答他的访问者们，埃利亚斯解释了1962年他怎样被推荐到加纳担任两三年的社会学教席这件事。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尽管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他说，“我对未知世界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②] 结果便是，埃利亚斯对“非洲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喜爱”，对人类学家来说，这种喜爱的方式类似于**自然民族**对19世纪学者的吸引力，**自然民族**这一范畴甚至包括古代社会。“我想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一切——内脏的流溢，鲜血的喷射”，“我知道在加纳我会看到一些巫术艺术，我能看到鲜活的动物牺牲，事实上我的确亲眼目睹了很多事情——这些经验在比

① Langland，Bversion，Passus 5，lines 339–345. 参阅：兰格伦，《农夫皮尔斯》，沈弘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65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② Elias，1994b：68.

175 较发达的社会中已经失去了意义。当然，这一点只好以我的文明进程理论来解释：感情越强烈就越直率。”越是自然的（本能的），就越是未开化的（不受约束的）。

埃利亚斯是如何了解“原始文化”的呢？他的对话者在这本访谈录中问道。“我和我的学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我开始收集非洲艺术，我的一些学生带我去拜访他们的家庭。在那里，我了解到加纳生活是如何形式化和仪式化的：学生站在父亲椅子的后面，几乎像仆人一样服侍他。古老的家庭类型在加纳仍然大量存在。”

埃利亚斯回想起和他的司机一起开车到一个“丛林深处的”村庄（有一张作者带着炊具和司机的照片）。他到达那个村庄，“第一次意识到没有一根电线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他对“他者”的评价关注的是他们的技术而不是观念态度。这些居民同样也很好奇，围住他说“来了一个白人”，还问到他的妻子（他是个单身汉）。是埃利亚斯，而不是这些居民，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人，他坐在一辆有司机开车的轿车来了，没有妻子。埃利亚斯没能从他遇到的这些人中得出显著的结论——对每种文化来说，在遵守社会规范意义上——通常在表现为自我理解的内化时，“他者”都背离了文明行为的常态。埃利亚斯自己和他的那些怪癖在加纳村庄是非常态的，而他也瞧不上同住居民的常态。

还有一次，埃利亚斯走到一个地方，这里即将被新的伏塔河大坝淹没。人们担心的是水面升起时他们当地的神仙会怎样，埃利亚斯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对神仙的急切关心——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神仙，与人们强烈的不安全感有关。他把这种思想用

到人格结构中，提出：“人们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超我的建构与我们的不同，因为所有这些神灵都代表着超我。”[①] 不过，我们假设知道只有一个上帝，但我们还有少量的分散在其他地方的超我。以这种方式，加纳帮助埃利亚斯认识到（或坚定了他的信念），弗洛伊德在比较层面需要进一步改进，相应地，埃利亚斯自己的文明进程观念也需要改进。“我认为，较简单社会中的超我和自我形式与我们的不同，这种预设在加纳完全得到证实”，一如我们所见到的。[②] 不妨再以另一种参考框架来看看。加纳有羞耻感（外在的），而没有罪恶感（内在的）。前者中，“依靠内在的精 176
神约束自我是不够的”。为了能被约束，“他们（埃利亚斯的非洲朋友）只好想像在他们身外还有灵魂强迫他们做这做那。这些国家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现象”。换言之，这里有种外在约束（这不同于埃利亚斯对牺牲没有限制的特征的推论），不过，控制和规范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像他的访谈者提出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更“不成熟”，埃利亚斯现在采取的非洲观是殖民主义的观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唯一的可能，“因为我们的身体安全感比他们要强烈得多”。[③] 然而，加纳人也有一些上流阶层，他们“处于和我们相同的思想水平……不赖的教养和自我约束”，群众为他们修建了几座祭坛，称为“圣庙”。这种宗教活动（埃利亚斯是一位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似乎与不受约束和不受教育的行为是一致的；它是社会安全感或者缺乏安全感的一个方面。

---

① Elias，1994b：71.
② Elias，1994b：70.
③ Elias，1994b：71.

对这种行为的理解为埃利亚斯对加纳人艺术的喜爱提供了理由。加纳人的艺术——

> 比19世纪或文艺复兴的传统艺术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了情感。这非常契合我的文明进程理论，因为文艺复兴有一次巨大的文明进步，至少体现在绘画和雕塑尽可能现实主义的尝试之中。20世纪对此有一次反动。人们也可以把它和弗洛伊德联系起来：心理分析所产生的理论——在全新的层面上，较高程度的情感表达得到允许，这也可以看作非自然主义的艺术，与梦境非常相似。非洲的雕塑有着同样的特性。那里既有恐怖的面具，也有和善的面具，但它们都强烈表达了无意识——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①]

文艺复兴被视为欧洲文明进程的一步，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从艺术角度说，它包括现实主义，看似暗示着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客观现实的现实化中。对埃利亚斯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现了原始认知和约束缺失的恢复，虽然埃利亚斯的发展理论如何包含这种长期恢复并不明显，但他自己非常依赖弗洛伊德的流行观点。同时，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补充。“超我”的概念在其他（即较简单的）社会是不同的，他认为这一概念在加纳得到完全证实，一如我们所见。但是，他使用的论据简单化了人们向神殿
177 求助行为的多元性。对任何了解这些社会的人来说，这都是肤

① Elias，1994b：72–73.

浅的认识。[①] 从大量实际物品来归纳当地生活的这些从结论也具有随机性。埃利亚斯也不了解非洲的宗教，表现在用过时的“圣庙”一词来形容神殿，以及他对血祭的急切好奇之心。难道埃利亚斯没听过也没看到犹太教等宗教所允许的动物屠宰，或者体验一下芝加哥等地方的“基督教”屠宰厂？

埃利亚斯整个社会进程理论的问题在对加纳的论述中清楚地暴露出来。人们在神殿宰杀小鸡这一点被看作显示了情感表达的充分自由。这和**自然民族**的民间看法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提到学生在父亲面前表现出过多的拘束。这两种评论在相反的层面上体现出自由和约束。自相矛盾的表述都能切合他的理论，说明心理生成和社会生成的解释都值得怀疑。如果说我研究多年的加纳北部的洛达基多多少少比现在的英国更受约束，恐怕还很难这样讲。因为任何评价都只能取决于特殊的活动语境，而不是彻底的

---

① 我在勒贡（Legon，加纳大学）和埃利亚斯进行了短暂的会晤。那是在1964年。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深陷欧洲经验和彻底服膺韦伯概念的学者，至少当我们谈到当地的政治制度时是这样。似乎埃利亚斯对这块“未知的”地方理解非常肤浅，只是当时对这块地方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埃利亚斯从他所说的“田野旅行”中获得认知：和司机和学生一起开车去村庄。但这种对“其他文化”的学术研究，所获的信息甚少。作为一位那时已经在加纳村庄耗费多年的人类学家，我并不喜欢“田野调查”这个概念，我认为它是非比较性的，埃利亚斯采取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术语。我本人和比较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劳埃德·沃纳尔（Lloyd Warner，同样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一起工作，他们两人充分考察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同样的理由，我发现，人们从一些游历商人的杂乱的非洲“艺术品”收藏中所获悉的任何复杂的见识是很有问题的。人们不能完全相信收藏或输出非洲的物品，而对它们的用途所知或了解得很少。这也是对那些专事掠夺的部落的旧事重提——虽然后来从维持生计的角度看他们也是合理的，他们更关心掠夺物和陈列品，而不是对文化背景的欣赏或这些物品对他们本身的意义。很多流亡国外的人开始收集艺术品——这并不费劲，因为每个豪萨族（Hausa）的夜行者都能带着他们的陶器到院落里那些具有殖民风格的平房中谈生意。这种交易体现了非洲艺术彻底的去语境化和商品化，不过，他们确实提供了一些可以拿回家的东西。

概念化。他们在墓地表示悲痛，但通常以仪式化的形式，这种形式看似限制或产生了悲痛。所有的仪式都受到限制包括祭祀。尽管如此，生活仍然历经各种变迁，它伴随着学校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
178 和传教士的增多。事实上，我没有看到非洲宗教像五旬节派教会那样不受约束，他们在瓦市周围50英里的地区布道（由美国人“圣·乔”引导，这是位知名人物）。在当地的行为中，宰鸡是为了在迷茫的情况下找到真相，可能是对神的供奉，但从没体现出祭神的特征，更不是埃利亚斯归结的“自由”。很多源自埃利亚斯对“文明”肤浅认识的差别在更为透彻全面的研究中消失了。没有理由不认为，埃利亚斯的欧洲研究对心理学形态和社会分析的贡献都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对欧洲和加纳的认识之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埃利亚斯理解加纳的问题触及到文明进程内在约束进步理论的根基。这绝不仅仅限于作者本人，往往也是欧洲民众的观点。他认为非洲艺术能够更为直接地表达情感。血祭的实践和多种“圣庙”崇拜是不受约束的行为，文明教我们在祷告和一神论的帮助下限制这些行为。加纳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视为接近无拘束的感情，打上了缺乏约束的标记。但是，在加纳大学生规规矩矩站在父亲椅子后面这种高度仪式化（和约束下）的行为中，埃利亚斯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要求某种约束和行为控制，否则就会导致人人反对人人的战争。仪式发挥着它的作用。介入情感和表达之间的语言也是如此。

比较埃利亚斯的非洲经验和他“文明进程”的理论，我试图表明：与他宣称的经验和理论互相支撑的观点相反，事实上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认识：如果作者能花更多精力研

究当地情形，尝试去理解当代的行为，而不是在他看到的情景上强加伪历史学的、伪心理学的、伪哲学的**自然民族**概念。而如果那样做，他就因循了欧洲人文明进程观点的民间观念，却置史前史专家和比较社会学家论证更为坚实的研究成果于不顾。 179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盗窃：布罗代尔与全球比较

古典时代、封建主义，甚至文明都被看成是欧洲特有的，由此，在通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排除了世界其他地区，因为所有这些阶段在逻辑上都是前后相续的。工业革命后19世纪欧洲的支配地位赋予了欧洲相对的经济优势，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问题转到早期阶段，是什么预设欧洲会取得这一优势？欧洲真的像很多人设想的那样创造了“资本主义”吗？或者，这又是历史学家们观念盗窃的另一个例子？

本章我将考察那些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比较的著名学者，他们的结论总是坚信欧洲的优势地位，不仅体现在工业革命方面——就此可能达成了某些共识，还体现在那些被认为促进这一变化的其他更为广泛的早期西方特征。我将集中探讨布罗代尔的贡献，然后间接评论这些学者如何偏离了“客观性”，尽管他们心怀最好的意图，但他们赋予西方以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进而剥夺了东方在历史上的正当位置。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坚定地致力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此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是如此。后者集中于比较各种“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并得出结论：只有禁欲的新教才能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我们看到他改变了对古罗马的看法）。我并不是认为韦伯的系统论述有什么错误，只不过他对包含其中的内容没有充分意识。而且，即便他在“理论上”意识到了，也没有在“分析上”做到。考虑不同宗教在资本主义兴起方面的（古代以色列、印度、中国和欧洲）“经济伦理”特性时，韦伯尽量做到了“客观”，但接下来他便完全赞同新教的种 180
种理论。这一焦点问题也同样被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坚决地抛弃了，不过主要是这位研究地中海的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本人——布罗代尔，他认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散布非常广泛，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古代社会都找到了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布罗代尔仍然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独特现象，并深入探讨了为什么独特的种种原因。

韦伯在看待资本主义时更为直接地将它与西方单边地连在一起。他坚信比较研究的客观性，[①] 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西方科学精神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与理性概念相联。请注意人类思想的祛魅进程，它标志着理性化进程中科学知识意义深远的发展。韦伯写道，这一进程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了几千年，并构成了“进步”。[②] 进步、

---

① 韦伯的这篇关于比较分析的论文，已被译为《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的“客观性”》，成为《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文库》杂志新版的导论性评论。他解释说，他所理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人文事件的意义预设了这些事件的价值取向。人文概念是个价值概念。经验的真实性对我们来说成为‘人文’，因为我们把它与价值理念相联”。（Weber，1949：76）韦伯的论断建立在营造一种“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之间巨大差别的需要之上。（Weber，1949：58）这两个主题对反思都非常重要，尽管“那些潜藏在实践兴趣之下的最高‘价值’对人文科学领域确定分析活动的重点意图一直有着决定性意义”，但对我们最有效的“一定同样对中国有效”。（Weber，1949：58）

② Weber，1949：139.

“日益富裕的生活”的观念对于文明人来说非常重要，基本都是西方概念。

韦伯曾经提到“文化事件的‘客观’分析”，这种分析一直顺着这一命题进行，即作为“法律”经验的现实缩影，科学理念对这些事件来说毫无意义，对各种不同的推理也毫无意义。人们会联系韦伯对文化的定义，它是“世界进程中无意义的无限中的有限部分，是**人类**赋予其内涵和意义的一部分”。[①] 这一定义与英国人类学家E. B. 泰勒的古典定义完全不同。[②] 泰勒的定义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和观念。在帕森斯图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概念[③]——虽然现在基本废弃，它也是帕森斯的美国追随者最为重要的概念。我本人比较倾向于泰勒的广义定义。文化覆盖了所有已知的人类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并对韦伯观念的实用性提出质疑，尽管韦伯对客
181 观性的论述依赖于此，因为在具体实践中构建集中于观察者价值观（韦伯坦陈观察者的价值观对命题的选取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那些实际的操作者了（很多社会学家采取了价值取向的概念）。不管怎样，很少有学者希望在实践中以这种方式限制他们的分析，尽管也有些人类学家试图采取帕森斯的观点，将整个领域转到观念和价值观这一“人文科学”领域。虽然价值观不能视为科学，而韦伯的目的的确是在比较分析中找到客观性的准绳，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起源的宏大目标研究中。韦伯没有意识到的是获取客观性方法的困难，从解释的角度区分“事实”与“价值”，要确定的因素比要“关注的焦点”还多。在韦伯自己的著作中，尤

① Weber，1949：80-81.
② Tylor，1881.
③ Parsons，1937.

其是和资本主义欧洲起源相关的著作中，都能看到这一困境。

而布罗代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他接受了很多重要的与东西方发展差异有关的西方预设，其中包括源于10世纪意大利北部的欧洲城市的自治特征。但是，布罗代尔极力反对韦伯创造“资本主义精神”时所主张的新教是首要原因的观点。费南德兹-阿梅斯托在讨论大西洋帝国时也批判了“韦伯命题”中的宗教因素；大西洋帝国的产生被看作“新教作为帝国信仰比天主教优越的论据，被看作新教继承中世纪特别是犹太人所展现的资本主义天分的证据”。他说：“韦伯命题的每个部分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误导。”[①] 南部的大西洋帝国比北部的新教国家更广阔，存在时间更长，也更富裕。“19世纪社会北部政权的优势争夺还未开始……几乎和通常想像的一样早。”因而，即便是宗教对这一优势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是地理位置。

我不想进一步讨论韦伯全球比较的初衷。当然，他主要关注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他对印度和中国的敏锐分析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普及为背景。事实上，布罗代尔没有把自己局限在19世纪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而是理解性地回溯到前提条件，尤其是宗教改革（由此才有新教伦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甚至进一步追溯到欧洲城市的“独特性”，有时甚至追溯到 182
罗马。很多评论家都如此行事。马克思和沃勒斯坦[②] 都追溯到了大航海时代，在时间上把欧洲的优势从19世纪大大往前提了。

全球比较的观念是历史学家联系近代欧洲史所采取的概念。那么，比较的是什么呢？这个词语主要指马克思在19世纪和韦伯20世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238.
② Wallerstein，1974.

纪初感兴趣的一类问题，但最终落在（欧洲）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上。韦伯的著作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认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企业精神成了为什么欧洲能、亚洲其他主要文明却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换言之，是近来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这是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最近著作的副标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却从错误的注脚出发。①

首先，这些比较远不是全球性的。韦伯非常有趣地写到中国和印度。世界其他地方都打上传统社会的记号，实行“传统权威”，这是一种几乎无用的社会学或历史学概念，因为它们被视为剩余物。印度和中国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背景被纳入到这一图景中来。其次，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论述中从经济角度粗略分析了其他社会，研究了各种产生方式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他仔细研读了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部著作试图雄心勃勃地在人类社会范围内进行全球比较。摩尔根的著作作为更加系统、证据更为充分的人类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之一，超过了先前维柯或孟德斯鸠的哲学成就。虽然《古代社会》体现了对这些哲学家思想性研究的提高，但就欧洲而言，他仍然采取了目的论的看法。

布罗代尔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方法的确是全球性的，这体现在三卷本的巨著《15—18世纪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标题是“日常生活的结构”②，第二卷是“形形色色的商业”③，
183 第三卷是“世界的前景”④。第一卷论述布罗代尔所说的“物质生

① Goody，2004：chapter 1.
② Braudel，1981/1979.
③ Braudel，1982/1979.
④ Braudel，1984/1979.

活”，他认为物质生活“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下”，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第二卷（从经济层面上）论述市场社会、商业社会。第三卷，论述盘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阴影地带”，即金融世界，“资本主义的特权领域”，没有这一领域，资本主义将“不可想像”。①

布罗代尔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他的同事泽尔丁（Zeldin）形容《日常生活的结构》为“才华横溢的大著”，另一位同事普尔姆（Plumb）也说是“杰作”。我想带着崇敬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布罗代尔的著作，从新的世界史发展的立场出发，试着修正某些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任何西方学者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这样的偏见。当然，布罗代尔比马克思或韦伯表现得要少些，他研究了广泛范围内比较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且，他处理欧洲优势这个问题时要微妙得多。

尽管如此，布罗代尔的资料来源不可避免主要还是欧洲的，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对欧洲优势的偏见。在布罗代尔看来，作为“欧洲伟大创新和革命”的不是纸而是“酒”这种蒸馏出来的液体。② 尽管如此，谈到世界其他地区时，布罗代尔仍然问道：“这种蒸馏液体物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优势了吗？”③ 但事实上欧洲使用蒸馏酒的过程非常缓慢。排除这种缓慢不说，为什么会认为欧洲人拥有这一优势，甚至在古代就已拥有？④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但它却遗漏了另一种观点。例如，其他饮料也应以相同的方式加以看待。大约“发现”酒的时期，欧洲——假设处于世界改革的中心——据布罗代尔说已经发现了新饮料，不过却是刺激性和滋补性

① Braudel, 1981: 24.
② Braudel, 1981.
③ Braudel, 1981: 241.
④ Braudel, 1981: 247.

饮料：咖啡、茶和巧克力。但这三者都来自海外，咖啡来自阿拉伯（最初是埃塞俄比亚），茶来自中国，巧克力来自墨西哥。[①] 显然，欧洲“发明”这些新饮料的说法的确很有局限性；它所涉及的是市场交换和消费。虽然如此，却致使布罗代尔把它们当作欧洲的发明，或许是由于近代欧洲对“资本主义”的“发现”，资本主义促成了这两者。但是后来，当这些饮料运到新几内亚（New Guinea）海岸时，同样也能说是新几内亚发现、引进了这些饮料。欧洲是
184 （“一直是”?）创新的中心这种观念被大大夸大，尤其是在饮食语境中，欧洲确实落后于中国或印度。布罗代尔自己也确实意识到“欧洲在15世纪或16世纪之前没有真正的奢侈品或精致独到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欧洲落后于其他古老的世界文明。[②] 这种看法似乎是正确的。那么，欧洲在这一领域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布罗代尔有关家庭方面包括饮食的论述似乎显得尤为欧洲中心主义。在肉类消费上，欧洲比其他社会都有“有利条件”。[③] 狩猎和采集的人们当然食肉。同样，我们站在不同立场看中国和印度在水果和蔬菜消费方面也有优势，他们采取了一种更生态、更亲切的方式。无论是基于品味、宗教还是道德，选择素食都没有什么价值标准。随着像糖、香料这样的饮料当作商品传开，世界主要从欧洲立场来看了，即便所有这些事物都是他人发明的。布罗代尔赞许地引用了拉巴特的话，因为拉巴特（Labat）说阿拉伯人不知道桌子的用途。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欧洲没有长靠椅或毛毯，直到它们从东方输入。“优势”往往被看作欧洲人的（它还可能体现在分配和市

① Braudel, 1981: 249.
② Braudel, 1981: 187.
③ Braudel, 1981: 199.

场交换的术语中)。布罗代尔关于欧洲“逐渐养成的优雅举止”[①]的一小节内容似乎体现出类似于埃利亚斯在欧洲人行为方面的偏见，因为其他人普遍认为远东在早期阶段也有非常优雅和严格的礼节。他引用一位欧洲研究者的话，说基督教徒没有像动物一样坐在地上，[②]语寓其他人像动物一样。桌椅“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③]，直到6世纪后它们才出现在古代中国。椅子“可能产生于欧洲”，因为据说在非欧洲国家没有发现坐姿，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艺术”。无论这是不是事实（这一声明非常可疑），但6世纪如此重要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不符合中国社会一成不变和“静止不动”的看法。[④]这一结论形成于他对衣服特征的思考，的确，衣服的用途不是人类行为的共同因素。[⑤]

布罗代尔的观点是，风尚的变化象征着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他吸取了赛伊1829年的意见。[⑥]赛伊轻蔑地写道“土耳其人和其他 185
东方民族一成不变的风尚”，“他们的风尚往往维持愚蠢的专制主义”。[⑦]这一观点同样也适于我们这些乡巴佬，我们天天穿着同样的衣服，几乎没有改变，而且所有男人在特殊场合可能都穿着晚礼服。但是，即便欧洲发生了变化，这些“时尚的变幻”也仅仅影响了一小群人，直到18世纪以后它才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而这一时期，人们打破了“古代社会的一团死水，这种状况正是我们形

① Braudel，1981：206.
② Braudel，1981：285.
③ Braudel，1981：288.
④ Braudel，1981：312.
⑤ Bray，2000.
⑥ Say，1829.
⑦ Braudel，1981：314.

容的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情形”。[①] 变化只属于少数特权人物，但布罗代尔并不认为风尚微不足道，而是“较为深层的现象表征”[②]：未来属于那些准备“打破传统”的社会。东方是静止的，但西洋只在近代才表现出运动的特征，关于各种文化长期以来在风尚方面的概念，布罗代尔的确是互相矛盾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难以统一，因为风尚所依赖的同样是“物质进步”的结果。[③] 一个例子是里昂的丝绸商人通过雇用“丝绸设计师”开拓18世纪“法国时尚潮流”的方式，他们每年变换样式，这些样式很快又被意大利人仿制。[④] 此时，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的丝绸生产几乎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了，它在16世纪和桑树一起传到托斯卡纳、威尼托，一直沿着隆河谷传播。日内瓦和威尼斯也长期从近东进口生丝、棉纱或大捆未加工的棉花。不仅原料，技术也来自所谓“静止的”东方。显然，时尚的主题不仅和变化有关，还和奢侈品有关。这一点将在第九章深入探讨。

同时，布罗代尔在变化主题方面也很犹豫。他确信，美国农作物比如烟草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就像其他消费品如咖啡、茶和可可的传播一样。尽管如此，但是，静止的东方仍然一直与活跃的西方形成比照，暗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革新不会在欧洲以外发生。布罗代尔在变化的和静止的社会之间设置了一种对立。[⑤] 这种二元论完全不能成立，变化的节奏当然是不同的，并迅速加剧。但是我认
186 为，一成不变的社会观念（客观地说，无论这些执行者会怎么想）

① Braudel，1981：316.
② Braudel，1981：323.
③ Braudel，1981：324.
④ 正如博尼（Poli，2001a and b）指出的那样。
⑤ Braudel，1981：430，435.

是不可能的，就像我特别论述的宗教和古老神话；[①] 即使简单社会中的技术也会随时间不断变化，例如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偶尔没有封闭，但是“封闭的体系”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

一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创新精神的看法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可能是正确的，但将亚洲所有地区都放入这种模型中显然是错误的，至少直到16世纪中国可能比欧洲更有“活力”（假设人们都能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达成一致的话）。布罗代尔“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往往体现出“长时段”特征变化速度的众多差异；但我更愿意把它们放在“大事件”的“历史”层面，属于“相互联系的”而不是“文明的”层面。还有一些做法似乎把19世纪欧洲无可怀疑的差异（以及一些优势方面）的时间提前了。尽管如此，为什么在20世纪或21世纪我们不能为社会趋同而做同样的心理准备呢？有人已经对日本作了这一论述，认为日本早期的“封建主义”使它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同样的观点也适于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很多国家吗？

但是，布罗代尔仍然提出这种看法，认为其他地区是“静止的、内向的”，也就是说，是贫瘠的文明。只有西方在不断的变化中日益卓著。“在西方，”他写道，“一切都在变化。”[②] 布罗代尔认为这是个长期特征。比如，家具在不同国家式样不同，见证“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运动——它将欧洲推向自己命名的启蒙运动的进步阶段”。[③] 后面还有几行：“如果就欧洲而言是完善的，那么最丰

① Goody and Gandah, 2002.
② Braudel, 1981: 293.
③ Braudel, 1981: 294.

富的文明、最可能变化的文明，就非这块剩下的地方莫属了。”欧洲或许在近代（一些人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另一些人则坚持文艺复兴之后）是最易变化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没有迹象表明欧洲的早期阶段更容易变化。然而，布罗代尔的程式，无论他赋予其他地方什么特性，无论提出怎样矛盾的证据，所依赖的仍然是动态的欧洲和“静止的”亚洲之间的比较。他认为这一特征如果不是永久的也是长期的。西方盗用“变化”这一概念，把它用在自己身上。

对布罗代尔而言，资本主义属于城市领域，它从城市传到乡村。他认为乡村经济是僵滞的，除非受到外部的刺激。布罗代尔反
187 问道，如果“滑稽的中国耕种方式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①]——适宜水稻生产的耕地以手用工具而不是犁来耕种，那么，西方城镇是否能够存在？当然，这种“滑稽的方式”却是一种非常密集的、“先进”农业的标志，它要求人口密度比欧洲高，城镇比欧洲大，欧洲没有这种耕种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不能为用来拉犁的较大的家养牲畜提供畜棚。的确，弄清西方城市是否“能在这些条件下存在”本身就有些荒谬，因为条件完全不同。[②]布罗代尔认为，当农业和出口联系在一起，当农作物被种来换钱时，资本主义就延伸到了乡村。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侵入”。[③]但他忽视了这一事实：乡村生产者通过在耕地、灌溉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已经建立了他们的“资本”。或者说，欧洲通过不断扩大牧群，也是“资本”积累的好方式。但对布罗代尔来说，资本家的概念是和金钱投资结合在一起，金钱投资能够让钱生钱，而不是靠劳动力或生产技术产生

① Braudel，1981：338.
② Braudel，1981：338.
③ Braudel，1984：288.

钱。欧洲在这方面是独特的。他还意识到印度和中国工匠的活跃特性，他说他们从未生产欧洲特色的“高水平的”工具。中国的人力可能太充足，[①] 这种思想很普遍，但却靠不住。[②] 不管怎样，南方的水稻生产比北方的谷物生产需要更密集的种植和移植技术，这不是简单的机械化“受到廉价劳力的阻碍”的事情。[③] 劳动工具被引进——独轮车是中国人的发明，（牲畜的）笼头可能来自蒙古（出自林恩·怀特[④]）。水车当然不只限于欧洲，风车可能来自中国或伊朗。中国人在铁的生产和煤的使用上也走在前头，尽管布罗代尔提到“19世纪后农村的停滞”，尤其在焦炭的使用方面。[⑤] 他认为古代“中国的先进很难解释”。[⑥] 如果人们仅从19世纪欧洲中心的立场来看世界的话，那么，这的确是事实。

据布罗代尔看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生产和交换所需要的“一套复杂的货币体系”[⑦]；只有“中世纪欧洲最终完善了它的货币制度”，这种说法有些奇怪，因为这些社会相互之间，以及和穆斯林世界之间不得不进行贸易。欧洲想像图景的完善要归于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外海的征服——“它产生了持续 188
数个世纪的世界霸权”。[⑧] 面对穆斯林的挑战，欧洲创造了一套完善的货币体系；欧亚其他地区则“代表了处于积极完善的货币经济生活的中间介质”。[⑨] 独特性的论断在有些方面很令人困惑，因为

① Braudel, 1984: 304.
② Hobson, 1981: 201ff.
③ Braudel, 1981: 339.
④ White, 1962.
⑤ Braudel, 1981: 375.
⑥ Braudel, 1981: 376.
⑦ Braudel, 1981: 440.
⑧ Braudel, 1981: 402.
⑨ Braudel, 1981: 448.

“海洋文明彼此之间一直是互相来往的”，至少在欧亚大陆中间是这样。地中海和印度洋形成“一片延伸的海域”，“通往印度的路线”此前已经包含两者的联系，以苏伊士的内沙奥运河（Nechao's Canal）最为有名，只是后来河道淤积了。不过，埃及一直为东西方的来往提供场所。所以，他们应该一直交换着丝绸制造、印刷术方面的信息，还有货物本身。尽管如此，对外海的征服依然被假设为欧洲提供了优势。布罗代尔着重研究的远距离贸易、大范围的重商主义依赖能讲普遍的“世界贸易语言”的能力，它促进了“建设性变革”和迅速积累。换言之，这种商业包括交换。尽管有平等、互惠和变化的趋势，但从布罗代尔对亚洲的“不完善经济”来看，欧洲不得不突显出来。所以，尽管布罗代尔抱着比较的目的，但他一直在探究与西方优势有关的东方，他认为这些优势往往是文化上的优势，是长期的，近似永恒的。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一直导向矛盾和对立。一成不变的印度使用贵金属，经历了16世纪棉花“工业化的巨大迸发”，但其经济却以“货币混乱”为特征。[①] 同样，中国可能只被理解为“处于原始的比邻经济体的环境中”，[②] 这被解释成“中国自身落后”的原因，“同时也可解释为‘支配性’货币体系的特殊实力”。应该注意，这种实力包括比西方早很多年的纸币发明，此前西方还根本没有纸，尽管即使在中国，纸币也只是在14世纪才被广泛使用。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虽然中国明朝时期（1368—1644）“落后”了，但“货币和资本经济却正在形成、发展、扩大它的利润和各个部门”，导致中国1596年煤矿的大量涌现。[③] 这

① Braudel，1981：450.
② Braudel，1981：452.
③ Braudel，1981：454.

些发展肯定减缓了它的落后，也使得中国难以符合布罗代尔的话，正如他问我们的那样（但是互相矛盾的），“在货币方面，中国比印度更为原始，更不成熟。”[①] 而印度，如我们所见，处于“货币混乱”。欧洲怎样呢？据说欧洲“独自屹立”。尽管布罗代尔承认 189
“这些（货币）运作并不限于欧洲”，但它“延伸并引入整个世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撒到其他各洲的财富之上”。随着美洲金银财宝的输入，“欧洲开始饕餮、咀嚼整个世界”，以致“整个世界的通货都陷入同一张网之中”。这一优势并不新，实际上，“13世纪后的长期压力”“提高了欧洲物质生活的水平”[②]，它是“急于征服世界”和“对黄金或香料”渴求的结果，伴随着实用知识的增长。但欧洲需要黄金，因为它没有造出多少东西和东方交换“奢侈品”，这些“奢侈品”后来在中间阶层中越来越有用。如果中国像布罗代尔说的那样是真的落后，那么，为什么西方的通货流向中国的恰恰是贵金属呢？[③] 显然不是只有欧洲才有“黄金的渴求”。东方也知道它想要的，并知道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贸易来得到它。

城市和经济

布罗代尔分析的核心集中于乡镇和城市，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这些。布罗代尔将之比作变压器，一直为人类生活不断充电。自青铜时代以来，它们显然构成了一种世界现象，但欧洲被看作是不同的。然而，布罗代尔宣称，“城市就是城市”，以“不断变化的劳

① Braudel, 1981: 457.
② Braudel, 1981: 415.
③ Braudel, 1981: 462.

动分工”为特征；人口也在不断变化，因为城市人口不能自我繁衍，所以不得不招徕居民。[①] 他提到城市的自我意识起源于对安全城墙的需要（和从15世纪以来西方火炮所带来的危机感[②]），以及城市中的内部交往意识和阶层意识。不过，尽管意识到这些常见特征，也不能阻止布罗代尔（或由于戈伊泰因对近东的论述[③]）追随韦伯在拥有“自由”的西方城市和没有“自由”的静止的东方城市之间做出区分。差别显然是有的，但学者们将这些差异定位到意识形态层面，因为他们对这种目的论的结果很感兴趣，亦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因而，布罗代尔的主要目标不得不放在“西方城市的起源”上，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他认为，在反对国家、
190 “专横”控制周边乡村的过程中，城市展现出“空前的自由”。[④] 其结果是，它们的演进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的静态相比显得“热闹非凡”。变化是受到鼓励的。事实上，亚洲城市同样也很热闹，远不是静止的，正如最近研究（例如大马士革和开罗）所展现的情景一样。

我们已在第三章讨论过，罗马帝国城市构架瓦解后西方城市在11世纪的复兴，此时还“兴起一股乡村活力”，[⑤] 据说贵族和教士进了城，这股风气也标志着“欧洲走向辉煌的开端”。[⑥] 复兴得以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增长和货币的持续使用。“商人、工匠行会、各种产业、远距离贸易和银行迅速出现在这里，还有一种资产阶级

① Braudel, 1981: 490.
② Braudel, 1981: 497.
③ Goitein, 1967.
④ Braudel, 1981: 510.
⑤ Braudel, 1981: 510.
⑥ Braudel, 1981: 479.

和某种资本主义。”[①] 在意大利和德国，城市的发展比国家还快，形成了“城市国家”。“西方的奇迹”，据说在于当城市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时它们所拥有强烈的自主性。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城市组织税收，发行公共贷款，组织工业和会计业，并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和“爱国精神的中心”。[②] 它们经历了中等阶级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学家桑巴特看来，这是14世纪末佛罗伦萨出现的一种新的精神国度的特征。[③]“建立精神的新国度，泛泛地说，是早期的仍然摇摇晃晃的新国度，西方资本主义”在“致富和生活艺术”上都获得了成功。它的特征还包括“赌博和冒险”，“商人……根据回报计算开销”。[④] 当然，所有的商人不得不都这样算计，否则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也计算冒险，这使他们特别喜欢诸如在中国冒险和赌博游戏。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城市的发展，欧洲的城市鼓励“自由”，为乡村的技艺活动提供中心。尽管中国有“资本主义活动”这个短语，但他认为，中国从来既没有在提供必要的自由，也没有在吸引乡村技工方面获得成功。布罗代尔的观点需要比较两种“城市—乡村”的关系模式，一种是独立的自足的城市，乡村为其需要服务；一种城市是官场的大本营，他们寄生和依赖于更有活力的乡村——东方模式。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恰当，因为中国城市 191
也是学者、文人，还有商人和行政人员的活动中心。从“资本主义”活动的角度排除农村，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方式限制了这种活动的定义。欧洲和中国乡村发生的事情是积极的政治制度和巨大成就

① Braudel，1981：511.
② Braudel，1981：512.
③ Sombart，1930.
④ Braudel，1981：514.

的源泉，这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的确，从当代中国来看，乡村显然急需“现代性”。

布罗代尔一边称赞欧洲城市的特殊“自由”，一边提出了一个发展图式，它由古代城市发展而来，打开了周围的乡村并与之来往。这幅图式中，“工业是基础”。[①] 对中世纪的“封闭城市”来说，人口由于农民的自我解放而增加，他们从一种奴役状态过渡到另一种臣属状态，最终臣属于“近代早期征服的城镇”。[②] 但是，国家处处“规训城市”，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国王公与教皇和美第奇家族一样。“除了英格兰和尼德兰，所有的臣属都是强行施加上去的。”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集权君主制国家，而中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国家现在被列为“臣属城市”。“自由”的西方城市这一概念需要得到限定。不过，这并不妨碍布罗代尔像此前的韦伯、马克思一样宣称与东方“帝国城市”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我们在伊斯兰世界发现了一些和西方相似的城市，但这些城市被视为“边缘的”、短命的，就像科尔多瓦和奥兰一样，尽管这种边缘性值得怀疑。的确，布罗代尔甚至还提到北非的休达是一种城市共和国。在“遥远的”亚洲，帝国城市“数量巨大，是寄生性的，是温柔和奢侈之乡”。“通常的模式是一座大城市处于王公或哈里发的统治之下，例如巴格达或开罗。”[③] 他们“没法从乡村手中接管工匠的生意”，不是因为权威本身的特性，而是因为“社会以一种特定的模式过早地确定下来”（因而总是回到文化变迁或停滞的问题上来）。印度的问题在于社会等级制度，中国则是宗族制

① Braudel，1981：515.
② Braudel，1981：519.
③ Braudel，1981：524.

度问题。布罗代尔认为中国没有权威能代表城市反对国家或乡村，“乡村领域是活跃的、积极的、富于思想的中国的真正中心”。毋庸置疑，政府官员当然代表城市，他们在城市生活，也在乡村生活，但大多数活动都发生在这些城市中心。而且，等级制度和宗族制度阻碍城市进步的观点沿袭了韦伯的分析，韦伯认为这些制度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们关注集体性而不提倡个人主义。这一命 192
题当然被布罗代尔夸大了，尤其是当他把商人的各朝各代看作资本积累的基本要素时。[①] 但不管怎样，印度城市也包括了耆那教徒和拜火教徒（祆教徒）的重要人员，他们通常处于等级制度的边缘，但对商业非常重要。布罗代尔和其他西方人的真正问题是东方的特征以及和西方城市的对照。[②]

和城市相关的自由概念有两个方面。无论在哪儿，迁往城市的乡村居民都要融入这样一种环境，这里比他们离开的那个较近的农村的约束要少。但在一些特殊的社会中，城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威的广泛约束也是个问题。显然，无论是欧洲还是西亚的城市国家中，城市的控制都不是很紧，虽然商人活动可能受到限制，但这些限制并不是由外部权威强加的，正如一些较大城市的制度一样。直到19世纪，西方城市一直都是城市国家的组成部分。显然，城市“自由”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都是不同的。总体来说，近代西方比其他地方要自由一些，这也可能是事实。欧洲社会当然也有“城市公民权”，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鼓励贸易而从政府税收中“获得自由”。东方也有一些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比其他城市更

① Goody，1996：138.

② 但是，资本主义活动同样发生在农村，尤其是当后者为工厂提供水力和劳动力，这在19世纪法国南部或美国东部都非常常见。

少受到控制。布罗代尔没有明确描述这种情况：其他地区的前工业城市一般自由较少而更加稳定。的确，其他很多城市看起来和欧洲城市一样“热闹”，有些例子中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东西方城市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布罗代尔写道，城市化，是“现代人的标志”。[①] 如果是这样，现代性应从过去，至少在青铜时代就开始了漫长的道路，虽然从那时起到现在它越来越现代。正如布罗代尔一贯坚持的：没有一座城市是孤岛——城市从不孤立地存在，它是广泛联系中的组成部分，其常见的必要特征是远距离贸易。这种贸易包括不同“文明”模式的多元性，它们不仅交换“物质产品”，还包括创造产品的方法，这是一
193 种以信息交流为特征的进程。很明显，交换的产生以消费为基础，在此推论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能理解“与众不同的”文明，还能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平行发展，正如欧洲大陆城市的产生伴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技术的大致平行发展（虽然，平行演进当然也是可能的）。它发生在绘画和文学以及宗教中。基督教从近东传到欧洲和亚洲。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和日本以及近东的边沿地带。若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使得这些得以发生，尤其在城市化方面，这些主要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活动将是不可能的。[②]

如上所述，布罗代尔对东方城市的总体看法是：它们“数量巨大，是寄生性的，是温柔和奢侈之乡”[③]；它们是官员和贵族的住

---

① Braudel，1981：556.

② 但是，交互影响对社会演变的解释的问题是，它忽视了在相对孤立的新大陆中的平行发展，它们也取得了城市文明的成就。相互影响非常重要，我们也不得不从内部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如何解释。这的确发生在一些商业和技术活动中。

③ Braudel，1981：524.

所，而非行会和商人的财产。事实上，西方城市同样也为贵族和官员提供住所，不为行会和商人**自己所有**。看到这点差别并不容易。某种程度上，城市成为西方“比较自由”的地方，但很多人否认，政府对其他方面的控制没有比“城市国家”更多。“自由”是“资产阶级”这个颇有意义的角色的核心（事实上是其产生的关键），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变化的内在特征；西方学者往往认为资产阶级是欧洲的独特特征，就像沃勒斯坦认为不断变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一样。布罗代尔承认，中国在16世纪末偶尔对此也会“默许”那种“具有商业精神趣味的”资产阶级的产生。[①] 在中国，需要朝廷“点头”；而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则被视为自然而然。同时，布罗代尔还唤起人们对西方“自由市场”各种特征的注意，即有组织的产业、行会、远距离贸易、交易票据、贸易公司、会计业。[②] 所有这些也都出现在中国和印度，正如近来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哈比卜（Habib）所指出的那样。[③] 印度也有复杂的贸易制度，包括货币兑换，这和西方一样，还有交易存条，即票据。“从14世纪以来，印度就拥有一种活跃的货币经济，它马上就要走到某种资本主义的道路上。”[④] 在此，布罗代尔似乎与他早期对印度混乱的货币体系的结论产生抵牾，因为这一“特定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 194
“真正的资本主义”[⑤]——“有批发商、商业贷款和成千上万的辅助性机构：代理机构、经纪人、货币兑换机构和银行。就技术而言，交易的可能性或保障性，这些商人团体中的任何特征都堪与西

① Braudel，1981：524.
② Braudel，1981：512.
③ Pomeanz，2000；Habib，1990.
④ Braudel，1984：124.
⑤ Braudel，1984：486.

方相提并论。”这些特征不仅出现在城市中，而且还在11世纪欧洲城市重生之前就已出现。但布罗代尔认为仍有所欠缺。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不能构成“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这一概念是布罗代尔欧洲资本主义起源观点的本质，也是和其他更广泛的“微观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网络”的真正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本质。[①]

这里有些混淆。布罗代尔提到的“强大网络”仅仅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才出现。尽管商业在此前早已形成，但他始终强调的是15—18世纪的发展，这些发展被设想为“微观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内，城市的“自由世界”和“真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相关联的。问题是，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活动出现在很多早期社会，他感到在资本主义性质方面也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方面需要说明19世纪欧洲的主导地位，因而以目的论的方式搜寻资本主义形成中的特殊因素，这使他陷入重重矛盾。但就此前存在的条件而言——这些条件或许会把西方引向“真正的资本主义”，整个欧亚看起来大致相同，即便有些术语用以区别东方和西方。城市到处都有，但“真正的”城市只存在于西方；只有在西方，“自由”才迎来了它的时代，而自由对商业活动和先进生产是必需的。

如果人们像布罗代尔一样，将一般化的资本主义理解成所有城市及其商业的一个特征，那么，西方独特性的观点便失去了很大影响力。后来的城市及其活动从各个方面都继承了早先的城市，不仅继承了商业和制造业，还有行政和教育职能，所有这些都与文化的普及有关，属于社会发展进程（或社会“演进”）。因为只有城市才

① Braudel，1981：562.

是文化的中心，它包括文学生产、成文的宗教和文本知识，后者在各种前后相续的形式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就像它对发明、生产发展和交换进程的贡献一样。对商人及其商业来 195
说，城市更是中心，就像它们是经济财富中心的重要根本一样。

金融资本主义

我现在要特地转到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上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布罗代尔将潜藏在市场经济下的“物质生活”从商业社会中分离出来，现在他又将其从金融社会“这一资本主义的特权领域”中分离出来。[①] 在资本主义等级和时间秩序中，正是在金融资本主义这第三个层面上，布罗代尔认为欧洲站到了领先位置，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位置。在布罗代尔对待欧洲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立场中，我们发现了抵牾：这两者有时被平等对待，但其他时候他便提出欧洲早在工业革命前就具有优势。事实上，后者似乎是他通常的立场。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活动本身，在“商业社会的顶端”占据“居高临下的位置”。在布罗代尔的眼中，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更受限制。完整的或真正的资本主义“总是产生于比它自身更良好的环境中，这些发展条件前后相续，上下关联”。[②] 良好发展条件的一部分便是远距离贸易，“就资本的增长和迅速繁殖来说，它是一架无可比拟的机器”。[③] 经济学家多布（Dobb）将其视为商业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④] 换言之，资本主义

① Braudel, 1981: 24.
② Braudel, 1984: 374.
③ Braudel, 1984: 405.
④ Dobb, 1954.

不仅一直和货币、信誉有关，还和金融、金钱的自我增值有关。①

布罗代尔将正在产生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博览会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是单纯的欧洲现象，“金钱和账款从一个博览会流向另外一个，在最好的流通状况的影响下，16世纪的进步必定在**以前**的基础上获得”。② 博览会和市场为金融交易提供了途径和清晰的账目，当然在早先和其他地区也非常活跃。显然，在西方，博览会不仅对货物买卖非常重要，而且对其导致的金融交易，如香槟展销会上的
196 交易，也非常重要。但它们也存在于东方。埃及苏丹与威尼斯或佛罗伦萨之间的条约甚至在“博览会的法则下”失效，“与西方管理博览会的规则没什么区别”。③ 近东的贸易和其他地区一样生机勃勃。在阿拉伯国家的城市“比西方任何城市的市场都要多”。④ 亚历山大和叙利亚有一些特殊场所留给外国商人，这和威尼斯的情况一样。同样，在阿勒坡和伊斯坦布尔，宿店和客栈为欧洲族落和东方商人而建。展销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在印度，它们常常和朝圣连在一起。在近东，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和伊斯兰的最大展会一起举行。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出现在类似的展会上，他们的长途交通工具“一点儿也不比欧洲逊色”。⑤ 在中国本土，据说展会是有限的，但是“市场还是比较自由的”。这些展会通常和佛教或道教寺庙的盛典有关。⑥ 因而，布罗代尔得出的结论和他的其他论述相反，在16世纪，“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地区面临着巨大的需求，

---

① 尽管有这些趋势，但欧洲早期的很多财富都流向宗教活动而不是全球投资。

② Braudel，1982：135.

③ Braudel，1982：128.

④ Braudel，1982：129.

⑤ Braudel，1982：130.

⑥ Braudel，1982：131.

对我们来说，彼此似乎太接近了，可说是平行或几乎平行”。[①]

这种平行的情形延伸到贸易领域，东方和西方一样一直都在变化。城市生活和商业生活一直在发展。趋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数据问题，而是经济、交流和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中平行的社会演进。东方与西方的差距仅在时间上出现得相对晚一些，但却构成了“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下一个50年这个差距真的重要吗？如果不重要，那么它又有多“基本”呢？不过，对布罗代尔而言，欧洲的真正起飞始于启蒙时代，在1720年之后。他提出“西方发展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较高层次的商业机构的建立，二是18世纪税收名目的激增”。[②]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帝国行政阻碍了”任何在最低层次的商店和市场之上“产生一个经济阶层的努力”。从这一普遍的欧洲观点看，伊斯兰世界和日本最像欧洲。所有这些当中，除了金融，布罗代尔很少谈到生产。但事实上，所有商业和制造业活动，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地方的，都需要生产和分配的结合，而两者的结合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布罗代尔承认，当欧洲人抵达东方时，他们所发现的是大规模贸易，而不能完全说成小商小贩，正如勒尔（Leur） 197
所认为的那样。[③]这比此话隐含的意思重要得多。很多商人和大股东签订契约，东方和地中海一样也有合约（海外贸易契约）。[④]包括波斯人和阿美尼亚人（Amernian）在内的东方商人都到过威尼斯，并的确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贸易。[⑤]诚然，生产、分配和财政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随时间而日益复杂，但布罗代尔希望在金融资本主义和其

① Braudel，1982：134.
② Braudel，1982：136.
③ Leur，1955.
④ Constable，1994：67ff.
⑤ Braudel，1984：124.

他资本主义之间做出一个概念区分，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我们看到，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仅仅在欧洲得到真正的发展，可能还有日本。限制其发展的原因是政治的和“历史的”，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因素。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大家族在各朝各代积累财富，这些因素在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发展的原因与这些条件有关。布罗代尔在第二卷的结论中批判了韦伯和桑巴特，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得不谈到西方‘精神’的结构性优势”。[①] 布罗代尔问道，如果中国的舢板船队在1419年，也就是说，大概早达·伽玛80年绕过好望角，那将会发生什么呢？但是，在对待那些拥有舢板船而不是普通船的国家，“舢板船”这个词语的用法似乎体现了某种矛盾的心情。但布罗代尔提出，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资本主义在欧洲获得成功，在日本只是开始，而其他所有地方却都失败了”，或没能达到“完整的资本主义”。[②] 他说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呢？布罗代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提日本的特殊性可能还有点依据。那时，这本书已经翻译成英语，但随着亚洲虎的出现，一些国家或地区崛起，东方的情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上是中国内地印度经济体的广泛扩大。

事实上，布罗代尔意识到了16世纪中国福建远距离贸易的活力，福建繁荣的经济与内陆的“静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的特定模式……只有避开中国内地的严厉控制，才能达到它真正的规模”。[③] 因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政府及其密切

① Braudel，1984：581.
② Braudel，1984：581–582.
③ Braudel，1984：582.

相关的官僚制度”。[①] 理论上政府拥有所有土地（虽然私人土地所有权可以追溯到汉朝），“甚至贵族都要仰仗国家的亲善”。每个城市都有巡视。仅有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有权铸造钱 198
币——“积累只能通过国家获得”。实际上，商人可能因为外露钱财而被文人妖魔化。中国拥有繁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最高层面控制一切。“所以中国没有资本主义，除非在某些明确限定的群体内。”[②] 但很多这种限制不仅局限在中国，甚至是欧洲“进步社会”的特征。国家干预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害。在日本，还有特别是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一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上说，东西方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布罗代尔这里的分析代表了很多早期“世界史学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重要观点。但从政治上说，有些东西就欠缺了。“专制”是布罗代尔用来描述中国、印度和土耳其情形的形容词，却从来不是针对欧洲国家的，欧洲国家是“绝对主义”。商人在东方出现，但从没有像他们的欧洲同伴那样“自由”过；而且，“自由”一词产生于欧洲居民的语境中，它也并非仅仅指商人的自由。布罗代尔的西方偏见在言语中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比如，他认为“在西方中心所找到的只有自由或近似自由的农民”。[③] 这种区别由于使用“专制”一词而概念化了，出现了我们在第四章论述过的问题：有些社会农民被看作自由的，其他则不是。自由也被视为西方商人地位的一个特征，这不像东方商人的情形，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广大的乡村。但对亚洲

① Braudel, 1984: 586.
② Braudel, 1984: 589.
③ Braudel, 1984: 589.

城市的近期研究中，例如罗威廉（Rowe）对中国[①]或吉列恩（Gillion）对印度[②]的研究，似乎与布罗代尔-韦伯式的断言相抵牾。何炳棣对“中国18世纪盐商的重商主义”的研究[③]，吴振强对厦门海上网络的研究，还有陈锦江对清朝官员和商人的研究[④]，都反驳了布罗代尔的观点。商人可运作的余地比布罗代尔意识到的要更大；文人当然也不全是整个官僚阶层。[⑤]乡村和城市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更为分化；尽管很多学者提出“乡绅”可作一个群体，其他人还讨论过农民起义[⑥]，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布罗代尔对这些乡村社会结构的错误评论和对乡村经济形势的正确估价是相关联的。

但是，布罗代尔承认明朝有一个资产阶级（“一种潮流之后”），
199 东印度群岛也有一种“殖民资本主义”。但他认为国家权力不像日本那样受到当时封建政权的调控。[⑦]人们在日本发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它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充满了“自由”。日本的政权不是极权主义的，布罗代尔认为中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但更“封建”一些。“所以，（日本）所有事情凑起来（例如有序的股票交易）便产生了早期资本主义”[⑧]，自由也就随着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同样，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所有欧洲的典型特征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资本、商品、经纪人、批发商、银行

① Rowe，1984.
② Gillion，1968.
③ Ho Ping-ti，1954.
④ Chan，1977.
⑤ 参阅吴敬梓（Ching-Tzu Wu，1973）。
⑥ 例如谢诺（Chesneaux，1976）。
⑦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被看成半殖民半封建国家（Brook，1999：134ff）。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分权统治”相联，这种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普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
⑧ Braudel，1984：592.

业、商业机构，甚至技术无产阶级，和类似制造厂的工厂……甚至还有专门的掮客替商人和家庭作坊拉拢生意……最后是远距离贸易。”[①] 但这种“高度密集的商业”只是出现在某些地区，没有在整个社会普及开来。按照彭慕兰的说法，人们很想知道是否有真正的大型商业组织——即便是英国式的。

在布罗代尔（也是很多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仅仅反映了欧洲的编年史，不具任何因果关系。就布罗代尔而言，在封建的分配情形下，商人家族被人瞧不起，成为二等公民，因而不得不为身份地位作斗争，而且还因吝啬而遭到鄙视，进而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动机。据说印度没有这种家族，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没有。人们需要为资本主义而发展市场经济，但资本主义只出现在特定社会，“它从过去就创造了有利环境”。[②] 这些社会都是阶级社会，经历了朝代更迭，鼓励财富积累。事实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真的没有商人家族吗？这并不可信，一如我们从近东的艾哈迈达巴德和很多家族中看到的一样，这些家族一直存在并积累财富。布罗代尔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他排除了其他地方正在发展的“真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文化因素抵制这种可能。资本主义起源依赖深层的文化根源。换言之，和上述提到的一样，政治或“历史的”因素比经济或社会的因素更重要，当然也比宗教因素重要。

和西方一样，随着时光流逝，其他社会也一直保持某种连贯性。布罗代尔的“文化”概念似乎认为，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一成不变，至少东方是这样。中国一直都有官吏，印度也一直是等级制 200

① Braudel，1984：585.
② Braudel，1984：600.

度，土耳其也一直有它的西帕希（sipahis）。[①] 布罗代尔认为，“社会秩序稳定而单调地自我复制，与基本的经济必要性一致”；文化（或文明）随时间一直延续，尤其由于宗教的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社会结构的空隙”。[②] 但是欧洲“更灵活”，更易接受变化，这一特征也似乎要归因于“文化”或“文化精神”。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多领域的变化似乎更加迅速，事实上确实如此，但把这一能力从文化角度直接推到过去，似乎是一种跳过论证的非历史方法。

布罗代尔意识到早期其他地方例如伊斯兰世界在财政和贸易上的平行发展。“整个伊斯兰世界，工匠行会及其经历的变化（师傅—学徒、家庭作坊、城外的工匠制造）与发生在欧洲的极为相似，因而都是经济逻辑的结果。”[③] 社会演进体现为劳动生产和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尽管中国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试图限制了一段有限时期的对外贸易，但它一直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山西商人和票号老板走遍了中国。”有些人甚至到了国外。“中国还有一种网络，出现在南部沿海（尤其是福建），一直抵达日本和东印度群岛，形成了几百年的中国海外经济体系，这与殖民扩张极为相似。”[④] 印度的外贸早在欧洲船队出现前就已广泛扩张；而它的高利贷商人也大量涌现到伊斯法罕、伊斯坦布尔、阿斯特拉堪（Astrakhan），甚至到了莫斯科。开放的大西洋贸易制造了重要的差别，但欧亚大陆的贸易一直非常活跃。这也并不是东西方的基本差别。

这些商人再次和欧洲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罗马帝国瓦解

① Braudel，1984b：61.
② Braudel，1984b：86.
③ Braudel，1982：559.
④ Braudel，1984：153.

之前就已存在，进而将“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化了。在帝国瓦解之后欧洲再度敞开大门。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尾，为了与东部地中海、亚洲，以及主要和近东伊斯兰世界（它的买卖来自中国等地区）开展贸易，威尼斯建立了商业舰队和海军。它既发展商业又发展海军。造船的兵工厂大约在12世纪建立，但只是随着14世纪前后新式军械库的建立才得到发展。“兵工厂”（Arsenal）是阿拉伯词语，相同的建造站点也存在于地中海，包括土耳其，各站点之间存 201
在明显的竞争。随后的三百年，威尼斯建造了最好最实用的战舰，尤其是轻型引航舰（galea sottile），作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大型战舰（galea grossa）的补充。兵工厂的建立需要国家垄断。数额巨大的船只建造了起来，并培植出了西方世界最大的一支舰队，它有100艘轻型引航舰，外加12艘大型战舰，这也是为什么1571年在威尼斯对土耳其的勒潘多战役中功绩卓著的原因所在。这个兵工厂和东方其他相似的机构一起说明，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的工业革命产物的这些特征，事实上出现得更早，也不仅仅出现在欧洲。

为了建造这些船只，兵工厂以流水线生产组织起来，“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集中地”，[①] 有2000—3000人。从1360年开始，劳动力在阶层上开始分化，对一些专业的优秀工人付以薪水，其他人则按每周算钱，雇佣方式主要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这种形式也给了他们相当的“自由”。暂将其说成“一种混合组织”，“现代和前现代同时存在，由此，工作关系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化（到组织内）了，尽管工人人身没有完全受到控制”。[②] 这种情况显然提出协调和管理的问题。所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大型运作

① Zan，2004：149.
② Zan，2004：149.

都是这样，需要分层、专门化、预估、成本预算和各种组织技巧。近代欧洲早期，这些特征特别和兵工厂有关，它们是最主要的工厂机构。[①] 指出这点并不是说在20世纪美国所谓的“看得见的手”出现之前，[②] 我们就看到了威尼斯“管理制度”的诞生。而是说，随着实际开始于青铜时代的工业活动的复杂化，我们看到，技术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而渐次产生。就威尼斯来说，应该强调的是，任何制造大量船只尤其是舰船的公司，无论是土耳其、印度还是中国，都必须面对这类问题。没人“发明”管理制度，尽管它们详细地阐释了日益增长的复杂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威尼斯的兵工厂没有什么特殊的独特性，它更多的是行为职能而不是文化功能。

202 这是欧洲“真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组成部分，通常要追溯到先前的优势和不平等状况。说到从“体系”或“部门”思考社会的构想，布罗代尔主张，欧洲整体的社会情况都比较容易研究，“它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大约11世纪或12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经济往往主导了其他部门，16世纪以后更加显著。”[③] 11世纪特指商业、城市和“封建主义”的发展，紧跟着上一个千年，预示着另一个新千年。[④] 而16世纪首先指的是荷兰和英格兰“大商业公司”的活动，他们在北半球创建了霸主地位。正是在16世纪，“一个新的阶级”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在商业背景下产生了”，[⑤] “凭借自身的努力”爬上“当时社会的最高位置”。作为新的一代，他们只是以

① Concina，1987.
② Chandler，1977.
③ Braudel，1984：460.
④ Duby，1996.
⑤ Braudel，1984：478.

资本家的身份幸存下来，后来成为大资本家，并和文艺复兴的人文文化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吹响了启蒙运动的号角，[①] 引导“革命的意识形态”反对“有闲贵族阶级的特权”。[②] 正是在“复杂的力量冲突中，中世纪到18世纪这段之间，经济得到了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③] 欧洲以外的情形则不然，因为“数百年来国家施加了难以容忍的压力”。[④] 只有在15世纪的欧洲，政府采取“坚定的扩张”，并创造了第一个“现代国家”。而其他地区还是旧制度横行。“只有欧洲创造了政治（当然不光是政治）。”[⑤] 这种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贬低了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更多依赖的是批评者（政治哲学家）的呼声，而不是实际的政治制度的经验分析。

布罗代尔承认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少，而产生“真正资本主义”的欧洲一直都有些特殊的事情。他写道，经济以及实际的社会总体发展“在整个欧洲有同步发生的趋势”，其他地区则没有发生（虽然不得不考虑组织单位的大小）。[⑥] 但考虑到欧洲和近东之间如此密切的（互惠的）关系，这些其他的发展如何就不能“同步发生”了呢？[⑦] 如果这是近东的事实，为什么亚洲其他地区就不 203
能这样呢？布罗代尔偶尔会忽略互惠贸易，他认为这些贸易基本上缺乏历史和政治因素。换言之，那些遥远的过去，可能是文化使得欧洲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而其他地方则不可能。这和布罗代尔

① Braudel, 1984: 487.
② Braudel, 1984: 504.
③ Braudel, 1984: 461.
④ Braudel, 1982: 514.
⑤ Braudel, 1982: 515.
⑥ Braudel, 1982: 477.
⑦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布罗代尔提出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增长和下降或多或少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体现了其他领域同期发生范围的可能性。

理论方法的大问题有关。首先，他在经济阶层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一区分的确有某种启发性价值，但是它也导致完整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的严格分离。市场经济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①] 只是在某些地方才与“一种至上而下的经济一起发生，从上层控制下层活动，引导它们，以其恩惠控制它们”。因而，完整的资本主义适于欧洲。

其次，布罗代尔不仅相信分析方式的循环（重复），还相信因果因素的循环，强调他的分析是持续的、循环的和“文化的”。他提到有位历史学家否定了康德拉杰夫周期循环（Kondratieff cycle）的意义，具体说是历史标准周期的重复运动。他总是怀疑自己的前提，自问道：“有没有可能认为人类历史遵循一般逻辑难以解释的重要步伐？我倾向于回答，可能。”[②] 但我本人更愿意相信逻辑，并非常明确地回答，不可能。无论如何，这种循环观如何匹配布罗代尔在其他地方所采取的发展观，这一点并不清楚。

布罗代尔的总体发展观是，“自历史的黎明那一刻起，资本主义就已**潜在地**可见了”。[③] 这里的“潜在”是怎样的程度呢？他认为，欧洲城市的兴起或许是转向可能的第一个潜在指标。13世纪，商业和工业包括银行业一直在发展。我们看到，布罗代尔不同于很多学者，他对早期和其他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有准备之心。但是，只有极少领域有利于“真正”资本主义必需的资本增值。这些使布罗代尔意识到完整的资本主义没有理智，甚至几乎是“不理智的投机活动”。[④] 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与众不同：从长远看，它产生了“新的

① Braudel，1984：38.
② Braudel，1984：618.
③ Braudel，1984：620.
④ Braudel，1984：577.

生活艺术，新的思考方式”，[①]几乎是新的文明，不是在新教改革时期，而是一直伴随着天主教的文艺复兴。13世纪的佛罗伦萨是座“资本主义城市”[②]，其他城市如威尼斯也是，不过却是因为交易，而不是因为生产。18世纪的欧洲，是商业而不是工业或农业让其赚取大笔财富，人们确实不得不拿出东西买卖。利润在商业中生成。[③] 204

在布罗代尔看来，参与这种全方位的（欧洲的）资本主义为资本家的经营带来巨额财富，当然其中并不总是直接的竞争行为（偶尔也有垄断）。[④]即便垄断的发展——如列宁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而是在更早时候就已出现。但在过去，垄断“只占据经济生活的狭窄一角”。[⑤]然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便是，它能在片刻之间将垄断从一个部门扩散到另一部门。[⑥]布罗代尔清晰地思考了金融资本主义，包括股票和参股，他认为这些处于经济结构的顶端。同时，商业也还包括装船的固定标准和目的地的既定方向。当然，正如工业和交易所显示的，需要新的金融，更复杂的金融。但在发展过程中，货物的生产和分配日益重要。

资本主义的时间

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何时在欧洲出现？一些历史学家愿意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开端看成西部地中海的开放，借助威尼斯与东方

① Braudel，1984：578.
② Braudel，1984：578.
③ Braudel，1984：428.
④ Braudel，1984：432.
⑤ Braudel，1984：239.
⑥ Braudel，1984：433.

的贸易在新的千年里蓄积力量。妨碍这一前进的事实是，由于14世纪的黑死病，整个欧洲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倒退。直到15世纪末英格兰才从这场瘟疫中彻底恢复过来。那时，在人口恢复的影响下，自耕农、蓄养羊群的乡绅、城市的布匹制造商、商业冒险者发起了一场所谓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生羊毛的出口为家庭生产的织布出口打开了门路，主要由一些棉花商收集，然后用船运到欧洲。亨利八世即位时期，商业冒险公司这一伦敦布匹出口商的联盟，控制了伦敦—安特卫普市场（以前是布鲁日），取代商站公司从事生羊毛贸易的重要经济。1496年，他们组成一个有规章的组织，实行合法的垄断。发展的结果是，畜群剧增，圈地获利，意大利的银行家都聚集到伦敦。地主在经济生活中呈现出不同的角色。首先是纺织品原材料，继而是纺织品本身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农业食品的生产，促
205 进了这一变化。佛兰德斯、荷兰和意大利的纺织贸易对欧洲的恢复非常重要，因为它生产东方需要的产品，同时鼓励欧洲进口东方的纺织品，特别是丝和棉花。欧洲后来努力在进口替代品时使东方的产品适应本土条件，开始了所谓的工业革命。

很多人都愿意将欧洲经济的优势看作近代的事情。对布罗代尔来说，欧洲经济是真正资本主义的母体，但时间不同，很早就有发展。在欧洲的第一批城市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个特征似乎都有雏形。[①] 这些城市国家都是“现代模式”，“走在时代的前列”。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开端大约出现在13世纪，依靠意大利主要是威尼斯的船只和商人收复了地中海。[②] 布罗代尔提出，十字军东征是获得这些成就的最大动因。只有在14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意大利才真

① Braudel，1984：91.

② Braudel，1984：93. 洛佩茨（Lopez，1971）年称之为商业革命。

正发展为商业中心。这些运动导致城市用围墙隔开了乡村和城市，这一发明受到与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交往的影响。例如，意大利西南部阿马尔菲的兴起已被解释成城市与伊斯兰国家所享有的特权关系联系。在那里，其他“城市国家”即将建立。

金融的发展显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关键。据说，大多数经济特征都无法追溯到古典时期，国债概念便是其之一。这一债务是英国“财政改革”的关键，与资本，尤其是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在经济部门中找到，一直寻求参与更活跃的国际贸易[①]：“资本嘲笑国界。”[②]我们看到，布罗代尔认为信誉、交易和金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导致他贬低生产活动，甚至工业革命，以及机器时代本身，尽管他在巨著倒数第二章中谈到了这一过程。他试探性地提出，欧洲的工业生产在17—19世纪至少增加了5倍，也就是所谓的革命本身之前，对于这一命题我们将回到里格利（Wrigley）的讨论。[③]很多大型生产是在津贴资助和垄断之下兴起的，这种情形只随机器时代而变化，因而像国债一样附着在民族国家的活动上（尽管在国际商业中基本是悖理的）。但生产的增 206
长对促进消费文化的确很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识到了——当北部的产品生产越来越廉价，这一事实被看作“工人的胜利”，并导致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新教国家的强势兴起。[④]

对布罗代尔而言，还需要增加一点的是，工业革命不仅是储蓄率、技术投资的增长，还是“一场全面的看不见的进程”。[⑤]他认

① Braudel，1984：554.
② Braudel，1984：528.
③ Braudel，1984：181.
④ Braudel，1982：570.
⑤ Braudel，1984：539.

为这种复杂性使得向其他地区传播资本主义非常困难。为了参与这一进程，作为整体的当代第三世界将“不得不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在早期，资本主义仅存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即欧洲，这一点是可能的。布罗代尔认为与革命紧密相联的机械化在欧洲可能始于13或14世纪，真正的先驱者可能是德国的采矿工业，其对机械的依赖在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意大利紧跟其后，这里发生了一场人口革命，并产生了第一个“民族国家”（15世纪早期），米兰地区发展灌溉和“高地农业”的农业革命早于英格兰和荷兰。事实上，如果米兰有国外市场的话，它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得更远。不过，16世纪落后于法国的英格兰也用煤作能源，使得大工厂适应大市场（是海外市场而不是通常的国内市场），并在生产上进行革新。但革新绝不仅限于西方，它吸取了很多东方特征。在东方，机械化和产业化已经开始，农业在很多领域都非常先进。

总之，布罗代尔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时间犹豫不决。实际上，无论我们提生产还是财政，都包括产品的制造和交换。就发生的时间来说，资本主义是普遍的，但“真正的资本主义”只是近代西方的特例，即便资本主义的根源要回溯到更远的历史中。布罗代尔的不确定性反映了西方历史学家中普遍的分歧。马克思最初认为欧洲的13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开端，而沃勒斯坦顺着自己后来的研究路径选择了16世纪。内夫（Nef）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6世纪，当时，产业化在整个欧陆还只是“地方性的”。另一些人，例如C. 威尔
207 森（Charles Wilson）和E. 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开始于1660年英国君主制的复辟。更常见的观点，认为18世纪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中心，其关键因素是即将到来的机器时代，亦即技术的发展，马克思

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棉花产业及其批量生产和广泛的商业。

因而，经济史学家对欧洲优势开始的时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对开始的地点也有分歧，这两者是相联的。最近的评论中，经济地理学家里格利提出[①]，直到19世纪初期，英国显然有别于它的欧陆邻居，它更富裕，发展更快，城市化程度更高，更少依赖农业，并将国家收入投入技术革新。罗斯托（Rostow）认为1783—1802年是英国的起飞，1830年之前是其发展。联系这种看法，铁路时代似乎就有点缓慢，尽管整个经济发展加快了。因而，里格利得出结论说，英国的分岔比平常想像的要早得多，18世纪时它就在对手中表现出明显优势。他认为这一优势并不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因为发展的缓慢势头仅从1760年开始，而是基于此前的一两个世纪的较大进步。这一发展源于他所谓的先进的“有机经济”内在可能性扩张的成功，而“有机经济”中的具体物品从动物或植物原料[②]（它们也提供能源）一直到无机物（具体地说，以煤和矿物燃料为基础）中都可获得。

以盎格鲁为中心的观点不是无可争议的。在德弗里斯（de Vires）和冯·德沃德（van der Woude）看来，在16世纪中期到168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第一个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荷兰。不仅商业和工业，还有农业都囊括进蓬勃的扩张之中。城市迅速发展，预示英国150年前景的主导性结构转变也产生了，[③]良好的交通设施（主要是水上交通）和廉价能源（主要来自“泥煤”这种“无机物”）促进了这一进程。17世纪末插进一段停滞时期，因为上述两位学者提出现代经济不一定能自我维持。但里格利断定，英国的发展是

① Wrigley，2004.
② Wrigley，2004：23-24.
③ Wrigley，2004：62.

指数性的，当有机经济转向无机经济时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分岔。

以民族国家来解释，先是荷兰后是英国，发展了先进的“有
208 机”经济——就发展而言，这些经济几乎不能自立，继而转向发展无机经济。然而，这些经济都不是第一个转向机械化的，就像我们从卢卡的丝绸生产历史中看到的那样，造船业和地中海兵工厂枪炮制造的工厂组织也不是最早转向机械化的。换句话说，意大利在这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意大利与中国和近东一样使用水力作为能源，也不会像烧木材一样受到有机物的限制。譬如，水力在造纸中的运用，赋予阴雨绵绵的欧洲比近东更大的优势，导致效率更高的纸张生产，进而开始出口而不是从近东进口。然而，中国早在英国和欧洲之前就已使用水力和矿物燃料（在鼓风炉中）；有机经济的特征到处都是，或者换言之，已经为资本主义挖好了壕沟，正如机械化甚至产业化一样。就“前工业时期”荷兰和英国农业的密集度而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意大利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彭慕兰讨论的那样，[①] 这些提醒我们务必谨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快速增长的说法（就像里格利警告我们留意不列颠或英格兰的发展一样），还要提到特殊地区和需要加上的特殊时间，因为这些变化太大。譬如，诺曼时期富庶的意大利南部在近代却倒退为意大利黑手党的老窝。北大西洋海岸的国家突然出现在这幅图景中，他们以出口“有机”纺织品、羊毛——后来是羊毛纺织品——而做到这一点，从不列颠到佛兰德斯，到法国北部，进而是意大利。他们沿着北海最后到地中海发展海上贸易，此时的主要活动都在这些地区发生。

---

① Pomeranz，2000.

各地区间的震荡不仅仅是“减少回返”原则发挥的作用，里卡尔多（Riccardo）解释了这一点。农业经济不是孤立存在的，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不是。那时，农业领域的发展受到城市和商业发展的刺激，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震荡产生于各种因素，发展在短期内不是持续性的，但长期内是可持续的。震荡也发生在个别的产业经济之内，这里，英国发展的主导地位为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铺好了道路，每个国家都挖掘了特殊优势。当今的中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竞争与优势只是游戏的名称而已。 209

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包括比较研究问题的韦伯和布罗代尔，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即便从不同的社会考虑种种数据，最后又都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认为欧洲是资本主义的“真正”故乡，恰好在大分岔之前。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研究的情形是19世纪的欧洲——毫无疑问，那时的欧洲是有相对优势的。但是，把这一优势推到近代早期和中世纪，经济、技术、知识和交流方面的很多成就就要大打折扣了。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取得了这些成就，包括“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这样做的结果是盗用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特征和精神（或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并声称它是西方独一无二的，甚至即使西方的一分子——英国或荷兰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第四章的最后，我讨论了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藩属国”概念的价值，及其在青铜时代城市革命以来持续发展的意义。我们需要着眼于五千多年的经济发展。我提到城市文明的进步，商品生产和思想的增长，继而是重商主义的发展。当然，所有这些领域还有另外的发展，进步的节奏随着交流的变化而加快，一直通向电子媒介。这些发展中，作为18世纪末英国特征的日益增长的产业化对将

来是最有意义的。但是，产业化、机械化和批量生产也开始在欧亚其他地区缓慢发展着，例如中国的纺织品、瓷器和造纸领域，印度的棉花——后来在欧洲和近东占据了主导地位；还要加上的是毁灭性武器的生产，以现代化流水线组织的工厂的批量生产（包括私人和国家资本），各地区的铸造厂和军工厂等领域。我们需要以长期的发展图式来思考欧洲大陆。

如果我们质疑欧洲经古典时代、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一特殊顺序的恰当性，那么，我们就要从长远的观念来看。城市文化的发展从青铜时代经铁器时代，到地中海同时还有中国和其他地区古典文化的繁盛时期，西欧的瓦解，中国缓慢却持续的增长，西方城市的逐渐复兴以及它们与东方的一直持续的交流，带来了商业活动和城市文化的相应发展，这一进程时快时慢。商业文化发展出多样化
210 的产物；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导致了批量生产和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但是如果不采用19世纪资本主义形成的概念，这一进程的所有一切也可以描述为世界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我们不需要通往假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阶段顺序，这些顺序仅限于欧洲。这种论述避免了欧洲分期及其长期优势的假设。

因而，布罗代尔的论述促使我们反思：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它似乎总是将我们的分析推向欧洲中心主义。事实上，在布罗达尔的论述中，他谈到了广泛的商业活动及其衍生物，所有这些最终主导了社会。它往往包括交通工具（比如船只）或生产工具（比如织布机）的再投资利润，但这一进程也发生在很多农业社会。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确是这一行为的扩展。由此，我们可不可以抛弃这个来自19世纪英国的贬义词，而认识一下从青
211 铜时代一直到现代社会市场和资产阶级活动的持续性因素呢？

The Theft of History

偷窃历史

第三部分

三种制度机构和价值观

第八章

机构的盗窃：城市和大学

西方有种普遍看法，认为欧洲城市本质上不同于东方城市，尤其是在创造“资本主义”的因素方面。持这种看法最为著名的人物要数马克斯·韦伯。这一区别应该产生于古典时代末期之后欧洲生活的特殊环境，尤其是具有封建主义特征的政治经济条件（它目睹了意大利北部“自治”城市的兴起）。与此相关的普遍观点是，高级教育始于11世纪西欧博洛尼亚各大学的建立。[①]以此看来，欧洲城市中兴起的类似的大学群体提供了质的飞跃所需的动力，从而使欧洲在中世纪数百年之后的思想生活卓尔不群。据中世纪专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看来，西方基督教欧洲在12—13世纪的转折实际上经历了城市和大学的双重诞生，尽管他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的思想家，而不是作为机构的大学，但他写道：“中世纪我们的思想模式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它与城市的关系。”[②]两者都被视为西方特有的，并发展了现代性。这两种假设都很有问题，也说明即便在吁求一种完全不同解释的有力证据面前，欧洲学者仍然一致维护一种十足的欧洲中心论立场。

---

① 参阅哈斯金斯（Haskins，1923：7）的研究。研究认为大学是“12世纪复兴的一部分”，受到阿拉伯知识的影响，虽然萨勒诺可以追溯到11世纪中期——“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所大学”。

② Le Goff，1993：xiv.

城 市

我们先来看城市。讨论中世纪时，很多历史学家都集中分析了乡村和封建的关系。如希尔顿（Hilton）提到的，这一点对马克思
215 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①]城市大多被降为历史背景，对封建的发展来说相对不太重要，至少在早期阶段，它们在欧洲历史上重新露面的同时也开始了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反映出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进步。其他学者比如安德森也注意到中世纪盛期的“城市区域”，但没有把它们同周边的农业环境分开。

西方“相互联系的城市公社毫无疑问代表整个中世纪经济的先锋力量”。[②]在罗马帝国的最西边，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安德森缩小了城市瓦解的范围，将眼光投向很多延续下来的自治村社，比如意大利北部。后来，其他一些中心在新千年里发展起来，其中大部分“开始时都得到封建地主的推动或保护”。[③]城市很快便获得了“相对的自治权”，诞生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贵族和教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譬如意大利的圭尔夫（教皇党）和吉伯林（皇帝党）。这意味着“主权分割”，也就是说，贵族和教士势力之间存在一道缝隙，而资产阶级从中获利，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并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然而，东方的城市仍在继续，城市居民也一样如此。地主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成为城市的推动者，尽管宗教中心和教会城市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

---

① Hilton，1976.
② Anderson，1974a：192.
③ Anderson，1974a：190.

古代的城市没有随着罗马的瓦解而消失，“城市人口、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赌博游戏、有着良好修养的上流社会等一直延续下来，至少在西方和南部小亚的地方首府延续着，在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以及直到阿拉伯入侵时的埃及，还有阿拉伯统治以外的地区”。[①]直到7世纪，意大利甚至拜占庭“与同时代的近东（还有那时的阿拉伯）看起来都很不相同，那里有太多延续下来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繁荣的迹象”。[②]但西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英国，像陶轮技术的使用、用砖和灰泥建筑这些技术都消失了，学校从残留下来的城市中灭迹，室内运动场废弃不用，错综复杂的罗马经济生活已不再。总体上，教会和乡村地主成为生活的核心，特别是“城市不再拥有学校”，读写能力变得很低，几乎仅限于“很少几家重要的家族”。水平较高的文字文化存在于私人教师中间，偶尔还有教会。但是，东方的文字文化和基督教与其他礼 216
仪一起在整个6世纪持续繁荣。到7世纪，甚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也经历了缺乏书籍的情况，知识越发局限在有文化的牧师和首府自身当中。[③]

看待中世纪晚期的城市重建时，马克思认为欧洲城市对资本主义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他完全接受欧洲中心论的系谱学：资本主义从古典时代经由封建社会发展而来。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内部活力，“除非它们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④]在《形式》一文中，马克思详细阐释了他的概念：为什么“劳动力”和“资本”在封建制度以外的前资本

① Liebeschuetz，2000：207.
② Ward-Perkins，2000：360.
③ Liebeschuetz，2000：210-211.
④ Hobsbawm，1964：43.

主义形态中不能产生？为什么只有封建制度被看作可以不需任何干涉就能产生所需的生产要素？答案肯定在于所采用的劳动力和对资本的定义，这个定义必须排除其他社会类型。换句话说，研究的答案由问题的性质提前决定。很多欧洲学者完全被19世纪欧洲社会的成就所迷惑，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目的论问题，用他们所谓正确的或“客观的”比较视野排除对其他社会类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欧洲的封建制度意味着独一无二，因为其他制度没有产生中世纪的城市，这是马克思资本主义进化理论的关键”。[①]因而，早期城市的特点是以19世纪经济的领先地位为基础而加以评判的。不过，“欧洲城市”所拥有的任何普遍的或“真正的”独特性(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并不一定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实际上，布罗代尔认为有种资本主义（重商主义）能够形容所有地方的城市，对他而言，只有金融资本主义才是西方最独特的（我在第七章已经质疑过这一结论)。

从古典时代起，地中海北部海岸的主要城市就由西西里、埃及、北非和黑海通过海路供给小麦。地中海的其他日用品比如油和陶器的贸易也很重要。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城市之间产生了一些差异。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伊斯坦布尔除外）规模和活动都减少了许多，
217 只有等到19世纪的伦敦或巴黎才能与罗马帝国的规模相当。[②]由于规模下降，活动减少，供给问题也就不再是同一水平的交易了。

地中海的贸易再次拉开，与东方的商业重新开展，此时城市生活才逐渐复兴。威尼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意大利城市。开放贸易中的主要角色由阿马尔菲周围的城市扮演。阿马尔

① Hobsbawm，1964：43.
② Geraci and Marin，2003：577–578.

菲位于那不勒斯南部城市的西南角，但它也不是卷进和南部进而和“萨拉逊人”（Saracens，阿拉伯人的古称——译者注）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他们在“整个9世纪几乎一致都活跃在第勒尼海峡(Tryhennia arc)”。[①]斯金纳（Skinner）表明，加埃塔（Gaeta）的建造者道尔齐布利（Dolcibili）是一位商人，他在和穆斯林的贸易中发了大财。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教皇的活动相反，他解放了萨勒诺附近的阿拉伯人群体”。[②]

一般认为，近东并不是促进西欧贸易的唯一因素。他们的影响在城市组织和规划以及文艺复兴之前时期的建筑发展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两种影响都是直接的，都是东西方商业来往的结果，并为西方城市带来了财富。阿马尔菲地区的土地一片荒芜，城市沿河谷而建，一直延伸到海。岩石垒成的海岬易于防守，面对阿拉伯人密集而猛烈的袭击，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正是阿拉伯人的袭击才导致阿马尔菲的本地人和加埃塔邻邦都从那不勒斯公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建筑和艺术：

> 在空间上，阿马尔菲山城复合式的房屋错落有致，饰于精美的装饰，这些特征使它们与意大利当时的建筑和中世纪早期一些更简单、更粗陋的住所截然不同。房屋的复杂特征与商业活动是分不开的，因为社区的财政收入被调拨用以创造这些奢华的环境。作为一个能够负担得起开支的城市，住房不仅超出了遮风避雨的基本需要，还进入艺术表达和摆阔炫耀的领域。

① Skinner，1995：32.
② Skinner，1995：31.

建筑的辉煌成就依赖于商业利润，它们的形式也反映出阿马尔菲人的商业经验。由于他们复杂的设计和错落有致的网状装饰，阿马尔菲的房屋非常与北非建筑和装饰的修饰性词汇非常贴切，在世俗和宗教背景方面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很多和北非艺术作品相关的事物都能在滨海城市如马赫迪亚（Mahdiyya）和突尼斯找到根源，阿马尔菲
218 商人的祖祖辈辈都在这些商业中心活动。从11世纪到13世纪，这些城市正是当地人卖出木材、谷物和纺织品等货物，换取黄金、皮革和陶器的地方。

推动人们接受北非习语体现了穆斯林自身在当地的地位，以及这里长期但却分散的穆斯林艺术生产的传统。北非使用的有些装饰或许在阿马尔菲的上流阶层并不常见，因为它和王国里规模很小的制作有着密切关系。在浴室和沐浴方面也非常相似：突出庭院、空间分层、装饰性陈列的复杂的房屋结构，地中海浴室部分反映了宽裕富足的文化，人们超越了信仰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马尔菲和12世纪富裕的君士坦丁堡非常相似，他们对伊斯兰绘画的认识和欣赏促使他们在首府也仿效这些作品。[①]

建筑上受到的伊斯兰世界的启发还包括直接整合欧洲之外的事物。北非和近东的一项重要进口便是精细陶器，“这是意大利南部最先广泛使用的日用品之一，也可用来装饰室内环境”。[②]不过，这些陶器往往以马赛克形成镶嵌甚至整个儿放到教堂设计中，特别是在拉维

① Caskey，2004：113–114.
② Caskey，2004：164.

罗(Ravello)。在这里，这些陶器见证了阿马尔菲商人的品味和经验。

拉维罗的建筑是南方风格，是“一种普通的地中海文化”，但它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来自北方的元素。北方的影响使它们自身也感受到南方的风格，当巴黎盆地征服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时，诺曼人从阿拉伯人手中接管了西西里，先是给霍亨索伦王朝后是给安茹王朝腾出法国的中心。哥特艺术逐渐形成它那尖尖的拱门以及纹章学。[①] 哥特的拱门可能源于阿拉伯，不管怎样，都有一股强大的影响来自东方的城市建筑，特别是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

但是，尽管东方城市对西方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东西方城市结构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亚细亚城市在结构上与后来（11世纪后）欧洲城市的用途是不同的，后者被假设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可能，而前者却不能。伊斯兰城市虽然和欧洲城市来往交易，据说也有这种差别。亚洲城市也是如此——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看法。但他们的论点总是从欧洲后来成就的立场出发，而这些成就是需要解释的。这一立场近来遭 219
到很多批评。例如，阿拉伯专家霍拉尼（Hourani）写道：“喜欢将发生时间提前的学者们往往采取了这种观念（基本上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即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只存在于欧洲国家，因为只有欧洲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在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直接治理下至少享有部分自治。”因而，东方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②] 不过，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学者观察到两者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③] 正如人们希望看到城市化和商业活动，将会颠覆这一评判。这才是

① Caskey，2004：165.
② Hourani，1990. 我的译文，转引自Denoix（2000：329）。
③ Denoix，2000.

真正的印度[①]和中国[②]。

但如果不争取，西方独特性的概念是不会放弃的。安德森认为新兴的西方城市不断增长的势力基于“欧洲封建模式下特殊的主权分割（因而是独特的），从而从根本上与东方国家的大城市区别开来”。西方最成熟的形式是共和国（commune），体现了封建城市和农村的统一，因为它是“一种联盟，建立在……彼此间立誓平等的互相忠诚，即同盟（conjuratio）之上”。[③]对待差别的看法反映出安德森因循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等很多人的观点。“平等个体的公社”自由限于一批有限的上层，但“刚刚诞生的机构源于自治城市的自我管理”，尤其是伦巴第，那时主教统治者的权威已被彻底颠覆。在英国，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依赖性的，因为它们“是封建秩序下绝对重要的经济文化因素”。[④]安德森继续写道：“正是在重大的农业进步和城市活力的双重基础上，中世纪盛期建立了令人震惊的美学和思想丰碑，大教堂（一项重要的成就是哥特建筑）和第一批大学出现了。”[⑤]但是，即使在古代近东，一些城市也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尤其是一些城邦国家）。在欧洲，意大利北部是非典型的。佛兰德斯和莱茵兰的其他城市也处于“封建宗主统治的自治宪章”之下。而且，安德森的评价忽略了其他地区城市（和乡村）在审美和思想等其他领域中的成就，比如伊斯兰统治下
220 的格拉纳达（Granada）和科尔多瓦，其建筑和知识的成就建立在

① Gillion，1968.

② Rowe，1984.

③ 实际上，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叙利亚，权力一直分成两派：哈里发、伊玛目（Imam）或忠诚的王公一派，苏丹及其各种埃米尔（Emir）一派，他们自己能够掌握权力。

④ Anderson，1974a：195.

⑤ Anderson，1974a：195.

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

“主权分割”的概念，对大多数分析家正确理解城市的产生以及现代性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安德森观点的内在本质，这种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必需的先行者，因为：

第一，它允许“自治城市在完全不同的统治之间的缝隙中求发展”。[①]但我们也看到，东方的城市并不需要这种默许，实际上它们在欧亚大陆沿着青铜时代的城市革命发展起来，它们是政治经济的内在本质。一些城市比另一些城市更自治一些。教会的自治也一样，安德森形容为“独立的和普遍的”。但所有的成文宗教，由于它们的组织和持有的财产权，在事实上都保持着某种对政治的独立性。

第二，财产制度导致中世纪议会的产生。但是，公民大会和咨询委员会并不局限于欧洲；一些咨询形式——通常是代表制，是世界其他地区各个政府的普遍特征。财产的划分也是如此，用韦伯的术语说是“身份团体”。

第三，主权分割是城市居民和城市本身自由的前提条件。但“自由”并不限于西欧的城市居民；所有的城市都有一点儿自治权，有不记名投票的权力，因此也有一点儿“自由”。

中世纪城市的自由是欧洲中心论观念的例证，它也值得进一步深思。安德森在其他地方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城市使人自由。不过这句评语适用于所有的城市，无论这些城市在哪里建立，因为它们必然会为市民提供匿名权利的尺度。但这些城市政治上总的说来都比较自由吗？很多城市因其发生的活动特性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制造业、借贷行业、法律、医学、行政管理和商业等活动。

---

① Anderson，1974b：418.

但是，与索萨尔观察到的“城市诞生也凸现了不平等”一样，[①]我宁愿将其归因于犁的使用（还有灌溉技术）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分化。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一直“剥削”农村，在生活和劳动方面占有农村的剩余产品。尽管如此，除意大利北部以外，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城市没有受到政治或宗教权力的约束。其他地方所谓的
221 “自由城市”与领主的财政特权是一致的。概言之，西欧城市比多数学者想像的要更像“亚细亚城市”。

索萨尔论城市一书包罗甚广，他虽然也承认马克思对东西方城市做出的区别，认为“尽管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很大的多样化，但从最早的开端到当地变革的连续性线索仍然是可以证明的，就像它们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样可证”。[②]尽管索萨尔看到了这些连续性，但他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空间划分为行政、交流等各个部分，即便每种划分都背离现实”。[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选择了“马克思勾勒的生产方式”。我个人认为，这并没有“减少他所表现的歪曲”，反而加剧了这一歪曲，进而他未经认真分析便接受了亚细亚和欧洲的差别。

索萨尔在考虑城市时并没有完全将其限于后青铜时代的社会。他意识到西非约鲁巴（Yoruba）的城市化，并称之为“农业城市”；他承认加泰土丘（Catal Huyuk）和哈吉拉尔·安纳托利亚（Hacilar Anatolia）小型城市的发展，杰里科（Jericho）和底格里斯脚下的耶莫（Jarmo）一样，还有新大陆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④]但是，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总是和青铜时代联系在一起。然而，索萨尔的确

① Southall，1998：14.
② Southall，1998：4.
③ Southall，1998：1.
④ Southall，1998：18.

试图将亚洲城市和欧洲城市分开（他用了长达125页的一章来论述），部分是基于徐中约（Hsu）所提出的文明的主要因素如等级、阶级和社团的区分。以这种方式认识城市忽略了明显的相似性（事实上，索萨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体现在人口数量、密度、组织、特殊团体、教育机构、市场、医院、寺庙、商业、手工业、银行业和行会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东西方城市在19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区别。

大　学

和断言欧洲城市独特性并行的观点指的是高级教育的特性，它被看作从根本上区别于欧洲原先的机构和同一时期非欧洲的机构。事实上，勒高夫也是这样认为的。[①]欧洲学院的独特性概念取决于这种观念：只有在这里，城市才一直发展，才能通往资本主义、世俗化和现代性；只有这里，在城市社会自治权的发展中，在自然而 222
然的、独特的欧洲社会阶层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中——它促进了对自然世界的关注，我们才能找到与朝着现代性进步相适应的大学和科学的产生前提。

不过，当我们想想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时，这一立场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有迹象表明古典时代之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思想的相对贫瘠时期，克服这段历史某种程度上要归于外来因素。显然，高级教育在希腊以学园（Academy）和演讲厅（Lyceum）的形式存在，它甚至延续到早期罗马帝国：

① Le Goff, 1993.

学校可追溯到亚历山大、安提阿、雅典、贝鲁特、君士坦丁堡和迦萨，它们在古代社会的大学方面颇有成效。在特征和重要性上，各学校也不尽相同：在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贝鲁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对这些机构的需求产生于4世纪罗马行政事务的剧增。政府需要受过文化教育和具有优美散文风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就像康斯坦丁（Constantius）皇帝于公元357年公开发表的布告，它保存于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中。[①] (14.1.1)

由于雅典人的排外、查士丁尼公元529年的封锁，所有这些都是亚洲或非洲的学校。查士丁尼在基督教世界关闭这些机构的事实表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能够通过限制知识的传播达到目的，尽管成文宗教的特征意味着需要挽救一些事情。基督教确实关闭了早期高级教育的各种机构，但教会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教育形式，即便较高水平的古典知识有很多问题。显然，这些古典知识属于异教。

直到6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文化的衰败非常严重。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大学由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于公元425年重建。主教管理下的新牧师学院是帝国主要地区唯一重要的教育机构。亚历山大的学校延续下来，只是有些孤立。帝国的疲弱状况无法鼓励知识的发展，在复兴

①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45.

发生之前，各种情况由于偶像崇拜的宗教论战而更加糟糕。在长达300年的时间中，只有很少一点教育记录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偶像破坏行动到843年最终失败，那时，教会委员会正式恢复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从这一时期起，几乎没有任何手稿保留下来，对古典作品的研究只有有基督教世界之外少得可怜的论证。[①]

223

直到3世纪末期，东西罗马帝国还有一种共同文化，一千英里开外还能发现几乎一致的碎片。[②]后来，西罗马帝国减少了希腊知识的运用，由于各种原因，差距越拉越大。5世纪时，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大部分领土落入“蛮族”的统治之下，最后意大利成为东哥特王国。最初的时候，学校还持续兴盛，但战争威胁到它们的存在，公元568年伦巴第人的入侵给了最后一击，“实际上只剩下修道院成为提供基础文化的唯一机构”。[③]即使北非地区于公元429年遭到雅利安汪达尔人的入侵——他们从迦太基派遣舰队控制了科西嘉、撒丁岛和巴里阿利群岛（Balearics），北非仍然发展得不错。开始时他们对教育没什么兴趣，后来才批准迦太基的拉丁学校，这些学校一直维持到公元698年阿拉伯人占领这座城市。

埃及和近东许多地区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就已经信奉基督教，但东部的基督教没有受到西罗马帝国及其经济瓦解的影响。城市保存下来，即使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没有像“蛮族”入侵和北方产生的内部虚弱那样毁掉生活。实际上，阿拉伯人还远不是“蛮族”，他们

①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47–48.
② Browning, 2000: 872.
③ Browning, 2000: 873.

是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和示巴（Sheba）王国混合文化的继承人，还是与犹太教、基督教一样的成文宗教的皈依者，大多数居民都已熟悉这些信条。他们也是诗歌传统的杰出后继者，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近东伟大文明的边沿地区。[①]虽然各地都处于衰落的时期，但地中海的东南部基本上还是大型城市中心的主角，有一些和古希腊罗马相似的城市和商业生活。艺术文化的相对缺乏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占主导地位的亚伯拉罕宗教的禁令，而不是其他更一般的问题。

这样看来，东方的教育仍在继续。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一下传播史中一个常被忽视的部分：希腊文本翻译为东方语言的意义。“古典时代末期的同一时期，希腊文本开始被翻译成古叙利亚语，这一活动以尼西比斯（Nisibis）和埃德萨（Edessa）两座城市为中心。”[②]不仅圣经著作，还有亚里士多德和提奥弗拉斯特以及诗歌都被翻译过来。希腊的知识在西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却在翻译中幸存下
224 来；不过拉丁文也零星地保留下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③]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东方包括拜占庭学校的相对持续都有一臂之力。在拜占庭这座城市，

> 巴德斯大学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创建，可能是活跃的学者团体的中心。这些学者关心恢复和传播大量不同形式的古典文本……古典知识和古典教育在11世纪像以前一样继续……哲学学校在米迦尔·普塞鲁斯（Michael Psellus，1017—1078）的引导下也教授语法、修辞和文学课程。普

① Conrad，2000.
② Reynolds and Wilson，1974：8.
③ Reynolds and Wilson，1974.

> 塞鲁斯是那个时代最具才华的人物，作为一名文官、几任皇帝的高级顾问、历史学家和学院哲学家而声名显赫。他的文学作品透露见证了他对古典著作的博识广见，不过他的思想兴趣更多在哲学上，作为演讲者和教师的杰出成就在于引领人们重新恢复对柏拉图的兴趣，粗浅地探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①

正是在东方，古典传统才得以延续，无论是在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方面，还是在教育体制的组织方面。虽然并非完全持续下来，但东方知识获取和传播的中断，与西方长期近乎抹掉教育和知识相比，远没有那样广泛。11世纪普塞鲁斯所教过的学校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建立了：

> 公元863年，摄政王巴德斯恢复了帝国大学。它倒闭于此前几百年的混乱之中。首府建立的学校由列奥（Leo）这位哲学家、著名数学家管理。同时任命的其他教授还有地理学家西奥多（Theodore），天文学家西奥德鸠斯（Theodegius），文艺学者科莫塔斯（Cometas），最后这位可能是修辞学和雅典语法的专家，同时他还着手《荷马史诗》的修订。②

但学校一直保持活跃，即便在更具破坏性的政治骚乱直接中断学校活动之后。

---

①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54, 60.
②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51.

> 学校的命运不总是一帆风顺。由于种种看似政治其实是思想的原因，教师开始反对朝廷，普塞鲁斯自己也不得不到修道院隐退一阵儿，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回到重要的位置上，这才使学校可能继续运行。

自建立之日起，巴德斯大学经历了各种变革，比如知识领域的专业化，这使它与现代高等学科的理念非常相似。

225

> 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包括帝国大学的重组，无论是不是受到巴德斯所提出形式的机构衰落的挑战，这一点并不清楚，但新的课程设置包括设立法律系和哲学系。改革在君士坦丁九世蒙那马裘斯的支持下于1045年进行。法律系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思。另外还要提到，它的建立比博洛尼亚著名的法律系要早很多，而（欧洲）现代法律系的雏形基本源于这里。①

如此看来，东方模式在学院结构上可能是工具主义的，一如我们所知。

在西欧，古典知识尤其是希腊知识的断裂，在大教堂和僧侣学校中更加明显，那里复兴了一些学术活动，并产生了早于11、12世纪博洛尼亚等地区那些一直被看作第一批大学的机构，反映出西方知识衰落、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高级教育的重建。随着新机构的出现，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在西方的积累和流通比东方更为迅速。这

---

①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54, 60.

部分展现了衰落后的复兴，缺席后的再现，并导致自我的重生。波提切尼《维纳斯的诞生》描绘了这一情形。此前，知识有利于东方，正如我们看到图书收藏并不稳定的差异，这一点主要因为东方大量使用纸张，而不是稀少的动物皮革或纸草。①

除博洛尼亚之外，克利斯特勒（Kristeller）还将意大利南部萨勒诺的中世纪学校形容为“中世纪欧洲最早的著名大学”。②这所学校的专长是实用医学，对动物进行解剖。其医学声名最早的可靠记载始于公元985年，没有迹象表明10世纪中期以前它已存在。有意义的是，它一直和东方（希腊）维持联系。和萨勒诺有关的最早学者是康斯坦丁这位“非洲人”，他成为蒙地卡罗（Monte Cassino）的一名僧侣，并被看作：

> 西方阿拉伯科学的第一位翻译者和介绍者。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和现代民族主义者的雄辩不应该遮掩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11、12 世纪阿拉伯科学肯定优越于西方科学，包括萨勒尼塔的医学；阿拉伯资料的翻译意味着实用知识的明显进步。同样，从阿拉伯语翻译的希腊著作也是如此，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同一时期阿拉伯拥有的希腊科学文艺作品比拉丁文要多。他们在注解和单独作品方面对古希腊遗产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③

226

所有这些并不完全依赖于阿拉伯的翻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① 参阅Djebar（2005：22–23）。
② Kristeller，1945：138.
③ Kristeller，1945：152.

盖伦等学者的大量著作都有拉丁文版本。尽管如此，康斯坦丁的翻译仍然非常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医学教育的基本原理。[①]阿拉伯的影响似乎始于康斯坦丁，此后，10世纪末期萨勒尼塔文学中的繁琐哲学和巫术减少了。[②]再此后，课程变得“越来越理论化”[③]，可能还传到了巴黎。

我们已经看到，博洛尼亚大学以及欧洲其他高级教育机构的创建落后于东方拜占庭的巴德斯大学。于是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讨论：这些高级教育机构的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斯兰世界的外部刺激——这些机构继承了亚历山大的大学、图书馆和大量的古典文献(“古代科学”)，或者说，教育的复兴是不是要归功于引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内部发展。我们还是先考察一下伊斯兰世界的情形，马克第锡（Makdisi）最近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评论了这一点。

穆斯林的教育

正是在东方，语法和修辞的教育延续下来。在西方，如我所说，城市及其学校常常趋于衰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允许实施古典教育的确存在矛盾。查士丁尼采取强硬措施抵制“异教”文化。但希腊语言在东方的延续暗示古典名著更易获得，包括对阿拉伯人，他们于7世纪抵达这里。继而，伊斯兰世界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领域，从西班牙南部到中国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东南亚，这使各种信息和发明得以在欧亚大陆便利传递。正是通过阿拉伯人，

① Kristeller，1945：153.
② Kristeller，1945：155.
③ Kristeller，1945：159.

很多古典文献和其他文献才得以传到西方，为西方教育的复兴铺平了道路。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哲学在雅典和亚历山大继续兴盛。在亚历山大，博物馆“随着研究的加强充当了大学的职能”。①

不过，尽管各种各样的学校在欧洲以外还很活跃——即便罗马衰亡后，但据马克第锡看来，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仅仅产生于12世纪后半叶的基督教西方。②欧洲的大学是一种“新产物”③，227
和雅典或亚历山大的希腊学园完全不同，和伊斯兰世界的经验也毫不相关。马克第锡指出，西方的高级教育并不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也没有根源于比它更早的教会或僧侣学校，从组织形式和学习内容都与它们不同。④而且，在他看来，高级教育和伊斯兰世界没什么关系，也没有法人的抽象概念，只有具体的个人才具有法律特性。另外，欧洲的大学也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获得特权，学者们可以居住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尽管他们不是那里的市民。

但是，马克第锡直接否认了伊斯兰活动对欧洲的影响，这就似乎否认了一个事实：大学的兴起伴随着12—13世纪知识的复兴，此时，一股知识的泉流从已经穆斯林化的西西里（直到1091年）但主要还是阿拉伯化的西班牙涌了进来。而且，虽说大学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在10世纪和11世纪建立的马德拉萨不同，但“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的教育制度仍有着重要的相似”。⑤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中世纪的大学很多要归功于阿拉伯的教育学院机构。⑥如果这一点都有

① Childe, 1964: 254.
② Makdisi, 1981: 224.
③ Makdisi, 1981: 225.
④ Rushdall, 1936.
⑤ Makdisi, 1981: 224.
⑥ Ribera, 1928: I, 227–359.

争议，那么，大学“作为救济和慈善机构就彻底属于伊斯兰本土”，[①]建立在瓦克夫基础之上（waqf，关于宗教慈善产业捐赠的法规，亦称瓦克夫制度）。巴黎是西方第一个建立学院的城市。1138年，一位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朝圣者在这里创建学院，可能模仿了马德拉萨，因为学者们的会所由个人设立而不是王室授权。在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成为法人之前也同样如此。我们还注意到，马克第锡承认东西方大学之间的相似性，伊斯兰机构可能潜在地影响了欧洲的早期大学。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作为法人的欧洲大学没有对等之物，正是由于它们的独特特征，现代教育和科学才得以发展。大学和学院间区别特征在于这一事实：大学是混合型机构，即学院制大学（比如耶鲁），是行业协会，是颁发学历证明(文凭）的法人机构，但学院是对争取进入大学的贫困学生的慈善信托机构。[②]

李约瑟也认为大学是西方战胜科学落后、为“现代科学”兴起
228 铺平道路而导致差异的机构。不过，埃尔文对中国没有这类机构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坚持中国确实存在高级教育学校。[③]不过，虽然大学是高级教育的协会，但并不是所有的高级教育都在大学里，尽管这一差别被遮掩起来了。高等教育和学术机构存在于古代近东的寺庙“研究院”中，也存在于古典社会和古代波斯中，实际上较高的文化水平到处都有。和城市一样，“大学只在欧洲才有”也是从一种非常狭隘的观点出发的，具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从长远看，它们作为法人机构是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高级教育机构没有其他功能，即

① Makdisi，1981：225.
② Makdisi，1982：233.
③ Elvin，2004.

便欧洲大学的不同功能也大部分（但不是普遍）为现代社会所沿袭。

争议最多的机构是伊斯兰国家的马德拉萨。一般认为，它在逊尼派的努力下接管了伊斯兰国家的早期图书馆，使教育恢复到法定的正统教上。这样做的结果是，马德拉萨集中于宗教教育，因而与欧洲学校相比不占优势，但它们在教育和课程很多方面还是处于平行水平的。尽管马德拉萨主要关注宗教教育，但其他地方也学习“异域科学”（源自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学问），如各图书馆、宫廷和中世纪的一些机构。欧洲的大学最初当然也关注宗教——在这方面，萨勒诺专注医学，博洛尼亚专攻法律研究都是非同寻常的。

在伊斯兰国家，教育最初由个别慈善家私人提供经费。但教育机构本身只是在瓦克夫捐赠制度形式化以后才得以形成。这些慈善基金是永久性的，并在10世纪时大范围创建。[①]伊斯兰学问开始于清真寺，它的建立更早一些，至少在8世纪就开始了，而宗教教育得到慈善基金的捐赠。

10世纪时，巴格达的巴德尔发展了一种新型机构：旅店式清真寺，为城市外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这是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k）改革马德拉萨的序曲。他的改革第一次涉及学校的法律地位而不是课程，尽管课程也受到影响。尼扎米亚（Nizamiya）本身在公元1067年创建于巴格达。但无论巴德尔还是尼扎姆（两人都是政治家）事实上都不是这些机构的创建者，它们从早期的学校逐渐发展而来。这些学校建来推动逊尼派的正统教，以应对什叶派的传播，确立伊斯兰教及其原则的普遍需求等。　229

① Makdisi，1981：28.

马克第锡否定马德拉萨的大学身份，因为后者没有形成法人，而只是一种慈善信托机构。伊斯兰世界从未在形成法人方面追随西方——马克第锡将法人看作14世纪重要的新的持久性机构。他认为，西方这种持久性机构更具灵活性，可以更从文化上解释它的持久性影响，以及某种程度上至少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相关因素还有很多，他列出以下几条：

(1) 瓦克夫和慈善信托……特别是创建者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慈善机构，不受中央政府或教会的干涉。

(2) 马德拉萨和学院是以瓦克夫捐赠制度或慈善信托为基础的，由其毕业生或学生捐赠……其他相关因素还包括创办者的功绩、选择的自由及其限制，捐助的对象及秘而不宣的动机，视察的访问者和受益人等。

(3) 伊斯兰世界西部、基督教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创办大学时统治者的意愿。

(4) 两种辩证逻辑的发展：一种法学的，另一种思索性的。

(5) 法学和神学研究中心位置的论争。

(6) 马德拉萨中法学的博识学者和欧洲南部始于博洛尼亚的各大学法学教授的特殊身份。

……[①]

所以，尽管马德拉萨不是大学（马克第锡认为这是东西方的主要区别），他仍然认为东方后来“借鉴了大学制度，完善了伊斯兰世界的大学元素”。[②]早期或许还从其他方面有所借鉴，至少包括教学。撇开法人和校长管理不说，高级教育在东西方都有。但是，所有这

① Makdisi，1981：287–288.

② Makdisi，1981：291.

些讨论都是以一个非常狭隘的大学概念为基础的。显然，伊斯兰世界从古代开始就已有宗教和法律教育等高等学问的重要机构。它们是否启发了西欧仍是尚未定论的问题，但其他先进的文字文化中也有一些明显平行发展的文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伊斯兰世界，这些机构多多少少排外地从事宗教研究；而在欧洲，尚管宗教开始时占主导地位，但其他学科也允许在大学领域里发展。各种世俗知识逐渐变得日益重要。在伊斯兰世界，这些知识不得不产生于其他地方。 230

显然，任何文字文明都需要学校。学校指导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将他们带出“自然”环境，比如寻找牲畜、看护小孩或年轻女孩取火等。他们仅限于有限的学校，或敬拜的场所。在这些地方，他们坐在老师（或女教师）的面前学习写字，记诵书本上的知识(有时是生活知识)。教授初级知识的学校必然分为几种，宗教学校可能只限于学习基督教的问答法，[①]伊斯兰国家的人们可能学习《古兰经》的重要内容。同时，一些学生也表现出他们的特殊天赋，有望成为未来的老师或行政官（因为文化现在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将被鼓励进一步深造。的确，有些学生可能出于自己的好奇心而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因此，对“高级教育”某种形式的渴望和需求广泛存在于文字文化中。教育有不同的形式，从私人指导到社会组织，因而，一些来自中国[②]、波斯[③]、伊斯兰国家以及古典时期[④]的记载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教育也存在于古代近东。巴比伦的寺庙“研究机构”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⑤]希尔德也提到高代沙

① Furet and Ozouf, 1977.
② Elvin, 2004.
③ Childe, 1964.
④ Reynolds and Wilson, 1974: 47–48.
⑤ Childe, 1964: 255.

保(Gondeshapur)大学，很大程度上是萨珊伊朗(Sassanian Iran，530—580)聂斯托利教派的医学重镇，它曾被阿拉伯人占领，后来在巴格达哈里发（750—900）的统治下恢复了医学及其他科学。这一机构对医学研究的延续非常重要，在阿拉伯人中间也一直处于优势。在阿拉伯，这种“古代科学”在不受宗教知识限制的医院和医
231 学院得以保存和延展。①

因为，在伊斯兰科学中，“宗教”和“异域”或“古代”知识之间一直存在着二元论。这一区分导致了对马德拉萨角色的误解，它是伊斯兰世界的高级教育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和辅助性学校仅仅关注“宗教科学”。那么，“异域科学”、“古代科学”是怎样同时兴盛的呢？最初是由于马德拉萨的传统知识和以图书馆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后者被前者所吸收。捐赠的学校中，致力于非宗教学习的主要障碍是瓦克夫制度，这一制度将所有异教文化都排除在课程之外。不过，这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中完全将“异域科学”排除出思想生活。它们体现在各图书馆中——“那里保留着希腊著作，争论围绕理性主义的主题”②，不过这种研究只是个人追求而已。这样，“古代科学”仍然能够为人们所接触，并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场所得到提倡，“尽管还有传统主义的对立，阶段性的禁止以及审判大会”。但科学中的二元论是与教育机构的二元对立相称的，伊斯兰科学得以在清真寺传授，世俗教育和学问主要限于私人领域。

但我们不是探究它的起源，而是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知识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实际上，很多方面可能伊斯兰教的方法领先于

① Makdisi，1981：27.
② Makdisi，1981：78.

博洛尼亚建立的第一批欧洲大学，例如教学原则，这就像拜占庭的巴德斯学校。《然否论》（对像阿奎那这样的学者的研究非常重要）《问题研究》《集注》和法学辩证法，在早期伊斯兰教中都有对等之物。[①]正如蒙哥马利·瓦特（Montgonery Watt）提到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影响时说道："因为欧洲抵制伊斯兰，所以它轻视萨拉逊人的影响，夸大它对希腊罗马遗产的依赖性。因而今天，随着我们进入社会的特殊时代，西欧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纠正这个错误的强调，彻底承认我们对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的亏欠。"[②]这一亏欠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中[③]，也产生于教育组织中，即机构和课程设置中，虽然宗教教学在马德拉萨占据主要位置，虽然"古代科学"（也是现代科学）与宗教科学之间存在隔阂，这些使得世俗知识的正式教学异常困难。 232

人文主义

西方教育史和教学世俗化联系在一起，逐渐摆脱宗教控制。这一运动依赖于"人文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希腊罗马"异教"学者的促进，以及古典知识的复兴，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拉伯的影响。在这节内容中，我想转而讨论教育语境下的"人文主义"及其对世俗主义发展的贡献（这对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以及伊斯兰教在欧洲这一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贡献，尽管在近来的"本质主义"之前稍稍有些含糊不清。

---

① Makdisi，1981：224.
② Watt，1972：84.
③ 参阅 Djebar（2005），有一个简短的论述。

尽管制造业和商业获得了发展，但将中世纪看作世界语境中的进步阶段（与瓦解后的欧洲不同）仍然忽略了文字文化和城市社会及其相关活动的衰落。罗马衰亡后，读写能力和文化活动也丧失了，而这对后青铜时代社会的迅速发展非常关键。随着人文主义以及最终的文艺复兴的产生，世俗知识再次发展，并经历了一次重生。这对古典知识和其他领域——比如建筑以及更普遍的知识体系来说，的确是事实。李约瑟明确描述了植物学方面。[①]中世纪早期，科学知识的总体领域有一次衰落，它伴随着城市社会及其早期学校的衰落，还有地中海等地区的贸易下降。在阿拉伯首次征服的冲击之后，经济状况开始走向开放的东方贸易的反面，不过早期教育的恢复仍牢牢握在教会手中，并将很多“古代科学”作为“异端”排除出去。随着交流的进步——空间上与东方、时间上与古典文化，两者都不是基督教——这一情况逐渐改变。

知识、教育和艺术当然不只与经济有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是宗教在这些领域实施的控制。不过中国没有这些。中国避免了受单一教条或支配性“世界宗教”的主宰，而“世界宗教”对人文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因为，宗教权威至少从“较高”层次上控制了教育，主宰了艺术。基督教最初对艺术也很恐慌，但最
233 终还是允许了诸如华美的表演（包括戏剧）之类的活动，虽然文艺复兴之前在事实上都只是为宗教服务。早期只有少量的世俗戏剧、绘画或“小说”。[②]

各世界宗教何时才放弃对知识和教育的束缚呢（这也决定了宗教学校的分布）？中国除了皇帝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外没有一种支配

① Needham，1986a.
② 参阅Goody（1997）。

性宗教。欧洲解放的进程在12—15世纪的人文活动中暂时找到了根源，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传统形式与其他教学形式的斗争是我们理解的关键。正是前者征服了后者，特别是在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才在大求知时代走向法学和马德拉萨的胜利，而法学就在马德拉萨中间传授。“古代科学”的教授，如我们所见，转移到个体教师的私人领域。但这并非宗教主导的传统可以忽略的方面，世俗的、“异域的”科学和知识的暗流在伊斯兰自己的人文阶段不时迸发出来，总体上有利于科学知识保存和研究习惯，使得各个时段都能唤醒欧洲。

人文主义并不否定宗教信仰，除了一些极端形式以外，但它的确限制了自己的实用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我以为这些在人类社会中都很常见。[①]欧洲的这种传统不仅由人文主义而且还由后来的宗教改革所推动，某种程度上使欧洲从既有的信条中解放出来，或者至少指出了一条明路。直到那时，阅读和写作的教育仍然完全牢牢掌握在天主教会的手中。宗教改革必定要打破这一垄断，虽然很多教师仍是牧师，宗教信仰并没有抛弃，只是限于一个更有限的“精神”领域里。这一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因为先进的科学研究和思想总体上暗示着自然的世俗化，以致各种问题可以在所有相关领域自由延伸，特别在高级教育的机构中。

在欧洲，这些机构被称为大学，它们兴起于12世纪。这一发展是西欧教育总体复兴的一部分，而西欧的文化曾遭到严重滑坡。西方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些大学看作高等教育的真正发起者，与独立

① Goody（1998），第11章。

的、本土的人文主义的诞生有关；但大学显然也和教会、“职员”培训有关，这和伊斯兰马德拉萨的例子一样。然而，它们对欧洲及其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展示出更为人文主义的前景，摒弃了一些宗教色彩。

从15世纪中叶，教育本身显然从印刷术的发展和书写的机械化中受益颇多。印刷术有益于新教徒广泛普及《圣经》。不过通过传播新思想和新信息，它也促进了世俗主义和科学的发展。木版印刷在1250—1350年间从中国传来。造纸术穿越阿拉伯、西班牙于12世纪抵达。大约在1440年，东方早已使用的活字印刷术，在德国的美因茨得到发展，其复杂的生产流程由抄写人员转为金属工人迅速传播，1467年传到意大利，15世纪70年代传到匈牙利和波兰，1483年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到1500年，欧洲的出版机构已经出版600万册书，欧洲大陆成为最“渊博”的殿堂，很多早期著作重新出版，也有一些新信息，这些都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事业。

14世纪，意大利北部早期的文艺复兴之时，古典文学研究获得重生。正是在此基础上，欧洲在“人文主义”的名目下独自宣扬人类文明的德行。古典研究得到教育者们的传授，最早为人所知的是15世纪末的人文主义法学者，他们是一批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和学者。这个词语来源于“人文研究”，与希腊语“潘迪亚”（paideia，译为“教育”、“人性教化”——译者注）意义相同，它包括语法、诗歌、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其中只有部分与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教育相关。但“人文”（humanitas）一词还有着更广泛的道德意义，意思是“人的德行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最完满的发展”，即，这些品行不仅和现代用语“人性”——“理解、仁爱、同情、怜悯有关，而且还有更积极的品质，如刚毅、判断力、深谋远虑、

雄辩、热爱诚实”。[①]换句话说，人性本身的正面特征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特质。进而，这个概念便包含三层意思：（1）回到先前有文字记载的知识，欧洲的情形便是古典时期；（2）人的潜能和德行发展到最高水平；（3）这一词同时也指一段时期，此时，宗教在思想活动中发挥着相对有限的作用，因而期待现在常常被看作是渴望的、“现代”国家的情形，也就是大多数语境中的世俗主义的胜利，思想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自由研究。 235

人文主义不仅包括古典知识的复兴——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1304—1374）认为这和基督教精神是一致的，还包括对现实世界知识的关注，提倡所谓的“个人主义”，这被视为人性的积极方面，以及第九章将要讨论的“德行”。除了知识和“德行”之外，还有恢复罗马制度的尝试，而罗马共和国自己也戴上了诗人的桂冠，这顶桂冠属于拉丁史诗（以及本土的抒情歌谣）。的确，诗歌本身到现在才成为“严肃而高雅的追求”（它在伊斯兰世界同样受到轻视）。事实上，“人文主义”的名称也和其他文明、其他时期和其他地方发生联系。据扎法拉尼看来[②]，伊斯兰自身在马格里布也经历了人文主义阶段，这一时期，非神学研究得到发展，科学和世俗知识也得到比较自由的发挥。毕竟，伊斯兰这种文化时而不太情愿，时而又非常热衷传播“异教的”希腊思想和伊斯兰思想，借助于高级教育的学校、马德拉萨和学院等机构。不过，学校世俗化的重要活动比基督教欧洲发生得要晚一些。

但是，世俗化在伊斯兰世界同样也有些问题，尽管伊斯兰世界对知识有较高的评价，但主要还是宗教科学。因为，“从非常现实

① Grudin，1997：665.
② Zafrani，1994.

的意义上来说，知识就是崇拜”。[①]而且，知识从属于宗教训令，印刷术的引进非常晚；伊斯兰世界从根本上拒绝印刷术，它的圣训和语言都没有借助机械手段得以重现。尽管伊斯兰世界在其他传统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在教育领域发生变革不是不可能，而是极为困难。譬如土耳其，只是在1768—1774年间它们败于俄罗斯人之手并导致克里米亚的惨败之后，才认识到急剧改革教育的需要。

> 乌理玛（ulema）的领袖们，圣律（Holy Law）的博士们这才受到垂询，并同意批准两条基本的变革。第一是接受异教教师，让他们教穆斯林学生。这是对文明左右不定的态度的一大革新，一千多年以来，他们习惯了瞧不起其他异教徒和野蛮人，认为他们没有贡献任何价值，除非把他们看作自然产物。[②]

这一改革来得相对晚了些，虽然如此，但伊斯兰世界也的确有段时
236 期被称为“人文主义”。

其他文化中也能发现类似的阶段。费迪南德-阿梅斯托认为“西方语境下所谓的‘人文主义’也存在于17世纪的日本和俄国”；在日本，人文主义与一个和尚的名字有关，即契冲（1640—1701），他是恢复《万叶集》这本8世纪日本神道诗歌作品真实文本的开拓者。在俄国，1648年，著名的虔信派说服沙皇取消朝廷中流行的粗野文化。在鼓吹回到纯粹的早期典籍这一意义上，两者都是人文主义的，[③]是一

① Berkey，1992：5.
② Lewis，2004：24.
③ Fernandez-Armesto，1995：279.

种有利于人民的宗教改革。

在欧洲，人文主义的发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不断。有些人比如绍森（Southern）认为12世纪的英格兰是“人文主义的”，[①]他主要是指古典时期的趣味复兴（这同样也发生在卡洛琳时期），这一复兴和后来的复兴非常相似，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接触促进了后来的这次复兴。但是，绍森的古典论述所缺乏的是对可能的外部影响的考虑。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看似都是内部的创造。这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欧洲许多方面都与伊斯兰文化有着大量来往。[②]西西里曾是穆斯林“伊弗夸”（Ifriqua）商路的一部分，11世纪时被诺曼人征服，但仍然有一个模仿早期穆斯林模式的朝廷。国王讲阿拉伯语，有后宫妃嫔，还是伊斯兰文学和教育赞助者。他组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Averrhoes）的著作，并散布到欧洲的各个研究机构。意大利的本土文学据说也诞生于西西里，而阿拉伯的翻译版本也被改宗基督教的教徒传抄，比如康斯坦丁的医学教材。[③]不过，与西西里相比，联系更为紧密的是中世纪的西班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徒比邻而居，前者以南方的摩萨拉伯(Mozarabs）而闻名，采取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托利多（Toledo）被基督教徒俘虏之时，被征服和改宗的穆斯林以摩迪迦人（Mudejars）而闻名。12世纪，这座城市成为传播阿拉伯科学和整个欧洲教育的重要中心。在圣明的阿丰索（Alphonso the Wise）的领导下，雷蒙德（Raymond）大主教开始着手将阿拉伯著作翻译成西班牙语，后来在摩迪迦人和犹太人的帮助下翻译成拉丁文，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整部百科全书及

① Southern，1970.
② Asin，1926：239.
③ Asin，1926：242.

其注解，还有欧几里德、托勒密、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①]最
237 初，作为再度征服穆尔西亚城（Murcia）的统治者，阿丰索有一所专门为穆罕默德·阿尔-利库阿特（Muhammad al-Riquat）而建的学校。在这所学校，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一起受到教育。后来，他在塞尔维亚建立了一所拉丁文和阿拉伯语综合学院，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教授一起教授医学和科学，被形容为"超宗派的大学"。[②]

一如阿信（Asin）指出，正是亚洲文化"不可否认的优越性"[③]影响了那一时期的欧洲，这一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但丁的伟大作品《神曲》，特别是"圣训"的故事，穆罕默德升天以及夜间旅行到耶路撒冷的经历，从这些故事中，作家从中吸取了与但丁在天堂地狱旅行的类似故事。穆罕默德的基督教兴趣要回溯到更远，更早时候一位摩萨拉伯基督教作家（可能是科尔多瓦的欧洛吉奥，约公元859年）竟写了一本穆罕默德的传记，1143年，里丁的罗伯特(Robert of Reading)，即潘普洛纳（Pamplona）大助祭，也将古兰经翻译成拉丁文。伊斯兰知识及其神话因此变得实用。事实上，但丁的老师——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曾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节于1260年出使阿丰索王朝（1221—1284）。他在这里可能接触到一些教育。阿丰索曾与摩尔人打过仗，虽然如此，但仍学到了穆斯林的天文学和哲学知识。拉蒂尼这位使节在阿丰索的朝廷中获悉很多从西班牙传来的文学著作，这一接触可以说明他引导但丁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据称诗人的哲学体系的确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阿拉伯哲学家本身，而是来自科尔多瓦的伊本·马萨拉（Ibn Masarra）创

① Asin，1926：244-245.
② Asin，1926：254.
③ Asin，1926：244.

建的有启发意义的神秘哲学［尤其是伊本·阿拉比（Ibn Arabi）］，他们的思想还传到奥古斯丁的经验哲学家那里，诸如东斯哥特（Dun Scotus）、罗吉尔·培根和雷蒙·鲁尔（Raymond Lull）。

人文主义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穆斯林趣味中大受裨益。亚里士多德强调研究人性（“现实性”），而不是信仰。[①]中世纪末期目睹了“神学文艺的复兴”，“将一切事情都归为神的意旨”，这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商业日渐重要，城市不断扩大，文化和社会也处于变化之中。商业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新式教育的源泉在于自由城市建立的学校，它们产生于13世纪末期，迎合了城市居民的需要，抛弃了中世纪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越来越转向古典知识，当然从阿拉伯的翻译中受益颇多，这种情形从14 238
世纪一直发展到17世纪。因此，以下这种情况就有些荒谬：欧洲的新知识不仅深受高级教育机构的影响，同时也朝着与宗教文化相关的世俗主义方向发展。宗教文化同时保留了世俗的“古代科学”，即古典著作中的“异教”传统。不过当然，欧洲也发展了自己对古典文献的研究，同时也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希腊学术保持着联系。

当1439年东正教的代表团从君士坦丁堡抵达，并在费拉拉（Ferrara）和佛罗伦萨各教会间的委员会寻求抵抗土耳其进攻的帮助时，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巨大的推动作用便很有意义了。佛罗伦萨的代表团由科西莫·迪·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接待。科西莫深受希腊柏拉图学问的影响，结果是，他建立了柏拉图学院，影响了欧洲的文化。领导这个代表团的是乔治·杰米·普莱桑（George Gemistus Plethon，1355—1450/2），一位拜占庭学者，在奥

① Peters（1968），Walzer（1962），Gutas（1998）.

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阿德里亚诺波利斯（Adrianopolis）做研究。他不仅介绍了柏拉图，还介绍了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他的成就帮助欧洲人改变了空间概念。和柏拉图学院有联系的另外一些学者是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395—1484）、同样来自特拉布宗的巴西尔·贝萨里翁（Basil Bessarion，1403—1472）和西奥多·加萨（Theodore Gaza），所有这些学者显然来自亚洲城市。如此，人文主义、世俗知识和文艺复兴的整个运动从东方汲取了巨大的能量，也间接从主导性的宗教文化中获得来源。

总之，西方高级教育的各种机构当然各不相同，不过在世俗知识这一重要方面相对较晚。从根本上说，它们并不限于西方，也不是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标志。那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

在论述中世纪欧洲的大学问题时，勒高夫写道：“最初出现了城市。西方中世纪的思想随之产生”。[①]这并没有发生在所谓的卡洛琳复兴中，而只发生在12世纪。但城市、思想和大学都不限于西方，各种机构没有根本性区别，尽管后来它们逐渐不同。和城市问题一样，大学问题是技术问题，而且也应该这样看待。它们在哪些方面与其他地方高级教育的机构不同呢？相反，它转变成一个分类
239 问题，高贵的价值赋予这些类别。但这并不是书写过去故事的方法。

① Le Goff，1993：5.

第九章

价值观的盗用：人文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

此前，我已解释了古典学家何以主张欧洲的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是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真正源泉。同样，在后来的时期，人文主义和人文研究的概念也被西方借来用于自己的特殊历史。这种观点被夸大了，它忽视了其他社会的代议制、自由和人类价值观的问题。但西方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冒称自己享有这些价值观的真正专利，这在今天甚至更为尖锐。一个最令人担忧的西方神话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从整体上与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不同。但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有着相同的根源，以及很多相同的价值观。代议制形式在很多社会中都有，特别是部落政权，尽管不是依照当时普遍的选举标准的“民主”。然而，西方的民主主义窃取了很多确实存在于其他社会的价值观，例如：人文主义、个人主义、平等、自由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基督教美德特有的慈善概念。不过，“是什么构成西方德行生活”这一点并没有一致意见，因而，这一做法将必然导致某些混乱现象。这里，我选取了西方主张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经常谈到的品质。虽然如此，所有这些关于西方独特性的思想仍然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厘定。

考虑西方宣称的德行时，“理性”显然应该包含其中。这里不

多讨论是因为我在《西方中的东方》（1996）一书中已经充分探讨了这一点，这里会讨论更多其他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东方社会总体上缺乏理性，这种观点遭到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技、神谕和巫术》（1937）（就非洲而言）的挑战。还有一些人试图将西方的理性与古代形式区分开来，就像看待资本主义一样。我认为，差异当然是有的，尤其存在于文字社会发展出的“逻辑”（往
240 往是一种正式的科学逻辑）与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按时间顺序论证的过程之间。无论如何，只有西方拥有理性或能够逻辑推理作为对现在或过去事件状况的论述，这种观点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人文主义

尽管如此，辉格党式的历史概念仍然假设一种持续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理性方面，还体现在实践和人类的价值方面，并往往导致更“人文主义”的目标和成就。生活水平、技术和科学一直朝向“进步”持续发展。一般认为，类似的转变也能在价值观中找到。如我们所见，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明进程”的发生。他探讨了某些价值，但那些方面的任何矢量运动似乎很有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人文主义了解的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术语有各种用法，有时指“基督的人性”，有时指人性的世俗信仰，其他时候又指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著作（这些学者致力于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换言之，是研究区别于基督教传统的“异教”学问，即基督教一直试图抛弃的学问。现在，这个词语又通常指“人的价值”，它们几乎逐渐由人的各种权利所定义，有时指世

俗而非宗教方面，以及政治和宗教权力、权威的分离。这些权利往往被想当然，但的确需要明确一下（是哪些人、在哪个时期、哪种语境下？如果它们是权利，那么谁来承担相关的义务呢）。

人文主义与世俗化

欧洲对他们认为的很多当代的重要价值往往会追根溯源，不仅追溯到古典时代，更多的是追随到近代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这些价值包括宽容[①]，继而才有信仰的多元化和世俗主义。世俗主义被视为思想进步的关键，因为它从教会的教条限制中解放了关于世界的思想。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便是将教会领域从更普遍的思想活动领域中分离出来，一边是科学（广义上的知识），一边是神 241
学，两者在政治上的对应是教会和国家的分离。世俗化不是解释成抛弃宗教信仰，而是将“宗教”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上帝没有死，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帝之城中。实际上，彼得拉克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领导人物之一，就认为古典时期的复兴强化了基督教的启示，但它在更多方面意味着更多社会活动领域的世俗化。

怎样确定这个“适当的”范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这一标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基督宣称他的信徒应该放弃属于凯撒的事务。这一训喻并没有阻止很多基督徒坚信政治应该根据基督教原则及其

① 像贝勒（Beyle）这样的自由思想家在17世纪80年代认为中国是宗教宽容的榜样。洛克、莱布尼兹和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也有同样的看法。伏尔泰也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认为居民的荣誉与幸福受到整个帝国实行的法律的保护。他将这一国家的理性特征归为缺乏神权统治（Blue，1999：64，89）。

相同的精神来处理。随着罗马的衰亡，罗马帝国变成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和天主教信仰成为很多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宗教改革到来时，亨利八世仍然是上帝荣耀下的国王，结果，他依旧是宗教信仰的捍卫者，其追随者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当时很多欧洲政治家都希望将欧洲明确规定为基督教大陆，以统一政治和宗教，就像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现象一样。

启蒙的一个方面是强调世俗世界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对科学不无裨益。想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想想19世纪中期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主教（Wilberforce）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然而，并不是全部欧洲，也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人们都还记得世俗主义者将哪些内容视为正统基督教的思想。世俗主义不是不要上帝，而是认为上帝应占据越来越少的社会思想空间。与之相随的是教会与政治的分离，教会财产的没收，宗教学校的世俗化，教堂出席率的下降以及祷告日益减少。但多数政治家、统治者和国家仍然对主导性的宗教保持谦恭，即便这越来越变得形式化。

我们从未达到这一状态：即使我们没有皈依一种单一的、主导性的一神论宗教，启蒙运动仍然会发生。在欧洲，宗教试图从根本方式上规范人们的生活。每个村庄都要建一所花费不少的教堂，委派一位管理者，其事务包括出生、婚嫁和死亡等各种典礼。村民们出席每个礼拜，聆听一段导向宗教主题、价值和权利的长长的祷
242 告，这些几乎没有为世俗活动留下空间。

中国古代的情况与此相反。宗教传统不占主导地位。多元文化非常盛行。实际上，儒教是一种道德，追求世俗目标，反对超自然的阐释。它提供了另一套信仰体系，包括祖先崇拜、对地方神龛和

佛陀的信奉。由于这种多元化，启蒙所鼓励的世俗化自由几乎不需要。科学在它的方向上稳步发展，与宗教信仰很少冲突。中国似乎并没有像处于一神论支配下的欧洲或近东一样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比如在新儒家中，多元化和世俗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时并存的，完全允许科学和其他观点的发展。中国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平行发展很有意义，包括对伦理和文学的强调，对古典著作的诉求，编辑文献的兴趣，并相信普遍的“人文”教育比培养行政官的专业人士更好。[①]

诚然，中国在科学领域有大量成就，正如李约瑟在他的权威丛书中展现的那样（我们在第五章已讨论过）。[②]埃尔文认为，中国某些世俗态度的特征在近代得到强调，而上层的思想体系体现出近代中国的世界祛魅这一相似的运动趋势，也就是说，有一种“几乎不相信真龙和奇迹的倾向，这与传遍启蒙欧洲的祛魅毫无二致”。[③]这些特征不是简单的欧洲影响的结果。

当然，即便是一神论传统也允许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如多神论也会阻碍它们一样。这里我们需要一个网状框架而不是概念上的对立。对伊斯兰世界而言，这一点尤其是事实，尽管哈里发奥马尔有一些言词，他宣称，“如果记载下来的内容（亚历山大图书馆中剩下来的书籍）与真主之书一致，那就不需要它们；如果不一致，它们就不被需要。那就毁掉它们吧”。[④]尽管如此，希腊的研究传统仍然建立了起来，记下大量成就。欧洲的很多领域都受到伊斯兰学术的影响，尤其在医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这些有助于进一步向

① 我将最后这句评论归功于彼得·伯克。
② Needham，1954.
③ Elvin，2004：xi.
④ Barnes，2002：74.

早期文艺复兴发展。最主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本身也经历了世俗化
243 运动，韦伯称之为“世界的祛魅”，特别是在艺术方面。追随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先驱们将造型艺术和戏剧从先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致非宗教的主题占据了主导地位。音乐也在一个较高文化的水平上表现出世俗形式。

正是在世俗层面上，“人文主义”这个词才偶尔用来形容其他非基督教传统的特殊时期。扎法拉尼提到伊斯兰文化中安达卢西亚和近东的“人文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学者们没有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宗教问题上，而是同时研究“科学”和“艺术”。他认为同样的事情偶尔也发生在犹太教中。同样，这些时期也没有抛弃宗教信仰，但都限制在一个更为有限的领域里。

然而，即便今天，人文主义与此前相比也没有彻底实现。自启蒙运动以来就没有单行道。近代独立国家很多早期领导者都是世俗人员，这一情况停留在事实层面。例如在印度，近东当然也是，世俗政权处于“变动之中”或受到威胁。由于本土宗教受到这种威胁的外部干涉，近东的世俗主义也得到很大发展。埃及与它的阿拉伯兄弟之间也有很多困难。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是对人文主义的抛弃。转而信奉基督教正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尽管如此，但仍然需要认真对待这一点，在车臣、爱尔兰、菲律宾、古吉拉特（Gujarat）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宗教关系成为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的重中之重。西方也的确不断派出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其中一些人强烈抵制后启蒙时代的思想，这不仅和普遍意义上的世俗化有关，还与进化学说、一元学说、避孕的作用、堕胎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有关。这种抵制即使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定的比率。

人文主义、人的价值与西方化：言辞与行为

前一章中我已讨论人文主义对教育进程的贡献，主要是在欧洲语境下。但是，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一段特殊时期，还要考虑这一概念与西方“人的价值”达成一致的方式。显然，人文主义无论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还是对世俗的承认，都不是“现代”或近代西方社会的发明创造。人的价值显然会根据所包含的人性而不断变化，但有些价值是普遍性的，比如分配公正、互惠、和平共处、丰裕、康乐，甚至政府或其他权威阶层的某种代表制度，西方所阐释 244
的“民主”等概念，都是一个变数。现代社会在他们看来更科学、更世俗，但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①]，“科学的”、技术性的或实际看待世界的途径是普遍的，可以共存于宗教观点中，也就是说，这一方法包括超自然的信仰（用E. B. 泰勒的定义来说）。即便在口头文化中，我们也能找到一种不可知论。在文字社会中，怀疑论会有一些书面表达作为学说，不过也体现在口头文化中，作为他们世界观的一个因素，这和我试图描述的加纳北部洛达基记载漫长的巴格里口述材料的不同形式一样。[②]即使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任何人都相信任何事；实际上，所有的神话都伴随一定程度的怀疑。

但是，欧洲在世界很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总体观念与教育计划的“人文化”使命密切相关，通常假借宗教人士之手，他们有诚挚的教育目的，但认为自身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皈依基督教，摆脱本土

① Malinowski，1948.
② Goody，1972b.

行为，引进欧洲的标准。在这个计划中，古典著作教育往往在中级教育层面上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古典时代的经典名著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基督教的盟友（就像彼得拉克坚信的那样），以及以人文主义价值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些努力获得了巨大成功。欧洲一些初级学校精选的最优秀的教师在接受古典培训的同时，也要接受基督教的熏陶。他们鼓励最优秀的学生追随他们的脚步，这一点对于引导1947年独立的意义重大。是年，西非加纳这个最先赢得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国家建立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人事上最早完全非洲化的系别便是古典文学系。其校长不仅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本土语言，也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位加纳籍校长，随后成为东京联合国大学的校长。这就是古典名著和“人文科学”所散发的力量。

随着殖民主义的消失，一些政治家将“人道主义”的产生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而全球化也被视为西方化的一种。这一结果的
245 广泛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性独立运动。很多新独立国家的早期领袖都有世俗倾向，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比如印度的尼赫鲁、加纳的恩克鲁玛（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位新任领导人）、肯尼亚的肯尼亚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埃及的纳萨尔。他们反对西方的殖民统治，并赢得了独立（他们的“自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采取了对方的价值取向口号。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生在法国上伏塔（现在是布吉纳法索，Burkina Faso）殖民地波勃-迪奥拉索城（Bobo-Diolassou）的情形。当时，一群秩序井然的非洲工人被法国警察包围，而工人们打出的标语却是要求“自由、平等、博爱”。

这些运动得到西方政权的支持以及倡导自由、民主的联合国的支持，表达了人们的意愿。评论家和政治家往往看到和他们相关的

价值，诸如尊重人的尊严，这些对先前缺乏它们的社会很重要。同时，这些外国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往往不能按照自己声称的水准生活。例如，美国也有兴趣提高自己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它巨大的石油消费和保护“生活方式”愿望的驱使。这种“资本主义的”的生活方式反对苏联尽可能的扩张，尽管后者已经由多数人统治。近东尤其遭受冷战之苦，援助给予了支持上述目标的“非民主”政权。在压制共产主义、确保石油安全的事务中，一位评论家写道：“美国不遗余力，促进甚至强加这些政权于伊斯兰世界之上，这是彻底的破坏，与保卫美国声称的民主自由价值的实践完全相反。”[①]换句话说，言辞上声称的民主价值与实际追求的政策之间存在严重的言行不符。

我们经常面对政治家和个别人所宣称的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但他们却在特殊情况下不断违背这些价值。举两个当代的例子来说。第一个例子是已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对战争中俘虏的士兵和平民的待遇有严格的规定。近来，美国及其盟军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将大量囚犯运到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在此，美国建立了治外法权基地，而此地的囚犯却饱受殴打。如果依照协定，这些不同国籍的囚犯不应该被视为战争俘虏，因为古巴基地不是美国领土，　246
但关在这里的人们却完全享受不到国际权利，甚至是美国法律下的权利。换言之，他们被拒绝给予“自由”，用律师的术语说是普遍的“人权”。这种情况后来遭到联合国的谴责。[②]同样的悖论发生在2003年12月13日萨达姆·侯赛因的逮捕过程中。据一位盟军发言人

① Saikal，2003：67.

②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曾是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战争囚犯时，这些权利大部分还是受到尊重的，因而，我对这个问题感受非常强烈。

说，他像一只躲藏的老鼠一样被捉住。尽管此前抗议的囚犯在电视上露面，但与《日内瓦协议》相反，他们仍然曝光了这位前统治者的照片。毫无疑问，这些画面违背了《日内瓦协议》关于囚犯在公众羞辱方面的规定。

第二个例子，不得不谈谈近期提克里特（Tikrit，还有其他城市）的爆炸事件，以回应美国士兵在周边的死亡，时间就在布什总统宣布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后。这正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议和反对的行为。那时，德国军队在攻下村庄和社区之后仍然对其进行集体镇压，比如在意大利的阿丁蒂（Ardeantine）防空洞和法国的奥兰多尔村庄。这些行径被视为战争罪行，最终得到了国际惩治。

一句话，西方以人道主义和人道行为概念为中心宣扬了一套价值体系。虽然它们毫无疑问会随时间发生一些可能会被如此形容的变化，但所有社会都有关于他们所认为的人道标准。有时以普世性的习语出现，诸如“不应杀戮”之类，但这些声明往往都是言辞上的，只适用于特定群体，而不是“他者”、敌人、恐怖主义者和叛徒。这一点在战争时期非常明显，那时，如此广泛的价值观往往也被压制或颠倒，尽管有些如红十字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在尽最大努力保证他们在当代世界的生存安全。

民主主义

新“产生的人道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民主主义”，它与
247 “自由”、“平等”、公民参与和“人权”等概念紧密连在一起。显然，就代议制政府而言，近几百年来，世界许多地区都有某种朝向

新型参与的总体趋势。但需要正确看待这场运动。早期团体当然有很多直接参与，但今天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投票中更多的参与伴随的是其他领域更少的参与，因为人们参与的这个政府更为复杂，更加疏远，包括更多的人。这意味着政治家更职业化，而直接选举越来越少。

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因为今天的民主被视为普遍的价值，当代西方社会成为主要的捍卫者和唯一的典范。不过，是这样吗？我还是这样开始吧。我认为，应在语境中看待民主程序，与特殊情况联系在一起。我听到很多当代的劳动者说劳动场所没有民主。当然，研究机构中只有有限的数字。不过可以比较一下当代的工作场所和那些简单农业状况下的工作场所。我曾引导一位加纳朋友参观英国本土的工厂。他看到妇女们站在工作台的流水线上，进入和离开工作间时都要打“计时卡”。“她们是奴隶吗？”他用加纳语问我。他自己在田间的劳动要“自由”得多，也没有职权关系。

在古希腊，“民主”的概念是指“人民的统治”，代表独裁甚至“专制”的对立方。人民的意愿由选举决定，但人民仅限于“自由的”男性，不包括奴隶、妇女和住在那里的外国人。所以，在政治语境中，欧洲的民主过去往往也受到限制。现在，被视为“充分民主”的制度中，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单独的一票，选举定期、反复、间隔地举行。这是代表的“个体化”，虽然研究表明，丈夫和妻子往往投出相同的一票，但他们却不再作为家庭或亲属。这种形式中，民主的实践是全新的。在英国，投票仅在1832年才扩大到包括男性户主，妇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投票权。法国则更晚。即便美国这一托克维尔眼中假设的现代民主的典型，乔治·华盛顿提倡的也是将选举参与限定在白种“绅士”中间，即土地所

有者和大学毕业生。每个例子中先前都有严格限定的特权。它所赋予投票箱和选举的用途取决于这种看法：选择是自由和无障碍的。
248 法国左派最初否定了妇女的选举权，因为女人总是喜欢按照牧师告诉她们的那样投票。

首先，即使现在关于选举的解释也有一些技术问题，就像2000年美国著名的佛罗里达的选举。还有由多数人构成的问题，比如是小部分还是全部，是依据选票的数量，还是单位（州）的数量。其次，强制的问题使事情变得越发复杂。无论提供选举前的贿赂——例如18世纪英国，还是选举后的报酬，某种程度上对未来利益的承诺都成为选举过程的一部分。不论是政治上对广播的控制（比如俄罗斯），或借助金融手段的经济控制，引起大众注意的不同方式也会影响自由选举的最佳结果。

西方的选举民主现在不是简单地被看作各种可选择的代议制模式中的一种，而是被看作适合的一种政府形式。[①]当代西方强国的目标一直是促进民主。在非洲的独立过程中，殖民统治者坚持把政权交给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所依据的——用英国的话说，就是贴上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标签，目的是确保民众满意。实际上，正如我提到的，这些政府形式并没有保留下来，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依据“部落”或宗派投票。他们采取一党统治，并认为这是统治者稳固新政府必不可少的，进而，军事政变便成为改变一党政权的唯一方式。对很多新政府而言，主要的政治问题不是转向民主，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此前没有的中央政府。要维持下来非常困难，因

① 我在亚历山大的一位谈话者反对将民主描述为一种代议制形式，认为民主是“一种文化形式”。然而，选举程式运用到政治领域，但几乎很难在其他领域比如雇佣或家庭中获得成功。

为这些政府包括一些具有原始性、部落或宗教特征的群体，可能会妨碍西方意义上“政党”政权的建立，但又不能把这些群体从他们自己的代议制（“民主”）程序中排除出去。 249

这种不考虑背景、明显偏好一种政府形式的做法是全新的。在古希腊、在罗马，政治制度随着时间发生重要的变迁，在“民主”和“专制”之间转变，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变化，就像非洲自独立以来所发生的一样。即便在欧洲，直到18世纪，甚至更晚，都没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民主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欧洲有各种形式的变化，不一定具有暴力特征，偶尔也会用到武力。就古代社会形态而言，政府形式的根本性变革被否认了。虽然有叛乱但也不是革命，也就是说，人们为了改变统治者而不是社会政治制度本身发动叛乱。[①]这种观点的有效性并不太清楚。很多这类社会中，政府形式和代表制度一起变化。根据拟好的方案彻底颠覆一种制度在古代社会中很少见，特别是在前文字社会中。这是事实。但通常是，不仅在中央集权之内有一些震荡，而且在中央政权和部落政权之间也有一些动荡，这些部落被看作分散的小政权；或者说，在中央和边缘的权力位置之间也有一些晃动。政府性质的变化是古代政权的特征，而“民主”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谈到民主进程时，我们要考虑各种方式，其中人民的意见应该得到正式解释。有很多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西方，选举团是用来咨询的，每四年、五年或六年通过秘密（通常是书面的）选举产生。人员数量不断变化。因而，检验民众的意见和寻求一段时期内连续的政策之间会有一个折中。有人提出，民众应该更频繁地得到

① Gluckman，1955.

250 咨询，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比如宣战，这在英国甚至不需要议会的投票，因为有一个虚设的皇家特权。（这仍然采取了欧洲做法）当各个政府能够决定一些重大行为诸如与大多数人意愿相反的战争时，很难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民主制度中（也就是说在人民的统治之下）。同时，我们可以由不断选举和民意测验来治理吗？又或许，骚乱就存在于此？这种情况值得讨论：当代表们不再代表，民主只有借助恢复代表们的活动才能得到真正确保，由此，人民的意志能够摆脱背离国家中大多数人的愿望而发动战争的政府。如果这种“真正民主”的可能性是有效的，那么，大多数欧洲政府在入侵伊拉克前夕都将被推倒。

不过，有种情形同样值得探讨，具体说来，一些社会方案需要超过四五年的时间来实施，因而政府的选举需要一段更长的时期。独立之后的非洲常常有这样的要求。例如，一些选举出来的政府本身变成一党政权。当然，没什么能阻止政府被连续选出，以便使其能够实施更为广泛的方案，但如果选举人自身“选出的”政府长期或实际就是永久被选，那将会怎样呢？

即便对民主主义者来说，现代民主制也的确提出了很多问题。希特勒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继而他将国家政权转为独裁统治。什么是选出来的独裁统治？正是这样的国家政权才延宕或抛弃“正常”选举，压制对手，尽管它也可能利用了普通投票权。不过如果与大多数人的认可或选择一致又会怎样呢？对民主主义者来说，问题是一党政权和类似的制度不允许选举变化。

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制的拥护者不允许其他制度，只有他们的选举程序才被视为“人民的统治”。但这些咨询形式也可能包括借助呼声而不是通过投票选出一位领袖，甚至选举程序也会被看作代表

上帝的意愿而不是人民的意愿，就像梵蒂冈或剑桥学院一样，教皇或院长的选举都在教堂仪式中记录备案。政党之间的选择暗示着一种选举制度，但在非洲很多地区却没有获得太多成功，因为部落和当地的王室有很大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成功，比如伊拉克，它涉及“正统的”宗教信仰或语言认同的问题。 251

如果“民主制”一词是指19世纪欧洲发展最显著的周期性选举程序，那么，它仅由一种可能的代议制形式构成。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政治制度都有一些代议制形式。它可能被抽象地设想成一种完全专横的独裁政权，但如果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考虑人民的意愿，那么它也就时日可数了，即便是在所谓的独裁或专制制度之下。例如，我们提到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秦朝还是王莽政权可能都称不上专制。古典文献本身就形成了对政府的反思，比如孔子的著作，我们在第四章已经提到。反思的结果是，文人往往发现自己与当时的政府处于对立之中。①

还有各种情形，其中现代国家认为民主制度不能普遍适用，即使是政治方面。直到最近，美国一些地区的黑人在国家中都没有选举的权利，而其他人却有这种权益。就国家来说，这一重要的少数民族最终获得了选举权。如果白人是少数群体，他们是否情愿同意这种做法，这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国家可能仍然保留了种族隔离制度，正如早期的南非一样。

民主制，是对当代伊拉克的回答吗？以下情况值得讨论，即由于宗教和民族群体的严重分裂，人们应该选择“权力共享”，就像近来的北爱尔兰那样，这样便没有一个团体（什叶教徒或新教徒）相 252

① Nylan，1999：70，80ff.

对另一个是永久性多数，而是一种“联合民主”，这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在古希腊，选举权仅限于公民。公民权的概念通常和自由甚至革命政权有关，在实践上可能包括排除大量非公民。“我是罗马公民”意味着那些居住在同一领土上的居民不能享有同等权利，就像最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一样，或者任何移居或旅居在瑞士或印度的人，他们不能购买土地或房屋。公民权是一种既排斥又包容的概念。

但即使在公民权概念内，和多数、例如和特殊宗教团体的半永久的附属关系也可能意味着对类似的少数群体长期的有力排斥。为了对抗相对持久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实际上排除了短期内“充分民主”所依赖的选举变化，那么，如我们所见，可能会诉诸权力共享以确保代议制（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或默许）。另一种“准民主的”手段是“客观区分”，它给予某些被剥夺权利的少数民族一些额外特权，或在国家议会中，或是选举过程中。这种程序为美国黑人所接受，以及某些特定“选举名额”分配下其他地区的妇女所接受。我所知道的国家范围内的第一例，是1947年印度宪法在“现有种姓制度”中引入民主制。安贝卡（Ambedkar）博士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描述。从出身来说，他本人属于不可触摸的等级，他认为在一个由其他等级控制的印度政府中，他的等级不会得到“公平”对待。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现在的大环境认为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价值取向的概念，享有普遍的适应性。但民主很大程度上还只限于言辞，并被（错误地）看作欧洲文化的发明，而实践却是另一回事。甚至指涉的含义都在变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这一含义有些狭隘，现在它还特别指一些国家政权，这

些国家的议会每四五年都会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秘密选举产生。即便这样，这个概念在一些情况下还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选举都是西方认为的“民主制”。人们希望外国有不同的领导人，但却要 253
求“民主”取代选出的政治家，而商谈的条件（比如哈马斯的例子）却傲慢到极点，这根本就不是民主，而是支配世界权力蛮横要求的表现，但却作为合法化的外交政策横加干涉其他国家的运转。近来，这种政策得到独裁者而不是民主选出的领导人的公开支持，甚至今天和严重集权化的君主制沙特阿拉伯或政变后的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们结盟都没有多少困难。

入侵伊拉克的一个主要借口是这个政权不民主，事实上是残忍的独裁统治。然而，一个国家必须采取哪种政府形式，对此并没有国际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都以民主选举的形式登上权力舞台。西班牙虽然不是，但盟军在战后处置佛朗哥（Franco）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他的就职导致了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和一场血腥的内战。同样，很多非洲政府和南美洲及其他地区的政府（例如斐济）都是这样。同时，加勒比岛上格林纳达（Grenada）民主政府的产生并没有阻止它遭到美国的入侵，即便它是与美国最亲密联盟连在一起的共和国。

国内的“民主”几乎不适于世界范围。选举的实践在国际层面上的决策制定完全不同。在联合国大会上，托管由各个政府决定，每个政府都有单独的一票，但却没有考虑到它的居民——是一个政府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18个成员的安理会由大会选出，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其中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是由胜利者创造的“合法”制度。安理会的大多数决定因为否定票都不能算数。尽管如此，享有优势的国家，特别是超级

大国，可以动用他们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种资源，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投票，并动用可能遭到国会谴责的各种手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很多欧洲国家的代表们，都致信白宫赞成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这些代表们显然定期在华盛顿会晤。他们在白宫得到一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官员的"建议"。正是这位官员，代表这些国家写了信件，而这些国家同时
254 是北约的候选国，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①]支持的决议并没有咨询他们自己的人民，而人民几乎必然反对。英国首相布莱尔同样如此，他认为没有义务在伊拉克战争上考虑选民，因为他所决定的立场是正确的，无论其他人想的是什么。这也是布什的立场。采取其他立场的人们不仅被谴责——这是意料中的，而且，也会遭到各种规则的抵制。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那么他们在战后的各种决定上就没有发言权，这些决定显然不是由联合国做出，而是超级大国及其同盟者——这才是不宣而明的。俄罗斯、法国等将来在伊拉克协议或石油上就没份儿（同样，他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事件上也没份儿），而那些协议或石油的分配将握在胜利者的手中。"法则"只是战争的产物。

如此区别对待的措施在可供选择的行为事实中几乎没有尊重合法权利和自由，而这却是民主和人民统治的基础。的确，我们只剩下武力统治。在国内，这些措施等不到战争结束。CNN[②]新闻节目中的讨论提出一种可能：美国应该不再喝法国的葡萄酒（以支持奥地利，因为奥地利政府为伊拉克战争提供支持），同时预告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的销量也会下降。甚至持不同政见国家的名字有时也

① *Herald Tribune*, 20/02/2003.
② *Herald Tribune*, 20/02/2003.

应忌讳一下：有些菜单上的“法国炸薯条”应改为“自由牌炸薯条”，而自由则和参与战争密切相关。美国在电影、电视，在普遍的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要保证它的位置一直用自己的术语解释。限制所有制，控制大众媒体，通过限制通货（还有武器）的用途以影响人们投票，这种民主形式看起来的确太惹争议。不过，全球的电子媒介几乎不会在此方式上受到限制。尽管如此，民主仍然依赖于颇具影响的“选举自由”这一概念。然而，当国际层面的选举受到贷款或赠礼的影响，而国内则是从那些负担得起大众宣传或为选民制定饮料价格的人们中选出候选人时，金钱和各种垄断权利显然影响了选举自由。总体来说，国际形势与国内是根本不同的，民主制度适应于不同的环境。联合国前秘书长最近在一篇题为《美国反对世界各地》的文章中提到：“最重要的观点可以用哲学家帕斯卡 255
的话来形容：‘民主是美国国内的民主，独裁是美国国外的独裁。’”[①]在国际层面上，民主国家是不尊重民主程序的。

“民主仅仅作为现代社会，实际是西方社会产生的特征”，这种观念将其根源归于希腊城邦显然过于简单。显然，希腊提供了一个不完整的典范。但很多古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最简单的制度，都体现了试图由人民意志决定的咨询程式。一般意义上，民主的“价值”虽然偶尔有所保留，但也经常——如果不是一直，在早期社会中得以呈现，尤其产生于与独裁统治相对立的环境中。现代社会所做的是将这种选举（选择权）形式制度化——最初是由于某些政治原因，因为需要人们以税收为国家开支积极做贡献。正因为要增加这笔钱财，议会才得以召开。没有这种代议制形式，国家税收几乎

① *Unita*，22/04/2003.

不可能，就像美国殖民地强烈声明的那样。但这些西方赞成的形式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充分的代议制，威斯敏特模式的发扬即使在国家范围内也不是一剂万能药。在国际范围内，选举程序被认可而不是以武力或其他制裁强行施加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个人主义、平等和自由

与民主主义有关的是三种价值观，它们构成了欧洲思想的三位一体，并往往被看作欧洲独有的原因或结果，具体说是欧洲艺术、科学和经济独特发展的原因或结果。它们在整个人文主义中到处可见，譬如在文艺批评中，在小说以及作为个人主义例证的自传兴起的讨论中。[①]个人主义也被西方看作是对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进取精神的一大因素。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要讨论的，个人主义涉及个人选择的自由（与集体责任不同），这一点成为当代婚姻和核心家庭的首要问题，而且被再次认为是欧洲独有的。这种自由往往等同于选择伴侣时不考虑家庭关系。但家庭关系的完全自由并不是当
256 事人所享受的，因为他们很快产生了另一种纽带关系。孩子们可能从家庭中相对早地分离出来，但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后不久，他们又和其他人，如情人、配偶，最后和自己的子女建立亲密关系；同时和他们的父母、亲戚的关系逐渐疏远（偶尔会来往，也会经常通信、通电话、发电子邮件）。实际上，莱斯利特等人认为，欧洲这种家庭的裂变恰好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而疏远了亲戚间的广泛联系。西方家庭内部的依恋越来越紧，这种观点看起来和

① Watt，1957.

（“自由”）独立个体脱离社会的观念——以鲁滨逊·克鲁索或欧陆的其他神秘英雄诸如浮士德的方式是一致的。“我们的经济由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在这种观念中，意识形态的矛盾非常明显，因为这绝非事实。事实上，家庭的稳固关系甚至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

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并不限于欧洲。近来已经有人指出②，与爱情有关的平等和自由是伊斯兰伦理教育的基本特征，正如对个人的关注一样。雅曼（Yalman）认为平等是“伊斯兰文化”的“基本因素”。当然，平等付诸实践在观念上是指机会向所有人敞开，宗教群体（僧侣）也没有接近神的真谛的特权。这种“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民族中间没有不平等。“现实中，低贱和高贵作为伊斯兰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和其他文化是一样的。”③

雅曼对伊斯兰文化中和平等、爱情有关的高度理想化形式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关系决裂作了一番对比。但意识形态和实践往往是不同的。如上所述，雅曼意识到平等并不总是伊斯兰国家实现的；同时，他引用了一段评论，提到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假设由一个长期不变的阶级主导，帕克蒂（bhakti）的出现也意味着等级是可以改变的，那些落入二等出身地位的人也可以升到较高的位置。④同样，爱也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社会的一个特征，并不是非此即彼。他提到印度特殊的性爱传统，比如奎师那（Krishna）的侍神女仆，还注意到梵文诗歌中的肉体之爱。因而，这种相似性包括

① Goody，1996a：192ff.
② Yalman，2001.
③ Yalman，2001：271.
④ Hopkins，1966；Yalman，2001：277.

257 “印度和穆斯林虔信主义的复杂联系”。他继续写道，在印度教中，爱和平等一样只是伟大文明中一个很小的主题，一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①]这种评价与欧洲通常对这些社会（和他们对平等和爱）的偏见相差多么遥远！雅曼展示的是，如果这是对立双方黑格尔式的解释，那么这两种社会的具体实践显示出的特征不仅和旁观者的陈词滥调相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也是背离的。

因而，我们需要缓和意识形态中关于平等的鲜明对比，要考虑实践中与其共存的相似之处。非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它涉及的社会分化较少。相比非洲来说，土耳其的伊斯兰社会和印度的印度教社会都代表了欧亚大陆后青铜时代的文化，所有这些社会都发生了严重分化，产生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大多数地区建立在对有价值的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不平等掠夺和军事功绩之上。不过，这些分化的不平等形式都能以成文的宗教意识形态赋予合法的权利。伊斯兰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松动甚至抵制世俗的分化，有些富人提倡慈善赈济（这是博爱的一个方面），偶尔也有穷人的叛乱，即使他们没有提出有效的重新分配方式。实际上，这种个人形式的慈善赈济据说可能强化了现状。在印度，世俗阶层也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支配，但并不明显，因为即便不是政治—军事统治者，也是有文化的僧侣来主持宗教仪式，他们被看作位列阶级的最顶层，世俗统治者追随其后。这在伊斯兰世界中也是普遍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僧侣，但也只有一小撮男人能够研习珍贵文献。而且，据说学问比政治权力还要重要。[②]

---

① Yalman，2001：277.

② Berkey，1992：4.

印度和伊斯兰国家一样，等级界限可以通过赈济、施舍的行为来打消。这和我在古吉拉特一个由议会管理的村庄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贱民，即以前的不可触摸者，排队去接“农民”帕塔尔们(Patels）制作奶酪剩下的乳清。但更有意义的是宗教方面，帕克蒂和奎师那崇拜体现出积极的平等主义的特征。一直以来，他们就与其他等级存在严重的对立，特别是印度无神论思想的长期传统包括达利特(Dalit，不可触摸者）对种姓制度的抵制，在这一制度中，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最底层。这种对立以19世纪的圣雄普莱的反抗活动而成为普那（Pune）典范，这位处于种姓制度底层的鲜花商人建 258
立了女子初级学校；后来由于安贝卡博士的活动，贱民领袖传到圣雄甘地手中，他草拟了印度宪法，包括我们提到的客观区别，最终引导他的团体脱离印度教加入佛教。佛教和耆那教都从印度教发展而来，但都抛弃了种姓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安贝卡博士能够成功领导以前的不可触摸者皈依佛教的原因。佛教在印度只有很少信徒，因而也就只有很少的内部政治意义。

平等的观念当然不仅限于欧洲，也体现在印度社会，即便在婆罗门宗教思想中也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伊斯兰教的实践和某种程度上等级的意识形态一样。平等和等级这些对立的意识反映了每个社会的内部。信仰体现对立的方面，但从更大的框架来说，这两种意识不仅体现在这两种社会，还体现在基督教世界中。如何体现？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这些社会都依赖先进的农业及其商业和手工业产品，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严重分化的社会，同时也是政治和宗教教育分化的社会，这和书面文字的运用以及更普遍的圣训经典有关。但这些分化往往被看作人类中间（例如在亲戚中，兄弟姐妹中间）实际泛人类平等观念的反面，它是阶级

社会中的一股逆流，是以分配公正的观念为基础的。从家庭的立场出发，平等和兄弟（“人人皆兄弟”）或伴侣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不是和父母子女间的关系有关（以父子关系最为典型，比如俄狄浦斯的例子）。[①]一套价值观包含不平等，另一套则包含平等，两者都建立在家庭关系延伸的社会关系之上。两者都包括爱，一套是博爱或姐妹之爱，以及“性”爱，它存在于平等的个体之间，是种横向关系；另一种则与父母之爱及亲人之爱有关，是有等级的，产生于不平等的个体之间。父亲或父母在等级上的强势地位恰恰和以兄弟或姊妹为平等特征的主张相背。这些主张能够支配个人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否则他们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疏远的关系，而对人们一贯的贪婪或消费主义的行为方式束手无策。我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清楚了解到这些意识形态和实际行为中的悖论，正如我们忽视汽车造成的环境污染，依然跳上自己的尼桑车开到超级市场（我们还公开谴
259 责超级市场接管小型的、个体的商店）。

和平等一样，自由的观念[②]在人类社会中也很普遍。这一观念取决于各种语境，而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英国人阿道夫·斯雷德爵士（Sir Adolphus Slade）曾于19世纪20年代在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中担任一名军官。他写道：“迄今为止，奥斯曼帝国仍然还有自由人享受最珍贵的豁免权的惯例，而基督教国家还在为此而长期斗争。”斯雷德只需缴付很少的土地税，还不到十分之一，不需要护照，既没遇到海关也没有遇见警察……“即使身份低下，他也能渴

① 参阅Mitchell（2003）。

② 但自由比起所形容的要复杂得多。卡罗琳·汉弗里斯（Caroline Humphries）最近分析了俄罗斯共产党之后的自由概念，并将其与西方作了对比。slobude和valya这两个概念曾被翻译成英文，第一个词指的是追求政治目标的自由，第二个指的是追求个人的自由。

求晋升而不会冒犯帕夏（Pasha，土耳其高官的尊称）的头衔”。他将这种自由——“这种实现最野心勃勃的愿望的能力”——比作法国大革命的功绩。[①]这种情形有很多现实意义。例如，一位新的皈依者，例如一个阿尔巴尼亚男孩作为圣子带到伊斯坦布尔，可以升为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成为苏丹的评判准则。

雅曼解释了自由是如何与平等相互联系的。他说，“伊斯兰的崇高理念”，

> 转而成为伊斯兰没有特权人物的原则，或者说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思想、行为和虔敬的德行。这可以通往天堂的大门，但即便在现实王国里，所有人一旦皈依伊斯兰信仰，也就是说，“臣服于”真主的意志，那么在社会的升迁中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机会。由此，这便是伊斯兰对诸如美洲黑人穆斯林以及其他地方被压迫人民的承诺吧？[②]

如我们所见，个人主义、平等和自由等主要“价值观”通常被看作本质上是欧洲的，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促使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之前进入现代化，这种观点建立在摇晃的基础之上。“主体可以自由追求他们的观念”长期以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但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③]，缺乏约束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方面，具体是指“消除再生产的保障”，抛弃源于传统的权利，而“资本主义”和过去的制度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却不清

① Yalman，2001：271.
② Yalman，2001：271.
③ Wallerstein，1999：16.

楚。[①]这些因素的不同形式在其他社会都能找到，不是只有先进的文字社会才有，尽管其意识形态必定更清楚一些。虽然如此，从意
260 识形态上说，欧洲尽量把这些观念的积极方面挪给自己，不过它们同样也有消极特征，博爱包括兄弟间的纠纷，而爱在亲密关系结束之后便是恨。公开倡导的美德实际上比通常想的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博爱（广博之爱），通过慈善往往改善了国家制度中的阶级不平等状态。

慈善以及奢侈的双重存在

虽不是人文主义，但却是人性或人类价值观核心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慈善观念。圣保罗宣称伟大的美德是“忠诚、希望和慈善，而最大的美德便是慈善”。拉丁文的“爱”（caritas）被翻译成慈善和爱情，爱情是对人类伴侣的感情，我将在下一章讨论两性之间的爱情。慈善是一种美德，它最初延伸到人的基督同伴，据说偶尔也单独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所有重要的成文宗教都在寻求支持。为了慈善的目的，为了维护祭拜的建筑，以及为了充实机构所需的人事，这些都需要吸引基金。所以，他们需要金钱，特别是从社会的富人中吸引金钱，这一点是必然的。如果个人有很多钱，他应该交给上帝的事业（或佛陀等机构）。同时，贫穷在原则上是值得称颂的。富人进入天堂会有困难（除非献出他的财富）。穷人的问题比较少，他或她配得上接受最终由富人但却由教会间接施与的救济和馈赠。因而，慈善从来不是单纯的基督教美德。这一

① Wallerstein，1999：16–17.

德行同样也可以在穆斯林、印度教、拜火教、耆那教和佛教徒中找到。对穆斯林来说，慈善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是五根智慧柱子中的一根。在西非，个人的慈善活动每周五举行。在那一天，救济（saddaqa，萨达卡）会送到穷人或那些需要的人手中。地中海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阶级”分化和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度，大量的物质救济施舍（瓦克夫）不仅用来支持清真寺及其相关机构，医院、集市、马德拉萨（学院），还有其他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所有其他宗教（有文字的）社会也提供相似的供应，他们给乞丐或和尚一种特权。修建救济院，提供食物，同时为穷人提供住所是重要捐赠，以此，个人得以消除前世的罪孽。

通过这条途径，穷人和教会都得到供养。事实上在基督教中，贫穷据称是一种神圣的身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文化不追求富裕和 261
奢侈。的确，在一些自我辩白的理由中，富人被认为必须帮助穷人，就像富裕的国家必须帮助那些不太富裕的国家一样。但是僧侣，这些教会的上层仍然像其他人一样追逐奢侈行为，致力于占有奢侈品。然而，这些奢侈风尚一直都有双重特征，不仅与宗教信条，还与孟子的主张相抵触。孟子认为奢侈对人类生活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在很多情况下绝对都是恶行。但这是个强有力的目标——无论在教会还是在世俗社会，无论是商人、农民还是专业人员，为了能奢华生活而积累财富。因此这两种倾向就有些奇怪，也导致了很多矛盾，一些人通过禁欲行为来克服这一问题，否定甚至毁坏奢侈品，著名的例子便是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在弗朗西斯的青年时代，他行为奢华，具有豪侠风范，慷慨施舍。疾病把他的注意力引到生活的另一个层面。献身于济贫事业之后，他发誓绝不拒绝对乞丐的救济。他只穿一件棕色的粗羊毛上衣，腰间系一根麻

绳。这位圣人后来建立了弗朗西斯戒律。和其他戒律一样，这一戒律以三条誓言为基础：贫穷、禁欲和顺从。三条中，贫穷是最重要的（导致禁欲），这一戒律拒绝所有占有财产的观念。

与奢侈和富裕相关的普遍矛盾很少以这种极端的形式体现，但慈善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现实：生活相对奢侈的富人拔一根毫毛对穷人来说都会动筋伤骨。奢侈品意味的高消费，其对立面却是消费的欠缺，即真正的贫穷，两者是经济分化的不同方面，具体表现为富人和穷人的产生。这种现象以一种如此显著的方式发生于青铜时代，此时，古代社会中相对“平等主义的”经济被新的生产技术所打破。这些技术使得一人一犁能生产出比另一人多得多的产品，也使得此人更富，而彼人更穷。[①]换句话说，慈善和导致奢侈的双重特征，还有贫穷和富裕，很大程度上都是青铜时代发展
262 变化的产物，非洲的锄耕农业社会基本没有，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在意识形态细节这些问题上不太明显。

奢侈行为和慈善一样是所有阶级化社会的一个方面，它也是一种动态的行为，外部和内部原因随时间变化。从外部来说，我提到市场力量和生产技术，例如糖料从奢侈品变为一宗大众消费品。既然社会上流借助奢侈品来标明自身身份，那么，他们现在就不得不寻求新的物品以表明区别，这些物品因为稀少或昂贵而一般人得不到。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布罗代尔注意到，我们总是需要从大多数人中区分出少数人，那些“特权人物，我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很奢侈”。[②]不过，区分的特征在不断变换。“例如，糖在16世纪以

① 我的意思不是说其他类型的社会没有贫穷，而是贫穷是另一种不同的方式。

② Braudel，1981［1979］：183.

前是奢侈品；纸直到17世纪末还是奢侈品，酒和第一道‘开胃酒’在美第奇的凯瑟琳时代也是，俄国贵族的天鹅绒被和银杯在彼得大帝以前也是。”橙子在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也是奢侈品，后来还成为圣诞节期间的特别珍品。富人们所有这些不断变化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遍的必需品，上层社会的产品也逐渐变成大众消费。

不过，奢侈品的变迁同样也会作为时尚的结果而发生在内部。布罗代尔认为欧洲时尚大约出现于1350年——紧身上衣逐渐变得又短又轻，尽管时尚真正兴盛只在18世纪前后，此时，时尚“开始影响一切”，[①]但只是在上层社会，农村人仍然继续着古老不变的样式。在布罗代尔看来，这也是东方文明的模式。

一些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家喜欢“变化”这一主题，他们认为西方“创造了发明”。[②]这种观点当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在第五章中从李约瑟论述中国的巨著中已经看到。布罗代尔更具细微差别的观点也是如此。变化不仅体现在奢侈行为中，也体现在更普遍的行为中，它是西方理解东方社会的内在本质。资本主义需要变化，传统需要稳定。但所有的社会都在不同环境下发生不同变化。我已经提到，在早期的宗教制度中，很多仪式常常体现出根深蒂固的倒退，致力于上帝做不到的事情。[③]这些仪式最终被证明起不了作用，因而，寻找解决人类难题的新办法成为这些社会的基本特征。一个典 263
型的结果便是推倒神龛。旧的神仙因为不能传递消息而被抛弃，于是产生了新的神仙。或许这一过程应看作时尚领域的外部因素，也是变化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存在于一个更细微的层面。这一层面人

① Braudel，1981：317.
② Landes，1999；Goody，2004.
③ Goody，1957.

们也能在加纳北部洛达基这样的口头文化中找到。木琴的曲子和音调即使在仪式中也经常变化，至少现在舞蹈以及妇女们表演舞蹈时所穿的棉质礼服也在变化。这些行为非常接近时尚，特别在进口布料的使用方面。

时尚和奢侈在推动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作用是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等人关注的对象。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看到。这一作用并不是欧洲特有的，而是由后青铜时代社会不断增长的经济活动广泛地推动着。急剧的变化随时间越来越快。大量的商业和贸易及其产品的增长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特征，而不断变化的时尚也在不断增长。我们看到，布罗代尔将增长的起点推至18世纪前后。这一事件指的是路易十四（1638—1715）统治下法国宫廷的时尚发展。路易十四坚持贵族一年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应该住在凡尔赛宫。正是在这种闲适的生活状态下形成了服装时尚的规律变化。法国宫廷开始从南部城市里昂邀请丝绸商，每六个月聚会一次讨论以后的式样。令人惊讶的并不是变化和新时尚的出现，而是这种急剧变化定期形成的方式。它对工业化生产的影响也是令人惊奇的。在法国，为贵族打造的丝绸服装的样式变化速度如此迅速，以致导致了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丝绸生产的没落，进而成为18世纪丝绸的大生产商，而意大利的工业则再也赶不上了。[①]这一过程不断竞争，为今天巴黎、米兰、纽约、伦敦及其他首府一年一度的时尚表演树立了榜样，显露出富人时装（尤其是女人）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形成了大众产品的风格。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大众也被吸引到“模特”引领的潮流中，尽管是在不太奢侈的程度上。

① Poni，2001a and b.

当然，随着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欧洲时尚和奢侈品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剧，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一变化不能归 264
因于使欧洲扬名的变化的内在意愿和一些不同的“精神”，而要归功于市场的特性和生产过程。因而，声称时尚为欧洲独有，布罗代尔在此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埃尔文窜改了布罗代尔变化不息和一成不变的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妇女服装的时尚以“阶段性趋势”而闻名，在17世纪晚期的上海可以找到。[①]但我怀疑，如果从较慢的速度看，我们可以追踪到古代，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有。

最初，服装时尚是富人维持他们外在身份特征的一种方式，正如更一般意义上的奢侈一样。很多后青铜时代社会中，服装款式往往由不同阶级引领；有些地区制定抑制奢侈法在等级中限制特定团体使用特定产品，其他地区中，差别也有一些不太正式的规定。例如亨利九世就曾禁止巴黎市民使用丝绸。但随着制造业和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资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及其所带来的名望，使得维持这些限制日益困难，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地区。社会下层作出各种努力来效仿上层行为，尤其是富人的财富威胁到既有的身份地位时。有趣的是，中国的抑制奢侈法大约与欧洲在同一时期松动，此时，资产阶级兴起的地区再也无法抑制，类似的变化毫无疑问是外部贸易和内部“发展”的结果。此后，时尚和“品味”，而不是法律，接替了凸显上流的角色，整个进程变得更加多变，更加复杂。尽管如此，施善（对穷人）的美德，奢侈（对富人）的双重特征，服饰辨别身份、法律保护时尚地位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变化，他们并不是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文化，而是其他所有主要城市化社会

① Elvin，2004：xi.

都存在的文化。

总之，很多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继承者，也是法国、美国甚至英国革命的继承者，这些被假定成通往新社会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启蒙的生活的一个方面是现代民主主义。欧洲也宣称发明了这些价值，它们被看作欧洲在言辞层面（特别是在文本中）的创造，但在实践中应被视为是语境中的、暂时性
265 的。这些口头宣称的目标（价值）与实际实践的差距甚大，而东方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总体缺乏这些价值。事实上，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在此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能找到，它并不总是以相同的形式出现，但在认知上通常还是具有可比性的。当然，个人主义、平等和自由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不只是和现代民主或现
266 代西方有关。正如慈善一样，人们发现，它们的散布要广泛得多。

第十章

偷来的爱情：欧洲的情感诉求

欧洲不仅宣称拥有很多令人骄傲的独特机构和价值观，同时还甚至声称拥有一些值得称赞的情感，尤其是爱情这一情感。[①]爱的方式，偶尔还有爱本身的理念，都被认为是纯粹的欧洲现象。这种观点在很多中世纪历史学家中间尤为明显，比如迪比（Duby），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认为“罗曼蒂克的爱情”产生于12世纪欧洲抒情诗人的社会。现代家庭史学者用这种独有的爱情关系概念来解释家庭生活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和家庭人员数量从多到少的转变有关，还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婚姻家庭的作用有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尤其是情感生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还有一些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与宗教相联，认为它是基督教和基督徒仁爱（“爱你的邻人”）的特征，在基督教中，爱被阐释为博爱。这已成为很多欧洲学者的共识，连佩尔森（Person）这样的心理学家都认为这一思想由于“对作为基本价值的个性的不断强调”而在整个文化中传播。[②]爱情，尤其是罗曼蒂克的爱情，常被认为

---

① 本章来自我为路易萨·巴瑟里尼（Louisa Passerini）编写的文集，名为《爱情、色欲与文化》，以《食物与爱情》（J. Goody）之名于1998年再版，和另一篇文章《爱情与宗教：两个可比性话题》，收入L. 巴瑟里尼（编辑）的文集（*Berghan Books*，Oxford），即将出版。此外还有一篇与《欧洲的伊斯兰》（Polity Press，2003）中的主题有关，以及我为C. Trillo San Jose（编辑）写的一篇文章，*Mujeres, familia y linajeen la edad media*，2004。

② Person，1991：386.

与个人主义、自由（有选择伴侣的自由，与包办婚姻不同），以及整体的现代化并肩而行。我关注的主要不是欧洲人何以会有种族中心论的观点，[①]而是对这种观点有效性的批判。

267 本章我将从欧洲（尤其是好莱坞）将罗曼蒂克的爱情视为非同寻常的爱情，并被看作完全是西方独有的感情这一思路出发进行论述。我认为这一命题并不正确，理由将会逐渐澄明。我也不认为“罗曼蒂克的爱情”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能比一般的爱情更与众不同。换句话说，它多多少少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陆文化。

我们还是从这一普遍前提着手，即在有关优雅爱情的写作中，12世纪的抒情诗人第一次引入罗曼蒂克爱情的观念与行为。这种设想对于像德·鲁日蒙（de Rougement）这样的历史学家欧洲爱情的研究非常重要。[②]爱情也被诺伯特·埃利亚斯看作类似的发展性词汇。他认为，“我们所谓的‘爱情’”，“幸福的变化，感觉的细微差别，各种情感的升华与风雅”[③]在抒情诗人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表现为“抒情诗”。他认为这些文本，实际上是整体风格，体现了“真正的情感”，用中世纪专家C. S. 勒韦斯（C. S. Lewis）的话说，是“风流韵事的新”表现。[④]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对基督教欧洲来说全新的诗歌类型，这一点几乎无可怀疑。但没有新的迹象表明这是普遍的新情感，除非我们借助一些新形式来表达这些情感。即便如此，全新的表达方式也仅适于基督教欧洲，而不是人类意识的全部变化。我们将会看到，欧洲以外有很多爱情的表达方式，甚至

① Passerini，1999.
② de Rougemont，1956.
③ Elias，1982：328.
④ Lewis，1936：11.

也有罗曼蒂克的爱情。爱情在欧洲封建社会最先产生的观点是难以立足的。①

著名的中世纪专家乔治·迪比近来开始研究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也认为“12世纪的欧洲找到了爱情”。②但他并不认为亚奎丹（Aquitaine）的抒情诗人是唯一代表。同样的歌谣也在巴黎传唱，例如，亚伯拉德（Abelard）也曾是“一位抒情诗人”。③这些活动还出现在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统治下的盎格鲁-诺曼人的宫廷中，亨利二世任命“工作坊进行大量文学创造”，还诞生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传说故事。④他认为爱情形式的变化与“基督教的女性化”有关，和成为骑士的小儿子们的新角色有关，他们从那段时期不断增长的财富中获益匪浅。

这些抒情诗歌所表达的爱情充满了失落感和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通常是侍臣与其主公妻子之间的社会差距。男人可以写诗，女人 268
（女诗人）也可以创作诗歌。最著名的女诗人奥弗涅的娜·卡斯特罗索（Na Castelosa），是图克·德·梅耶纳（Turc de Meyonne）的妻子，她写了一首情意绵绵的诗歌《布里昂的阿芒德》。诗歌的第一句是这样开始的：

你，煎熬一段漫长的时光，
因为，你已离我而去。

---

① 参阅Goody（1998）。

② 迪比论爱情的著作包括：*Que sait-on de l'amour en France en XIIe siecle?*（1988），*A propos de l'amour que l'on dit courtois*（1988）。

③ Duby，1996：61，66.

④ Duby，1996：73，68.

爱人往往不在身边，要不然就是无法得到，无论是自然距离还是社会地位的差距，都被视为风雅情诗的共同特征。

但是，这类情诗在多愁善感方面一点儿也不特别，虽然可能在细节上有些特别。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找到了古埃及描写兄妹之间的爱情诗——古埃及允许兄妹结婚。[①]早在公元前9—前7世纪的中国，我们知道也有汇编的《诗经》。公元6世纪中期，一位朝廷诗人徐陵将爱情诗收集在一起，称之为《玉台新咏》，它主要由隶属中国南方贵族宫廷传统的诗歌组成。“宫廷诗”以其规范化的修辞风格跻身于各种诗体之列。而其中一个特点便是“女人的情人一定不在爱情场景中”。[②]我们马上将会看到，距离是书信和情诗总体的内在特征。在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连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宫廷的妃嫔”，这些女人主宰着文学舞台。贵族家庭向未来的配偶求爱时，青年男人要向女孩发出求爱信，同样女孩也得回复一封。一旦结婚，女人往往在诗歌写作和连词缀文的比赛中消磨时光。有一种比赛是在春天樱花时节将写在纸联上的诗歌挂出来，这一行为包括宗教和世俗两层含义。[③]书信的艺术对于献殷勤和“礼仪”非常重要。[④]情书尤为有用。与基督教西方的情形(至少在宗教背景中）不同，爱情不是罪恶，而是庆典。通常由和尚写的性教育书籍（写有文字，还有不同姿态的图画）被藏在年轻女孩的妆奁
269 中。不过，后来一段时期，尚武之风大受赞赏，而爱情与性爱则以比较清教徒式的形式加以对待。普通民众对清教式的拘禁与欢快的庆典之间的选择不仅与尚武之风有关，还和宗教有关。的确，人们

① Hopkins，1980.
② Birrell，1995：8.
③ Le Seuil，*La Culture des Fleurs*，1994：496.
④ Beurdeley，1973：14.

可能会认为抒情诗人阶段正是这一进程在欧洲的体现，随后便是早期基督教所明令的各种约束。

中国和日本文化不是欧洲以外的唯一文化，他们知晓并创作情诗。我们还在希伯来的圣经《雅歌》中找到了爱情的文学表达（毫无疑问，它对基督教欧洲产生了影响，但通常以一种比喻的形式加以阐释，正如在其他传统中一样，似乎这种风格的文字形式不值得认真关注），而印度的古梵语诗歌中也有大量体现。[①]抒情诗人的诗歌，也是12世纪欧洲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体现在奥维德的作品中。奥维德住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但在他看来，爱情是“赤裸裸的肉欲”和通奸。鲁日蒙认为，“近代罗曼蒂克的爱情几乎或无迹可寻”。[②]但作者忽略了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两种传统中，爱情通常都是婚外的，而且抒情诗人的诗歌也的确有股性爱的暗流，正如奥维德的诗中不只是罗曼司的踪影。

比较研究中世纪拉丁情诗和欧洲情诗的兴起时，德罗恩克不同于勒韦斯，他总结说，12世纪并没有什么“新情感”。

> （1）“骑士之爱这种‘新情感’至少和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埃及一样古老，实际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就像马娄（Marrou）教授猜想的那样，‘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
> （2）骑士之爱这种情感并不限于宫廷社会或骑士社会，但它体现在欧洲最早记载下来的民间诗歌中（其背后的确存在一个悠久的口述传统）。

① Brough，1968.
② Parry，1960：4.

(3) 因而，对欧洲宫廷诗的研究应该与各种优雅娴熟的宫廷礼仪的发展相关，而不是寻找各种礼仪本身的特殊根源。因为，如果摆脱了对突然出现的新情感的幻想，文学史上的各种特殊问题毫无疑问就留在那儿了。①

我完全赞同德罗恩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欧洲的情形看作一种
270 “幻想”，虽然我更愿意强调这种幻想在世界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对自己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口头文化社会也有一些疑问②，因为抒情诗似乎都要求是写出来的文章。

虽然拉丁诗歌可能是朗格多克抒情诗人的鼻祖，但在形成伊斯兰情诗强大传统的过程中，一些特殊资源和影响就近在手边，这一传统也能在讲阿拉伯语的西班牙和西西里找到。诗歌领域中奥维德与后来作品之间的差异看似最为合理的解释是“抒情诗人受到西班牙穆斯林文化的影响”。③在“小王国”时期，公元1086年道德保守的阿尔摩拉维德人——他们是从非洲来的柏柏人——出现之前，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比邻而居，平等共处。而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朝廷与其他西班牙人拥有相同的传统，这对于情诗的写作和口头流传非常重要。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便是著名诗人伊本·哈兹姆（Ibn Hazm），他写了一首《鸽子的项圈》（1022），这是一首关于艺术之爱的诗歌（偶尔需要隐喻地解释）。在西班牙南部，这一传统对男人和女人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者最为著名的是瓦拉达（Wallada）这位哈里发的女儿，她在科尔多瓦举办了一

① 德罗恩克（1965，I：ix）提到马娄的是RMAL（iii，1947），189。“新情感”一词为C. S. 勒韦斯在《爱情的寓言》中的用法，第12页。

② Goody，1998：119.

③ Parry，1960：1.

个文学沙龙。还有其他一些妇女，她们所写的诗歌体现了“情感抒发的惊人自由”，并充分表达了她们的爱情。[①]在安达卢西亚，甚至有犹太妇女开始以同样的题材写作情诗。

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非常方便，也很频繁。诗人本身往往就是交流的介质。“一批巡游的诗人逐渐形成，他们从一个宫廷云游到另一个宫廷”[②]，就像一百年以后法国的情景。在西西里，来自北方的诗人常常出入罗杰二世的诺曼朝廷，后来是巴勒摩的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6）的宫廷。这个朝廷为了解当地的艺术活动，严重倒向阿拉伯文化。[③]西西里学校的学生用他们本土语言而不是普罗旺斯语写作情诗，并被认为创造了意大利最主要的两种诗歌形式：组诗和十四行诗。 271

同样，穆斯林欧洲对基督教邻邦有不可否认的影响，这对以下观点提出了严重质疑，即罗曼蒂克的爱情某种程度上是由欧洲的骑士宫廷创造的。为了支持欧洲爱情起源于本土的观点（以及被视为“现代”家庭生活的其他因素），一些学者也暗示安达卢西亚妇女的杰出地位是从这个国家的悠久传统中汲取了力量，从穆斯林进入之前就已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西哥特人、西葡人）中间获得来源。类似的观点也赋予安达卢西亚家庭生活其他一些特征，尤其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时期更为盛行，那时，出现了贬低伊斯兰对其社会生活以及更普遍的欧洲的贡献的倾向。这种倾向遭到盖查德（Guichard）的抵制，他的《东方与西方的社会结构》[④]对这一地区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还遭到随后研究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学者的反对。

① Viguera，1994：709.
② Parry，1960：8.
③ Asin，1926.
④ Guichard，1997.

事实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中，人们对伊斯兰统治下的妇女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的西方人头脑中往往充满了戴着面纱的妇女形象、一夫多妻制婚姻、不鼓励妇女入学接受教育。这些看法一直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政治演讲甚至学术讨论中，尽管近来的研究为这些事实打开了更细微的视角，揭示出地中海欧洲和穆斯林在观点和行为方面比通常设想的具有更深层次的相似性。在地中海地区，面纱的用途取决于社会地位，正如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一样。除了王公的妃嫔制度以外，一夫多妻制实际上在任何时期都仅限于很少的家庭，不超过5%，通常发生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比如为了延续子嗣。这里的一夫多妻制类似于著名的亨利八世的连续婚姻，未受宠幸的妻子也不会被打发走（离婚）。与一夫多妻制相似的其他形式还有纳妾和欧洲人常见的婚外通奸行为。无论如何，一夫多妻制的确没有妨碍个人的和个性化的情感发展，包括爱情的发展。正如我们从雅克的婚姻故事中看到的，他虽有位正妻，但通常还有一位“最喜欢的”女人（“萨拉”），丈夫与其维持着罗曼蒂克的感情。至于教育，伊斯兰学校（男校）并不是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教师有时也在家庭中给妇女私人授课。不过，把妇
272 女排除在学校之外的确影响了很多伊斯兰人的生活选择，近来犹太教和基督教欧洲的很多地区也是如此。[①]

这一论述表明，关于抒情诗歌起源的观点与关于安达卢西亚和伊斯兰社会特征更普遍的争论是同时存在的。妇女的地位（这会影响她们参与的爱情关系）是要归因于欧洲的根源，或反之归因于外来者呢？穆斯林中，妇女去集市一般是自由的，无论是买东西还是

① 虽然穆斯林妇女被排除在多数马德拉萨的正式教育之外，但她们偶尔也会接受一种宗教教育，正如贝克所讨论的那样。（1992：161ff）

卖东西。在土耳其，她们常常还出现在法庭上。在加纳和其他地方，她们也加入了艰苦的麦加朝圣。如我所提到的，盖查德认为我们需要对这种情形采取阶级分析。上层社会的妇女往往受到约束，而娱乐场所的妇女却是自由的——后者有歌手、舞者、乐师、诗人，有时她们还是朝廷间——甚至是穆斯林和基督教统治者之间交换的礼物。这种交换似乎表明两种传统之间结构上的相似，同时也是诗歌和爱情观念的交流渠道。实际上，朝廷的疆域、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界限往往是相互渗透的。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近来一些学者将穆斯林对抒情诗歌的影响这一问题看得更为深刻。有人提出，诗歌主题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诗歌体裁也一样。我们看到诗人从一个地方云游到另一个地方，往往处于一种非官方的保护之下。[①]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西欧来说，创新的文学形式受到与伊斯兰国家交往的影响，这种可能性就很大。在韵律和内容两方面，“西方的抒情诗没有什么先驱，但体现出早期西班牙—阿拉伯诗歌所产生的主题、意象和体律的相似”。[②]历史学家丹尼尔（Daniel）在其论述中世纪欧洲—阿拉伯关系的著作中写道：

> 总体说来，阿拉伯的宫廷诗通常比较细腻，但在主题和处理方法上要比抒情诗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似乎不可否认。如果后者在欧洲文学史上没有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它只不过是西班牙宫廷诗地方性的、衰微的分支……但是，如果欧洲宫廷诗的概念源自塔

① Asin，1926.
② Nykl，1946.

273 伊法斯的小朝廷（产生于公元1031年白衣大食哈里发的瓦解之时），那么，整个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与11世纪的西班牙几乎完全不配。①

甚至连内利（Nelli）这位研究抒情诗人和卡塔尔教派的法国历史学家也认为，禁止亲密性行为、男人臣服于优雅女性的浪漫主义传统一定程度上来自阿拉伯以及拜占庭等其他地方。“内利说的所有可能，”丹尼尔说，“都表明欧洲浪漫主义起源是模糊的或多元的。”这完全不同于颇具影响的英国中世纪文学专家C. S. 勒韦斯的结论。勒韦斯提到抒情诗人时说，

> 他们在11世纪，发现或创造，或第一次表达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情感，而英国诗歌直到19世纪都还在描写这一主题……它们在我们与古典时期或如今的东方之间树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与这种变革相比，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表层的涟漪。②

正是抒情诗人第一次使“爱情不再是一宗罪行，而是一种美德”③，这种观点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可能正确，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难以立足，它流露出一种狭隘的文学观点，仅局限于西方文学。卢克斯（Roux）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普罗旺斯的诗歌不仅在神权统治时期描述妇女的身体之美，而且还第一次在欧洲排除了任何救赎或

---

① Daniel，1975：105–106.
② Lewis，1936：4.
③ Roux，2004：166.

超自然的、奇异的意义，[①]并产生了新的人文主义，借此他谈到世俗的生活方式，并视其为封建伦理与“爱情关系”的结合。我们已经提到，在伊斯兰统治下，欧洲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经历了相同的阶段，而其他主要的传统也是如此，虽然文艺复兴扩张到很多领域的确是事实。但不管怎样，抒情诗人的宗教和超自然力量的内涵影响了诗歌和不同传统的学者，他们知道哪些内容必须排除。这种影响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普罗旺斯在语言上接近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语。譬如，卡塔尔教派认为思想无界限，他们的居住区既在西班牙又在“法兰西”边境上。[②]

或许在基督教欧洲中，爱情也不得不扩大到世俗背景，扩大到宗教领域以外，因为后者强加了很多约束。但并不是处处如此。世 274
俗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并不是爱情这种情感发展或表达的前提条件。穆斯林世界的世俗和宗教领域对这一主题有着广泛的兴趣。宗教领域中以苏菲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最为著名。一位苏菲长老写道：“我既不是基督徒、犹太人，也不是穆斯林……爱情，才是我的宗教。”[③]事实上，世俗之爱与宗教之爱互相纠结。下面我详细引用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它与前面几章有很大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人类学家雅曼写道：

> 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据说在早期伊斯兰世界对爱情的热衷伴随着神秘主义的塔利卡提的出现。关于心灵的谈话很多：在此意义上爱情是一种危险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学

① Roux，2004：166–167.
② Weis，2001.
③ Zafrani，1986：159.

说，因而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还得到塔利卡提的关注。人们对神的爱，对彼此的爱，具有酒神特征，它是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如此难以压抑、全身心投入的爱情由一种非常感人的仪式来表达——什叶派的情感戏剧，或各种伊斯兰托钵僧教义的仪式性的祷告，或者毛勒维斯教派的旋转舞仪式，据说，仪式的一个共同结果是一个人沉入团体中的“爱情之海”。中东至少接受了这些观念，其程度可以从这一事实理解，即神圣之爱是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实际上还有蒙古帝国的诗歌和音乐中最主要也是最持久的主题。几百年来，这一潮流向纵深发展，现在仍有泛滥之势。重要诗人如尤努斯·埃姆莱（Yunus Emre）、毛拉那·加拉丁·鲁米（Mevlana Celaleddin Rumi）、萨迪（Sadi）、哈菲兹（Hafiz）以及其他很多人，他们所有的重要主题都是神圣之爱。在神圣的精神背后，人们感知强大的爱情意象是对人类关系的比喻。这种坚信仍然基于共同的神秘经验之上。个人神秘主义的经验和沉迷据说正好是基督徒所拥有的。

爱情的譬喻，人类的神及他人之爱，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当然它否定了机械特性，运行良好的社会偶尔也会展现出这一特征。作为一种耗费心思的情感，爱情抛弃了各种礼节，打破了各种社会屏障。它将侵蚀那些少量的、封闭团体的特权，这些人往往掌握着社会各个重要机构，坚持阶级结构应按此意愿建立，应依赖维持地位、履行职责的人们，但所有这些都应被推翻。爱情坚信，人们彼此平等，消除了隔开他们的各种障碍，在共同、一致

的意义上和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成为彼此相连并与神相连的人。①

为爱痴狂最为著名、将神圣之爱与尘世之爱相联的一个例子便是伟大的诗人鲁米与云游的塞姆斯（Shams）的同性之爱。但类似的爱情也存在于异性之爱中，体现在安达卢西亚的苏菲诗人伊本·阿拉比（公元1165年生于穆尔西亚，1240年卒于大马士革）的著名作品中。他与伊斯法罕的伊本·鲁斯坦（Ibn Rustan）在麦加研究先 275
知传统之时，遇到了后者纯情的女儿妮扎姆（Nizam），她是“一位有着迷人美貌的苗条少女，优雅地出现在我们的会议上……如果不是这样的精灵如此勾起人的邪恶念头和意图，我愿能仔仔细细描述神赋予她的一切，那简直就是一块丰盛的果园”。他论“欲望的阐释”的作品献给了妮扎姆。后来他解释说，诗文中所有的表达（适于情诗的表达）都暗指妮扎姆，同时也暗指这个精灵的肉体。②这层关系一直以来都与但丁和贝特丽丝之间的爱情相提并论。的确，有人认为他直接影响了佛罗伦萨的诗人。世俗与神圣之爱的结合在伊斯兰世界中尤为明显，但它同时也存在于基督教世界中。尽管如此，人们在伊斯兰世界也发现有些诗歌形式与蒙古人等的艺术之间有些差异，但没有绝对的区别。

正如我们从卡洛琳时期拜努姆（Bynum）对中世纪妇女的神秘主义所了解的，③有时候爱情的两方面——精神和肉体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13世纪的神秘主义神学家哈德威茨（Hadewijch）提到她

① Yalman，2001：272.
② 参阅V. Cantarino（1977），R. Nicholson（1921），Ibn Arabi（1996）。
③ Bynum，1987.

与基督的结合时说："此后，他向我走来，用他的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压着我，我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感受他，沉浸在狂热的幸福之中……"[①]对情欲的关注与基督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这种观念有关，这位看不见的上帝现身于道成肉身的教义中便成为可见的了。基督教与其他重要宗教一样，男人/女人的尘世之爱与精神的上帝之爱（以及上帝对人类之爱）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同一个词既用来指人的情绪，又用来指罗曼蒂克的爱情，一如《雅歌》和《鸽子的项圈》；它赋予一种寓意的、精神的意义，因为爱情往往被看作宗教思想和行为结合的内在本质。上帝之爱（给予和接受），男人之爱，女人之爱，所有这些汇到一起都用了一个"爱"字，暗示着一个共同因素，却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希伯来圣经也用了同一个"爱"字来形容上帝之爱，男人或女人之爱。因而，拉比们能够将明显色情的《雅歌》对以色列人解释为上帝之爱，后来基督教徒将这种解释转换为上帝对其子民之爱。这本书是唯一揽入基督教规的，因为阿齐发（Aqivah，公元1世纪）打算隐喻地解读它；文本
276 本身并没有标明这种解释。[②]何西阿书的前三章表明了同样的一致性，有些内容被后来的新教徒讲得比较混乱。但是，希伯来的爱与欲望中间似乎的确存在一些差别。当上帝惩罚夏娃的时候，他说她将对亚当产生欲望，而不是她将"爱上"亚当。

对女人之爱和对国家或对上帝之爱的一致性在旧约中非常常见，并延续到后来。在犹太人的著作中，伊本·盖比鲁勒（Ibn Gabiro，1021—1057）深受其影响，他的情诗同样包括泛爱的成

① Hart，转引自J. Sockice（1996：38）。

② 对此论断，我要向杰西卡·布鲁姆（Jessic Bloom）、安德鲁·马金托什（Andrew Macintosh）以及雅曼（N. O. Yalman）教授的论文致谢。

分，以及对以色列和她的上帝特殊关系之爱。扎法拉尼写道："爱是含混的混合，抑或圣洁抑或世俗，人们都不能说清他们指的是神秘主义之爱，还是亲近之人的关系，是信徒还是朋友。"[①]请注意，阿拉伯诗歌往往是世俗的，甚至是色情的[②]；马格里布的犹太诗歌一直都主要是宗教诗歌，虽然它也有另外一面。伟大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强烈谴责诗歌的作用。世俗的诗文并不总是受到尊重，尤其是歌曲，通常由奴隶女孩演唱，与饮酒相伴。[③]

在欧洲基督教的一些分支中，两种形式之爱，即便用同一个字表达，在很多方面也是截然相反的。在罗马天主教会中，牧师禁止结婚（当然也禁止未婚性行为），虽然他们被引导着进入与上帝的相互之爱和永恒的友善（博爱）中，这种爱面向全人类以及实际上是上帝的所有创造物。但是，与天主教授予男女独身的价值观不同，对爱情的怀疑或限制，甚至与爱人结婚，都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体现在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基督及其使徒保罗的话语中。这种对立在基督教信仰的两种教义中非常尖锐，接近摩尼教。在摩尼教中，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一边是罪恶的尘世世界，另一边是良善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12世纪的卡塔尔教派中，所有人都必须朝着成为"上帝的完美造物"这个目标努力——肉体之爱作为此岸世界的一项事务必须抛弃，因为它是完全反对精神、上帝和宗教生活的无神论行为。这条自我放弃的道路甚至影响了基督教以外的信徒。在托尔斯泰的晚年，他对爱的新信仰

① Zafrani，1986：109.
② Zafrani，1986：134.
③ Zafrani，1986：136.

促使他抛弃家庭，断绝与尘世的联系，包括对他妻子和13个孩子的爱。这里尘世之爱与神圣之爱、肉体之爱与广博之爱之间的转变并不太明显。希腊人将精神与尘世之爱两种主要形式区分为厄洛斯（Eros，情欲之爱，性爱）和阿加坡（Agape，博爱或友善之爱）。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些观念使用相同的术语，常常会发生混淆，但要做出一个区分的确需要一些语境。抒情诗人致力于尘世之爱。印度的梵文情诗以及古代中国的情诗等都有一些类似的倾向。虽然马格里布的犹太诗歌主要都是宗教诗歌，但《雅歌》也挑出了一些明显不同的世俗成分（虽然通常以比喻的形式加以解释）。长期以来，我们在多数传统中发现的是宗教（清教徒式的）成分和世俗（更具情感的）成分之间侧重的变换。与抒情诗人同时代的作家，是来自法国南部同一个地区的卡塔尔人，他们在清教徒式的宗教领域中深深植入世俗之爱，当然也是为了成为“上帝的完美造物”，成为人们的精神领袖。这种模棱两可不仅存在于随时间的变化中，还存在于信仰的当代差异中。

让我们把这一讨论扩大到性领域，虽然爱不能等同于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可分离的。的确，我们有“柏拉图式的爱情”，男人或女人之爱，上帝之爱，甚至自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一个人“做爱”是爱的一个方面，这种爱本质上都是尘世的，往往都是世俗的。

善恶的矛盾特征保留下来，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合法的性行为落到与卡塔尔人比较时划分界限的对立面。不过，这种矛盾特征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并扩大到与爱有关的各种行为中。堕落依附于男人的性行为，但亚当需要夏娃，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
278 性和爱有着同样的怀疑，我们在洛达基的巴格里口述文化中也发

现了这一点，[①]尽管在每个例子中，上帝见证的男女结合似乎都是对撒旦恶行的反抗。

承认由欧洲抒情诗人发现罗曼蒂克爱情的这些观念往往认为性和婚姻态度的某些发展同样也是独有的，例如我们在第六章探讨过的埃利亚斯的著作。他在“两性关系态度变化”的小节中讨论了性行为。[②]为了符合他对“礼仪的历史”的总体观点，埃利亚斯声称：“围绕人类性关系的羞耻感在文明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③]他从19世纪对出版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对话录》的评论中找到了进步的论据。这本书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近代的“羞耻标准”，这种差别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因为在近代，“即便在成人中，与性生活有关的一切事情都被严密隐藏，消失在生活舞台背后”。[④]性的羞耻感被看作欧洲文艺复兴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但我本人更愿意认为它和更广泛的矛盾特征有关。

埃利亚斯发现类似的进程也发生在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演化过程中，而教会在其历史早期就已赞成这种制度。“婚姻以严肃的形式维系着两性社会制度，只是到近代才出现。在近代，欲望和冲动被压抑在越来越牢固和严格的控制之下。因为只有这样，男人的婚外性行为才能真正从社会上消除，或者至少属于绝对的隐私。”[⑤]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论断，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可能持这种态度，但并不是欧洲任何地方都这样。虽然在试图形成他的命题时，

---

① Goody and Gandah，2002：15.

② Elias，1982：138ff.

③ 有一条注释提到金斯伯格、蒙田和弗洛伊德对这一行为社会影响的论断，但没有为羞耻感概念中的任何进步观点提供理论支持。

④ Elias，1982：146.

⑤ Elias，1982：150.

埃利亚斯坚持探究这一问题："在文明进程中，性的欲望和其他方面一样，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并不断变化。"[①]在20世纪30年代作这一论述是可能的（虽然我本身也有很多疑问），但在60年代以后，仍然声称"越来越严格控制"的进程几乎不能成立。因为，妇女在这方面和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解放，男人也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刻板"。的确在这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应该被看作性压抑的一个特殊时期。

对尘世之爱的困惑并不是开始于成文的宗教，尽管有些人从罗
279 马式教会建筑中广为流传的亚当夏娃故事中提出这一困惑，也就是说，正是犹太—基督的传统（正如通常被认为的那样，这一传统从宗教同伴中错误地略掉了伊斯兰教），赋予了性以罪恶之感，上帝把这种罪恶施加在第一批打破他禁忌的人类上，这就意味着人类将被永远逐出伊甸园。印度宗教也是一样，虽然性行为在寺庙的雕塑中刻画得非常清楚，但仍然不仅以其他方式鼓励放弃性行为，而且还要视为"污秽"，会带来脏东西或不纯洁的东西，至少在精神上对有此行为的人是这样看待的。在洛达基的巴格里神话这种口头文化中，我们也发现人类在生殖方面具有同样的双重特征。[②]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但对向上帝这一特殊的造物者坦诚事实时却保持缄默。实际上，性一直都是私密行为，体液的交融既是危险也是福祇。

正是抒情诗人（不是卡塔尔教派，这一教派和摩尼教派一样对肉体之爱非常审慎），他们往往被赋予创造欧洲爱情的名声，就像我们从其他一些作家中看到的，爱情的发展（至少以博爱的形式）

① Elias，1982：149.
② Goody and Gandah，2002：15.

根源于基督教本身，根源于“仁爱”（爱）的观念和爱你的邻人、兄弟或他人的训喻中。但却没人解释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有着相同根源和神圣经典的基督教是怎样以这种方式独自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所有伟大的世界性宗教都产生于青铜时代社会经济在“阶级”形成的根本差别中，至少为他们的同宗教徒提供了慈善赞助。这一点体现在伊斯兰瓦克夫的作用上，以及拜火教、耆那教、佛教等其他教派的相似制度中。同样，“爱你的邻人”的训喻也是文字社会各宗教普世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宗教没有保留“部落”色彩，其目的是皈依来自其他群体的人们。[①]不管怎样，训喻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是有限的，即便在那些有着相同劝谕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言辞、意识形态和实际行为区分开来。尽管有一些基督教辩护者的论断，但很难看出基督教在这方面对人们的情感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仅宣称爱情产生于欧洲——这一命题很有问题，而且，就近代而言，他们还认为爱情产生于欧洲这一设定事实（至少是各种罗曼蒂克的爱情这一事实）是欧洲大陆的现代社 280
会、现代化发生的确切原因，而它们又和被看作欧洲另一项创造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紧密相连。这一命题依赖于历史人口统计学领域的一些杰出贡献。不单爱情，还有“家庭”，对观点相左的两方都很重要。彼得·莱斯利特及其剑桥小组的同事在其著作中给出了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郊区出生和死亡的统计数字，他们指出，英国的家庭从来都不是“复合型”家庭，因为，自16世纪以来家庭人口的平均数量（MHS）仅仅在4.7人左右。[②]他们认为小户型家庭与核心家

① 参阅Goody（1986）。
② Laslett and Wall，1972.

庭有关，它的出现被视为隐藏在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帕森斯这样的社会学家也指出，产业资本主义与小户家庭有亲缘关系，小户型家庭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对较疏远亲戚的义务支出。家庭史学家认为，以罗曼蒂克爱情为基础的“核心家庭”展现出夫妇之间的爱情（通过自由选择配偶）和父母之爱（照顾孩子），在竞争的环境中激发自我提升的动机。事实上，有人提出，英国并不需要等到资本主义时期才采取这种类型的家庭；它一直都有适当的位置，这和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情形不同，其他地区并没有共享欧洲（西方）的家庭模式。①

玛丽·哈特曼（Mary Hartman）在近期研究成果《家庭和历史形成》（2004）中声称她提出了“对西方历史的颠覆性观点”。她说，“发现于1960年但起源于中世纪的一种独特的晚婚形式，揭示了为什么西欧是各种变化的场地……最终导致现代社会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这种马尔萨斯式的观点并无新意，它有着漫长的历史，体现了人口统计学的各项事实与伦理或社会“进步”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并不怀疑与众不同的男女晚婚形式在欧洲的存在，有人认为这种形式促进了“爱情”的发展，不过，其调整有利于现代社会这一结论似乎过于夸大了，十分可疑，而且又是一种基于近代优势地位、缺乏比较思想的目的论。

主张欧洲家庭独特性的这些观点也从更广的亲属研究立场提出了种种问题。例如，中国完全不同于所谓的“复合型”家庭（“复合型”家庭被证明主要限于有钱人，相对穷人而言，有钱人总是住在较大的家族中）。在先前剑桥小组组织的一次会议中②，我提出的论

① Laslett and Wall, 1972; Hajnal, 1965.

② 其会刊于1972年出版（Laslett和Wall编辑）。

据表明，即使在有着相当规模的亲戚群体（例如宗族）的社会中，主 281
要家庭（与公寓、寓所型的群体不同）也通常都是小型的，以再生产和经济单位[①]为基础的家庭并不都和莱斯利特记述的欧洲家庭规模不同。我认为，欧洲婚姻模式概念的有效性[②]，具体说是欧洲与非欧洲模式的深刻区分远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概念上的，它忽视了东西方实际行为中的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就后青铜时代的主要社会来说是这样。因为，这种对立的观点忽视了与嫁妆和“妇女财产体制”的共同特征。[③]实际上，这些观点引导人们质疑甚至是哈吉纳尔（Hajnal）最近对东西方平均家庭人数相关问题的精辟论述，[④]他提出东西方在家庭规模上的差别并不像家庭形成过程中的差别那样大。

除了家庭规模以外，从人类学角度看，家庭“演化”方面还有两个显著趋势。第一种趋势主要体现在19世纪学者的思考中，探求从游牧部落到宗族部落再到家庭的一条转变线索，这一过程包括从较大家庭向较小家庭的变化。这种趋势体现在这些历史论述中——在早期社会寻找较大的（但基本未加分析的）家庭单位，例如“复合型”家庭，而在后来的近代社会寻找较小的家庭单位。但“复合型”家庭一直是主要的“基本家庭”，因此至少这里这种比较是错误的。第二种趋势代表了另一种人类学观点，它源于近来田野实地的研究，而不是对未知过去的思考，尤其体现在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命题中，他在其专著《澳洲的土著家庭》[⑤]表明，即使在现存最“原始的”社会中，所谓的“游牧部落”也是

① Goody，1972.
② Hajnal，1982.
③ 参阅Goody（1976）。
④ Hajnal，1982；Goody，1996b.
⑤ Malinowski，1913.

以小型的家庭单位为基础而组织在一起的。因而，关于这些家庭单位，从“游牧部落”或“宗族部落”到“家庭”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转变，两者的存在并行不悖。而较大的亲属集团随着历史性的时间逐渐消失，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家庭及其密切相关的人员在社会关系领域中仍然是主要活动者。依我看来，这似乎是这一领域绝大多数重要社会理论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不仅是马林洛夫斯基、拉迪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还有紧随他们其后的埃文思-普里查德和福特斯，无论他们强调什么重点，涂尔干和吉福德(Gifford)都继承了这条宽泛的家族谱系。①

282 若不承认这种普遍的小型家庭广泛的盛行，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以配偶（或配偶双方）的（性）“爱”和对孩子（非性爱的）“爱”为基础的家庭单位没有发挥作用的事实呢？前者不一定涉及伴侣选择，它没有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至少在有财产的家庭中间没有。但我们认同这种爱情形式对意识形态导向下现代性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了选择的**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些被视为的基本的西方价值观。它也体现出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更多的是离婚的感情破裂），体现出父母和孩子之间平等的亲密（但更脆弱的）纽带，它不仅导致对年轻人培养的巨大投资，还导致后来趋向更小家庭（数量上但不是质量上）的选择，这一进程在人口变动中非常有名。较小的户型，较小的家庭，进而是父母孩子间以及父母本身之间更亲密的关系，换言之是父母之爱和夫妻之爱。这样的家庭形成于伴侣本身最理想的选择，而不是通过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在穷人中间并不普遍，他们的财产和地位几乎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① Goody，1984。

虽然组建婚姻有各种方式，包办婚姻，“自由选择”、罗曼司等都体现了各种可能性，但几乎没有社会认为这些是固定的选择方式。[①]当然，与发生在现代欧洲人的婚姻本质上不相容的包办婚姻不能排除婚姻之后产生爱情，在这种情形下，性先于爱。如果这种婚姻证明不合适，那么，很多社会都允许离婚，此后，“自由选择”更可能成为下次婚姻的重要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整个历史中人类文化通过两性结合自我繁衍，那么每个家庭都包括伴侣选择(不一定通过他们自己，其他人也经常牵涉近来，这些原则是适用的)。那么，只有西方才有爱情，至少是罗曼蒂克的爱情，这种主张似乎就太盲目自大了。实际上，西方也有少量反主流的关系，这些关系长期以来被看作东方男女关系的特殊现象，无论是以鲜花的语言表达（这一点19世纪初被认为由土耳其的妃嫔发明）、像《天方夜谭》这样的故事，还是蒙古宫廷中的春宫图缩微图形、用于诱惑或指导日本新娘的性爱图画，这些在19世纪晚期之后的欧洲都能 283
找到。事实上，富有各种意义的鲜花赠送长期以来存在于亚洲的主要社会中。

在极端的例子中，男女结合要归于性欲而不是爱情，尤其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性与爱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比作我们所谓的爱情的亲密关系即使在非洲简单的非文字社会文化也能找到，比如加纳北部的洛达基，[②]尽管大多数第一次婚姻的重要因素乃是父母的愿望。

虽然我认为爱情在非洲文化中也有体现，但口头“文学”没能以在欧亚主要社会发现的那种方式使爱情更为高雅。注意，所有这

① Hufton，1995.
② Goody，1998：113ff.

些社会都是有读写能力的，12世纪法兰西的论据和非洲社会的迹象基本可以互为参考。能够读写意味着表达爱情可以采取特殊方式。首先，人们只有在远距离的交流中才使用文字（除非你是学校老师，有一个班级、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所以，文字交流的行为与那些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就像纯粹的口头文化那样）很不相同。首先，写情诗基本上是和一个不在身边、离开了的，又或者是有其他形式的“距离”（可能是社会差距）的人进行交流，这一特点在抒情诗人的诗歌中已经提过，但同样也能在中国的韵律诗中找到，正如先前在本章中提到的。其次，文字诗歌或散文体现了反思的过程，它和演讲本身还不相同。人们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反思性，它促使情感表达更加优美，这一点人们在口头文化中很少找到。于是，情诗很可能是文字社会相比其他比较优美的文字，特定时段更是如此。我们并不是指在所有社会都能找到有着相同“爱情”观的特定时期，也不是指处处是以“罗曼蒂克的爱情”为主要途径寻找配偶的时期。尽管如此，罗曼蒂克的爱情关系绝不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的特权。或许应该说，它也不是“适合之爱”。近来社会学家吉登斯赞其为后浪漫主义、“现代”社会的特征，[①]是“罗曼蒂克爱情”演化而来的继承者。

与先前缺乏爱情、缺乏选择观点相反的看法是：古代各个社会是在集体而不是个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产生了“原始共产主义”
284 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得到较大血缘群体（宗族或亲属）的支持。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这些方式，这些群体常常分散在“鸟巢般的据点”（例如，“散布开来的家族”），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他们往

① Giddens，1991.

往以“很小的家族”为据点，周围聚集着简单，也可能更复杂的家庭。同样，土地所有权的确从来不像“共有”这个词语所表示的意思那样是“公有”的。小群体或多或少有耕种农田的权利，平常还有狩猎的收获，尽管他们有时是集体活动。

在表达爱情（尤其是罗曼蒂克的爱情）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欧洲以外的大多数制度（并不是所有）都鼓励早婚。女孩在青春期之后马上结婚，有时是事先的婚配，无论是通过特殊的安排还是通过亲戚关系。这种安排部分是要确定一位伴侣，部分是提供一个合适的伴侣（一个“对象”），部分是避免使孩子出生被社会主要规范视为不合法（避孕的技术是有限的）。一旦早婚，我们就找不到性爱被延迟的漫长青春期，一旦找到性伴侣，对爱情最终的希望也就“远离而去”。正是在漫长的寻找中，“罗曼蒂克的爱情”才频繁得以详尽表达，才充满了失意的渴望。尽管如此，即便在青年时期，未来伴侣的个性也逐渐消失在彼此之间，为准备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家庭而消磨掉。这些情形中，是爱情（但不是通常说的那种爱情）而不是性，如此显著。

情感表达和情感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正如我表明的，爱情在写出来的文字中变得优美，在情书中张扬个性，这些在文字文化中都能找到。爱情的确支配了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欧洲大陆。

最后，和爱情是欧洲的独特特征相关的主张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不仅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还被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在尤卡坦半岛的梅里达有一座宫殿，其装饰描绘了头戴头盔手执武器的征服者高高屹立在被征服的野蛮人之上的情景，而题词却宣称这是爱的征服力量。这种博爱而非性爱的情感，是来自欧洲的帝国主义征服者所宣称的。爱，借助侵略的军队在文化上征服了所有人。　285

结 语

在本书中，我一直关注欧洲通过将自己的时间观念（主要是基督教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强加于欧亚其他地区之上盗窃东方历史的方式。我们也可能认为，世界历史需要欧洲提供一种简单的时空计量方式。但我的首要问题与历史学家对历史分期所作的尝试有关——将历史时期分为古典时代、封建主义、文艺复兴，紧随其后是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被认为以独特的变迁前后相续，一直到19世纪欧洲统治现有社会，接替了被看作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这里，强加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论意义。

任何形式的殖民统治或世界统治既为思想研究提供了相当的风险，也提供了尽可能的便利，不是指科学领域，而是说人文领域，因为在人文领域，“真理”标准的界限不太分明。目前的情况是，西方设定了一种优势（自19世纪以来这种优势明显体现在某些领域），并在时间上将这种优势提前，创造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是，这些观念被用来证明看待“他者”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他者”往往被看作静止的，没有外界的推动就不能改变自身。但历史教育我们，任何优势都是暂时的，我们也不得不寻求变化。中国这个庞然大国似乎早已在经济上占据领先位置，而经济是教育、军事和文化权力的主要根基，就像早先的欧洲，后来的美国的情形一样。在更早的古代，这种领先地位仍然属于中国自己。而近来的改革由中国政府实施，没有来自西方大量的特意扶持。

在这项研究中，我一直试图展现从16世纪扩张开始欧洲统治世界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经过19世纪的工业化，欧洲处于世界经

济的领先地位，从而取得了世界历史的话语支配权。所以我提出另外一种选择，以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近现代历史。这种方法在史前史学家戈登·希尔德的著作中已露端倪。希尔德认为青铜时代是一场城市革命，是文字意义上“文明”的开端。青铜时代始于古代近东，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向南到埃及，向西到爱琴海。它包括机械化农业的引入，牲畜牵引耕犁的形成，大型水力控制，轮子的改进和各种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字的发明——这可能和商业活动的扩张有关。城市的专门化显然需要生产力的提高，以使工匠等人能够避开主要的农业生产，同时它还促成了“各阶级”之间土地所有情况的巨大差异，因为人们不再局限于靠锄头生产，在犁的帮助下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犁只是锄头的简单变形，通过牲畜牵引实现了机械化，体现出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最初，青铜时代以亚洲“文明”为基础，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有很长时间，文艺复兴与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进程有关。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青铜时代具有可比性的联合体后来如何被认为分成了欧洲和亚细亚分支，前者被假设成一个动态的大陆，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特征，而后者则打上静止的、专制主义的标记，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例外论”，以不同的“生产方式”为基础。

这一分叉不得不从某些地方开始，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有种共识认为克里特的情形（必定还有埃及）因其早期的文字传统而属于青铜时代。这种分叉被认为出现于欧洲，先是古希腊，后是罗马和古典时代，这些在根本上与先前的历史不同，但某种程度上，荷马的故事和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也产生于亚洲。我认为差异、分岔的观点主要是由欧洲人提出来的，无论是文艺复兴（他们将其看作古典时代通过人文主义的重生），还是18、19世纪的分岔——其时，

欧洲工业革命使得欧陆具备了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明显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经济以及枪炮和舰船）。换句话说，欧洲人观念的背后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因素，并认为欧洲的传统在古代已使自身卓尔不群，而古代又被看作欧洲随后的优
287 势的根源。

但实际上，古典时代自身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凸显出来了呢？古典史学家摩西·芬利认为古希腊创造了民主制度这一人民的统治原则，这一命题非常接近当代政治家的核心，接近布什和布莱尔的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制是我们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特征（这里排除了伊斯兰文明，尽管它明显是文明中的第三位成员），作为天赐之礼，欧洲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展示这一点。毫无疑问，雅典是最先将民众直接的书面投票制度化的地区之一，这种制度被看作雅典与波斯君主专制政体和其他亚洲邦国的区别，但是，达荷莫（Dahomey）这个前文字王国也通过向一个箱柜中投放石头的方式进行投票。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比较小，足以运作直接代表制。即便如此，城邦国家及其民主制并不仅仅在这里存在。这种统治形式也体现在腓尼基的城邦，以及现今的黎巴嫩中，尤其是提尔城，它是腓尼基殖民地迦太基的母邦。腓尼基不仅改进了没有元音的文字——这些文字曾经记录圣经以及阿拉伯和闪米特的其他著作，而且，他们也有民主形式，代表们不是每隔几年选一次，而是每年一次，以此确保民众意见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迦太基被世界遗忘了，或至少不在欧洲历史之列。因为他们是非洲人，不是欧洲人；是闪米特人，不是雅利安人、印欧语系人。迦太基图书馆的散佚某种程度上是罗马征服的恶果，因而我们对它的成就了解很少。

但并非只有腓尼基。即便亚洲的君主制在他们设立的城镇中也

可能有民主统治。在很多集权的政府周边，即在一些王国里，我们发现一些民族有着不同制度，他们没有首领，却由代表制治理。伊本·赫尔敦描述的贝都因人，福特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描述的更普遍的非洲都是如此。古典时代不是民主统治模式的唯一源泉。

芬利还称赞古典时代创造了“艺术”。古典时代显然创造了希腊艺术，这在欧洲以及整个世界史上都非常重要，但要说希腊创造了艺术本身却毫无根据。譬如希腊的圆柱来自埃及，埃及和亚述对视觉上的艺术发展都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除了西方，其他很多国家在艺术领域也颇有建树。西方在艺术领域世界范围内明显的自信与19世纪欧洲的统治紧密相连，并经由欧洲传向世界。但当古典时 288
代被看作通往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直接而必需的阶段时，问题便随之而来。

在欧洲人看来，古典时代不仅是一个时期，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在欧陆是独一无二的。对他们来说，必须将古典时代视为一段独特的发展时期，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最终由另一时期即封建主义的兴起所代替，而这又被看作是西方特有的，它们的矛盾冲突导致随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古典时代的概念得到欧洲古典学者的详细阐释，以解释希腊罗马传统的独特性。虽然这些社会明显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化，正如它们不同于早期的古希腊罗马一样，但根本性的尝试是将它们区别于他者，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例如在欧洲找到的民主制度和自由明显不同于设想的普遍盛行的亚洲独裁与专制。无论和这些声名赫赫的态度有关的是什么，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知识体系在古典社会以其思维的技巧、字母文字的运用是相当先进的。字母文字的广泛运用扩展为各种可能的文字，最早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发明，随后发展到

叙利亚（乌加里特）的腓尼基字母，继而是希腊大陆。希腊字母在元音字母表示法上自然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后来的欧洲影响深远。不过，它与腓尼基文字相当接近，差别相对较少，而且和其他文字形式的区别并不是像大多数人包括我和瓦特想像的那样是根本性的。

还有一些学者以同样的方式用基督教标榜欧洲的独特性，但基督教是西亚三大宗教之一，运用了相关的神话和经文，包括相似的价值观和法典。关于这一点，欧洲稍微有些特别，因为早期的主要思想家都来自近东，又或者是奥古斯都统治下的北非思想家。它完全是大陆相互之间的地中海体系，而旧约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干燥沙漠和肥沃绿洲中游牧的、闪米特的环境之中。

近代世界史的主要问题不是搜罗早期欧洲的独特性，而是抛弃史前史学家的视角，对此戈登·希尔德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作了概括，他强调青铜时代的文明是跨越欧亚的广泛的统一体。
289 这个统一体被单纯的欧洲古典时代（其他地区也有古典时代吗）的西方概念所打破，其基础是大量技术性手工行业的发展，包括文字本身。早期的文字写作和宗教经文等事物有关，它把指导权交到牧师手中（教师都是牧师）。寺庙的发展和宫殿体系的膨胀，以及宗教团体的发展，这些被古代史学者奥本海默称为“庞大的组织”。欧洲古典时代的单独概念打破了这个联合体，并宣称这一阶段在世界史中为欧洲独有，在鼓吹者的思想中预示了欧洲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少有人从经济层面上去判断这种例外论。在这些文明中，铁逐渐取代铜，还暗含着“平民”的意义（铁比铜的使用要广泛得多，也有用得多）；铁用于战争、农业、手工业等方面，还有“机械”发展方面，虽然由于这一目的，一直到19世纪木材都是主要的原材料。毫无疑问，一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发展得要快些。在古

代社会，希腊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城市建造、寺庙、学校、城市的室内建筑诸如埃菲斯（Ephesus），文字知识和文学创造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尽管很多领域都依赖于近东的先驱（譬如著名的柱子），并在另外一些领域和遥远的印度和中国进行竞争。不过，古典时代的问题对现在和过去都特别敏感，因为欧洲学者将统治形式（民主制）的重要根源诸如自由、个人主义，甚至“理性”的价值观都归到这一历史性时期，进而归功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

经济并没有挑出来作为这一差异的主要因素，除了把希腊罗马描述成奴隶社会，但这种用法又“似是而非”地强调古典时代“创造”自由作为其对立面的概念。据说，古典时代不仅创造了自由，还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我已经表明，这一观点被大大夸大，正如这种主张坚持独特的奴隶制一样。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成就非常杰出，应像伯纳尔所认为的那样看成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延展。将这些突显为完全不同类型社会的尝试，所依循的是希腊人自己区分欧洲和亚洲的意愿，也是后来西方学者鼓吹他们自己谱系的意愿。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作为字母文字的某些结果，文化本身的丰富资源创造了不同“精神”和生活方式的整体情形。从史前史发展到历史，人们开始通过文字语言表达自己，不再局限于具体信息的主要解释，而要考虑“精神”和“言辞”（文字记录下来的“言 290
辞”）。人们不得不思考希腊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但人们却不以同样的方式考察腓尼基人，因为他们只留下很少的文字）。这就意味着对希腊人和其他人的意见给予更多的重视，也意味着把他们的自我评价作为“真理”加以接受会产生危险的结果。希腊人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接受（甚至延伸）了他们对民主、

自由以及其他“德行”的盗用。希腊仅仅在程度上与腓尼基和迦太基不同，后两者大多都没有留下文字。这两个地区的小城邦与大城邦相比能采取更为灵活的统治制度，尽管有时他们也遇到甚至是选择暴君。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也运用了民主程序，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希腊或欧洲是民众咨询形式的创立者，尽管它可能发展成一种书面形式。自由也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芬利认为希腊自由观念的产生是为了反对奴隶制度，这不是十足的讽刺吗？实际上，很多居住在大城邦或任何集权政体周围的族落，都谨慎地抛弃了集权权威(譬如社会上游荡的罗宾汉们)，一些人由于某些原因聚集在一起，以不同的“无首领”制度组织起来。与居住在平原的各个民族相比，住在边区、沙漠、森林、山丘的民族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治理方式。

排除腓尼基预示着后来对亚洲和东方其他地区的排除，它也暗示着欧洲古典时代独特概念的脆弱性，因为，对很多同时期的地区来说，腓尼基的殖民地迦太基显然是罗马和希腊的竞争对手。对于后来的欧洲人而言，迦太基被看作从未留下类似的文化遗产，但其原因是罗马等对图书馆的毁灭性破坏和散失，也有纸草文字容易消失的原因。有人将这些排除解释为“雅利安”人对闪米特亚洲人或非洲人之于欧洲重要发展影响的忽视，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伯纳尔的观点以及霍布森的新近观点。这两人认为这种排除产生于19世纪的反犹主义或帝国主义，这些特征属于在时间上要追溯更远的种族中心论等更大范畴，也是身份确定的必然过程（虽然身份的变化力度因特殊时期和特殊地点而定)。

正如古典时代在其他地区被视为没有相应对等的阶段一样，封
291 建主义在很多论述中也只局限于西方。有些人也怀疑这种限制，例

如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hi）对印度、库尔本对其他地区的论述，但在马克思或明显或含蓄接受的这种演进图式中，古典时代必定在欧洲封建主义之先，这就像后者对欧洲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一个阶段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下一个阶段的解决方案。独特性的论断对很多西方中世纪专家颇有吸引力，尽管他们并没有承认马克思明显的直线发展观。即便如此，欧洲的发展轨迹仍然被认为是独特的。欧洲的确很独特，但在哪些方面、从何种角度是独特的呢？是欧洲依附性的土地所有制，还是分权化的统治方式？这两种特征需要的是网状分析，而不是将各种变量煮成一锅。“我们与众不同”的论断本身对分析或研究不能提供有用的基础。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欧洲“独特”因素对“近代”世界的发展是最根本性的。

因为，与马克思等人观点相关的是，封建主义的概念作为世界史的一个“进步阶段”引导了“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要将其看成西欧的发展并不那么容易。在西欧，城市据点的瓦解是大范围的。和城市、城市手工业、教育、文化活动、知识体系、艺术和戏剧等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活动同样也大范围地衰退了。当然，这些事情逐渐得到改进；由此不得不发生一次“重生”——由于商业贸易。农村也有些变化，这些都得到很多关注。不过，西方的城市直到11世纪左右才复兴，僧侣学校稍微早些，经济的复兴大约在同一时期，很多和早期大学有关的艺术和思想活动虽然都有恢复，但直到所谓的文艺复兴才开始出现。欧洲经济的最终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意大利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后者从未经历西方一样的破坏。那里的城市持续繁荣，并与更远的东方进行贸易。和贸易一样，思想活动在10世纪之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斯林东部和南部，不仅有希腊译本作基础，同时还有他们自己在医学、天文、数

学等其他领域的贡献（以及犹太人的贡献）。印度和中国在复兴中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为伊斯兰社会的一支正好跨越整个亚洲，从西班牙南部一直到中国边境。更特殊的是，很多植物、树木以及花（橘子、茶和菊花）都能找到东方的根源；还有一些创新——弗朗西斯·培根视其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指南针、造纸和火药，更
292 别提源自东方的印刷术和制造业和瓷器、丝绸和棉织品的真正产业化。这些成就很难使早期封建主义看起来是欧洲或世界史特别的进步阶段；在西方，进步常常具有外延意义，尽管这并不是多数欧洲学者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全部观点。在他们看来，欧洲的古典时代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必定会走向封建主义、殖民扩张和商业扩张，继而走向工业资本主义。这种目的论历史从发展进程中排除了其他社会，并认为那些社会受到以灌溉和大城市为基础的僵化的、专制国家的禁锢，西方则是雨水灌溉农业（一般说来出产要少得多）和小城市。

这些非欧洲的城镇往往被否认“存在资产阶级”。在韦伯看来，这些城镇是不同的，即便它们展现了很多和西方相同的特征和成就，尤其是在国内和“文化”生活以及商业和制造业中。我们在第六章分析了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文明”的社会发生学研究，但这一研究仅仅集中于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中国几千年来如此显著的“文明”（城市化的、文雅的）行为的整个概念都被忽视了。在这种情形中，欧洲盗取了这一思想以及文明进程的事实。在经由阿拉伯从中国获取造纸术之前，西方是如何文明化的呢？费南德兹-阿梅斯托在其著《千年》[①]中较好地平衡了各种文明，这本书从平安时代

① Fernandez-Armesto，1995.

的日本开始，认为欧亚主要社会处于相同的水平。

显然，重要的活动比如制造业、商业、思想、艺术等活动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都出现了。但欧亚文字文化中也产生了其他复兴，可能不太引人注目，却是内部发展和互惠影响的结果。就欧洲而言，这些变化都被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载入编年史。布罗代尔决定尽量思考可比性参数，而放弃了韦伯对新教伦理的重要贡献（第七章），而新教伦理一直以来都用来支持对欧洲成就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对意大利和其他天主教地区的成就来说就不太令人满意了）。布罗代尔指出，广泛的市场活动早在西方之前就已是东方的特征了，重商主义只是在近代欧洲才兴盛起来，从未限于这个大陆或那个大陆。但他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西方“真正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事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造价不菲的制造业厂房需要不断增加的资本；国民经济同样如此，但扩张基础往往体现在意大利 293
出现的银行业和金融改革，和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兴起有关。这一发展催生了相似的制度，这些制度或已存在，或在亚洲主要的商贸中心很快发展起来。

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工业化方面。英国和西方的工业革命有一场颇为壮观的发展。但同样，这些基础在更早时候在其他地区也能找到。青铜时代的主要经济产生了一些大型制造行业，尤其是纺织行业，大多数都由国家控制。在美索不达米亚，羊毛布在考古学家伍利（Wooley）所说的“工厂”中生产出来。伍利的苏联同行狄雅可诺夫（Diakonoff）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它们仅仅是“厂房”，他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将“工厂”一词留给了近代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印度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哈克哈纳斯（kharkhanas）也是国家组织的机构，它们雇佣工人，在大顶篷下从

事大量的棉布生产。在产业化的早期形式中，中国的情况更为明晰。雷德洛斯（Ledderose）曾经提到大量陶瓷（“瓷器”）产品被装船运到西方，以及生产过程如何通过组合式（批量）生产技术而表现出亚当·斯密式的复杂劳动分工。中国的瓷器生产被形容成产业化，它采取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组合式生产和工厂形式的组织。同样，丝织品被国家以税收形式获取之前主要在家庭作坊中纺织。在公元元年初期左右发展之后，造纸被广泛推广，同样采取了“产业化”流程。这也是机械化的，因为纸被造出来时使用了水磨，这是近代工厂（“磨坊”）的雏形，西方用于织物生产，在人力之外还使用了来自流动蒸汽和河流的能源，提供了一种比本地丝帛或皮毛（羊皮纸）以及进口到欧洲的纸草更为廉价的书写原料。纸草从埃及运来非常昂贵，但依靠新的生产流程，纸在任何地方都胜过了本地原料。造纸业传遍穆斯林世界，最终在印刷革命之时抵达西欧，首次从西西里登陆意大利。这种廉价的本土制造的、批量生产的书写原料意味着即使没有印刷术，东方信息和观念的传播也要比西方迅速广泛得多。

294 “亚细亚例外论”是一些历史学家对过去进行的目的论思考，这种态度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西方“现代性”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看法，但这种观念也使他们看不见很多既存的共同特点。布罗顿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市场、土耳其的贡献，以及近东在这一时期的总体贡献。我们还会想到伊斯兰西班牙对早期“文艺复兴”的贡献，表现在数学、医学、文学（譬如抒情诗人的诗歌和虚构的叙事小说）、柏拉图研究以及但丁思想研究方面。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重生并不单纯是欧洲现象这种观点。理论上讲，每个文字社会都能复兴被遗忘或被谨慎剔除的知识。欧洲

古典时期之后，基督教会也卷入了剔除大量古典知识之列，这些知识因为被斥为异端而遭到禁止，或作为他们信仰的冗赘，这一做法不仅体现在艺术领域（即雕塑、戏剧和世俗绘画），还体现在科学（例如医学）中。这种境况如此严重直到重生到来，而且在欧洲要比其他地方要更为突出。确实，思想领域的恢复速度在印刷术、纸张的影响下非常快，大范围的商贸尤其是和东方贸易的复兴也很惊人。

将文艺复兴视为一场复兴或者甚至是古典生活的因素，其问题在于，尽管罗马建筑在诸如模式和结构等很多方面仍然影响着教会的生活、拉丁文继续为西方基督教徒采用，但基督教的形成和罗马帝国的瓦解导致了严重的断裂。我曾提到文化知识、学校、城市手工业，甚至可能还有基督教在英国的消失，同样，希腊罗马艺术，尤其是雕塑和戏剧也有大范围的消失，这是由于犹太偶像破坏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作用，并对艺术表现形式加以限制。我注意到偶像破坏没有在天主教背景下以同样形式进行，但坦白说，世俗形式的艺术也颇有影响，一直到文艺复兴早期。欧洲丢弃了很多东西，直到世俗主义出现才再次变得可能，它使世俗戏剧的复兴变为现实，并产生了帕多瓦（Paduan）议员阿尔贝提诺·墨萨多（Albertino Mussato）的作品，其悲剧《爱瑟里尼斯》（Ecerinis，1329）描述了当地一位暴君，用拉丁韵文写成，仿效了塞涅卡（Seneca）的风格。但马洛和莎士比亚的英国戏剧、拉辛和高乃依的法国戏剧仍有漫长的路要走（250年后）。

换言之，后罗马时代与古典时代之间很多领域都有明显的断裂，这一断裂需要重生，也就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但东方没有。东方的城市文化没有如此巨大的鸿沟。事实上，正是东方帮助复兴了

295 西方，不仅在商业上，艺术和科学上也是如此。安达卢西亚也有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譬如对布鲁内托·拉蒂尼（但丁的老师）的影响，阿拉伯字母文字的影响，其用法由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Pop Sylvester Ⅱ）传到西方。再比如医学，西方医学研究的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禁止解剖，禁止切开人的身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医学文献，比如盖伦的医书。后者因穆斯林世界的大量翻译才回到西方医学界，经由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靠近萨勒诺的医学学校）的非洲人君士坦丁和蒙比利埃的其他人。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医学仅是以古典学问的复兴为基础，那么我们往往会排除这一事实，即这门学问和穆斯林的重要补充是通过间接路线传到我们这里的。

恰是没有遭遇西罗马帝国衰落的东方促进了文艺复兴，因为东方没有经历西欧那样的“文化”的灾难性瓦解，依旧以贸易为中心，维持文化交流，这时，首先是意大利的城市，尤其是威尼斯，恢复了与东方的联系。这些联系被证明是如此重要。在整个亚洲，东方都不需要同样的重生，因为它没有发生相同的死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走在西方前头的原因，科学上一直领先到16世纪，经济上（根据布雷等人的观点）到18世纪末仍然领先于西方。东方既没有大范围的物质崩溃，也没有和西方一样限制性的、主导性的宗教。虽然很多学者都有此断言，不过东方的确发展了一种积极的商业城市文化，甚至比西方都早。韦伯、皮朗（Pirenne）、布罗代尔等人关注的是，他们设想的和亚洲城市不同。这些观点以目的论为基础，非常值得怀疑。比如鲜花和食物的例子——我在其他语境下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在此方面，“古代”的鉴赏力和兴趣的发展与欧洲大致同步。戏剧（例如日本的歌舞伎）和现实主义小说

也是如此，虽然比古典成就要晚一些。如果我们摒弃亚细亚例外论的观念（实际上是欧洲的观念），仔细想想城市革命以来大致平行的发展，节奏和内容上的变化，它们产生于欧亚大陆，以相似的社会演进进程和广泛的互惠交流关系为基础，欧亚的同步性完全可以理解。商业需要各种联系，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交换，还有信息交流，包括技术和思想交流。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作为科技革命论及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发展。这当然不是科学的开端。李约瑟就中国科技成就编了一套极其重要 296
的丛书，其中他总结道，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科学直到16世纪都非常先进。造纸和印刷在近代传到欧洲，使得信息交流更为迅速(就像后来的计算机)。由此，李约瑟认为西方接管并引入了基于精确验证假设的科学。他称之为“现代科学”，并将其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文艺复兴的形成联系起来。不过有人认为，验证受到阿拉伯炼金术士的影响，而数学最终来自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李约瑟的观点涉及我所批判的一些特殊的发展前提。我更倾向于有规律的演进变化，而不是想像的突发革命。“现代科学”与早期科学联系应更紧密，西方的发展和中国一样比李约瑟的最终设想更具连续性。

同样，埃利亚斯对“文明”以及布罗代尔对“真正资本主义”的观点也消除了西方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对更为普遍的各种机构尤其是城市和大学的看法也是如此。我在第八章讨论了这个相关问题。我发现这种独特性论断被大大夸大，特别是在城市方面。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西欧的大学成功地摆脱了宗教束缚，而且比伊斯兰的马德拉萨知识世俗化要早，但中国在高级教育上从来不存在这些问题，正如它没有将一种统治性的教条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来信奉一样。毫无疑问，西方的城市和大学这两种机构都有特殊的特征，

但欧洲创造了这些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机构这种观点看起来与东西方的长期平行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平行也不妨碍欧洲人相信他们拥有各种德行（第九章），他们认为是这些德行而不是其他因素帮助他们实现了现代化。这种看法始于古希腊人（至少对文字证据来说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至少是除了奴隶、妇女和外乡人的所有人），而亚洲国家却实行“专制”。个人主义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一特征长期存在于这些人群中。把“集体”原始、“原始共产主义”看作一种社会形态是立不住脚的，尽管一些社会中某些资源的所有权可能是共同所有。

297 情感也被西方偷走了。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爱情。一些欧洲人宣称爱情由12世纪的抒情诗人创造，另外一些人认为爱情和仁爱一样是基督教的内在本质。对一些人来说，爱情描述了欧洲还有英国家庭的特征；对另一些人来说，爱情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特征。所有这些主张都是难以立足的。虽然好莱坞在叫卖“罗曼蒂克的爱情”，好莱坞并没有创造爱情。英国人、基督徒还有现代人都不曾创造“罗曼蒂克的爱情”，普罗旺斯和阿基坦地区的抒情诗人从阿拉伯—西班牙的邻居那里获益匪浅，他们继承了近东世俗（和宗教）情诗悠久而重要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雅歌》时期。是什么导致欧洲人认为某些德行和情感的发展非常独特，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但独特性没有论据，论据只能从跨文化的系统比较中得出。

还是回到希尔德对青铜时代城市革命的概念上，它显然与L. H.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①]中提出的文明概念和城市文化有关，与更

① Morgan，1877.

普遍的原始资料有关。这一概念的最大优点是没有赋予西方特权，并描述了发生在古代近东普遍的历史性发展，一直延伸到埃及、爱琴海、印度和中国。这一时期产生的欧亚主要城市文明之间文化亲缘性反驳了根本性断裂或重要差别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世界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论断的主要基础。根据欧洲的主导性观念，立足于工业革命之后毋庸置疑的成就来追溯19世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某种程度上还有人类学家）都觉得有必要论述各种差异性。于是，西方被认为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从古代社会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同时，东方则打上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例外论”的标记，以水利农业和专制制度为特征，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雨水灌溉和议会制度相反。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韦伯和很多历史学家也提出不同的说法，各种版本的观点由社会学家M.曼进一步推进，[①]并得到坚持欧洲优势具有长期性观点的人们的发挥——地理学家布劳特称这些人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这些观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马尔萨斯对中国以前没能控制人口所做出的颇具影响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内化的情感控制，这种观点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有很多相似之 298
处。情感控制的特征被彼得·莱斯利特领导下的剑桥小组的人口历史学家广泛运用，的确很像弗洛伊德和埃利亚斯的看法。

当然，东西方社会生活进程也有广泛的差异。在西欧，古代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城市文明的部分衰退，城市消失、乡村及其治理者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封建主义”。欧洲对发展进程的论断中，这一阶段在世界历史中通常被看作“进步的”变化，并导致

① Mann，1986.

新型城市的诞生，肇始于意大利北部的自治村镇，庇护了热爱自由的资产阶级及其自治政府，展现出各种不同的特征，所有这些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先驱。但这一进程同样也回到了先前与“民主”希腊相对的亚洲“专制”的观点中（尽管希腊也有专制暴君，正如亚洲也有民主政体一样）。欧洲当然也有它们的制度特征。

亚细亚例外论的观点近来也开始失去影响，它遭到一些人的含蓄批判，其中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①]便是一个例子。沃尔夫在书中提出，由于东方有时比西方更集权化，东西方两种权力制度——专制或民主，应被看作是两者的不同形式，是“藩属国”的体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遭到新一代欧洲学者的严厉批判，他们或抛弃或修正了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优势。我最近在题为《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之争》的书中论述过他们的著作。[②]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试着将看待古典之后历史的新视角和考古学背景中产生于早期欧亚发展的相似性研究联系起来。如果就“文明”而言，在青铜时代就有一种宽泛的联合体，那么接下来，东方“例外论”与西方相应的独特性是如何产生的呢？究竟有没有产生？城市的消失（和“封建主义”的盛行）是否只是世界历史中一段特殊的西欧插曲？因为在地中海周围，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或“贸易港口”城市，在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阿勒坡、巴格达、亚历山大等地一直持续繁荣。当然在更远的东方也是如此。稍晚一些，
299 威尼斯又重新恢复了过去的罗马精神与活动，积极参与到与东方利润丰厚的交易活动中来。如果我们多多少少看到亚洲城市发展的连续历史，而不是只关心西欧城市文化的衰退和农业生产方式（导致

① Wolf，1982.
② Goody，2004.

“封建主义”），我们就会有一幅完全不同的世界史图景。这可能更应该看作欧洲问题而不是亚细亚例外论。在欧洲以外，城市和港口并没有消失后再重生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先驱；它们在整个亚洲一直繁荣，成为商业、制造业、教育、知识和其他专门活动的交汇点，并通向近代的发展。毫无疑问，西欧新兴的城市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特征，但它们在韦伯和布罗代尔[①]设想的方面一点儿也不独特。无论是哪里的城市，它们都卷入了古代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动，在印度、中国和近东。它们是专业活动的中心，是文字文化、商业、制造业的中心，是由商人、工匠和其他资产阶级人物所实践的各种不同复杂程度的消费中心。的确，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认为它的早期发展对欧洲独一无二这种看法恰是对世界历史的歪曲。发达资本主义的普通标准是工业化和发达的金融业（布罗代尔）或广泛的商业（马克思、沃勒斯坦）。由于工业条件下的批量生产，金融业必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交易更加频繁，但这两者都不是欧洲经济的新特征，也不是工业化的特征。有人令人信服地指出，工业化也是早期制造业流程特别是中国制造业流程的特征。在欧洲，纺织品的工业化生产的确不是发端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棉花工业，而是始于11世纪意大利的缫丝业，它使意大利的工业占据了相当的可比性优势。[②]这些工业流程在与从中国和近东进口的丝绸竞争中获得发展，最终由水力驱动的机器制造出来，制造方法可能和原材料一起引进。

我们需要质疑很多类似这样的古老神话，重新看待假设的青铜时代的古代社会、古典时代与封建社会之间的断裂。在其他地方，

① Braudel，1981.
② Poni，2001a and b.

城市化历史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城市文化以及它们的“奢侈”元素和知识，一直发展并在古代的基础上得以改变。精制的美
300 食[①]、奢侈的产品以及更普遍的栽培鲜花[②]有益于我们认识这一点。更有意思的是，高级厨艺的发展出现在欧亚各主要文明中，一般认为它们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人们可以追溯中国鉴赏文学的产生，大致与欧洲在同一时期出现。[③]精细厨艺在中国的出现要早些——如果我们不考虑地中海东部的古代社会的话。关于很多艺术发展也可以做出相似的论断，包括彻底否定形象表现（偶像），我们在所有主要宗教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都能找到。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这些关于世界发展的论述：认为东方静止西方活跃，长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大综合中也采取了这条线索，这种对应关系似乎太令人惊讶了。抑或，人们再次认同“亚细亚例外论”或“东方专制主义”的教条，这些似乎限制了城市趣味的发展，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城市特征。

的确，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或许在穆斯林统治地中海之后，西方有一次商业衰落和城市文化衰退，[④]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基督教[⑤]的形成有关。在基督教中，例如财产是要交给教会而不是市政机关。但随后发生的对农村生活的强调，导致封建主义概念的兴起，主要都是西方的现象，它不能也不应该被看作世界或欧洲发展史的

① Goody，1982.
② Goody，1993.
③ Clunas，1991；Brook，1998.
④ 霍杰斯和怀特豪斯（Hodges，Whitehouse，1983）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试图在考古证据的支持下修正皮朗商贸中断的命题（1939）。
⑤ 斯贝塞（Speiser，1985）认为，拜占庭世界中有一些城市中心的参考物。

必然阶段。

在其他地方，青铜时代的城市文明一直生产着范围越来越宽的艺术和制造业物品，越拉越大的贸易网络体系，商业文化的日益发展，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希尔德称之为“社会演进”。最终，在皮朗提到的11世纪的贸易复苏和城市发展之后，西方再次赶了上来，它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与近东贸易的恢复，那里的城市商业文化从未消失。在恢复中，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中心城市非常重要。[①]
其他地方的商业网络一直沿着青铜时代延伸，在锡兰（Ceylon）[②]、 301
东南亚[③]、近东[④]和印度洋[⑤]。最终，基督教欧洲赶上了“现代化”进程，通常是借助东方的技术，例如印刷术、造纸术、丝绸纺织、指南针和火药，食物比如柑橘和糖，各种品种的花儿；尽管不是原发的，但它们后来得到发展，工业制造的进程（还有舰船和武器制造——兵工厂在工业生产及其生产进程尤为重要[⑥]）在此期间获得了有力的相对优势。一旦获得发展，发达的工业活动便开始传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各首府城市和那些青铜时代城市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还有另外一些移民城市）。

欧亚主要社会的这些“现代化”进程与其他地区相比推进更为迅速，整场运动广泛展开。考古学家已经惯于研究这种变迁，它以相同的顺序发生但在不同的时间，例如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变迁。他们往往寻找各种解释，可能是从外部交流，也可能从是

① Lane，1973.
② Perera，1951，1952a and b.
③ Sabloff and Lamberg-Karlovsky，1975；Leur，1955；Melink-Roelofsz，1962，1970.
④ Goitein，1967.
⑤ Casson，1989，for the Periplus.
⑥ Zan，2004.

最初平行的起始状态内部产生的结构相似性。[①]同时，人类学家往往诉诸文化变迁的模糊意义，历史学家则诉诸“精神特质”。在我看来，“精神特质”对历史学者来说是危险领域，甚至比对考古学家还要危险。考古学家只有较少数据支撑观点。基于文化或精神的阐释可能会造成误解，如果它主动引向思考差异性的话。有充分理由说明这些差异在长远的框架中只是暂时的。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后青铜时代的各种文化中有些发展是平行的，即便以略微不同的速度。这一进程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全球化问题，而是今天的西方化问题。进而，它展现了城市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自希尔德写作的年代开始就一直持续发展，部分是通过彼此的相互接触和交换，部分是因为内部的“逻辑”发展。因为这些商业文化，致力于创造各种产品和设施，和本地的城市人口交换，和当地的乡村
302 进行交易，同时也和其他城镇进行交换。他们改进新产品，改善旧的设施，扩展他们的接触范围。

城市基本上是“贸易港口”——借用卡尔·博兰尼说的话（但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制造产品，提供各种服务，不时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范围及其顾客，几乎很少一成不变。他们为了生计而从事制造业和商业，这意味为了支付更大范围的进口他们不得不获取较多利润（至少要突破持平），而不是更少。因此他们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索萨尔提到，[②]商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助产士，他们逐渐扩散并转化为工业家和金融家”。他继承韦伯，认为这一进程产生于封建方式之中，虽然商人是各地所有城镇和都

① 参阅G. Stein。关于大美索不达米亚组织变迁过程的复杂性，见Stein和Rothman（1994：11-22）。

② Southall，1998：22.

市的基本元素。[①]“都市是商人的创造，他们拼命抵制国家这一国王和贵族们的创造物。”城市“始终是创新的核心”，索萨尔说，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尽管这一点尚有争议。城市也是阶级冲突的场所，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社会战争的残忍戏剧”，但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活动的场景。[②]

这些活动应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根源，至少是重商主义的根源。或者，也可能是一些中国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从这一层面上说，资本主义起源或更重要的各种社会文化形式包括艺术在内的城市文化的发展都不是问题。对此，我们的思维便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跳跃。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即无论当代大众传媒方面发生了什么，西方都没有创造这些艺术、文学（例如小说）、戏剧、绘画或雕塑，更谈不上创造了一套促进西方发生现代化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价值观。这些活动一直在整个欧亚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城市社会中进行，有时这个社会领先，有时那个社会领先。但在中世纪初期，西方戏剧性地落后了，部分原因是与古典过去的断裂，部分是因为早期基督教和亚伯拉罕宗教对代表制（不管怎样都是世俗的）的蓄意抛弃。

我在上文曾提到重商主义的广泛基础。这一基础显然足以划出亚洲早期重商主义的范围，印度棉花出口到东印度半岛和东南亚， 303
还有中国青铜、丝绸和瓷器在整个地区的出口。与西欧相比，甚至与地中海相比，古代近东是商业活动的聚集地。在布雷看来，中国直到18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势力。[③]在制造业甚至工业方

① Southall，1998：21.
② Southall，1998：116–117.
③ Bray，2000：1.

面，哪些正好被当作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呢？东亚的广泛交易也一直包括工业。陶器不是唯一需要大规模技术的产品。印度和中国一样，以家庭作坊为基础的纺织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往往由依靠包买主制的商人组织，棉花业与原始工业的欧洲相似。[①]但也有大工厂类型的各种机构。[②]在中国，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重要的造纸业。这种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亚洲主要社会中，从青铜时代开始，城市文化长时间以来都多多少少经历了持续发展。当然也有各种中断，其原因包括环境、经济、军事甚至宗教因素，例如“蛮族”入侵，商业中断，统治衰落以及禁止印刷。但数千年来所有城市文化的发展都越来越复杂，与生产、交换、分配、财政以及物质、艺术和思想生活有关，表现在艺术、教育、商业和制造业方面。不过，很多西方历史学家从工业革命后都带有目的性地回顾了过去，忽视了这些平行的发展，并试图在想像的古代优势前提下接受近代的优势。青铜时代互相关联的联合体被忽视了。这些历史学家提出欧洲产生了古典时代，其他地方则没有。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这种独特性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出发点。在这方面，后青铜时代社会的广泛连续性遭到仅仅对欧洲经历关注的灾难性打击，不仅学者关注，民众也是如此，最终导致对历史的盗窃。

要得到一种有效的比较性结果，必将涉及弃用预设的范畴诸如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抛弃这些概念，建构一张社会学网格，展现比较对象各种可能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历史论述中非常缺乏。相反，历史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坚持自己想要的“进步”

① Bray，1997.

② Goody，1996b：187.

特征。通过将这些概念范畴和发展顺序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成功了偷走了历史。 304

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盗窃问题也影响到其他人文学科。近年来，学者们也采取措施使各个学科更具比较性、更加适应世界其他地区。但这些措施总体来说还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文学变成“比较文学”，但比较的范围往往局限于几个欧洲国家；东方被忽视了，口头文化也没有考虑进来。英国以及美国变种的文化研究领域也是混乱不堪的。后者的文本基础实际上只是单独的西方作品，往往是哲学家的著作，并且常常是法国人，他们评论生活却没有提供多少资料，除了他们自己的内在思索，或对其他哲学家所代表的现代城市社会的评论。这些评论如此普遍以致人们都不需要真正的信息就可以参与讨论。

最后总结一句，这并不是一本欧洲学者所理解的世界历史著作。这个问题在尝试解释欧洲所获得相对优势的背景时就出现了。搜寻历史几乎不可避免都会掺杂或隐或现的目的性偏见。在看待导致自身“现代化”的因素时，人们会对其他人做出判断：他人缺乏新教伦理、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变化能力，所有这些被认为制造了差异性。

历史的主要难题是近代欧洲的优势被特殊化的方式。如果欧陆被认为在经济方面——某种意义上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出了一种独特形式，那么，将资本主义的根源追溯到“绝对主义”、“封建主义”、古典时代便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视其为机构、德行、情感和宗教等一连串没有平行发展的结果。但如果设想自青铜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被看作城市和商业文化的不断完善，就没有任何显著断裂，包括“资本主义”一词的用法所体现的

概念区分。在布罗代尔的权威性调查中，他实际上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此类活动存在于他研究的社会范围内，亚洲和欧洲都是如此。但是，他将“真正资本主义”的概念赋予了现代西方，正如李约瑟对待与“科学”相对的“现代科学”的态度一样。如果“资本主义”被看作所有社会的特征，那么不可避免它的独特性就会消失，也就不需要解释这个问题了。人们能做的是解释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而不是苦心经营的概念变化。的确，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通过完全抛弃“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来得到澄清，因为它的使用总是
305 试图表明西方长期的、具有优势的地位。所以，为什么不在城市和商业发展的长远框架中就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增长来讨论现代西方的优越性呢？这种框架考虑了这些或多或少剧烈活动的时段，也充分考虑到“文明进程”的消极和积极方面。当然，这一顺序需要分期，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但我们也会提工业化甚至工业革命不断扩大的范围，而不否认亚洲等其他社会在这一进程的开始，进
306 而不会将其看作单纯的欧洲发展。

参考文献

Adams, R. M.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early Mesopotamia and prehispanic Mexico.* Chicago: Aldine, 1966.

Agoston, G. *Guns for the Sult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weapons indust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mory, P.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89–554.

Amstutz, G. Shin Buddhism and Protestant analogies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1998, 40: 724–747.

Anderson, P.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4b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4a.

Arizzoli-Clémental, P. *The textile mseum, lyons.* Paris: Paribas, 1996.

Asin, P. M. *Islam and the Divine Comedy.* London: J. Murray, 1926.

Astour, M. C. *Hellenosemitica.* Leiden: Brill, 1967.

Bacon, F.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London: John Haviland, 1632.

Baechler, J., Hall, J. A., and Mann, M.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Barnard, A. Mutual aid and the foraging mode of thought: re-reading Kropotkin on the Khoisan.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2004, 3 (1): 3–21.

Barnes, R. Cloistered bookworms in the chicken-coop of the muses: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In R. MacLeod (ed.),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rth, F. *Nomads of South Persi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1.

Barthélemy, D. The "feudal revolution" . *Past and Present*, 1996, 152: 196–205.

Bayly, C.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ern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eloch, J. Die Phoeniker am aegaeischen Meer.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1894, 49: 111–132.

Berkey, J.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medieval Cairo: a social history of Islamic educ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rlin, I.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augural lec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Bernal, M.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Cadmean letter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 *B.C.*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0.

Black Athena: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ed. D. C. Moore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rnier, F. [1671] *Travels in the Mughal empire, AD* 1656–1668. Columbia, Missouri: South Asia Books, 1989.

Beurdeley, C. and M. L'amour courtois. In *Le Chant d'Oreiller: l'art d'aimer au Japan.* Fribourg, Switzerland: Office du Livre, 1973.

Bietak, M.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6.

Minoan paintings at Arquis/Egypt. In S. Sherratt,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Wall Paintings of Thera.* Athens: Thera Foundation, 2000.

Bion, W. R. *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1963.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insight in psvcho-analysis and groups. London: Tavistock, 1970.

Birrell, A. *Chinese love poetry: 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a medieval anth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assics, 1995.

Blaut, J. M.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Bloch, Marc. *Feudal society*, trans. L. A. Many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

Bloch, Maurice (ed.) *Political language and oratory in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Bloom, J. M. *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o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lue, G. Capit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period.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oas, F. The folk-lore of the Eskimo. *F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04, 17: 1-13.

Bodin, J. *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 Paris: Chez Iacques du Pays, 1576.

Bohannan, P. J. and Dalton, G. (eds.) *Markets in Afric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Bonnassie, P. *From slavery to feudalism in south-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oserup, E.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llen&Unwin, 1970.

Bovill, E. W.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Braudel, F. *Méditerrané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lipe II.* Paris: Colin, 1949.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Vol. I.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1-4a.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wheels of commerce. Vol. Ⅲ.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1-4b.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Vol. Ⅲ.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1–4c.

Bray, F.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2000.

Briant, P.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550–330 BC". In J. Curtis and N. Tallis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5.

Brodbeck, M. (ed.)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Macmillan, 1968.

Brook, T.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Brook, T.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tton, J. *The Renaissance bazaar: from the silk road to Michelangel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ough, J. *Poems from the Sanskri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Browning, J. *Palmyr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9.

Browning, R. Educ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urke, P.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98.

Burkhardt, J.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Penguin, 1990.

Buruma, I. and Margalit, A. Seeds of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4, 51: 4.

Butterfield, H.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 London: G. Bell, 1949.

Bynum, C.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aeval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Cabanès, Dr. *La vie intime.* Paris: Albin Michel, 1954.

Cahen, C. Iqt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Brill 1988–1991, 1992.

Cai Hua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 New York: Zone Books, 2001.

Cameron, A. Vandals and Byzantine Africa.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ntarino, V. *Casidas de amor profano y mistico*. Mexico: Porrúa, 1977.

Capellanus, A. [1186]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ed. J. J. Par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Cardini, P. *Breve Storia di Prato*. Sienna: Pacini, 2000.

Cartledge, R. Trade and politics revisited. In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eds.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3.

Caskey, J. *Art as patronag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merchant customs in the region of Amalf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asson, L.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astoriadis, C. The Greek polis and the creation of democracy. In D. A. Curtis (ed.), *The Castoriadi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1.

Cesares, A. M. La logique de la domination esclavagiste: vieux chrétiens et neo-convertis dans la Grenade espagnole des temps moderne. *Cahiers de le Méditerranée. L'Eslavage en Méditeranée à L'epoque moderne*, 2002: 219-240.

Chan, W. K. 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ndler, A. 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ng, K. C. (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rtier, R.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Daniel Gordon and "The second death of Norbert Elias". In E. Dunning and S. J. Mennell (eds.), *Norbert Elias* (vol. Ⅳ).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Chase-Dunn, C. and Hall, T. D.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7.

Chayanov, A. 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Chesneaux, J. *La Révolte des Tai-Ping 1851-1864: prologu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Paris, 1972.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1840-1949. Paris: Seuil, 1976.

Childe, G. [1942]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Watts, 1951.

Ching-Tzu Wu *The schol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Cipolla, C. *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New York: Minerva Press, 1965.

Clark, G. D. *World prehistory: an ou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lone, R. (ed.) *The story of time and space.* Greenwich: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Clunas, C.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Cohen, E. E.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a banking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hen, M. J. Writs of pass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documentation of partial misunderstandings in Minong, Taiwan. In M. Zelin and J. K. Ocko, and R. Gardella,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ncina, E. *Arsenale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Milan: Electa 1987 *Arsenali a cittá nell'occidente europeo.* Rome: La Nuova Italia Scientifica, 1984.

Confucius 1996 [*c.* 500 BCE.]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eijing: Sinolingua

Conrad, L. I. The Arab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nstable, O. R. *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 the commercial realignmen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900–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quéry-Vidrovich, C. Research on an Afric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D. Seddon (e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1969). London: *Pensée*, 1978, 144: 61–78.

Cormack, R. The visual art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ulbourn, R. (ed.)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Crane, N. *Mercator: 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 London: Phoenix, 2003.

Curtis, J. and Tallis, N.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5.

Daniel, G. *The three ages: an essay on archae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Daniel, N. *The Arabs and medieval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75.

Davies, J. K.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ussex: Harvester, 1978.

Davies, W. V. and Schofield, L. (eds.) *Egypt, the Aegean, and the Levant.*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5.

Denoix, S. Unique modèle ou types divers? La structure des villes du monde arabo-musulman à L'époque médiévale, ed. C. Nicolet *et al. Mégapoles méditerranéenes: géographie urbaine rétrospective.*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0.

Djebar, A. *L'âge d'or des sciences arabes.* Paris: Le Pommier, 2005.

Dobb, M.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54.

Dronke, R. *Medieval Latin and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love-lyric*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Duby, G. *Féodalité.* Paris: Gallimard, 1996.

Dumont, L. 1970 [1966]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urkheim, E. 1893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étude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supérieures. Paris: Alcan

1947 [1st French edn 1912, 1st English trans.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Glencoe, Il.: Free Press

Dürr, H.P. *Der Mythos vom Zivilisationsprozes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8.

Edler de Roover F. *La sete Lucchesi* (Italian trans. from German 1950. *Die Seidenstadt Lucca*. Basle: CIBA.) Lucca, 1993.

Eisenstein, E. L.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Elias, N. 1994a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 E. Jephcott). Oxford: Blackwell

1994b *Reflections on a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Eyre Methuen 2004 Ave atque vale. In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t 2, vol. 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Evans, A. 1921–35 *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 4 vols. London: Macmillan

Evans-Pritchard, E. E.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The Nu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Fantar, M. H. *Carthage: la cité punique*. Paris: CNRS, 1995.

Faure, D. 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 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9, 5–7 January.

Fay, M. A. Women and waqf: property, power and the domain of gen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gypt. In M. C. Zilfi (ed.) *Women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Leiden: Brill, 1997.

Fernandez-Armesto, F.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our last thousand years*. London: Black Swan, 1995.

Fevrier, M., P.A. Fixot, G. Goudineau, and N. Kruta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

baine.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IXe siècle. Période traitée: la Gaule de Vlle au I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80.

Finley, M. I. (ed.) *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W Heffer, 1960.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ed. B. D. Shaw & R. P. Salle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1.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Hogarth, 1985.

Firth, R. *Social changes in Tikopia: re-study of a Polynesian community after a gene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Flannery, K.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2, 3: 399-426.

Fortes, M. and Evans-Pritchard, E. E.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Fowden, G. Elefantiasi del tardantica (Review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F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2002, 15: 681-686.

Frank A. G.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Freud, S.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d. J.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vol. xxi (1927-1931). London: Hogarth, 1961.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and other works. Trans. and ed. J. Strachey, Standard edition, vol. xxii (1932-1936). London: Hogarth, 1964.

Why war? Letter to Einstein.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xxii (1932-1936). London: Hogarth, 1964.

Furet, F. and Ozouf, J. *Lire et écrire, l'alphabetisation des fran*d 觭*fais de Calvin à Fules Ferry.* Paris: Minuit, 1977.

Garnsey, P., Hopkins, K., and Whittaker, C. 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Geertz, C. et al (eds.) *Meaning and order in Moroccan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Gellner, E. The mightier pen: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inside-out colonialism.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reprinted fro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 February 1998), 1994.

Geraci, G. and Marin, B. L'approvisionnement alimentaire urbain. In B. Marin and C. Virlouvet (eds.) *Nourire les cités de Mediterranée: antiquité – temps moderne.* Paris: M. M. S. H., 2003.

Ghosh, A. *In an antique lan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Gillion, K. L. *Ahmedabad: a study in Indian urban history.*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Gilson, E. *La Philosophie au Moyen Age* (2nd edition). Paris: Payot, 1999.

Gledhill, J. and Larsen, M. The Polanyi paradigm and a dynamic analysis of archaic states. In C.Renfrew *et al.*,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52.

Glick, T. F. *Irrigation and hydraulic technology: medieval Spain and its legacy.* Aldershot: Variorum, 1996.

Gluckman, M. *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5.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Oxford: Blackwell, 1965.

The ideas in Barotse jurisprudenc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Godelier, M. The concept of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arxist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D. Seddon (e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arxist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London: Cass, 1978.

Métamorphoses de la parenté. Paris: Fayard, 2004.

Goitein, S.D.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Fewish communities of the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An abridgement in one volu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Goode, W.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Goodman, M. *Fews in a Graeco-Roma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Goody, J. Anomie in Ashanti? *Africa*, 1957, 27: 75–104.

Death, property and the ancesto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04, London: Routledge), 196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ime.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The evolution of the family. In P. Laslett and R. Wall (eds.),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a.

The myth of the Bagre. Oxford: Clarendon, 1972b.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ooking, cuisine and clas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Under the lineage's shadow.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84, 70: 189–208.

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culture of fl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a.

Comparing family systems in Europe and Asia: are there different sets of rul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6b, 22: 1–20.

Represen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7.

Food and love. London: Verso, 1998.

The Bagre and the story of my life. *Cambridge Anthropology*, 2003a: 23, 3, 81–9.

Islam i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b.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the great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Goody, J. and Watt, I.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3, 5: 304–345.

Goody, J. and Tambiah, S. *Bridewealth and dow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Goody, J. and Gandah, S. W D. K. *Une récitation du Bagre*. Paris: Colin, 1980.

The third Bagre: a myth revisited.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2.

Gordon, D.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equality and sociability in French thought, 1670–17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Gough, K. *Rural society in Southeast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riaule, M. *Conversations with Ogotommeli*. Paris: Fayard. (English trans. 19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Greenberg, J.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Supplement to *International F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9), 1963.

Grudin R. Humanism.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7.

Guichard, P. *Structures occidentales et structures orientales*. Paris: Mouton, 1977.

Gurukkal, R. and Whittaker, D. In search of Muziris. *Roman Archeology*, 2001, 14: 235–350.

Gutas, D. *Greek thought, Arabic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8.

Guthrie, D. J. and Hartley, F. Medicine and surgery before 1800.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n) .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 775–783.

Habib, I.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precolonial India.In J. D.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jnal, J.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Aldine, 1965.

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2, 8: 449-494.

Halbwachs, M. *Le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 F.Alcan, 1925.

Hart,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st Afric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New York: Texere, 2000.

Hart, Mother Columba (trans.) *Hadewijch: the complete works*. London: Paulist Press, 1980.

Haskins, C. H.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York: Henry Holt, 1923.

Hill, P. *Studies in rural capitalism in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Hilton, R. (e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76.

Hobsbawm, E. J. *Primitive rebel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1964.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65.

Bandi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Hobson, J.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dges, R. and Whitehouse, D.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Duckworth, 1983.

Hodgkin, L.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Mesopotamia to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Hopkins, T. J.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Bhagavata Purana*. In *Krishna: myths, rites and attitudes*, ed. M. Singer.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66.

Hopkins, K. Brother-sister marriage in Roman Egyp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0, 22: 303-354.

Introduction to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p: Chatto & Windus, 1983.

Hourani, A. L'oeuvre d'André Raymond.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1990, 55-56: 18-27.

Howard, D. *Venice and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Europe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su-Ling *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A. Birrel (ed.). New York: Penguin, 1982.

Hufton, O. *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vol. I, *1500-1800.*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5.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Ibn Arabi *L'interprète des desirs.* Paris: Albin Michel, 1996.

Ibn Khaldun [1377] *Al-Muqaddimah.* Beirut: UNESCO, 1967.

Ibn Hazm [*c.* 1022] *The ring of the dove. A treatise on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Arab love.* New York: AMS Press, 1981.

Inalcik, H. with 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ckson, A. and A. Jaffes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A Publications, 2004.

Jacquart, D. L'i Épopée de la science arabe, Paris: Gallimard, 2005.

Jayyussi, S. K.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2.

Jidejian, N. *Tyre through the ages.* Beirut: Librarie Orientale, 1991.

Sidon à travers les ages. Beirut: Librarie Orièntale, 1996.

Byblos through the ages. Beirut: Librarie Orièntale, 2000.

Jones, E. L.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Kant, I. [1784] Ideas on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In J. Rundell and S. Mennell (eds.), *Classical readings in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Keenan, J. G. Egypt.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ennedy,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Krause, K. *Arms and the state: patterns of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Kristeller, P. O. The School of Salerno: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45, 17: 138–194.

Kroeber, A. L. *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6.

Lancel, S. *Carthage: a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97.

Landes, 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nations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London: Abacus, 1999.

Lane, R. C.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Lantz, J. R. Romantic love in the pre-modern period: a sociological commentary. *F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81, 15: 349–370.

Laslett, P. *The world we have lost: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Scribners, 1971.

and Wall, R. (eds.)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Latour, B. Derrida dreams about Le Shuttle. Reviews of E. Durian-Smith, *Bridging divides: the Channel tunnel and English legal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 Berkeley.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2000, 2/6/2000: 31.

Ledderose, L.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Lee, J. Z.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 Goff, J.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Blackwell, 1993.

Lenin, V. I. The awakening of Asia. 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2.

Letts, M. *Bruges and its past.* London: Berry, 1926.

Leur, J. C. van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W van Hoeve, 1955.

Lewis, B. *Islam in history: ideas, men and event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lcove, 1973.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London: Orion House, 2002

Lewis, C. S.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Liebeschuetz, J. H. W G.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cities of the fifth to the mid seventh century: 425–440.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r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loyd, G. E. R.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cient worlds, modern reflection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pez, 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1.

Love, J. R.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Max Weber and 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oman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1.

Maalouf, A. *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 London: Al Saqi Books, 1984.

Macfarlane, A.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78.

Macfarlane, A. and Martin G. *The glass bathyscap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Machiavelli, N. *The prince* (trans. S. J. Millner) . London: Phoenix Books, 1996.

Maine, H. S. *Ancient law.* London: Everyman Library, 1965.

Makdisi, G. An Islamic element in the early Spanish University. In *Islam: past influenc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rise of colleges: illustrations of learning in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linowski, B. 1913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London: Hod-

der & Stoughton, 1981.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Kegan Paul, 1947.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ed. R. Redfie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48.

Mann, M.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Ⅰ: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x, K.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intro. E. Hobsbaw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4.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Capital. London: Penguin, 1976.

Marx,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Vol. Ⅰ.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Matar, N. *Turks, Moors and Englishme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McCormick, M.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A.D. 3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cMullen, I. J. *Idealism, protest, and the tale of Genji: the Confucianism of Kumazawa Banzan 1619–16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Meier, C. *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cs* (trans. David McLintoc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eilink-Roelofsz, H. A. P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Asian trade and Islam in the Malay-Indonesian archipelago. In D. S. Richard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B. Cassirer, 1970.

Mennell, S. *All manners of food: eating and taste in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1985.

Mennell, S. and Goudsblom, J. Civilizing process-myth or reality? A comment on Duerr's critique of Elia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7, 39: 729–733.

Meriwether, K. L. Women and waqf revisited: the case of Aleppo 1770–1840. In M. C. Zilfi (ed.), *Women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Leiden: Brill, 1997.

Miller, J.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Millett, P. Maritime lo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credit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Mintz, S. and Wolf, E. An analysis of ritual co-parenthood (compadrazgo). *Southwestern F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50: 341-367.

Mitchell, J. *Sibl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Montesquieu, C. S., *The spirit of laws*. London: G. Bell & Sons. (French original 1748 *L'Esprit des lois*), 1914.

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New York: Henry Holt, 1877.

Mossé, C. The "world of the emporium" in the private speeches of Demosthenes. In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Mundy, M. W. The family, inheritance and Isla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farā'id* law. In A. al-Azmeh (e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Islamic law*. London: Routledge, 1988.

Ownership or office? A debate in Islamic Hanafite jurisprudence over the nature of the military "fief", from the Mamluks to the Ottomans. In A. Pottage and M. Mundy (eds.),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 making persons and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Murasaki, S. *The tale of Genji* (trans. A. Wale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5.

Murdock, G. P Ethnographic atlas: a summary. *Ethnology*, 1967, 6: 109-236.

Nafissi, M. Class, embeddedness, and the modernity of ancient Athe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 378-410, 2004.

Nakosteen, M. *History of the Islamic origins of western education, A.D. 800-1350*. Boulder, Colorado: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1964.

Needham, J. (e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Time and eastern man.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65.

Clerks and craftsma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ed.)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t. 1: Botany*, vol. Ⅵ,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a.

(ed.)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pt. 7,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vol. v,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b.

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t 2*, vol 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Nef, J, U. *Cultural founda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Nicholson, R. *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Nykl, A. R. *Abū Muammad, Alā ibn Hazm al-Andalusā: a book containing the Risāla known as the dove's neck-ring about love and lovers.* Paris: Geuthner, 1931.

Nylan, M. Calligraphy, the sacred text and test of culture. In C. Y Liu *et al.*,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NJ, 1999.

Ong, W.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Oppenheim, A. L *Ancient Mesopotami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

Osborne, R. *Greece in the making 1200-479 BC.* London: Routledge, 1996.

Parker, 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arry, J. J. (ed.) *Andreas Capellanus: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arsons, 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

Pasinli, A. *Istanbul archaeological museums.* Istanbul: A Turizm Yayinlari, 1996.

Passerini, L. *Europe in love, love in Europe: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I. B. Tauris, 1999.

Passerini, L. Ellena and A. C. T Geppert (eds.), forthcoming *New dangerous liaisons.* Oxford: Berghahn.

Perera, B. J. The foreign trade and commerce of ancient Ceylon. Ⅰ: the ports of ancient Ceylon. *Ceylon Historical Fournal*, 1951, 1: 109–119.

The foreign trade and commerce of ancient Ceylon. Ⅱ: ancient Ceylon and its trade with India. *Ceylon Historical Fournal*, 1952a, 1: 192–204.

The foreign trade and commerce of ancient Ceylon. Ⅲ: ancient Ceylon's trade with the empire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s. *Ceylon Historical Fournal*, 1952b, 1: 301–320.

Person, E. S. Romantic lov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syche and the cultural unconscious. *F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39 (supplement), 1991: 383–411.

Peters, F. E. *Aristotle and the Arabs: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in Isl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8.

Petit, P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s.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1997, 20: 2205.

Pirenne, H.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mans. B. Mall). London: Allen & Unwin, 1939.

Polanyi, K.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ommentary*, 1947, 3: 2.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 Polanyi, C. Arensberg; and H.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olybius.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trans. E. Shuckburgh). London: Macmillan, 1889.

Pomeranz, K.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ni, C. network della setta nelle città italiana in età moderna. *Iscuola Officina* [Bologana], 2001a, 2: 4–11.

Comparing two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s: Bologna and Ly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P. L. Porta, F. Scazzieri, and A. Skinner (eds.), *Knowledg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heltenham: Edwards, 2001b.

Radcliffe Brown, A. 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Cohen and West.

Rashdall, H.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ed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ttray, R. S. *Ashant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Rawson, J. *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4.

Renfrew, C., M. J. Rowlands, and B. A. Segraves (eds.),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Repp, R. C. *The Mufti of Istanbul: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toman learned hierarchy.* London: Ithaca Press, 1986.

Reynal, J. Al-Andulas et l'art roman: le fil d'une histoire. In: T. Fabre (ed.) *L'Héritage Andalou.* La Tour d'Aigues: Éditions De L'Aube, 1995.

Reynolds, L. D. and Wilson, N. G. *Scribes and schola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Ribera, J. *Disertaciones y opúsculos.* 2 vols. Madrid: E. Maestre, 1928.

Richards, A. I. Some types of family structure amongst the central Bantu. In A. R. Radcliffe Brown and C. D. Forde (eds.) *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Rodinson, M. Recherches sur les documents arabs relatifs à la cuisine. *Revue études islamique*, 1949: 95–106.

Rougement, D. de *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Roux, J. Cortesia a fin'amor, un nouvel humanism. In R. Bordes (ed.) *Troubadours*

et Cathares: en occitanie médiévale. Cahors: L'Hydre, 2004.

Rowe, W.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China, 1796–18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abloff, J. A. and Lamberg-Karlovsky, C. C. (eds.) *Ancient civilisation and trade.*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5.

Said, E.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 London: Verso, 2003.

Saikal, A. *Islam and the west: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Say, J.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ctique.* Paris: Rapilly, 1829.

Sayili, A. *Higher education in medieval Islam: the madrasas.*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l'Ankara Ⅱ, 1947: 30–69.

Schapera, I. The sin of Cain. In B. Lang (e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5.

Schwartz, S. B.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enon, K. M. *Venice, Austria and the Turk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1.

Sherratt, 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wall paintings of Thera.* Athens: Thera Foundation.

Singer, C. (ed.)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1984.

Singer, C. Medicine. In *Chambers Encyclopaedia.* London: Newnes, 1950, vol. Ⅸ: 212–228.

Skinner, P. *Family power in Southern Italy: the Duchy of Gaeta and its neighbours, 850–1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licher van Bath, B. 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A. D. 500–1850.*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3.

Smith, P. J.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7–122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nodgrass, A. M. Heavy freight in Archaic Greece. In P. Garnsey, K.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83.

Sombart, W. Capital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I.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The F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Leipzig: Dunker and Humblot (Engl. trans. 1993, London: T. F. Unwin), 1911.

Soskice, J. Sight and vision in medieval Christian thought. In *Vision in context: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sight*, ed. T Brennan and M. J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9–43.

Southall, A. *The city in time and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outhern, R. W. *Medieval human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Sovič, S. forthcoming *Western families and their Others*. MS.

Speiser, J. M. Le christianisation de la ville dans l'Antiquité tardive. *Ktema: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 de la Grèce et de Rome antiques*, 1985, 10: 49–55.

Steensgaard, N. *Carracks, caravans, and companies: 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European–Asian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Copenhagen: Studentlit-teratur, 1973.

Stein, G.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complexity in Greater Mesopaotamia. In *Chiefdoms and early states in the Near East,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complexity*, G. Stein, and M. S. Rothman M. S. Madison, Wisconsin: Prehistory Press, 1994.

Stone, L.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5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Strayer, J. R. 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Feudalism in History*, ed. R. Coulbour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Tandy, D. W. *Warriors into traders: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n early Greece*.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apar, R. *A history of Ind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History and beyond.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ognetti, S. *Un industria di lussoo al servizio del grande commercio.* Florence: Olschki, 2002.

Tolstoi, L. *Last diaries* (ed. L. Stilman) .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0.

Trevor-Roper, H. 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5.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58.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1881.

Valensi, L. *The birth of the despot: Venice and the sublime porte*, trans. A. Denn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Vico, G. *New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Viguera, M. Asludu li'l-ma'ūl I :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Andalusi women. In S. K. Jayyusi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4.

Villing, A. Persia and Greece. In J. Curtis, and Tallis, N. (eds.),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4.

Von Staden, H. Affinities and visions-Helen and hellenocentrism. *Isis*, 1992, 83: 578-595.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I :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The west,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I: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alzer, R. *Greek into Arabic.* Oxford: B. Cassirer, 1962.

Ward, W. A. *Egypt and the east Mediterranean world 2200-1900 BC.* Beiru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71.

Ward-Perkins, B. Specialised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X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tson, A. M.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Watt, I. P. *The rise of the novel.* London: Chatto, 1957.

Watt, W. M.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E. A. Shils and H. A. Finch).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49.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London: NLB, 1976.

Weis, R., *The yellow cross: the story of the last Cathars, 1290–1329.* London: Penguin, 2001.

Weiss, W. M. and K. M. Westerman *The Bazaar: markets and merchants of the Islamic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8.

Whitby, M. The army c. 420–602.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ol. XIV.

White, K. D. *Roman farming.*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0.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White, L.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White, S. D. The "feudal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1996, 152: 205–223.

Whittaker, C. R. *Rome and its frontiers: the dynamics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Wickham, C. The other transition: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feudalism. *Past and Present*, 1984, 103: 3–36.

Un pas vets le Moyen Age? Permanences et mutations. In P Ouzoulias *et al.* (eds.) *Les campagnes de la Gaule àla fin de l' antiquité.* Antibes: Editions ACDCA, 2001.

Will, E. Trois quarts de sìècle de recherches sur 1'economie greque antique. *Annales E. S. C.*, 1954, 9: 7–22.

Wilson, A. Water power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rizontal water wheel. *Fournal of Roman Archeology*, 1995, 8: 499–510.

Wittfogel, K.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olf, A. P. and Huang, C.-S.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Wolf, E. R.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Wong, R. B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agrarian empire and its modern legacy.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orsley, P.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 study of cargo cults in Melanesia.*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57.

Wrigley, E. A. *Poverty, progress and pop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Yalman, N. O.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love (or equality). In J. Warner (ed.) *Cultural horizon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Zafrani, H. *Fuifs d'Andalousie etdu Maghreb.* Paris: Maisonneuve Larose, 1986. *Los judíos del occidente musulmán: Al Andalus y el Magreb.* Madrid: Editorial Mapfre, 1994.

Zan, 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discourse in proto-industrial settings: the Venice Arsenal in the turn of the 16th century.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04, 34: 2, 345-378.

Zilfi, M. C. Women and society in the Tulip Era, 1718-1730. Amira El Aazhary Sonbol (ed.), *Women, the family, divorce laws in Islamic history.*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Žižek, S. A Leftist plea for "Eurocentrism". In *Unpacking Europe: towards a critical reading*, S. Hassan and I. Dadi (ed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1.

Zurndorfer, H. T. Not bound to China: i Étienne Balasz, Fernand Braudel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n post-war France. *Past &Present*, 2004, 185: 189-221.

索 引*

Abbasids，（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750–1258）的统治者，112
Abelard，Peter，彼得·亚伯拉德，268
Absolutism，绝对主义，21，94，96，98，118，160，163–4，170，199，305
Abuse，虐待，167
Accountancy，会计业，194
Aceh，亚齐，111，114
Adam and Eve，亚当和夏娃，277–9
Adams，亚当斯，8，57
Aegean，爱琴海，60，64，111
Affective life，情感生活，160，170，267
  emotions，情感，160，176–7
  guilt，罪恶，156，164–5，167，171，177
  inhibition，节制，168
  insecurity，不安全感176
  instinct，本能，163–5，169，176
  internalization，内在化167
  restraint，约束，156，159，161–2，164–5，167，169，173，177，178，179，193
  self-detachment，自我疏离，173
  shame，羞耻，156，159，165，167，171，172，176
  unconscious，无意识，177
Africa，非洲，1，8，14，26，31，51，64，74，114
African time，非洲时间，17
agriculture，农业，3，119，154
  calendar，历法，15
  contrast with Eurasia，比较欧亚社会，119–20，136
  cuisine，烹饪术，119
  feudalism，封建主义，91–3
  flowers，花儿，120
  market，市场，41，45
  military coups，军事政变，249
  North，北方，27，51，73–5，85，99，115
  one party rule，一党制，249，251
  orality，口述文化，14
  political systems，政治体制，53
  religion，宗教，信仰，62
  sectarianism，宗派，249
  Sub-Saharan，撒哈拉以南，58

* 索引页码为原文页码，见本书边码。

trade，贸易，75
Aghlabid，阿格拉比，76
Agoston，G.，阿格斯通，104
Agriculture: advanced，先进农业，188，207，259
agro-city，农业城市，222
Bronze Age，青铜时代，3
and feudalism，封建主义，77，91-2，95
hoe，锄头，3-4，28，51，101，119，154，262
irrigation，灌溉，3-4，40，70，85-6，100，108，136，207，293
manorial system，庄园制，79，92，109
plough，犁，3，48，80，87，91，100，154，188，262，287
plough and inequality，犁耕和不对等，221
property law，财产法，58-9
rain-fed，雨水灌溉，3-4，40，70，293，298
South America，南美洲，116
technology，技术，84
transport，运输，84
Turkey，土耳其，102，108
Akenaton，埃赫那吞，62
Akkadia，阿卡得，27，42，48
Albania，Clans，阿尔巴尼亚的宗族部落，51
alcohol，酒，184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39-40
Alexandria，亚历山大，20，69，71-2，75，87，223，227-8
Algarve，阿尔加夫，115
Almoravids，阿尔摩拉维德人，271
alphabet，字母文字，5，26-7，31-3，35，67，289-90
consonantal，辅音的，31-2
Europe，欧洲，66
Greek，希腊，5，26-7，35，67，289
printing，印刷术，86，129，132
Phoenician，腓尼基人，63-4，100，287
Semitic，闪米特，67
Ugarit，乌加里特，289
West Semitic，西闪米特的，32
Amalfi，阿马尔菲，75-6，206，218-9
America，United States of，美利坚合众国，91
colonies，殖民地，51，115
freedom fries，自由派炸薯条，255
Native Americans，美洲土著，56
south，南方，117
Americas，美洲，美国，8，14，28，103，115
discovery of，发明，50
South，南部，116
treasures，财富，190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134
anatomy，解剖，73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186
Anderson，Perry，佩里·安德森，2，70，78-9，81-2，84，92-6

Angevin dynasty，安茹王朝，75–6
Antioch，安提阿，71，73，75–6
Antiquity，古代，古典时代，2–5，8–9，21–68，130，241，287，300，305
capitalism，资本主义，38，44–5，79，97，119，215
classes，阶级，49
crop development，农作物生产，66
Dark Age，黑暗时代，44
democracy，民主，民主制，26，33，49–60，77，287，290
Doric invasion，多利安人侵，28
and Europe，欧洲，49，52，100，134
trade and ancient economy，商业与古代经济，26，29，38–48，290
feudalism，封建社会，封建制度，68–9，77–82，91，95
five –stage theory，五阶段论，86，289
freedom，自由，26，31，55，290–1
great organization，庞大组织，290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33，35，290
Islam，伊斯兰，131
market，市场，集市，26，40–2，44–8
merchants，大商人，46–9
metals，金属材料，66
modernist –primitivist controversy，现代主义与尚古主义之争，45，48
Near East，近东，27，29–31，33–6，38–41，46–7，51，57–8，61，63
oikos，小农经济，41，44
periodization，历史分期，82
politics，政治，48–60
rationality，合理性，290
religion，宗教，信仰，60–4
rule of law，法治，26
slavery，奴隶制，7，26，29，55–7
towns，城镇，215
water engineering，水利工程，66
water–mills，水车，82
Etruscan civilization，（意大利古国）伊特鲁亚文明
Greece，Ancient，古希腊
Persia，波斯
Rome，Ancient，古罗马
anthropology，人类学，45，58，62
Apamea，阿帕美，70，80
Aquinas，St. Thomas，圣托马斯·阿奎那，232
Arabi，Ibn，伊本·阿拉比，238，275
Arabia，阿拉伯半岛，20，81
Arabic，阿拉伯的，21，31
astronomy，星相术，21
mathematics，算术，21
numerals，数字
Arabs，阿拉伯人，5
alchemy，炼金术，297
Bedouin，贝都因，30
carpets，毛毯，185

countries，乡村，69
expansion，扩张，74，91，224
Isnad，阿拉伯圣训传述世系，9
medicine，医学，73
Near East，近东，71
paper，造纸术，66
philosophy，哲学，23
poetry，诗歌，224
scholars，学士，72
science，科学，87
settled，定居，30
translations，翻译，237
world histories，世界史，13
Archaemenic culture，古风时期的文化，34
Archaic Society see Greece，Ancient
archaeology，古风社会，参考古希腊考古学，27，33
anthropo-archaeological，人类—考古学的，121，287
architecture，建筑，218-20
Amalfi，阿马尔菲，218-20
Arabic，阿拉伯半岛，212-20
Greek，希腊的，26
Venice，威尼斯，219
Aristotle 100，133，223-5，237-8，亚历士多德
art，艺术，
African，非洲，176，178，
Gothic，哥特式的，219，
Greek，希腊的，
magic，巫术，176
music，音乐，244
non-naturalistic，非自然主义的，177，
plastic，造型，244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26-9，
theatre，戏剧，244
Aisa，亚洲，2，4，13-14，21-2，25-7，36，54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亚细亚生产方式，28，97，140
Asiatic states，亚细亚国家
Europe，欧洲，4-5，7
capitalism，资本主义，144
civilization，文明，183
connoisseurship，鉴赏力，296，300
economy，经济，71，84，92，96
exceptionalism，例外论，4，9，25，66，84，100-1，105，287，294，296，298，300-1
feudalism，封建主义，91，93-6
Greece，希腊，19
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4，9，25，40，50-1，54，97，99-122，136，186，289，293，297，299，301
paper，纸，22
Rome，罗马，70
trade，75，115
Asia Minor，小亚，19，36，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进程，111
Assyria，亚述，34，54，56
Assyriology，亚述学，50
astronomy，星相学，22
Arabic，阿拉伯人，21
astrolabe，星盘，21

astrology，占星术，18
Athens，雅典，27，46–7，50，52–3，71，134，223，227–8
Atlantic Powers，大西洋帝国，56，100，103，110，115
empires，帝国，182
Australians，Native，澳大利亚原住民，56
Dream time，梦幻时代，22
Avaris，阿瓦利斯，62
Averrhoes，阿威罗伊，237
Avicenna，阿维森纳，73

Babylon，巴比伦，56，134
Akkadian documents，阿卡得文献，27
maps，地图，21
Bacini，用于教堂装饰的马赛克式的陶片，219
Bacon，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292
Bacon，Roger，罗杰·培根，148，150，238
Baghdad，巴格达，73
Bagre，巴格里，23，37，245，280
Balazs，Etienne，提恩那·巴拉兹，138–9
Balkans，巴尔干，58，70，85，99，104
Baltic，波罗的海的，87，110，127
banking，银行业，90，131，191，204，293
bankers of Shansi，山西票号，201
Italian，意大利，205
barbarism，未开化，50，64，154–5，224，236
ancient Greece，古希腊，27，29，
Barotse （Lozi），巴罗策人，58
Basra，巴士拉，114
bath/bathing，沐浴/浴室，163
and luxury，奢侈品，218
Bath，Slicher van，斯里彻·冯·巴斯，79
Beijing，北京，32，145
Berlin，Isaliah，以赛亚·伯林，55
Bernal，Martin，马丁·伯纳尔，5，32，57n，60–3，130n
Black Sea，黑海，60，110–11
blast furnaces，鼓风炉，209
Blaut，J. M. 布劳特，7，169，298
Bloch，Marc，马克·布洛赫，68
Boccacio，薄加丘，76，90
Bologna，博洛尼亚，73，88，94，96，113，215，229–30，264
bourgeoisie，资产阶级，172，191，194，196，198，199，203，211，216
Braudel，Fernand，费南德·布罗代尔，2，9，66，94，96，98，110n，125，137–8，153，180–211，220，263–5，293，296–7，300–1，305
Bray，Francesca，弗朗切斯卡·布雷，92
Brazil，巴西，116
Britain，Great education，大不列颠的教育129
Empire，帝国，20

Greenwich meridian，格林威治子午线，20–1
law，法律，141–2
Roman，罗马，70，80
space，空间，20
potter's wheel，陶轮，216
textiles，纺织品，88
water-mill，水磨，81
bronze，青铜，101，104，304，
Bronze Age society，青铜时代的社会，2–3，6，21，25–6，28–33，35，38–41，44–5，47，50，56–7，59，66，69，97，100，120，122，135，137，140，156，158n，262，280，290，294，
onset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开端，166，287，299
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6，29，69，100–1，121，128，130，135，137，190，193，202，209–10，300–5
Brook，T. vii，129，布鲁克，143n
Brotton，Jerry，杰里·布罗顿，8，127，129，129n，132
Bruges，布鲁日，90，113，127，205
Bücher，Karl，卡尔·毕歇尔，38
Buddhism，佛教，95，147，153，194，197，259
lunar calendar，月历，15
Burke Peter，彼得·伯克
Burkhardt，J.，布克哈特，35，37，67，127
Bush George W.，乔治·布什，253，255
Bursa，布尔萨，88，93，110
Busbecq，Ghiselin de，吉斯林·德·布斯贝克，17
Byzantium，拜占庭，9，61，71，73–4，76，86，97，111–12，206，216
Empire，帝国，69，81，110–11
feudalism，封建主义，93
renaissance，复兴，9
Turkey，土耳其，99

Cadmus，卡德莫斯，64
Cairo，开罗，74–5，136
Canary Islands，加那利群岛，115–6
Capitalism，资本主义，21，25–6，38，66，67，92，97–8，125，143–4，180–211，299–300
agrarian，可耕地，45
Antiquity，古典时代，
colonial，殖民的，199
commercial，商业的，199
early，早期，201
entrepreneurial，进取的，256，305
European 'invention' of，欧洲发明1–4，6，126，128，133
feudalism，封建制度，92–3
finance，金融，181，184，196，293，300
five-stage theory，五阶段论，86
full，完整的，204
industrial，产业的，45，68，86，91–2，94，96，195

the market，集市，市场，
mercantile，商人，4，6，67–8，128，181，210，293，300，303
micro–capitalism，微观资本主义，195
pepper，胡椒，114
pre–capitalist formations，前资本主义的构型，45
speculation，投机买卖，204
'sprout' of，萌芽，303，
sugar，糖，115–6
'true'，真正的，195–6，198，200，202–6，210–11，293，297，305
Turkey 104 and see market，the trade，土耳其，参考“市场”、“贸易”词条
Carolingian period，卡洛林时期，68，87，110
feudalism，封建主义，81–5
Ranaissance，（卡洛林）复兴，87
Carthage，迦太基，40，61，63–5，71，73–4，79，95，288，291
democracy，民主，53–4，291
Punic War，布匿战争，53
Cartledge，R.，卡特利吉，40，42
Caskey，J.，卡斯基，76
Cathars，加尔文教派，274，278，280
Caucasus，高加索，75，111
Central America，中美洲，42
Central Asia，中亚，30，95，112，
ceramics，glazed，精致制陶，219
porcelain，瓷器，39，292，304
Chaldea zodiac，卡尔迪亚王国的黄道十二宫图，18
Champagne Fairs，香槟展销会，89，113，127
charity，慈善，慈善组织，228–9，240，258，261–2，265，278，280，298
classes，各阶层，280
luxury，奢侈，261–6
Charles Ⅱ of Sicilly，西西里的查尔斯二世，76
Chaucer，Geoffrey，杰弗里·乔叟，135
Chayanov，A. V.，恰亚诺夫，106
Childe，Gordon，戈登·希尔德，3，29，47，54，57，71，78，287，289，298，301–2
anthropo –archaeological approach，人类考古学方法，287
social evolution，社会演进，301
China，中国，2，4–5，6n，20–1，29，39，51，73，100，192，194，210，243，290，296，304
agriculture，农业，85，145，150，188
art，艺术127
Book of Songs，《雅歌》，269
botany，植物学，100
bourgeoisie，资产阶级，135–9
bureaucracy，官僚制134–9，142–3
calendar，历法，15，18
capitalism，资本主义，92，94，96，136，138–40，142，182–3，185，
cavalry，骑兵，85，

ceramics，制陶业，294
checks and balances on government，政府制衡，252
clans，宗族，192
clocks，钟表，17
clothing，衣着，185
Communist，共产主义，32，153，
connoisseurship，鉴赏力，296，301，
cuisine，烹饪术，烹饪风格，119，145
diplomacy，外交，96
economy，经济，100，133，136-46，189，286
Empire，帝国，101，241n
European views of，从欧洲的立场出发，137，190
fairs，展销会，197
fashion，时尚，潮流，265
feudalism，封建主义，92，95，109，139-40，143
flowers，鲜花，120，145
gambling，赌博，191
guns，枪炮，17，103
gunpowder，火药，103
Han，汉朝，142
Horseshoe，马蹄铁，81
industry，行业，88
inventions，发明，81
junks，舢板，198
law，法则，134，141-6，241n
Manchus，满族，30
Mathematics，数学，132，134
millennium，千年，13
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玉台新咏》，269
New Year，新年，14
Northern Sung，北宋，88
the novel，传奇，120，132，145，296
Palace Style Poetry，宫体诗
paper，造纸术，66，131-2
philosophy，哲学，23，37，
printing，印刷术，66，86，116，132
religion，信仰，146，153，234
science，科学，9，16，125，128，129n，131-6，138-40，143，145-53，243
script，凭据，32，100
Shang，商朝，88
silk，丝绸，111-12
spur，马刺，81
'static'，僵滞的，118
stirrup，马镫，85
Sung，宋朝，138-9，142-3
Tang，唐朝，59
technology，技术，132，145
textiles，纺织品，88，113
towns，城镇，138-9
trade，商业，114，137-9，142，145，148，198-9，201，300
and universities，大学，150，229，231，297
water-power，水力，81，145
wheelbarrow，独轮手推车，288
world histories，世界历史，13
chivalry，骑士制度，160，262
chocolate，巧克力，184

Christianity, 基督教, 2, 6, 16, 31, 35, 69–70, 72, 116–17, 132, 146, 182, 194, 204, 210, 216, 241, 259, 261, 267–8, 275–80, 295, 298, 301, 303
art, 艺术, 72
buildings, 建筑, 74
calendar, 历法, 14–5
Catholicism, 天主教, 130–1, 182
Christendom, 基督教, 20, 118, 242
Christmas, 圣诞节, 15, 22
cities, 城邦, 74
dissection, 解剖, 72,
dualistic creeds, 二元对立的教条, 277
Easter, 复活节, 15, 22
eastern, 东方的, 73
Europe, 欧洲, 19, 61, 289
feminization, 女性化, 268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276
international calculus, 国际通用的微积分, 22
Jesuits, 耶稣会士, 17, 127, 131
knowledge, 知识, 72, 216, 223, 227–35, 238–9, 245
missionaries, 传教士, 178, 244
Nestorians, 聂斯托利教, 73, 75, 93, 231
New Testament, 新约, 32
papacy, 教皇在位期间, 90
Pentecostal Church, 五旬节教派, 179
Pilgrimages, 朝圣, 19, 144, 197
Protestantism, 新教, 新教徒, 6, 35, 62, 129–31, 153, 171, 182, 207, 235, 293, 299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130
salvation, 救赎, 274
space, 空间, 19
trade, 商业, 75
Turkey, 土耳其, 99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154, 164
city see Towns, 城市, 参考城镇
city-states, 城市国家, 191, 192, 206, 220, 256, 288, 291
civilization, 文明, 154–6, 173, 177, 179, 191, 193, 195, 210
Asia, 亚洲, 183
civilizing process, 文明进程, 169, 171
decivilization, 去文明, 170
norms of civilized behaviour, 文明行为规范, 176
psychical process, 精神进程
class, 阶级, 160, 203, 222–3, 258, 261, 265, 287
conflict, 冲突, 矛盾, 191, 303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下等阶级, 155, 207
cleanliness, bodily, 身体的洁净, 173–4
clocks, 钟表, 15, 17, 21, 116,
candle, 蜡烛, 17
China, 中国, 17
clepsydra, 水漏, 17
clockwork, 钟表机械, 17
Europe, 欧洲, 17

sundial，日晷，17
club，俱乐部，222
Cnossos，诺索斯，31
coal，煤，188，207–8
coke，焦炭，188
cocoa，可可，186
Columbus，Christopher，克里斯多夫·哥伦布，50，118
commenda，合约，198
communication，Modes of，交流方式，3，26，31，33，39，70，86，131–2，195，236，284
technologies of the intellect，思维技巧，33，35，289
see information，knowledge，literacy，printing，writing，参考信息、知识、读写能力、印刷和书写
Comte，Auguste，奥古斯都·孔德，128
Confucius，孔子，32，101，147
Confucianism，儒教，153，162
Constantine，Emperor，君士坦丁皇帝，82，237
Constantine the African，非洲的君士坦丁，226，296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20，68–9，72，74–6，85，87，89，93，104，114，239
literacy，读写能力，217，
university，大学，223
consumption，mass，大众消费，167，263–4
Cordoba，科尔多瓦，76，112，191，220
Coulbourn，R.，库尔本，7，91，292
courtoisie，宫廷礼仪，161
Crete，克里特，27，31，63，115
Crimea，克里米亚，109，111
Crombie，A. C.，克罗姆比，147
Crusades，十字军东征，19，61，75，82，91，113，115，174，230
cuisine，烹饪术，119，200，204
culture，文化，155
concepts of，概念，181，187
consumer，消费者，207
simple，简单，162，176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305
Cycladic culture，西克拉底文化，34
Cyprus，塞浦路斯，31–2，105，115–16
ethnic cleansing，种族清洗，252

Damascus，大马士革，110
Dante，但丁，61，238，276，295
Dark Ages，黑暗时代，21，81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159，242，244
Delft，代尔夫特，39
democracy，acclamation，以欢呼声表决的民主制，251
Antiquity，古典时代，26，33，49–60，77，287，240
Carthage，迦太基，53–4
citizenship，公民权，253
coercion，高压政治，249
'consociational'，联盟的，253
electoral，选举的，240，249n

Europe, 欧洲, 1–2, 9, 13, 117, 126, 127, 163, 245, 265, 289
exclusion, 排外, 253
freedom of choice, 选举自由, 249
full, 完全, 253
Greek, 希腊, 26, 30, 49–60, 253
European 'invention' of, 欧洲"创造"的, 1–2, 9, 13, 256
iron, 铁, 290
majority, 大多数, 249
mass-media control, 大众传媒控制, 255
opinion polls, 民意测验, 251
Phoenicia, 腓尼基, 53
political parties, 政治党派, 251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正确辨别, 253, 259
power sharing, 权力均分, 252
primitive, 初步的, 49
referenda, 普通票, 251
recall, 号召, 251
right to, …的权利, 24
Sparta, 斯巴达, 33
tribes, 部落, 部族, 30, 50
as value, 价值, 245, 247, 249
vote, 投票, 250, 252–3, 255–6
Westminster model, 威斯敏特模式, 249, 256
demographic history, 人口统计史, 281, 299
restraints, 约束, 298
transition, 转换, 过渡, 267, 283
De Quincey, Thomas, 托马斯·德昆西, 128
destruction, modes of, 毁灭模式, 3
weapons of, 武器, 210
see guns, 参考枪炮
dictatorship, 独裁统治, 专政, 163–4, 251–2, 254
authoritarianism, 极权主义, 256
facism, 法西斯主义, 254
dissection, 解剖, 72–3, 226
Dronke, Peter, 彼得·德龙克, 270
Duby, Georges, 乔治·迪比, 267–8
Dun Scotus, 东斯哥特 (1266–1308) 238
Durkheim, Emile, 爱弥尔·涂尔干, 30, 53, 162, 169, 171, 172, 282
school of, 学派, 7n
solidarity, 团结, 162
Dürr, Hans Peter, 汉斯–彼得·丢勒, 158
Dutch Golden Age, 荷兰的黄金时代, 208

East, the 6n: agriculture, 东方农业, 3
civilization, 文明, 3
market, 市场, 71
porcelain techniques, 烧瓷技术, 39
trade, 贸易, 103
and see Asia, East–West, Far East, Near East, 参考亚洲, 东西方、远东、近东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110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20
east–west, 东西方, 2–3, 8, 14, 19, 27, 31, 92

civilizations，文明，263
cuisine，烹饪术，119，132
common development，一般发展，4.8，25，89，100，103，111，118–22，144，150
divergence，分岔，2，67，100，102，119，139，150，210
Europe/Asia opposition，欧亚对立，61
feudalism，封建主义，121–2
flowers，鲜花，120，132
glass，玻璃，120
inequality，不平等，258
interaction，相互影响，6，98，112，296
livelihood dichotomy，生活方式的二元对立，66
marriage，婚配，116
the novel，传奇，132
painting，绘画，120
paper，纸，120
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30–1
renascences，复兴，130
science，科学，132
social differentiation，社会差异，258
silk，丝绸，120
theatre，戏剧，120，132
towns，城镇，215
trade，贸易，95，132，148
'tributary' states，贡赋国，121–2，299
war，战争，106
education and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教育与欧洲文艺复兴，129，148
higher，高等，229–32，234，236，239
Islam，伊斯兰，129，227–30，232，234，236，261，273n，297
schools，中学，127–8，216，223–6，228，231，233，238，245，292，295
schools in medieval Europe，中世纪欧洲的学校，216
stratification，阶层化，259
Egypt，埃及，76，111–12，116，131，189
Muslim Brotherhood，穆斯林兄弟情谊，244
Egypt，Ancient，古埃及，29，31–2，40，54，56，60，64–5，70
Aramaic document，亚拉姆文献，27
flowers，花儿，269
painting，绘画，34
religion，宗教，61–3
statuary，雕塑，34
Elias，Norbert，诺伯特·埃利亚斯，154，170，185，241，268，279，287，299，306
civilizing process，文明的进程，9，125，293，297
figurations，构型，155
Elvin，Mark，马克·埃尔文，88–9，91，132，139，142–3，147，150–2，229，243，265
England，英国，4

colonialism，殖民主义，114–5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87，94
textiles，纺织品，
Britain，Great，大不列颠，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8，16，24，185，197，203，241–4，265
equality，平等，189，240，247，257–9，262，265
fraternity，博爱，246，261
etiquette，books of，礼仪指南，160
Etruscan civilization，伊特鲁亚文明，29
Euclid，欧几里德，134
Eurasia see Asia，East，欧亚，参考亚洲，东方
East–West，东西方
Europe，欧洲
West，西方
Europe，欧洲，1–13，21，158，163，165，187，201，203，286，304–5
alcohol，酒，184
alphabet，字母文字，66
Antiquity，古典时代，49，289
aristocracy，贵族政治，135
bourgeoisie，资产阶级，134–5，190，265，297，299
Eastern，东方，29，58，70
eurocentricity，欧洲中心论，1，4–7，9，32，61，96，100，102–3，126，263
capitalism，资本主义，1–4，6，86，126，128，133，180–11，292–3
cannons，加农炮，104
centralization，中央集权化，96
Christianity，基督教，19，289
civilized，文明的，154–81
clocks，钟表，17
colonialism，殖民主义，13，20–1，168，201，286
commercial revolution，商业革命，131
cuisine，烹饪术，119
democracy，民主制，1–2，9，13，117，126，250–2
dominance，优势，主导地位，5，61，127
economy，经济，38，69，88，92，94
emotions，情感，297，305
family，家庭，126，257
freedom，自由，126
good manners，优雅举止，173，185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1，9，126
invention，发明，184，263
Islam，伊斯兰，61
guns，枪炮，5，66，110，117
love，爱情，9，126，297
mathematics，数学，134
the novel，传奇，120
people，民族，51
philosophy，哲学，23
printing，印刷术，66，86，117，129

renaissance，复兴，8–9，126–7
sails，航海，5，66，117
science，科学，133，135，148–53
sidereal year，恒星年，15，
slavery，奴隶，55
southern，南方，4
space，空间，19
tables and chairs，桌椅家什，185
towns，城镇，9，134，204，215–22
trade，商业，89，110，148
Turkey，土耳其，99
universities，大学，9
values，价值，240–66
and see feudalism，参考封建主义
Evans，Arthur，阿瑟·伊文斯，31
Evans–Pritchard，E.，埃文思–普里查德，50，97，240，282
evolution，social，社会演进，201
exploration，world 'Age of'，世界大探险时代，66，182
European，欧洲的，21，66
Eyck，Jan Van，杨·凡·艾克，126，127n
fairs，展销会，89，113，127，144，196–7
annual，一年一度的，15
family，家庭，3，176
conjugal，夫妇的，257，267
equality，平等，259
Europe，欧洲，126，130
extended，复合的，282
firms，商号，257
inheritance，遗产，119
kin groups，亲属团体，284
kinship，血缘关系，2，4，257，281
lineage society，世袭社会，53，282
nuclear，核心，2，256，281–2
segmentary lineages，171，249，285
siblings，同胞，259
and see marriage，参考"婚姻"词条
Far East，远东，32，57，85–6，103，129
peddler economy，小商小贩的经济，71
fashion，时尚，潮流，185，263–4
class，阶级，265
the economy，经济
status markers，身份标志
Fatamid dynasty，法蒂玛，76
Fernandez–Amersto，F.，费南德兹–阿梅斯托，8，14，20，101，166，182，237，293
Fertile Crescent，新月沃土，29，100
fetishes，偶像，177，178，179
feudalism，封建主义，4，6–7，21，23，28，41，68–98，108，121，126，156，160–1，200，203，291，293，299–300，304–5
and Africa，非洲，91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77–81，128
and capitalism，资本主义，92–3，215，289

and Carolingian period, 卡洛林时期, 81–5
and cavalry warfare, 骑兵战, 85–7
Japan, 日本, 78, 91–2, 94–6
and Middle Ages, 中世纪, 81
military and bureaucratic, 军事和官僚的, 121–2, 134
parcellized sovereignty, 主权分割, 221
towns, 城镇, 87, 215
trade and manufacture, 商业和制造业, 87–91
Finley, Moses, 摩西·芬利, 2, 7, 33–6, 38–40, 42–7, 49–50, 54, 56–8, 65, 71, 79, 287
Flanders, 佛兰德斯, 90, 209
renascence, 复兴, 126
weavers, 织工, 127
Florence, 佛罗伦萨, 20, 73, 75, 113, 127, 134, 204, 239
flowers, 花, 119–20, 301
culture of, 文化, 296
domesticated, 教化的, 300
giving of, 礼物, 284
language of, 寓意, 283
food, 食物, 157, 160, 173, 15, 205, 296, 300
hautes cuisine, 高级烹饪, 301
meat, 肉类, 185
vegetarian, 菜蔬, 185
fork, 餐叉, 161, 164
Fortes, Meyer, 梅耶·福特斯, 50, 282
Fortunate Isles, 好望角, 20
France, 法兰西, 113
aperitifs, 开胃酒, 263
wine, 葡萄酒, 255
Francis of Assisi, St.,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 262
Frank, Gunter, 贡德·弗兰克, 7
Frazer, James, 詹姆斯·弗雷泽, 15
freedom, 自由, 55–8, 117, 165, 170, 178, 179, 190, 192–5, 197, 199, 202, 220, 240, 246 –9, 255, 260, 265, 267, 289
of choice, 选举自由, 256, 283
concept of, 自由概念,
European 'invention' of, 欧洲"创造的", 13, 126
Greece, 希腊, 49, 51, 55–8
towns, 城镇, 221
tribes, 部落, 30
Freud, Sigmund, 格蒙德·弗洛伊德, 62, 156, 164–5, 170, 175, 299
furniture, 家具, 185, 187
furze (for cleansing), (擦屁股的)荆条叶, 175

Gabirol, Ibn, 伊本·盖比鲁勒, 277
Galen, 盖伦, 72, 227, 237
Galileo, 伽利略, 242
gambling, 赌博, 191
Gates, Hill, 希尔·盖茨, 140
Geniza, 《创世纪》, 75
Genoa, 热那亚, 75, 89, 110, 112 –3, 134
gentry, 士绅, 199

Germany，德国，35，37，105
Ghana，加纳，42，155，158，164，170，175，176，179
northern，北部，22，50，51*n*，58–9
and see Bagre，the LoDagaa，参考洛达基的巴格里
Ghent，根特，126
Gibbon，Edward，爱德华·吉本，28，132
Giddens，Anthony，安东尼·吉登斯，284
Glass，玻璃，71，73，120
Gledhill，J.，格利德希尔，41，61–7
globalization，全球化，22，245，302
Gluckman，Max，马克斯·格鲁克曼，58–9
gold，金子，190
Goitein，S. D.，戈伊泰因，74–5，190
Golden Age，黄金时代，22，24
Gondeshapur，高代沙保，231
Gonja，冈加族，50，86
Gordon，Cyrus，希乌斯·高登，63
Granada，格拉纳达，220
Greece，Ancient，古希腊，21–67，95
alphabet，字母文字，5，26–7，35，67
Archaic，古风的，25-6，28，31-4，40，43，45，47
aristoi，有钱人，44
architecture，建筑，26，62
art，艺术，26，34–5，65
Aryan Model，雅利安模式，
and Asia，亚洲，19，100，118
banking，银行业，47
cities，城邦，36
Classical，古典的，33，40，71
colonies，殖民地，44
creation of modern world，现代世界的“创造”，36–7
democracy，民主，民主制度，26，30，49–60，253，297，299
demos，平民，52
Doric invasions，多利安人侵，28
early Semitic colonies，早期闪米特殖民地，54
economy and trade，经济与贸易，26，29，38–48，290
ethnocentricity，种族中心论，5
freedom，自由，49，51，55–8
Greek language，希腊语，26，60–1，63，72，224
Greco–Persian war，希波战争，27，29n
the Greeks，希腊人，19，31
Hellenistic，希腊风格的，希腊化的，46，71–2
Hellenocentrism，希腊中心论，31
and history，历史，27–8
Homeric epics，荷马史诗，32，40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34
iron，铁，36，43，66
Iron Age，铁器时代，47，57，63
lending，放贷，47
literature，文学，文化，34，49，

65, 71
logic, 逻辑, 67
marriage, 婚姻, 45
medicine, 医学, 71–3
merchatile activity, 商业活动, 60,
see Antiquity, 参考古典时代,
military, 军事, 49
polis, 城邦, 26, 40, 52, 54, 134
philosophy, 哲学, 23, 57, 61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 44
rationality, 理性, 34
renaissance of, 复兴, 8, 61, 131, 150
rhetoric, 言辞上的, 37
science, 科学, 67, 71, 146
slavery, 奴隶制, 55–7, 297
space, 空间, 19
translations from Greek, 从希腊过渡, 292
tyranny, 暴政, 专制, 52, 248–9
writing, 文字
and see Antiquity, 参考古典时代
Greenwich meridian, 格林尼治子午线, 20–1
Mean-Time, 平均时, 21
Guantanamo Bay, 关塔那摩湾, 167, 246
Guichard, P., 盖查德, 272–3
guilds, 行会, 194, 201
guns, 枪炮, 102
arsenal, 兵工厂, 201–2, 208, 210, 302
cannon, 大炮, 加农炮, 17, 103–4
China, 中国, 17
and Europe, 欧洲, 5, 66, 110, 117
Islam, 伊斯兰, 102
powder, 火药, 3, 102–3, 292, 302
and Turkey, 土耳其, 102–5

Hadewijch of Antwerp, 安特卫普的哈德威茨, 276
handkerchief, 手帕, 164–5
Hanseatic League, 汉萨同盟, 126–7
Harappa, 哈拉帕, 29
Harrison, John, 约翰·哈里森, 21
Hasbroek, J., 哈斯布约克, 40, 42
Habsburgs, 哈布斯堡, 105
Hassan, Muhammed Khan Ben, 穆哈默德·卡·本·哈桑, 21
Hazm, Ibn, 伊本·哈兹姆, 270
Hegel, G. W.F., 黑格尔, 128
Herodotus, 希罗多德, 60
Herophilus, 赫罗菲卢斯, 72
hierarchy, economic, 经济分层, 162, 197, 200, 202
and India, 印度, 257–9
Hilton, Rodney, 罗德奈·希尔顿, 85, 215
history 'Ages of Man', 人类历史分期时代, 22
alternation, 更迭, 286
change, 变化, 166, 186–7, 189, 191–2, 194, 197, 201
comparative, 比较的, 2, 60, 117
eurocentric, 欧洲中心论, 1, 4–7, 9, 32, 61, 96, 100, 102–3,

126, 136, 291
five-stage theory, 五阶段论, 86, 91, 139
grid method, 网状分析法, 7, 48, 92, 109, 243, 292, 304
linearity, 线性, 23–4
mentalities, 精神气质, 201, 265, 290
periodiztion, 分期, 6, 18, 21–5, 102, 286
teleological, 目的论的, 6, 31, 37, 86, 96, 131, 137–8, 190, 217, 286–7, 293, 305
theft of, 偷窃, 1, 22, 26, 304
world, 世界, 6, 13, 22, 25, 52, 68, 70, 125, 128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53
Hobsbawm, Eric,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17
Hobson, J. M., 霍布森, 5, 6, 8
Holland, 荷兰, 114–15
Hollywood, 好莱坞, 298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117, 242
Hopkins, Keith, 基思·霍普金斯, 41–4, 79, 269
Hormuz, 霍尔木兹海峡, 115
hospitals, 医院, 73
household, 家庭, 185
formation, 构成, 282
home-working, 家庭作坊, 201
mean size, 平均大小, 119, 282
Howard, Deborah, 德博拉·霍华德, 8
humanism, 人文主义, 16, 35, 61, 67, 126–7, 156, 177, 203, 226–7, 233–7, 239–41, 243–4, 265, 274–5, 287
human rights, 人权, 241, 247
Humboldt, Wilhelm von, 威廉·冯·洪堡, 127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127
hunting/gathering, 狩猎/采集, 28, 44–6, 97
Huntington, Samuel, 塞缪尔·亨廷顿, 154
Huxley, T. H., 赫胥黎, 242
Hyksos, 希克索斯王朝, 62

iconoclasm, 偶像破坏活动, 223, 233, 295, 301, 303
India, 印度, 4, 6n, 14, 20–1, 29–30, 48, 51, 92, 120
agriculture, 农业, 85
atheistic thoughts, 无神论思想, 258
Banias, 巴尼亚斯, 145
bhakti, 帕克蒂, 257
castes, 世袭制度, (印度的)等级制度, 192, 222, 253, 258
cotton, 棉花, 4, 39, 88, 98, 294, 303
cuisine, 烹饪术, 119
economy, 经济(状况), 92
hierarchy, 层次, 分层, 257–9
Jains, 蕲那教, 145
kharkhanas, 哈克哈纳斯, 294

Mughal court painting，蒙古宫廷的绘画，283
Mughal period，蒙古统治时期，131，276，283
philosophy，哲学，23，57
renunciation，脱离，257
Sanskritic poetry，梵文诗，270
science，科学
south-west，西南，75
textiles，纺织品，90
trade，商业，贸易，73，75，95，110，114，145，148
untouchables，不可触摸者，258
western，西方，75
world histories，世界历史，13
Indian Ocean，印度洋，111，115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59n，92，97，192，236，256-7，265，267，283
and the collective，集体，256
European 'invention' of，欧洲"创造的"，9，126，240
Sparta，斯巴达，33
and tribes，部族，97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111，114
industry，产业，78
and capitalism，资本主义，45，66，86，96-7，101
factories，工厂，200，202，207-8，248，294
and feudalism，封建主义，88-91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21，129，183，189，207，209-10264，294，300，306
mass production，批量生产，294
mills，磨坊，294
mining，矿业，207
organized，组织起来的，194
and time，时间，17
textile，织物，89
water-power，水力，70-1，188，193，209，294
workshops，工场，294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产业革命，6，8，13，39，56，61，81，91，94，127，130，18，183，187，196，201，201-2，206-8，286-7，298-9，304，306
and England，英国，88，94
and Europe，欧洲，117，125
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22
technology，技术，22
invention，创造，195
innovation，革新，207
Ionia，爱奥尼亚，32
Iran，伊朗，75，104，112
Iraq，伊拉克，51，104，251-2，254-5
iron，铁，36，101，104，188，290
Iron Age，铁器时代，28，30-3，57，63
Neolithic，新时期时代的，23，42，46-7
Isfahan，伊斯法罕，174
Islam，伊斯兰，19，25，31，35，109，174，194，224，258-9，260-1

and ancient science，古代科学
art，艺术，131，218
armies，军队，86
and Asia，亚洲，61
buildings，建筑，74
conservatism，保守主义，守旧，102–3，105，116–17
diplomacy，对外政策，96
and Europe，欧洲，61
expansion，扩张，61，74，82，85，91，99，114
five pillars，五根柱子，19
guns，枪炮，102
headscarves，女人头巾，15
Hegira，回教纪元，14
humanism，人文主义，131，227–38，244
knowledge，知识，学问，16，117，227–38
law，法律，法则，107–8，117018，146
love poetry，情诗，271–6
lunar calendar，月历，15
maps，地图，20
madrasa，马德拉萨，129，227–30，232，236，261，273n，297
markets，市场，71，118
modernization，现代化，55
mosques，清真寺，261，
music，音乐，275
Muslim economies，穆斯林经济，87–8
paper，纸张，131
pilgrimage，朝圣，273
printing-press，印刷出版，116–117
Qu'ran，古兰经，231，238
rationality，理性，16
renaissance，复兴，9，225
Shi' ite，什叶派，56，253
Sunni，逊尼派，51，229
towns and cities，城镇和都市，71，74，118
trade，商业，74，111
waqf，瓦克夫，228–9，232，261，280
women，妇女，55，273，273n
Israel，以色列，19，63，65，249，253
Istanbul，伊斯坦布尔，99，104，109–10，118，135，197
Italy，意大利，3，71，85，91，111
cities and towns，都市和城镇，82，86–7，110
merchant families，商人家族，75
northern，北方，70–1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6，93，127–8，131
southern，南方，71
textiles，纺织品，86，89–90，113
trade，贸易，93，131

Japan，日本，4，164，197–200
and capitalism，资本主义，95–6
courtoisie，宫廷礼仪，269
erotic albums，性爱图册，283
and feudalism，封建主义，78，91–2，94–6

Heian，平安时代，155，166，293
kabuki theatre，歌伎馆，120，132，296
letter-writing，书信体，269
love not a sin，爱不是罪，269
sexual education，性教育，269
Tale of Genji，《源氏物语》，164，166
women and literature，女人与文学，269
Jerusalem，耶路撒冷，19，76
Johnson，Dr Samuel，萨缪尔·约翰逊博士，127
Jones，E. L. 103，琼斯，103
Josephus，约瑟夫，65
Judaeo-Christian civilization，犹太基督教文明，240，288
Judaism，犹太教，19，35，63，116-7，152，182，280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19，61，291
headgear，头饰，15
Hosea，Book of，何西阿书，276
humanism，人文主义，131
the Jews，犹太人，5，19，31，110，130n
law，法，118
monotheism，一神论，146
New Year，新年，14
Old Testament，旧约，31-2，34
Song of Songs，雅歌，270，276，278
trade，贸易，74
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19
justice distributive，司法分配，53，245，259
reciprocity，互惠，189，245
Justinian，Emperor，查士丁尼皇帝，72，82，111，223，227

Kalahari，卡拉哈里，44-5
Kanesh，卡尼什，47-8
Kant，Immanuel，伊曼纽尔·康德，155
Kantian，康德哲学，163
Katsumi，Moritani，森谷胜见，134n
Kennedy，P.，肯尼迪，103
Khaldun，Ibn，伊本·赫勒敦，3，30，50-1
Knights，younger sons of，骑士的小儿子，268
knowledge and Christianity，科学和基督教，71
Islam，伊斯兰，16
revolution，革命，55
systems，体系，制度，3，66，84，100，131，133，146-8，289
Knossos，诺索斯，62
Kondriateff cycle，康德拉杰夫循环，204
Kropotkin，Peter，彼得·克鲁泡特金，53
Kubla Khan，忽必烈，150
K'ung San（Bushman），桑族（丛林人），44-5

labour，劳动力，188，202
division of，分工，162，168

power，权力，193
Landes，David，大卫·兰德斯，183
land-tenure，土地所有制，106-9，117，285
contracts，契约，144
communal，群体的，7
dependent，依赖的，292
hierarchy of rights，权力分层，7，108
languages African，非洲语言，61
Afro-Asiatic，亚非的，27，60
Arabic，阿拉伯的，32
Aramaic，阿拉姆，32
Aryan，雅利安，27，31
Catalan，加泰隆尼亚，274
Coptic，歌普特的，27
Far Eastern，远东的，57
Greek，希腊，26，60-1，63，72，224
Hebrew，希伯来，32，57
Indian，印度，31
Indo-European，印欧语系者，26-7，32，60-1
Indo-Hittite，印欧-赫梯人，60
Latin，拉丁，20，57，65，295
and Nazis，纳粹，27
Near Eastern，近东的，57
Phoenician，腓尼基的，63-4
Proven?al，普罗旺斯的，274
Semitic，闪米特族的，闪米特语的，27，31，60，63-4
Ugaritic，乌加里特，63，289
Larsen，M.，拉森，41，46-7
Latini，Brunetto，布鲁内托·拉蒂尼，238，296
law，法律，法则，58-9，96-7，117-18，164，198，223
faculty of，（大学的）系别，226
property law，财产法，107，144
sumptuary，限制奢侈的，265
Laslett，Peter，彼得·莱斯利特，2，257，281-2
Lebanon，黎巴嫩，54，63
Lenin，Vladimir，弗拉基米尔·列宁，32
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73
Lepanto，Battle of，勒潘多战役，91，100，202
Levant，黎凡特，60，62，65，70，110
Lévi-Strauss，Claude，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282
Lévy-Bruhl，Lucien，吕西安·列维-布留尔，128
Lewis，Bernard，伯纳德·刘易斯，25，55，117
Lewis，C. S.，勒韦斯，268，274
light galleys，引航舰，202
literacy，文化，读写能力，3，14，32，35，70n，195
and credit，信誉，142
and feudalism，封建主义，216
Greek，希腊，23，52
and reflexivity，自反性，52，284
law，法律，58
literate society，文字社会，295
literati，文人，199

and Protestantism，新教，131
and renaissance，复兴，128
and sentiment，多愁善感，284
and space，空间，19
unversalism，普世主义，280
literature and poetry，Arab，阿拉伯的文学和诗歌，224
canzone，组诗，271
comparative study，比较研究，305
courtly，宫庭的，160，270，273
laureate，桂冠，236
love poetry，情诗，268–80，284，298
narrative fiction，叙事小说，295
oral，口头的，284
prosody，韵律学，273
romantic，罗曼蒂克的，274
sonnet，十四行诗，271
wandering poet，吟游诗，271，273
written love poetry，写情诗，284
Lloyd，G. E. R.，劳埃德，171n
LoDagge，the，洛达基，178，179，264
Bagre，巴格里，23，37，245，280
Djanni，雅尼人，23
land property，土地财产，59
social structure，社会结构，50
time，时间，22–4
Lombardy，伦巴第，75–6，89
London，伦敦，93，113，134
City of，城市，90
Love，爱情，257–8，261，267–85
absence and distance，缺席和疏离，268–9
agape，阿加坡，博爱，友善之爱，278
Ancient Egypt，古埃及，269
carnal，肉体的，肉欲的，277，280，283
celibacy，独身，277
conjugal，夫妇的，281
congruent，适合的，284
courtly，宫廷的，268，270
courtly poetry，宫体诗，270，273
desire，欲望，277
ecstasy，沉迷，275
eros，厄洛斯，性爱，278
European ‘invention’ of，欧洲“创造的”，9，126，297
family，家庭，259
fraternal，博爱的，258，267，277–8
ideology，意识形态，280
and imperialism，帝国主义，285
invention of，创造的，171
and Islam，伊斯兰，271–6
language of flowers，花语，283
love letters，情书，285
love lyric，爱情抒情诗，270，298
metaphor，隐喻，275
parental，父母的，281
platonic，柏拉图主义的，278
puritanism，清教，269
rhetoric，花言巧语，280
romance，罗曼司，270，283
renunciation，脱离，277
and social hierarchy，社会分层，275

Sufism，苏菲主义，（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275
Love，J. R.，拉夫，57
Lucca，卢卡，88-9，94，113，113n，135
luxury，奢侈，113，167，186，190
ambivalence，双重性，262
and charity，慈善，261-6
and mass consumption，大众消费，263-4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社会分化，263

Machiavelli，Niccolo，尼古拉·马基雅维里，99
machine age，机器时代，208
Madeira，马德拉，115
Maimonides，迈蒙尼德，277
Maine，Herry，赫里·梅因，7，59，108
Makdisi，G.，马克第锡，226
Malabar，马拉巴尔海岸，74-5
Malinowksi，Bronislaw，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58，282
Malthus，Revd Thomas，雷维德·托马斯·马尔萨斯，167，298
Malthusian approach，马尔萨斯手段，281
management，管理，202
manners，礼仪，157，159-60，164，167，173
Mannheim，Karl，卡尔·曼海姆，157
maps，地图，21
Babylonian，巴比伦的，21
Greek，希腊，21
and history，历史
Islam，伊斯兰，20
latitude，纬度，20-1
longitude，经度，20-1
Mercator projection，墨卡托的设计，20
Roman，罗马，21
Market，the，市场，2，4，121
Africa，非洲，41，45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26，41-2，44-6，48
and bourgeoisie，资产阶级，135
and capitalism，资本主义，4，6，41，45，67，114，122，128，217
eastern markets，东方市场，71
and landlordism，地主所有制，95
local，当地的，15
mercantile activity，商业活动，5-6，21，38，46-7，74，76，114，144-5，220，292
mercantile culture，商业文化，301
Near East，近东，74
Neolithic，新石器时代，42
and ports，港口，46-7，56
primitive economies，“原始的”经济（状况），44
and European Renaissance，欧洲文艺复兴，127，129
societies，社会，45
and sugar，糖，116
marriage ancient Greece，古希腊的婚

姻状况，45
arranged，包办的，267，283
brideprice/bridewealth，聘礼/聘金，4
concubinage，纳妾，272
divorce，离婚，283
dowry，嫁妆，4，119，282
Eurasian，欧亚的，119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欧洲婚姻模式4，282
'favourite' wife，宠妾，272
harems，后宫，妃嫔，272，283
late，晚期，281
match，门当户对，285
monogamous，一夫一妻的，279
polygynous，一夫多妻的，
serial，连续，272
woman's property complex，妇女财产体制，119，282
Martel，Charles，查理·马特，85
Marx，Karl，卡尔·马克思，2，38，45，47，48，59，84，92，96-7，100，136，143-4，157，161-2，183-4，199，207-8，220，292
labour，劳动，
pre-capitalist systems，前资本主义制度，217
and towns，城镇，217，222
Marxism，马克思主义，56
historians，历史学家，78，107-8，136，138-40，142-3
McDermott，Joe，乔·麦克德莫特，138n，139n
Mecca，麦加，19
mechanization，机械化，207，209-10
Carolingian，卡洛琳，87
classical texts，古典作品，73
Medicis，美第奇家族，75，90，126
Cosimo de Medici，科西莫·迪·美第奇，239
Mediterranean，地中海，3，9，26，82，102，104，110-11，118，189，217，219，224，233
agriculture，农业，80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26，28-9，33，40，43，57，61，63-5，99，109
Eastern，东方的，20，25，28，60，63-5，68，71，73，80，82，87，115
mercantile activity，商业活动，21，26，29，43，75-6，87，91，94，110，114，198，206，209
Mehmed the Conquer，征服者穆罕默德，111
Memling，Hans，汉斯·梅姆林，126
Mencius，孟子，37，262
Mennell，Stephen，斯蒂芬·孟奈尔，157-8
mentality，'primitive'，原始精神，171-2
Mercatantia，商业，218
Mercator，Gerardus，杰拉德乌斯·墨卡托，20
merchant adventurers，商业冒险家，205
merchant companies，商贸公司，203

Merovingians，墨洛温王朝，68
Mesopotamia，米索不达米亚，29，32–3，40–2，46–7，50–1，54，60，142
Mezzogiorno，意大利南部地区，209
Michael Angelo，米开朗琪罗，43
Michelet，Jules，朱利斯·米什莱，127
Middle Ages，中世纪，16，19，36，38，46，61，68，72，148
  agriculture，农业，80
  early，早期，80
  feudalism，封建主义，81–2，86–91
  later，晚近，99
  parliament，议会，221
Milan，米兰，73
Mill，James Stuart，詹姆斯·斯图亚特·密尔，128
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米诺–迈锡尼文明，29–32，34，56，62，64，287
Minz，Sidney，辛迪·明茨，79，116
modernization/modernity，现代化/现代性，21，45，55，117，126，128–9，132，135，156，160–1，183，192–3，234–5，241，260，267，280–1，294，297，299，302–3，305
  and modern science，现代科学，223，229
  and towns，城镇，215，221–2
Mommsen，Theodor，西奥多·蒙森，45，59
money，货币，188，168，174，205，255
  money–changing，货币兑换，194
  paper，纸币，189
Mongols，蒙古，104，111，113
  invention of bridle，马嚼子的发明，188
  khan，可汗，197
monopolies，垄断，205
Monte Cassino，蒙特·卡西诺，296
Montesquieu，Baron de，巴龙·德·孟德斯鸠，99，183
Montpellier，蒙比利埃，73，296
Moor，the，摩尔人，99，115，130*n*
morals moral density，道德密度，162
  relaxation in，缓和，169
Morgan，L. H.，摩尔根，183，298
Morocco，摩洛哥，82
  Jews，犹太人，110
Mossé，C.，摩西，46
Muhammad，默罕默德，61
Moscovy，莫斯科维，110
Muzuris，莫泽里斯，75
myth，迷思，神话，13，35，60，187，245
  Creation myth，创造神话，62

Naples，那不勒斯，75
national debt，国债，206
naturvolk，自然民族，156，158–9，164–6，169–71，175，178–9
Nazism，纳粹主义，158，165，170
Near East，近东，8，17，55–6，71，75，85–6，89，93，97，

100, 103, 110, 112 -24, 132, 135, 224, 295, 298
Ancient, 古代, 27, 29–31, 33–6, 38–41, 46–7, 51, 57, 61, 70, 88, 118
bazaar economy, 杂货铺经济, 71
cuisine, 烹饪术, 119
Islamic, 伊斯兰的, 109, 117, 148, 216
Nechao's Canal (Suez), 苏伊士的内沙奥运河, 189
Needham, Joseph, 李约瑟, 9, 16n, 18, 23 –4, 67, 67n, 91, 100, 104, 109, 121, 125, 128–43, 145–9, 228, 233, 243, 263, 297
and 'the Needham problem', 李约瑟难题, 125, 133–4, 148–53
Nef, J. U., 内夫, 207
Nehru, J., 尼赫鲁, 92
Nelli, R., 内利, 274
Nuer, the, 努尔人, 58, 97
Nizam (Harmony), (纯情的) 妮扎姆, 276
Normans, 诺曼人, 115
Anglo-Norman courts, 盎格鲁-诺曼朝廷, 268

Oedipus, 俄狄浦斯, 64, 259
Omar, Caliph, 哈里发奥马尔, 243
Oppenheim, A. L., 奥本海默, 40, 51, 290
orality, 口述文化, 33
Arica, 非洲,
calendar, 历法, 14–15
poetry, 诗歌, 284
time, 时间, 13, 23
Ovid, 奥维德, 270

Pacific trading network, 太平洋商业网, 56
paganism, 异教, 异教徒, 异教信仰, 16, 147, 155, 174, 223, 227, 232–3, 241, 295
and see Antiquity, Greece, Ancient Rome, Ancient, 参考古典时代、古希腊、古罗马等词条
Palermo, 帕勒诺, 135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0, 65, 112, 115, 252
Hamas, 哈马斯, 254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253
right to return, 回乡的权利, 252
Palmyra, 帕米拉, 70, 73, 80
paper, 纸, 纸张, 造纸术, 22, 33, 66, 86, 120, 131–2, 174–5, 226, 263, 292–4, 297, 302
Arabs, 阿拉伯人, 66
Chinese, 中国人, 66, 131–2
east–west, 东西方, 120
Islam, 伊斯兰, 131
money, 纸币, 189
paper–making, 造纸术, 209, 235
toilet, 手纸, 174
and Turkey, 土耳其, 102
parcellized sovereignty, 分散的主权, 200, 216, 220–1
Paris, 巴黎, 113

parliament, medieval, 中世纪的议会, 221
Parma, 帕尔马, 75
Parsons, Talcott, 塔尔科特·帕森斯, 50, 156, 166, 172, 181
Passerini, Louisa, 路易萨·巴瑟里尼, 267n,
pastoralism, 田园诗, 28
Pater, Walter, 瓦尔特·佩特, 127
peasant revolt, 农民起义, 199
peat, 泥煤, 208
peddling, 行商, 71, 198
Pera, 佩拉, 89
Persepolis Elamite document, 波斯波利斯的埃兰文献, 27
Persia, 波斯, 20–1, 27, 73, 86, 100, 111–13, 115, 131
Persia Gulf, 波斯湾, 114
Petrarch, 彼得拉克, 16, 236, 242n, 245
Phoenicia, 腓尼基, 27, 32–4, 43, 54, 60, 63–5
  alphabet, 字母文字, 63–4, 100
  democracy, 民主, 53–54, 288
  writing, 写字, 27, 32–4, 65, 291
Philip the Good, 腓力大帝, 126
philosophy, 哲学, 23, 227
  European 'invention' of, 欧洲"创造的",
  faculty of, (大学的) 系别
  free-thinkers, 自由思想家, 241n
  Greek, 希腊的, 23, 57, 61
  Indian, 印度的, 23, 57
  Roman, 罗马, 61
Phule, Mahatma, 印度圣人普莱, 258
Pirenne, Henri, 亨利·皮浪, 296, 301
Pisa, 比萨, 134
Plato, 柏拉图, 225, 239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147, 295
Poitiers battle of, 普瓦泰战役, 85
Polybius, 波里比乌斯, 53
Polyani, Karl, 卡尔·博兰尼, 38, 41–4, 46–9, 303
Pomeranz, K., 彭慕兰, 7, 92, 168, 209
Portugal, 葡萄牙, 114
Postan, M. M., 波斯坦, 68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57
poverty, 贫穷, 261–2
Prato, 普拉托, 75, 89–90
printing, 印刷术, 6, 33, 55, 66, 86, 117, 129, 189, 235, 297, 302, 304
  and the alphabet, 字母文字, 86, 129, 132
  the book, 书籍, 22
  andChina, 中国, 66, 86, 116, 132
  printing-press, 印刷出版, 116–17, 236, 132
  and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132
production, modes of, 生产方式, 3, 45, 69, 70n
  Ancient, 古代, 28, 39, 45, 48, 66
  Asiatic, 亚细亚的, 28
  collective, 集体的, 205
  cottage, 村舍, 206, 208
  mass production, 批量生产, 208,

210–11
progress，进程，23–6，70n，157，159，172，181，185–7，199
property and church，教会财产，221，301
pyschogenesis，心理生成，156，162 –3，165
Ptolemy，托勒密，20，237

Radcliffe Brown，A. R.，拉迪克利夫–布朗，7n，53
Rahman–al，Abd，阿卜杜–拉赫曼，112
rationality，理性，4，181，204
Europe，欧洲，240
ancient Greece，古希腊，34
dialectic，辩证的，230–1
Islam，伊斯兰，16
logic，逻辑，204，240
Revello，拉维罗，75–6，219
reciprocity，互惠，164–5
negative，消极的，170
Red Sea，红海，75，114
Red River Valley，黄河流域，29
reflexivity，自反性，172
Reformation，the，宗教改革，16，21，130，133，182，204，240
regression，衰败，170，173
religion，宗教，信仰，16，20，50，62
Abrahamistic，亚伯拉罕的，224，233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60–4
asceticism，禁欲主义，262
alternative views，不同看法，243
and *chastity*，贞洁，262
fundamentalism，正统派基督教，242，251
hegemonic，霸权的，223，233，296–7
local gods，地方神，176
monotheism，一神论，62–3，242
cult obsolescence，仪式荒废，263
plurality of belief，多重信仰，241，243
polytheism，多神论，243
and poverty，穷困，262
priesthood，神父，牧师，257–8，262
sacrifice，牺牲，祭品，176–9
shrines，神龛，264
and see Buddhism，Christianity，*Confucius*，India，Islam，Judaism，Myth，参考佛教、基督教、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神话等词条
renascences art，复兴的艺术，126
Byzantine，拜占庭，9
Carolingian，卡洛琳，87
and early mordern periodization，近代早期，130
education，教育，129
European Renaissance，欧洲文艺复兴，1，8–9，16，21，25–6，35，43，61，67，72，78，81，90，95，117，120，125–53，156，161，173，177，182，187，227，235，238 –9，

244, 292–3, 296–7
Flemish, 佛兰德, 90, 126
Islam, 伊斯兰, 9, 243, 295
and literate cultures, 文字文化, 128
literature, 文献, 274
mercantile activity, 商业活动, 127, 129
Renaissance Bazaar, 文艺复兴时代的杂货市场, 295
and science, 科学, 132–3, 296
revolution, 革命, 249
constrast with rebellion, 与反叛相比, 249
Rhazis (al-Razi), 拉兹, 73
Riccardo, David, 大卫·里卡尔多, 209 (正文中有c)
rice, 水稻, 188
Ricci, Mateo, 利玛窦, 131
risk, 冒险, 191
Robin Hood, 罗宾汉, 50
Robinson Crusoe, 鲁宾逊·克鲁索, 97, 257
Roger II of Sicily, 西西里的罗杰二世, 93, 113
Rome, Ancient building, 古罗马的建筑, 80
and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38, 79, 97
child sacrifice, 用小孩作祭品
cities, 城市, 36
democracy, 民主, 53
economy, 经济, 69–70, 84, 100
Empire, 帝国, 30, 68, 70–2, 74–5, 77, 79, 81–2, 95, 100, 107, 110–11, 132, 191, 249
farming, 农业, 70, 78–9
and history, 历史, 27–8
irrigation, 灌溉, 40, 70
latifundia, 大庄园, 69–70
Latin, 拉丁, 20, 57, 65, 295
medicine, 医学, 72–3
philosophy, 哲学, 61
Punic War, 布匿战争, 53
renaissance of, 复兴, 9, 15
republic, 共和的, 249
roads, 驿路, 84
Romans, 罗马人, 5, 46, 97
slavery, 奴隶, 奴隶制, 55, 58, 70
water, 水力, 70, 84
Rostow, W. W., 罗斯托, 208
Roszak, T., 罗斯扎克, 146
Rotterdam, 鹿特丹, 134
Rougemont, Denis de, 丹尼斯·德·鲁日蒙, 268, 270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27
Rufolos, House of, 鲁菲洛的建筑, 76
Rumi, Jalauddin, 贾劳丁·鲁米, 275
Russia, 俄国, 87, 106, 111

Salerno, 萨勒诺, 75, 113, 226, 229, 296
salt merchants, 盐商, 199
Saracens, and Trade, 萨拉逊人和商业
Sao Tomé, 圣多美, 116
scpticism, 怀疑主义, 16, 127,

171, 245
science, 科学, 125–53, 302
Arab, 阿拉伯, 87, 22
botany, 植物学, 100, 133
and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133
and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33
Chinese, 中国人, 9, 16, 18
compass, 指南针, 292, 302
Greek, 希腊的, 67
Islamic, 伊斯兰的, 229, 302
laws, 法律, 181
modern, 现代, 18, 24, 67n, 128–9, 131–3, 135, 140, 147–53, 223, 229, 297, 305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革命, 8, 18, 296
Scotland, clans, 苏格兰的部落, 51
secularization/ secularity, 世俗化/世俗性, 15, 24, 116, 131, 166, 222, 230, 239, 241–2, 275, 277, 295, 297
dischantment of the world, 世界的祛魅, 181, 243
teaching, 教学, 232–4
Serabit el-Khadim, 西拉比卡迪, 62
Setton, K.M., 瑟顿, 103
Seville, 塞尔维亚, 112, 238
sex, 性爱, 278, 283
ambivalence, 双重并存, 278–9
guilt, 罪恶感, 280
lust, 色欲, 284
renunciation, 脱离, 280
shame, 羞耻感, 279
Shelley, Percy Bysshe, 珀西·比希·雪莱, 127
shrine, 神龛, 神殿, 177–8
Sicily, 西西里, 71, 79, 99, 113, 115, 186, 219, 237, 271
Sidon, 西顿, 63
silk, 丝绸, 87–9, 93–4, 97–8, 102, 111, 120, 131, 189, 206, 209, 264–5, 292, 294, 301, 304
reeling, 卷轴, 300
Silk Route, 丝绸之路, 144
and Turkey, 土耳其, 111–14
'simple' societies, 简单社会, 45, 164
acephalous, 无首领的, 49, 170, 291
bandits, 强盗, 51
clans, 部落, 51
colletive, 集体的, 284
early society, 早期社会, 285
primitive communsim, 原始共产主义, 46, 284, 297
primitive society, 原始社会, 45, 172
segmental, 分散的, 52
Singer, Charles, 查尔斯·辛格, 72
Slade, Sir Adolphus, 阿道夫·斯雷德爵士, 105, 260
Slavs, 斯拉夫人, 85
slavery, 奴隶制, 奴隶, 55–8, 79, 101, 248, 260
Africa, 非洲, 115–16
Antiquity, 古代, 古典时代, 7, 26, 29, 55–8, 66, 69, 78, 93

slave-girls，奴隶女孩，277
slave societies，奴隶社会，290
Snodgrass，Anthony，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43
soap，肥皂，163
socialism，社会主义，32
regimes，政权，96
society，courtly，宫廷社会，170
sociogenesis，社会生成，155-6，158，160，162，165，171
sociology，社会学，50，59n
figurational，构型的，158
historical，历史的，157
of states，……的国家，156
synchronic，断代的，166
Sombart，Werner，维尔纳·桑巴特，191，198，264
South Africa apartheid regime，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252
Southall，Aidian vii，艾迪安·索萨尔，28，69
eastern and western towns，东西方的城镇，222
Southern，R. W.，萨瑟恩，237
Soviet Union，economic historians，苏联，经济史学家，57，68
space，空间，19-21，286
continents，大陆，19
Christianity，基督教，19
European，欧洲，19-20，239
and history，历史，13
and literacy，读写能力，19
and see maps，参考“地图”词条
time，时间
Spain，西班牙，85，99，105，113，127
Catalan traders，加泰隆尼亚商人，
Christian，基督徒，110
Golden Age，黄金时代，16
Hispano-Magrebian culture，希伯来-马格里布文化，16
Islamic，伊斯兰的，
southern，南方的
Sparta，斯巴达，33，64
spices，香料，87，95，103，127，185，190
and Turkey，土耳其，114-16
Staplers，商站公司，205
state，the，国家
controls，控制，159，164
formation，形成，158-9，168，171
modern，现代，203
‘primitive’ states，“原始的”国家
tributary，进贡，210
Strayer，J. R.，斯特劳约，68
structure，social，社会结构，171
and personality structure，人格结构，172
Sudan，苏丹，3，97
Sufism，苏菲主义，275
Mevlevis，毛勒维斯教，275
tarikats，塔利卡提，275
sugar，糖，糖类，115，185，263
Sumeria，苏美尔人，56
super-ego，超我，163，176-7
Sylvester Ⅱ，Pope，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296

Syria，叙利亚，63，65，73，75–6，82，104，112–13

Tabriz，塔伯利兹，112
Taiwan，台湾，59
Tandy，D. W.，坦迪，44–6
tea，茶，184，186
  ceremony，仪式，173
textiles，纺织品，87–90，95，97–8，112–13
  cotton，棉花，183，
  mechanization，机械化，113
  putting-out systems，生产体系，304
Thapar，Romila，罗米拉·哈帕，51，
Thebes，底比斯，
Theophrastus，提奥弗拉斯特，133，224
Thera，锡拉岛，62
Third World，第三世界，22，207
Thirty Years War，三十年战争，105
Thomas，St.，圣托马斯，75
Tikrit，提克里特，247
time，时间，14–18，168，286
  African，非洲的，17
  calendar，历法，14–15，18，24
  circular，循环的，18，23
  cosmic，宇宙的，18
  and history，历史，13
  and industry，产业，17
  linear，线形的，18，23–4
  millennium，千年，13
  and orality，口述文化，13，23
  and writing，文字，13–15
  and see clocks，参考“时钟”词条
  space，空间
tobacco，烟草，186
Tocqueville，Alexis de，阿雷克西·德·托克维尔，277
tolerance，kuanrong，241
Tolstoi，Alexis，托尔斯泰，277
towns and cities，agro-city，乡镇与都市，农业城市，222
  anonymity，匿名，221，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28，33，36，70
  Asia，亚洲，300
  bourgeoisie，资产阶级，302
  and capitalism，资本主义，190–6，215
  cathedral cities，教会城市，71
  class conflict，阶级矛盾，303
  culture of cities，都市文化，154，156，161
  Italian commune，意大利共和国，182，215，220，299
  early urban societies，早期城市社会，182，215，220，299
  east-west，东西方，42
  and feadualism，封建主义，87，93，97
  eastern European，东欧，82
  eastern Miditerranean，地中海东部，71
  economy，经济学，4，38，72
  and Europe，欧洲，110，134，292
  European ‘invention’ of，欧洲“创造的”，9，126，297–8

holy cities，神圣城市，19
and inequality，不平等，221，
and innovation，革新，303
Italian，意大利，82，86–7
Islamic cities，伊斯兰城市，71，117
luxury，奢侈，300
mercantile urban culture，商业城市文化，296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47
Near East，近东，86
parcellization，割据，96
ports of trade，贸易港口，303
religion，宗教，74
supply problem，供给问题，218
Turkey，土耳其，106
urban construction，城市结构，290
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67，69
urbanization，城市化，8，220，222
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6，29，69，100–1，121，128，130，135，137
Villes Franches，“城市公民权”，193
walled towns，有墙围起来的城镇，206
and see city–states，参考“城市国家”词条
trade，贸易，56，74–5，97
Arican，非洲，75
and Antiquity，古典时代，26，29，38–48
artisanal，技术的，
and Asia，亚洲，75，103，115
and China，中国，114，137–9，142，145，148
and Christianity，基督教，75
east–west，东西方，95，132，148
exchange，交换，189
and feudalism，封建主义，87–91
and Greece，希腊，26，29，38–48，290
and India，印度，73，75，95，110，114，145，148
and Islam，伊斯兰，74，111，115
and Italy，意大利，93，131，218
long–distance，长途，191，193，194，196，198，200
Ottoman，奥斯曼土耳其，102，109–18
reciprocity，互惠，203
and towns，城镇，4，38，72，296，303
and 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27，129，132
and Venice，威尼斯，75，93，109–10，115，218，296，299
and see market，the，参考“市场”词条
traditional societies，传统社会，183，186
authority，典据，168
Trevor–Roper，Hugh，休·特雷弗–罗伯，1–3，19
tribe，the: and Antiquity，古代的“部落”，28–9，31
Aryan，雅利安，28

as 'barbarian', 像蛮人, 29, 304
Bedouin, 贝都因人, 30
Berber, 柏柏尔人,
democracy, 民主, 30, 50
Doric, 多利安, 30
economy, 经济, 28
freedom, 自由, 30
Germanic, 日耳曼的, 28, 30, 77, 85, 97
Indian, 印地安的, 51n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97
Manchu, 满族, 30
misleading concepts, 错误概念, 2, 28
North African, 北非的, 30, 51
solidarity, 团结, 30
historical stage, 历史阶段, 86
Timurids, 铁木尔,
troubadour, 吟游诗人, 267-8, 270, 273-4, 278-80, 297
poetry, 诗歌, 284, 296
troubaritz, 女吟游诗人, 269
Tswana, 茨瓦纳法, 58
Tunis, 突尼斯, 75
Tunisia, 突尼斯国家, 64, 76
Turkey, 土耳其, 7, 17, 75, 87-8, 91, 93-4, 98-122
agriculture, 农业, 102, 106
and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04
and Europe, 欧洲, 102
feadualism, 封建主义, 7, 106, 108
government, 统治, 102
guns, 枪炮, 102
Iznik tiles, 伊兹尼克瓷砖, 88
Janissaries, 苏丹禁卫军, 105
law, 法典, 107-8, 117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104-5, 108-10, 112, 118
silk, 丝绸, 111-14
technology, 技术, 103, 105
peasants, 隶农, 106-9
and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欧洲文艺复兴, 129
slavery, 奴隶制, 106-9
spices, 香料, 114-16
'static', 僵滞的, 116-18
towns, 城镇, 106
trade, 贸易, 102, 109-18
Tuscany, 托斯卡纳, 90
Tylor, E. B., 泰勒, 181
Tyre, 提尔, 54, 63-5, 288

Ugarit, 乌加里特, 63, 65
underwear, 内衣, 174
United Nations, the, 联合国, 22, 254
Security Council, 安全理事会, 254
veto, 否决权, 254
university, 大学, 228, 234, 239
Bardas, 巴德斯, 225, 227
European 'invention', 欧洲"创造", 9, 126, 297
and Islam, 伊斯兰, 129
interdenominational, 派系间的, 238
and 'modern science', "现代科学", 150
Western, 西方, 215, 220, 292
Upper Volta, 上伏塔, 42

Volta River Dam, 伏塔河大坝, 176

Valley of the Kings, 帝王谷, 31
Valensi, Lucette, 吕塞特·瓦伦西, 100
values, 价值观, 240–66
  human values, 人类价值观, 244, 261, 265
  universalistic, 普世的, 247
  and see democracy, equality, freedom, humanism, human rights, individualism, justice, religion, tolerance, 参考民主、平等、自由、人文主义、人权、个人主义、正义、宗教、宽容等词条
Vandals, 汪达尔人, 73
Venice, 威尼斯, 103, 111, 113, 134–5, 201–2, 204–6, 296, 301
  Arsenal, 兵工厂, 104
  commodities, 日用品, 4
  trade, 贸易, 商业, 75, 93, 109–10, 115, 218, 296, 299
Vico, Giambattista, 詹贝斯蒂塔·维柯, 127
Vikings, 维京人, 50
Voltaire, 伏尔泰, 241

Wallerstein, Immanuel,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43–4, 183, 194, 207, 260, 300
  war, 战争, 251
  cavalry, 骑兵, 85–7
  prisoners of, 囚犯, 246
Ward-Perkings, B., 沃德-伯金斯, 71
water-mill, 水力磨坊, 188, 193
water power, 水力, 209
water wheels, 水车, 70–1
Watt, Ian, 伊恩·瓦特, 35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2, 15, 38, 45, 49, 59, 130, 134, 136, 138–9, 144, 157–8, 161–2, 167–9, 173, 178, 180–4, 190, 192, 198–9, 210, 293, 298, 300, 303
  Asian cities, 亚洲城市, 219
  and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215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世界祛魅, 181–2
  objectivity, 客观性, 22
  Protestant ethnic, 新教伦理, 180, 293, 299, 305
  value-orientation, 价值取向, 181n, 182
West, advantage, 西方的优势, 86, 125–6, 299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20, 286, 291
  economy, 经济, 46, 72
  exceptionalism, 例外论, 66, 84, 91–2
  freedom, 自由, 56
  rise of, …的兴起, 114
  and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70
  towns, 城镇, 70
  trade, 商业, 110

westernization，西方化，244–5，302
world domination，世界统治，286
world history，世界史，68
and see East–West，Europe，参考“东西方”、“欧洲”等词条
West Indies，西印度群岛，20
West Semites，西闪米特人，54，64–5
Weyden，Roger Van Der，罗吉尔·凡·德·维登，126
White，Lynn，林恩·怀特，81，84
Wickham，C.，维克曼，77
Wilberforce，Bishop，威尔伯福斯主教，242
Winckelmann，J. J.，温克尔曼，127
windmill，风车，188
Wittfogel，Karl，卡尔·魏特夫，136，140
Wolf，Eric，埃里克·沃尔夫，79，101，116，121，299
wool，羊毛，87–90，110，112–13，116，127，209
women，Andalusia，安达卢西亚的妇女，272
and democracy，民主，248
education，教育，272
gift–exchange，礼物交换，273
and Islam，伊斯兰，55，273，273n
Jewish，犹太族的，271
liberation，解放，279
and literature，文学，269
male oppression，男性压迫，55
mystics，神秘主义者，276
poets，诗人，271–2
veiling，面纱，272
workshop，车间，200
Wrigley，Anthony，安东尼·里格利，206–7
writing，文字，3，32，290
Chinese，中国的，32
Eguptian，埃及的，32，62
and Eurasia，欧亚，14
and distance，距离，284
Greek alphabet，希腊字母，5，26–7
invention，创造，287
linear A and B，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32
logographic，语标的，32–3，100
memory，记忆，231
Mesopotamian，美索不达米亚，32
Minoan–Mycenaean，米诺–迈锡尼，27，32，62
papyrus，纸草，291，294
parchment，羊皮纸，294
post–Antiquity，后古典时代，71
Phoenician，腓尼基的，27，32–4，65
syllabic，音节的，33
and time，时间，13–15
and 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101
and see alphabet，literacy，paper，printing，参考字母文字、读写能力、造纸术、印刷术等词条，

Xerxes，薛西斯，27

16，131，236，244，277
Yalman，Nur，努尔·雅曼，257，260，275
Zafrani，Haim，哈伊姆·扎法拉尼，16，131，236，244，277
Zambia，赞比亚，58–9
Zan，L.，赞，104
ŽiŽek，Slavoj，斯拉文尼亚·齐泽克，49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44CK5YG356qD5Y6G5Y+y44CLXzEyMjAzMzI4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077\u7a83\u5386\u53f2\u300b_12203328.zip",
  "filesize": 27575657,
  "md5": "4de71a9510ceaa6661a228dc19cebedb",
  "header_md5": "69508de05822b4a4fe8c8124ffa70e51",
  "sha1": "d35b510d606a759eddeff91867ccf37931d21500",
  "sha256": "d1fb614cce50927a78735a6b6b283b64192fc77bee9616ab9cd7d4b00fbe7a3d",
  "crc32": 343316681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8084299,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50\u2561\u255f\u2558\u2514\u00b7\u2569\u2556\u00ed\u2556_12203328",
  "pdg_main_pages_found": 436,
  "pdg_main_pages_max": 436,
  "total_pages": 453,
  "total_pixels": 20890899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